

政治理论译丛

028-55

518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

[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 主编

施 杨 译



A094712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 言

这本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撰写的重要文章。这些学者聚精会神地从事的是对帝国主义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这本书是对过去出版的文选的补充，而该文选汇集的是围绕这些课题的问题和争论的重要理论看法。该文选将由“人类出版社”（HUMANITY PRESS）出版。这两个项目与我题为《关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即将出版）的专著中篇幅很长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一章有联系。这些研究项目代表多年来经济学和政治学教学的升华。在那段时间里，我讲授了两个关于发展和欠发达状况的政治学课程，但我未能说服我的同事们相信开设关于帝国主义的课程是有益处的。这样的课程应该将过去提出的问题和争论，与最近关于发展问题的文献相联系起来。当我于1990年受到经济学教育界的欢迎时，我的同事们举办了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研讨会。这样，这本书就从那段经历中诞生了。它是鼓励进行新分析的一种努力，这种分析既应该回头看并思考过去的贡献，但同时又应该思考帝国主义和发展在当代世界的前景。

我赞赏理解这种态度的同事们的支持，也特别赞赏参加研讨会大学生们，他们阅读了材料，他们通过每周的讨论和把观点写成文章，变得对问题和争论很敏感，而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又导致了理论上的突破。我还想感谢埃尔维亚·拉米雷斯，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社会学研究生，在我把这本书组织起来的初

级阶段里，她协助了我工作。我还要感谢克里斯塔·埃斯费尔特的执着的努力，她目前是印地安那州大学的研究生，是她使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完成。最后，我的夫人福兰希斯参加了工作，协助我协调最后的样书，特别是对参考文献资料的目录的校对。我也想感谢克鲁沃（KLUWER）学术出版社经济思想系列编辑沃伦·塞缪尔斯和威廉·达里泰，以及编辑扎哈里·罗尔尼克，他们一直鼓励我并通过出版这本书保证了本项目取得成功。最后，我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学术研究委员会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表示感谢。

罗纳德·H. 奇尔科特

第一 部分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遗产及当代意义

第一章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M.C. 霍华德

J.E. 金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们广泛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但赋予它的含义却很不同。然而，在该术语这样的多义性之下，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共同主题。对帝国主义的代表性理解重视这样一些过程，即将特定经济制度一体化于笼罩一切权力的结构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那些经济制度的各个专业体系的一体化也被加强了，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它们更加像一个协调一致运作的整体。典型的情况是，融合是按照不平等的条件进行的，这些条件涉及单向的主导和服从机制，因而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就变成了在国际关系和文化关系中间实行非经济性强制力的同义词（这有别于其在均一文化条件下扩大政治控制的做法）。

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多半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

做的工作。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经济学家都争辩说，从总体看，实行强制带来的是损失——所付出的净费用，它不能以相应的利润得到补偿。于是，理性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会认识到，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签订合同具有优越性，这是因为，通过自愿的交换，各方所能得到的好处，比起通过暴力冲突得到的好处要更多。因此，虽然帝国主义的现实很少被否定过，但学者们广泛认为，它应该是处于正统经济学分析的界限之外，因为，正统经济学把自己限制于合理获取财富的行动的逻辑。^① 熊彼德（1919）大概是从这种视角认识帝国主义的最出名的代表人物。他把帝国主义在现代的扩张，追溯到封建主义的顽固的残余势力。这种认识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但它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流派。^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的帝国主义。然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在历史上很独特，马克思主义者多次改变了他们研究的重点。我们把有关的理论划分为3个类型——原始的、古典的和新型的，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三、四和五部分中，批判性地评论每个类型的综合描述。第二和第三个类型是从前的理论的理所当然的产品，因此，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原始阐述。而且，这3个类型都包含持续性的认识，因此，从最基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反映了学术上的进步。实际上，分析有这样的倾向，即它滞后于事实的发展，故可以被指责是事后的理性化。但是，这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广泛表现出

① 随着信息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知识及转移费用的意义的增长，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善于解释暴力冲突为什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结局。请参看霍华德和库马尔（1999）。

② 请参看希尔施曼（1982）、麦业尔（1981）、穆尔（1966）和托洛茨基（1971）。

来的特点。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假设，即它是在现象首次出现之前已经被提出来的，有充分根据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该现象的假设。贬低帝国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是很困难的。在任何学派中，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认真否认过贸易的好处会促进越来越广泛的一体化。不管怎么样，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以及机构体系等因素的创造，各种帝国主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因素正是产生贸易物流的最贴近的原因。

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独特分析集中研究了英国殖民化的特点，但他把它们看成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的、普遍化作用的特点的例子。回过头看，他的思想可以被视为与英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具有最密切的关系。随着英国的衰退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的突出——它后来登峰造极，造成了两场世界大战爆发——马克思原来的见解因为希法亭（1910）、布哈林（1915）和列宁（1916）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而变得被关注（而不是被抛弃了）。这3个人的理论都强调发达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垄断化的出现，并把帝国主义侵略的动力和它们的直接目标的变化归咎于该垄断化。由于苏联与美国的两极关系的出现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征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个现象都是传统时代的理所当然的结局——那些理论的影响减弱了。现在，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对第三世界中资本主义推动变革的作用为什么滞后的问题。巴兰（1957）和弗兰克（1967）研究的主题是边缘地带的欠发达状态，他们把摆脱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看做是实现自主和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两人都坚持认为，要使边缘地区继续保持处于资本主义交流循环之内，光靠经济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非经济性的强制。

依附论仍然有很多信徒，但是，随着1960年后第三世界内

部资本主义结构的调整、70年代苏联经济的停滞不前及其在80年代的崩溃，这些信徒的行列缩小了。所有这3个事态的发展削弱了遏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提出来了，以容纳这些震撼世界的变化，虽然我们和它们的像沃伦（1980）和哈里斯（1987）那样的拥护者一起，把它们视为返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因为我们必须从就要结束的20世纪的历史学习很多东西，当代的理论家们超越了对19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思想的重复。不管怎么样，马克思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将按照其自身的形像创造一个世界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实现普遍的经济增长——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分析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要解释清楚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世界——即帝国主义特点更少的世界——怎么样才能继续表现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特点。在本文第六部分中，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

马克思以两种形式处理当代帝国主义。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指出了殖民化在作为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的创造中的作用。他争辩说，一旦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身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介质，资本主义关系正是通过它被扩散到中心国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话，都与他对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那些特点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为了明确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批判，而且也是为了能够评价它们启发出来的修改、倒退和思考。因此，我们将从勾画该模式入手，这种勾画将按照最初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时的因素来进行，同时将按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的思考情况改变勾画的重

点。^①

有5个因素是确定不变的：公共市场、对交换的普遍依赖、普遍化的对财富的获取、合理化的组织以及经济活动与政治和文化的隔绝。正如我们将简要地解释那样，正是这些特点的共同存在，对于那些因素的促进增长的能力，具有关键的意义，但是，在解释它们是如何地互相作用之前，我们将以分别描述它们开始。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企业的典型特点是，它们是为公共市场而生产的，而不是按照习惯性的规定，为当地顾客群活动的，而这后一种情况一直是历史上主要的交换形式。非个人化未必意味着在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市场关系消失了，而仅仅意味着，它们再也不与亲缘和社区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它们的主要联结以金钱为纽带。这样，只要人们认为或者当他们认为，建立新的合同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这样做。第二，诸如劳动力和土地这类输入因素的供应被市场化了，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也同样如此。保证以支付工资和租金交换输入因素的合同，主导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之间的配置，使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动性遇到的天然和法律障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除了特殊情况外，其后果是，为了解决自己大部分的消费需求，人们依赖于市场，以致自给变成不重要了。所有这一切，都与奴役关系，包括奴隶制和农奴制，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那些关系之下，劳动者合法地和一个主人，或土地，或两者拴在一起了，大量家庭需要的东西，都通过家庭生产或小型亲

^① 我们说的是霍华德和金做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准确描述（1976，第86~93页）。然而，我们的确进行了简化和夸张，并且使用了像维贝尔（1948、1983）那样的历史社会学家的术语。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强调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古怪。勒佛特（1978）讨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缘网络解决。第三，主导生产性企业的支配性动机是抽象化地获取财富，而它一般是用金融要素加以衡量的。与此不同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许多财主类型，所致力的是积累范围狭窄的资源，比如说土地，或者像马匹、仆人和宫殿那样的特殊东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性企业，寻求的是实现最大的利润，而相对来说不那么关心它们为了获得那种利润所买的或卖的实际商品。第四，在追求利润时，这些生产性机构组织得很合理，而不再由以家庭、亲缘关系以及顾客群为中心的传统原则所约束。利润的最大化要求尽量减少费用，因此，输入的因素要根据其生产效率来使用，并且按照有效的比例进行组合。对市场的依赖和由合同保证的关系，提供着一种灵活性，从而允许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够被改变，而这有助于为了利用获取利润的新机遇而必须进行的调整。

最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都倾向于把自己互相隔绝开来。特别是在封建制度下明显存在的对土地财产的占有与公共权威的结合，现在就不存在了，而教堂再也不拥有它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带来的典型特点，即突出的政治影响和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专门从事政治权力的行使，而这得到了对施行法律强制力量的垄断的支持，国家是通过按照司法自由原则执行正式和可预测的法律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法律具体规定各种类型的财主的权利，包括工人的权利，他们的主要财富是进行各种劳动的能力。根据某些重要的规定，关于排他性的控制、索取好处和放弃的权利被合法化了，以致不具备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们必须根据合同通过市场交换获取这些需要的东西。宗教组织也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它们被限制于散布思想和执行仪式，而这一切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独立影响很小。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们不要误解刚才谈到的资本主义这个特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职能被高度专门化的意义上看，各个方面的活动领域是分

开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再互相影响。虽然获取财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并且被允许自由地进行统治，但因为人们感到他们需要以超越的含义充实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事实，意味着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文化思想，将倾向于和物质利益相协调起来。而且，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自由产权的维持需要得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境相对较差的阶级的认可，办法是实现文化的神圣化和把政治影响缩小到最小的程度。因此，断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是互相分割开来的，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没有得到文化和政治上的支持，正如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也得到非经济结构的支撑那样。

如果拿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的话，这样的制度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它涉及强大但又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威，它拥有发达良好的公民权利但又限制人民的影响，突出鼓励获取财富但又限制享乐主义并鼓励诚实交易。这一切都说明了在 20 世纪中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事情：事实突出地证明了，输出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像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相信的那样那么容易。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在本文第三、五和六部分，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然而，有一个问题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机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资本主义企业获取财富的独特历史形式，提供着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它是普遍做到这一点的，而并不是将进步仅仅集中在少数部门之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善于管理财富和接受市场环境风险的那些人们能够相对容易地掌握对企业的控制，这一切都加强了那种动力。市场则不停地发生创新和技术变革。认识上自由的条件促进了发明能力本身；特别是任何有益于生产的知识，都再也不能由于被指责是异教而受到抑制，因为，宗教团体在政治上很弱。此外，因为经济活动的合法化是由市场需求确定的，而犯错误的代价必须集中由进行错误投资的人们来承担，所以，任何受到广泛欢迎的技

术变革，都倾向于成为真正有益于生产的变革。于是，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激励人们的因素，即要合理地提出自己的期望，要考虑到所有的当前可以得到的相关信息。与此同时，签订合同的自由和对市场的依赖，提供着在可以选用的全部的一整套技术面前合理组织生产所需要的适应能力。系统地限制输入因素有效组合的身份差别——它们可以凭等级、阶层和行会禁令等形式，通过法律强加于人们——再也不存在了。即使这些安排的结果可能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自由产权还是支持这种安排的，而能够认真威胁这些权利的任何民主参与，一般是靠压迫、制定意识形态限制和宪法规定的障碍加以抑制的。当现有的投资和稳定的关系在经济上被对生产更有益的新关系破坏时，熊彼德（1942）称之为迅速创新的“创造性的破坏”的现象，变得非常明显。

因此，决定着资本主义的5个特点，构成着互相支持和互相加强的综合体系。就这5个特点而言，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的经济制度，或缺少一个或缺少几个，马克思相信这是它们的生产一般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当它们证明能够提高生产力时，这只是以很低的速度实现的，在自然灾害、人口增长、政治权威的保守行动以及敌人的残暴面前，很容易出现倒退。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很不一样，它们表现的是突出的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倾向，而且迄今的事实证明，它们对任何长期倒退具有免疫力。继续对此有怀疑的那些读者，将会觉得在表1-1和表1-2中关于增长的统计数据，非常令他们感到困惑。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阐述

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阐述，将那些带来了劳动和土地的商品化的历史事件定位在西欧。这些事件导致了非土地资产的积累，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对劳动的雇佣和对土地的利用

成为可能。他断定帝国的征服很重要，但解释了殖民化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此时占主导地位的确是构成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典型特点的纳贡、掠夺和新奴役关系。但是，因为马克思的目的是集中解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根源，而不是解释其作用方式或在确立后的地理扩展，这里并没有什么不一贯性的地方。另外，他当时说的话是否正确，对于理解现代的世界，也无关紧要。^① 显而易见，考虑到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谈到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的确有强大的力量存在才使得与过去的结构性关系的决裂得以实现。他明确地把自己关于历史的评论，局限于在欧洲内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否认它具有任何普遍意义。^②

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身的解释正确或错误，具有伟大的意义。下面的提法构成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的核心。^③ 推动着地理扩张的动力是资本主义致力于获取财富的一般特点，不是其自身矛盾或特殊的全局性事件。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这些因素可以起作用，但仅仅是在其特殊形式和准确时间进程方面。有时资本主义能够进入现存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交换关系，并且靠自己的优越的效率，把它们改造成成为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渗透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阻碍或完全阻滞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某种形式的帝国统治和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的强制性结构改革，就成为使扩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影响，最终都将作为溶解已经确立的生产方式的溶剂发挥作

① 请参看欧布赖恩（1982）

② 请参看布莱克斯托克和霍塞里兹（1953，第217页）。

③ 请参看阿维涅里（1969）、霍华德和金（1985，第225-237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1888）。

用，同时又创造现代社会的基础——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基础。破坏倾向于在建设之前发生，这不仅是一个明显的顺序问题，但也是因为帝国主义最初表现出很多前资本主义特点来，它们反映着大都市中心的不完善的变革，而这些前资本主义特点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在自身本土上的纯洁化才消失。因此，虽然许多与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相关的现象——包括纳贡和赤裸裸的盗窃——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突出存在下去，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它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在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下的意义。最后，当在新区域发生真正的资本主义扩展时，欧洲已经实现的成就将在那儿得到复制，其中包括可持续增长。

在这些预言中，没有一个是经过细心推敲的预测，而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与当代关于增长的理论——绝对和有条件的趋同、依赖于道路的增长路程、增长俱乐部、增长的分化了的源泉等等——相类似东西。此外，某些相关的经验性现象，都很难解释清楚（在本文的第五部分，我们将更充分地对此进行评论）。但是，说到了这里，在最近的 150 年内发生的事情中，很多与马克思的预计是相一致的。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5 个特点，即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总结的那 5 个特点，在最初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被纯洁化了和广泛扩散到它们之外。^①正如雷诺兹（1985）和在表 1-1 及表 1-2 中的数据所证明的那样，它们也被与高速经济增长（以历史标准衡量的速度）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变数说明，进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具有遥远的意义，特别是在延长人类寿命、扫除文盲、都市化以及征服饥荒和灾荒的方面，^② 进步很突出。在地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仍然非常大，但是，它们多数可以被归咎于不均衡的发展。

① 霍布斯鲍姆（1962、1977b、1987、1995）、沃伦（1980）、冯劳厄（1987）。

② 瑟赫勒尔和肯尼迪（1993）、麦迪森（1995）以及尤谢尔（1998）。

表 1-1 1820~1989 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 (GDP)

单位:美元*

| | 1820 | 1870 | 1890 | 1913 | 1950 | 1973 | 1989 |
|----------------|------|------|------|------|------|-------|-------|
| 板块 A: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 | | | | | | |
| 奥地利 | 1048 | 1442 | 1892 | 2683 | 2869 | 8697 | 12519 |
| 澳大利亚 | 1250 | 3143 | 3949 | 4553 | 5970 | 10369 | 13538 |
| 比利时 | 1025 | 2089 | 2654 | 3267 | 4229 | 9417 | 12875 |
| 加拿大 | 不详 | 1330 | 1846 | 3515 | 6112 | 11835 | 17236 |
| 丹麦 | 980 | 1543 | 1944 | 3014 | 5227 | 10527 | 13822 |
| 芬兰 | 639 | 933 | 1130 | 1727 | 3481 | 9073 | 14015 |
| 法国 | 1059 | 1582 | 1955 | 2746 | 4176 | 10351 | 13952 |
| 德国 | 902 | 1251 | 1660 | 2506 | 3295 | 10124 | 13752 |
| 意大利 | 965 | 1216 | 1352 | 2079 | 2840 | 8631 | 12989 |
| 日本 | 609 | 640 | 842 | 1153 | 1620 | 9524 | 15336 |
| 荷兰 | 1308 | 2065 | 2568 | 3179 | 4708 | 10271 | 12669 |
| 挪威 | 856 | 1190 | 1477 | 2079 | 4541 | 9347 | 15202 |
| 瑞典 | 1008 | 1401 | 1757 | 2607 | 5673 | 11362 | 14824 |
| 英国 | 1450 | 2693 | 3383 | 4152 | 5651 | 10079 | 13519 |
| 美国 | 1219 | 2244 | 3101 | 4846 | 8605 | 14093 | 18282 |
| 板块 B: 其他欧洲国家 | | | | | | | |
| 希腊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1211 | 1456 | 5781 | 7564 |
| 爱尔兰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003 | 2600 | 5248 | 8285 |
| 葡萄牙 | 不详 | 833 | 950 | 967 | 1608 | 5598 | 7387 |
| 西班牙 | 900 | 1221 | 1355 | 2212 | 2405 | 7581 | 10881 |

续表 1-1

| | 1820 | 1870 | 1890 | 1913 | 1950 | 1973 | 1989 |
|---------------|------|------|------|------|------|------|------|
| 板块 C: 拉丁美洲国家 | | | | | | | |
| 阿根廷 | 不详 | 1039 | 1515 | 2370 | 3112 | 4972 | 4080 |
| 巴西 | 556 | 615 | 641 | 697 | 1434 | 3356 | 4402 |
| 智利 | 不详 | 不详 | 1073 | 1735 | 3255 | 4281 | 5406 |
| 哥伦比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1078 | 1876 | 2996 | 3979 |
| 墨西哥 | 584 | 700 | 762 | 1121 | 1594 | 3202 | 3728 |
| 秘鲁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1099 | 1809 | 3160 | 2601 |
| 板块 D: 亚洲国家或地区 | | | | | | | |
| 孟加拉国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519 | 463 | 391 | 531 |
| 中国 | 497 | 497 | 526 | 557 | 454 | 1039 | 2538 |
| 印度 | 490 | 490 | 521 | 559 | 502 | 719 | 1093 |
| 印度尼西亚 | 533 | 585 | 640 | 710 | 650 | 1056 | 1790 |
| 韩国 | 不详 | 不详 | 680 | 819 | 757 | 2404 | 6503 |
| 巴基斯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611 | 545 | 823 | 1283 |
| 中国台湾 | 不详 | 不详 | 564 | 608 | 706 | 2803 | 7252 |
| 泰国 | 不详 | 741 | 801 | 876 | 874 | 1794 | 4008 |
| 板块 E: 非洲国家 | | | | | | | |
| 科特迪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888 | 1699 | 1401 |
| 加纳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484 | 724 | 724 | 575 |
| 肯尼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794 | 794 | 886 |
| 摩洛哥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1293 | 1293 | 1844 |
| 尼日利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1040 | 1040 | 823 |
| 南非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037 | 5466 | 5466 | 5627 |
| 坦桑尼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578 | 578 | 463 |

* 按照 1985 年的美元和美国商品价格换算。

资料来源：麦迪逊（1994），第 93 页表 2-1

表 1-2 1820~1989 年人均国内总产值 (GDP) 增长率
(综合增长率年平均百分比)*

单位: %

| | 1820~1870 | 1870~1913 | 1913~1950 | 1950~1973 | 1973~1989 |
|----------------|-----------|-----------|-----------|-----------|-----------|
| 板块 A: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 | | | | |
| 奥地利 | 0.6 | 1.5 | 0.2 | 4.9 | 2.3 |
| 澳大利亚 | 1.9 | 0.9 | 0.7 | 2.4 | 1.7 |
| 比利时 | 1.4 | 1.0 | 0.7 | 3.5 | 2.0 |
| 加拿大 | 不详 | 2.3 | 1.5 | 2.9 | 2.4 |
| 丹麦 | 0.9 | 1.6 | 1.5 | 3.1 | 1.7 |
| 芬兰 | 0.8 | 1.4 | 1.9 | 4.3 | 2.8 |
| 法国 | 0.8 | 1.3 | 1.1 | 4.0 | 1.9 |
| 德国 | 0.7 | 1.6 | 0.7 | 5.0 | 1.9 |
| 意大利 | 0.4 | 1.3 | 0.8 | 5.0 | 2.6 |
| 日本 | 0.1 | 1.4 | 0.9 | 8.0 | 3.0 |
| 荷兰 | 0.9 | 1.0 | 1.1 | 3.4 | 1.3 |
| 挪威 | 0.7 | 1.3 | 2.1 | 3.2 | 3.1 |
| 瑞典 | 0.7 | 1.5 | 2.1 | 3.1 | 1.7 |
| 英国 | 1.2 | 1.0 | 0.8 | 2.5 | 1.9 |
| 美国 | 1.2 | 1.8 | 1.6 | 2.2 | 1.6 |
| 板块 B: 其他欧洲国家 | | | | | |
| 希腊 | 不详 | 不详 | 1.4 | 3.1 | 1.3 |
| 爱尔兰 | 不详 | 不详 | 0.7 | 3.1 | 2.9 |
| 葡萄牙 | 不详 | 0.3 | 1.4 | 5.6 | 1.7 |
| 西班牙 | 0.6 | 1.4 | 0.2 | 5.1 | 1.8 |

续表 1-2

| | 1820 - 1870 | 1870 - 1913 | 1913 - 1950 | 1950 - 1973 | 1973 - 1989 |
|---------------|-------------|-------------|-------------|-------------|-------------|
| 板块 C: 拉丁美洲国家 | | | | | |
| 阿根廷 | 不详 | 1.9 | 0.7 | 2.1 | -1.2 |
| 巴西 | 0.2 | 0.3 | 2.0 | 3.8 | 1.7 |
| 智利 | 不详 | 不详 | 1.7 | 1.2 | 1.5 |
| 哥伦比亚 | 不详 | 不详 | 1.5 | 2.1 | 1.8 |
| 墨西哥 | 0.4 | 1.1 | 1.0 | 3.1 | 1.0 |
| 秘鲁 | 不详 | 不详 | 1.4 | 2.5 | -1.2 |
| 板块 D: 亚洲国家或地区 | | | | | |
| 孟加拉国 | 不详 | 不详 | -0.3 | -0.7 | 2.2 |
| 中国 | 0.0 | 0.3 | -0.5 | 3.7 | 5.7 |
| 印度 | 0.0 | 0.3 | -0.3 | 1.6 | 2.7 |
| 印度尼西亚 | 0.2 | 0.5 | -0.2 | 2.1 | 3.4 |
| 韩国 | 不详 | 不详 | -0.2 | 5.2 | 6.4 |
| 巴基斯坦 | 不详 | 不详 | -0.3 | 1.8 | 2.8 |
| 中国台湾 | 不详 | 不详 | 0.4 | 6.2 | 6.1 |
| 泰国 | 不详 | 0.4 | 0.0 | 3.2 | 5.2 |
| 板块 E: 非洲国家 | | | | | |
| 科特迪瓦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9 | -1.2 |
| 加纳 | 不详 | 不详 | 1.1 | -1.1 | -1.4 |
| 肯尼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6 | 0.7 |
| 摩洛哥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0.7 | 2.2 |
| 尼日利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4 | -1.5 |
| 南非 | 不详 | 不详 | 1.2 | 2.3 | 0.2 |
| 坦桑尼亚 | 不详 | 不详 | 不详 | 2.4 | -1.4 |

* 按照 1985 年的美元和美国商品价格换算。

资料来源：麦迪逊（1994），第 97 页表 2-2

不管怎么样，连对历史最富有同情心的阅读，也没有完全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相一致。他的最明显的失败在于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的估计。他把印度的状况视为具有典范式

的意义，还把他相信是亚洲社会的不变的本质，视为一切非欧洲人社会的普遍特点。在 19 世纪中，这种观点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观点，它既不是始终一贯的概念，也不是由经验证明为准确的概念。^①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说，这些缺点的意义很小，因为，在西欧之外，有利于内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看来并不存在，或者是特别脆弱的，几乎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制度阻碍和平方式的变革。因此，虽然马克思关于非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严重偏差，但其缺点并不对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扩展的前提条件这一看法产生严重的损坏。他没有赞同经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两大幻想——暴力的使用是前现代社会的做法和不利于生产的——但他相信关于在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端所产生的大规模暴力是时代性错误的信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而不是围绕各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开展的，即他相信，现代性的扩散，主要是跨国家主义的表现，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表现。他还展望一切形式的特定个性的消失，而这些个性包括对民族经济制度、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忠诚。然后跟上来的将是沿着本质上是和平的渠道产生的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广泛的一体化，而一旦资本主义的条件普遍化，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就没有用处了。^② 看来，马克思

① 安德森（1974a：第 462 - 549 页）、霍华德和金（1985，第 225 - 237 页）、沃尔夫（1982）

② 当然，马克思想像的暴力冲突，将作为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抗继续下去，但他预计这些将代替其他形式的互相支持，而无产阶级的觉悟被认为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普世主义，不是新的特殊性。的确，马克思很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战争的影响能够使社会发生变化。请参看吉登斯（1981）和灵克雷特（1990）。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相信非阶级性冲突将削弱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提出的理由则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理由很相似，因此，虽然我们能够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关于帝国主义传统理论的痕迹，但是，这需要忽视或贬低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性的认识。

完全没有想到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列强将以帝国主义的武器互相进攻。他毫无疑问受到了“漫长的 19 世纪”的相对和平条件的影响，他在军事敌对状态凸现出来之前逝世。恩格斯继续活下去，认识到了问题，而且对正在逼近的被工业化了的战争灾难感到恐惧。

四、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理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归纳现代国家间的体系，甚至的确根本上很少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通过讨论资本的集中，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弥补所形成的空缺。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希法亭（1910），所有其他的传统著作（除了罗莎·卢森堡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之外）都大大受益于他的富有开拓性的工作。这种说法肯定适用于布哈林（1915）和列宁（1916a），这而且是他们亲自承认的，尽管他们对希法亭的思想进行了最激进的解释。

在这些传统著作中，没有一部（包括吕克斯的著作）否认马克思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话，但他们重点研究的问题转移到了对资本主义势力间的帝国主义冲突进行解释。^①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垄断化已经使经济和政治结构日益结合起来了，使每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国家机器联合起来了，而原来是很活跃的普世主义的谈论部署和自由主义的机构则被瓦解了。资本主义获取财富的特点仍然能够引起共鸣，但它现在以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向外部世界经济。面对着基本上已经被殖民化了的世界，它转而支持

① 许多历史学家坚持把它们理解为对 19 世纪的殖民化的解释，而作为对他们的反应，埃斯灵顿（1982）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

持有这样的目的的战略，即要实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或霸权领域之内的一体化。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一种新的结构上的互不相容的状况已经成熟起来了。那些推动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力量仍然没有被削弱，但它们被分割在拥有主权的政权之间，这些政权只能在互相损害的情况下迅速成长起来。现存国家或者这些国家的帝国国界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进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皇”，他否认上述结论，他的论据既正统，又激进。他争辩说，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对列强来说，谨慎而聪明的办法还是建立一种超帝国主义制度，并且根据它们相对的力量，将经济领域瓜分给它们的资本家，让他们共同地剥削世界。当然，考茨基面临过如何解释1914年敌对活动为什么爆发原因的问题。他通过指出军国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各个阶级都会顽固维持自己的权力，来作出这种解释。许多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把本国的事业作为最进步的事业或其不进步特点最少的事业来向其提供支持。^①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的含义使欧洲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裂。

对考茨基的主要反驳来自列宁。列宁认为，因为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均衡，为继承和重新瓜分财富的霸权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具体地说，英国和法国对世界经济进行的控制，超越了它们在生产上的相对意义。在此前半个世纪中，德国和日本这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急剧地加速了，它们现在觉得自身的未来发展受到阻碍。为了重新分配其他列强的财富，并且使那些财富从属于它们自身的积累过程，它们选择采用暴力作为惟一可靠的

① 霍华德和金（1989，第93、123-124、247-248、252、274页）。

手段。列宁继续说，不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怎么样，持续不断的不均衡发展过程，将对任何战后的安排起动摇作用。^① 考虑到在 20 世纪上半叶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些思想甚至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费歇尔（1974）、吉尔品（1981）和肯尼迪（1989），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管怎么样，假如列宁当时能够从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抽出自己的结论来的话，其论据本来会得到相当可观的加强。

在竞争或垄断化的条件下，任何资产阶级都从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内部的调节中，获得重要的经济支持。在内部和外部对产权的保护，仅仅是最明显的好处。统一的符号系统的创造，包括统一的语言、共同性的基础设施供应以及促进通过合同的特定机构的网络的建立，这些也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垄断资本可以和国内的政治权贵们建立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各国民族资本主义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很可能会加剧它们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② 但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发展阶段中，对于资本家来说，其对“居住地点的优先考虑”方面持久性因素的加强，都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为对国家的效忠和旨在扩大国家活动的霸权范围的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③ 因此，在对帝国主义间冲突的解释方面，无论是资本的集中还是不均衡发展，都不会互相矛盾，但是我们不应该像几乎所有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家们那样认为，它们

① 霍华德和金（1989，第 243~266 页）。

② 费德斯坦和霍里欧卡（1980）、葛森克隆（1966）、汉普顿-特纳和特罗姆佩纳尔斯（1993）。

③ 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比如说格尔内尔（1983），正是强调这些考虑。布尔迪约（1986）以关于资本的扩大的概念提供了补充性的理解——按照博奕论的语言，有些东西支持依靠道路的发展，把多数经济活动置于民族国家的管理之下；请参看阿齐恩和霍维特（1998）、阿瑟（1994）、鲁卡斯（1995）和诺思（1990）。

构成了与马克思时代竞争性资本主义条件的彻底决裂。除此之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可以被尖锐地批评没有认识到教区主义和侵略的持久性的经济基础。

不管怎么样，在重新评估国家时，希法亭（1910）和布哈林（1915）的确点出了怎么样才能将某些考虑与马克思主义者统一起来的方式。他们认识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发的监视及跟踪技术和扩大了合理组织能力的巨大进步。布哈林甚至走得很远，像个新利维坦主义者那样，以国家条件谈问题，把国家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起主导作用的结构，因为它对整个公民社会发挥着深刻的管理作用。这作用包括将工人阶级集体活动加以制度化或者将它们与本国目的同化。的确，在布哈林写的东西中，很多内容看来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加符合政治现实。现代的国家被当做个别的角色扮演者，它们在应对着权力平衡被破坏了的世界。这样的认识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不仅可能涉及由资本主义获取财富支配一切的特点所驱动的经济一体化，而且也与作为国家行动的国家议事日程有某种关系。正如罗森贝格（1994、1996）的工作所证明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完全接受这种思想。但是，它对像吉登斯（1981、1987）、曼（1986、1993）和斯科克波尔（1979、1992）那样的历史社会学家们产生了影响，这些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分析，但争辩说，文化和权力互相竞争支配一切的特点，产生着各种动力，而马克思仅仅认定其中的一个动力。

1914年后，在学术上，布哈林对列宁的影响很大，他和列宁一起将他们关于国家的分析，用于对历史变革进程中的一个新排序进行论证。^① 马克思本来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导致革命的基础这样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而现在他们补充了战争作

① 霍华德和金（1989，第243～266页）。

为一个中间变量。在这方面，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要承认在各个国家政府指导下形成的阶级妥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妥协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只有通过打碎这种国内的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成功的革命变革。此外，列宁认识到了，除非现代国家内在的镇压性能力崩溃了，否则它们不能轻而易举地被革命家们征服。想贬低这些认识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从俾斯麦的时代起，任何一个列强之间的暴力冲突，都给失败的一方带来了革命的高潮，给胜利的一方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①因为关于垄断资本和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这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进行了某种肯定。但是，在论证这一点时，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理论揭露了一个问题，即经济决定论究竟适用于哪些实体的问题。是世界体系，还是在本国内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显而易见，因为把带来变革的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世界经济结构，生产能力的分配，而不单纯是生产力的综合发展水平，才成为了关键的因素。然而，这意味着，另外一套可变因素进入了决定事务发展的基本因素中，使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对简单的提法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从理论上论证俄国革命符合关于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靠布哈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进行的。简单地说，俄罗斯帝国是最弱的环节，它首先断裂了。但是，在俄罗斯发生的这些变革，当然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必须适应这个新世界。它的理论家们的反应是突出夸大国家和民族中的阶级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争辩说，帝国主义带来了各地受压迫人民（工人、农民以及甚至被殖民化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团

^① 波尔特尔（1994）和斯科克珀尔（1979）

使结束帝国主义时代的前景更加有希望。

看起来，提出反对意见的惟一办法，仅仅在于使已经确立的理论适应两极化的世界的条件，具体是通过修改和加工共产国际理论家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这就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它构成着对帝国主义分析的第三个阶段。其目标仍然和过去一样——理解资本主义需要的经济研讨会过程——但焦点转移了，人们重新集中研究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核心国家面临的新问题是，要保持第三世界与资本循环体系的一体化，遏制苏联控制的经济体系的扩张，消除为了对付市场力量而被建立起来的一切传统和现代形式的保护。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深信，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需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列强经常施行暴力，以保证不发达地区对它们的服从。仅仅依靠经济是永远不能成功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贫困化过程，现在绝大部分集中发生在大都市地区之外。遵循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理论提出的修改，新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解释的运动规律，再也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操作。工资已经提高到了大大超过生存水平，福利政策使收入明显得以重新分配，工人阶级再也没有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了。人们广泛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继承下来的贫困化特点，现在被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因此，在国际范围内的剥削就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普遍更加注意关于各国对道路的依附性的观点，而传统马克思主义那儿没有这个观点。对马克思来说，在世界经济的不同的地区里，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的。有些国家的发展启动得早一些，有些国家发展得快一些，但是，它们的相互作用越大，它们的整体发展速度就越快，而只要国际上的不平等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造成的，它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上的意义。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所有这一切提

出了质疑。启动得更早的国家得到了某种意外事件带来的好处，该事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但是，这些国家改变了后来开始发展的国家的环境，因为前者创造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发展的道路，另一条是欠发达的道路。

新理论也有新意，即它争辩说，实际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比起他关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解释，更具有普遍性。但是，因为新理论吸收了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它与传统理论也有一些连续性。像巴兰（1957）和弗朗克（1967）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了，争辩说，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把世界经济构建成为一个在边缘地域复制不发达状况的形式，该地域遭受的剥削，对于核心国家自身的经济积累，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找出这样的诊断的同时，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经济发展导致革命，而是要把革命视为经济发展（按照苏联的路线的发展）的先决条件。继续留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之内，只能带来依附性的发展，经济增长只能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的反应。他们认为，实现独立的经济过程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需要，边缘地域国家的经济已经变得畸形了。^①

在分析这种不发达状况时，与从前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相比较，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因为，他们超越了关于外来的强制作用与“经济力量的单调的强制作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在核心国家的经济中，资本主义企业享有市场权力，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经济管理者活动。这样，关于市场力量—强制制度的两分法被纳入到了连续的统一体的极端，这里，特定决策

^① 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对这个思想的预见。请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894）。

者的权力与市场过程结合在一起了。战略性的互动既不是纯粹的强制，但也不是分散的竞争对纯粹市场的依赖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两者的相结合，统治和服从的不平等关系在经济关系内部存在。马克思多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除了在劳动过程的框架内，他不愿意或者未能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传统理论不得不承认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他们未能把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互动纳入他们的研究之中，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者却做到了这一点，是他们研究问题的背景迫使了他们必须这样做。

把国内的工人阶级纳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美国通过正式的军事联盟和国际经济协议对其他核心国家行使的霸权，意味着这些国家之间或内部的争端，主要是靠奈（1990）称之为软合作权力的手段解决的。在大部分问题上，边缘国家继续被排斥在解决问题的网络之外。在核心国家之内，文明化过程变得更明显，但很少被扩展到其外部。因此，边缘国家获得的非殖民化和国家的建立，掩盖了世界经济两个部分之间的非常现实的差异。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公式，包括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都没有抓住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至少具有同等意义的是，这些国家必须进入互相发生作用的国家网络，这些网络支持着各种合作协议，而这些协议涉及加入世界经济的具体规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有关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而边缘地域有关国家正是因为被排斥在外，就缺乏所需要的影响，故不能形成实现进入上述网络的背景的最好方案。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权力的多方面性本质的意义，这也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对于马克思和传统理论来说，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相对清楚的事情，它涉及依靠权力实现经济一体化，而这被视为有别于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合作。一旦认识到了大的经济和政治单位仅仅通过市场活动就能够行使权力，

这样的区分再也不是显而易见的了。现在就有可能把跨国公司、核心国家、国际组织和制度化的协议描述成为帝国主义的，即使没有使用暴力也如此。人们倾向于把帝国主义当做滥用权力的术语，而不当做一个分析的范畴，这并不是为奇。那种分析范畴适用于所有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着因差异而产生优势的迹像的话。这不仅仅是不严谨的思维表现。事实证明了，权力和统治是最难于准确解释的现象。像葛兰西（1988）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像布（1986）、鲁克（1973）以及福（1979）那样的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他们的工作至今对关于帝国主义文化上的研究产生了更大得多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很少被运用于经济分析。^①

就以经验为依据的内容而言，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关于第三世界里情况的描述，并不像人们（不管我们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说的一切，在这些人中过去也包括我们^②）经常以为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虽然表 1-1 和表 1-2 里关于增长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进步很广泛，它们同时也暴露普里切特（1997）称之为**离题，最高的一级的情况**。18 世纪 20 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经历了明显的趋同过程，使各国人均 GDP 趋向一致。与此同时，增长的两极分化特点表现了对扩展效应的主导，具体地说，是上述集团与整体的边缘地域国家经济的距离进一步拉开了。在 1820 年，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平均收入比例是 2.5:1，现在是接近 10:1。上述集团中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印度是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焦点，也是经济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能够提供完整的数据，它们表明，美国与印度

① 然而，请参看哈尔格里弗斯·希普（1989）、哈尔格甲弗斯·希普和瓦鲁法基斯（1995）以及罗思柴尔德（1971）。

② 霍华德和金（1992，第 205-224 页）。

之间的平均收入比例，已经从 3:1 扩大到了将近 18:1。世界上经济富裕的国家仍然只是一个小集团，它们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日本是唯一成功地加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集团的没有欧洲根子的国家。

与经济增长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干预，镇压了旨在打破现状的许多尝试。这种镇压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致力于实现本国某种形式独立发展的运动，这种镇压大大超过旨在对付苏联扩张的斗争的范围。^① 按照今天传统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华盛顿主张的共识），这些运动的要求都是错误的战略，因而注定要失败，但是，这种说法是幼稚的。许多尝试在还没有起来之前就已经被镇压了，因此没有成为以经验为依据的指责的对像。那些战胜了西方的反抗运动，常常被隔离在世界经济之外，并且被强迫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国内资源发展经济，而没有被允许去创造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即始终被认为是李斯特式战略^② 的合理因素。更普遍的是，现在已经拥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旨在实现现代化的革命（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和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同时都是很重要的，是成功地加入世界经济的先决条件。^③ 多数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的亚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因素在于，作为核心国家旨在遏制苏联扩张的明确战略的一个部分，它们

① 乔姆斯基（1991、1993、1996）、科尔科（1988）。

② 巴克豪斯（1992）、拜罗赫（1993）、克鲁格曼（1991、1995）。我们要提出的观点不仅仅是说，如果古巴、尼加拉瓜和越南的革命家（我们随便选择了这 3 个例子）没有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激烈抵制的话，它们在经济上的表现会更好得多。更一般地说，关于相对增长率的经验依据，不是相同于大自然提供的增长，也不相同于自由选择的工业化战略的结果。它是由帝国主义活动塑造的。

③ 拜罗赫（1993）和斯科克珀尔（1994）。

被允许在经济政策上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方面它们相对自由。它们的经历也表现一种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是外在的安全问题，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些动力，使他们能够促进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除非资本主义的剥削。^①此外，帮助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机制，向我们暗示，虽然为实现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不大可能是足够的。正如阿默斯顿（1989）、埃文斯（1995）和韦德（1990）争辩的那样，看来，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既包括行政上的独立性，又包括通讯网络的建设和公务员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交流。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都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它们没有制定过关于国家官僚制度的完善的理论。^②此外，在本文第二部分阐述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能够误导人们的，因为，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它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即它片面地倾向于认为，国家与资本是最低限度和互相保持距离地相互作用的。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欠发达状况的阐述，把马克思最初的设想中其他错误的考虑也指出来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财富的追求，还是贸易的扩大，都没有始终促进生产能力。与此相反，它们能够加强外来的非经济性强制，以便从在其技术相

① 贝特兰（1990）、霍尔（1986）、肯尼迪（1989）、曼（1988）、罗森贝格和伯尔茨尔（1986）、森（1995）、斯科克珀尔（1979）以及替利（1992）。

② 尽管如此，某些有用的工作正在积累起来。请参看埃文斯（1995）、鲁施梅耶尔和斯科克珀尔（1985）、杰索普（1990）、诺思（1981）、奥尔森（1993）以及乌登（1996）。就关于“公众的选择”的文献而言，可以说的最好的意见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它，但它最终不能说明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政治当局都堕落为蒙博托主义。

对停滞不前的国家里活动的生产者身上榨取利润。^① 完整的一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经常受到帝国控制遗留下来的制度的阻碍。其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政治发展超越经济发展的地方。殖民地的移民们正是因为没有受到当代资产阶级遏制，而能够为国内的精英阶层奠定一个基础，使他们能够通过现代国家机器，很容易地获取资源。此时，不利于生产的直接谋取利润的活动处于第一位，通过强制性地贯彻执行可靠的产权法规来促进积累，退居到第二位。^② 总之，事实证明了，在本文第二部分里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并非像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它们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我们强调指出，如果这些特点同时出现，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因此，无论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还是人们不可能为其提供理论依据的情况，都不能否定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真正弱点在于其作者们视其核心的因素为，关于边缘地域

① 霍华德和金（1992，第 205～224 页）。

② 埃文斯（1995，第 43 页）提供了一个极端但是很说明问题的解释：“一旦蒙博托在 1965 年控制了扎伊尔时，他和自己在扎伊尔国家机器里的人马，有计划地盗窃了扎伊尔的丰富的铜、钴和钻石的矿藏，从而积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国内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也表现在大量的在欧洲的别墅，以及存入瑞士银行的数量未确定的存款。扎伊尔人虽然纳税，但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甚至不能指望他们的政府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在蒙博托统治 15 年后，比如说公路网，已经完全‘解体’了。在蒙博托头 25 年的统治下，扎伊尔的 GNP 每年以 2% 的比例减少……使这个资源很丰富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国家等级制度的底部，还使国家的居民生活苦难，其严重性和在比利时统治下一样坏或者更坏……政府在镇压方面的效率，大大超过其建设公路的效率。国家对……（比如说 1978 年班顿都省一个征税官被杀死一事）的反应……是它派了两队士兵，屠杀了当地的 700 人。后来还绞死了 14 个男人，说他们是杀死税务官的‘集团的头子’……”另外请参看阿拉维（1972）、拜罗赫（1993）、巴格瓦替（1982）以及鲁卡斯（1995）。

的贫困和核心地域的发展。虽然巴兰、弗朗克及他们的追随者们表达了与上面描绘的论点相类似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服从他们视为主要力量的因素——把剩余资本从南方转移到北方，而通常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垄断化。^① 凭借感觉来说，这种思想不能说是缺乏始终一贯性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剩余资本一旦被榨取后，为什么就没有被用于支付边缘地域的积累的费用，却与此相反地被留存在核心地域，以扩大这里的投资和消费。此外，被转移剩余资本的可取金额的上限也是很小的，因此，它不能被算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今天的繁荣的重要因素。积累首先是按照符合算术的规律进行的。目前，核心国家的经济构成世界产量的将近四分之三，而资本——产出比例大约为 3:1，对其他经济的剥削，显然不足以解决它们再生产的需要。^② 多数边缘地域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它们没有能力生产剩余资本，或者没有能力阻止剩余资本被抽出去，并以促进生产的方式利用它。我们很难拒绝这样的结论，即新马克思主义者被误导了，其原因在于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因为把民族和国家与阶级等同起来，财富与贫困也就被紧密地与国际剥削联系在一起了。

这里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误解。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在其范畴究竟适用于哪些变数的问题上，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而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来坚持说，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且只能是一个世界体系。对于他们

① 埃曼努尔（1972a）强调在看来是竞争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尽管如此，驱动其结果的是核心国家经济（不是巴兰 [1957] 和弗朗克 [1967] 提出的对产品市场的垄断化）的劳动力市场里的市场力量，而在任何情况下，他的结果不巩固。请参看霍华德和金（1992，第 186~204 页）。

② 格里芬和古尔利讨论了在早期对殖民地的剥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核心地区的经济积累作出了贡献。

来说，各国的经济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因此，各国的资本主义是一样的；边缘地域没有迅速的趋同，被归咎于笼罩着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结构，而没有被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失败，即它们没有能够使自己牢固地被建立在核心国家经济之外。此外，不管如何解释它，历史唯物主义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弱点。边缘地域国家的经济没有充分地适应技术的潜力并利用它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相反，统治者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积累的办法，而过于经常地采用了非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从生产者那儿榨取资源。历史唯物主义者错误地认为，一旦适用于资本主义式发展的一项技术诞生了，它就将带来相应的产权，而为了保护那些产权，发展很良好的国家将伴随着它而产生。第三世界的危险的状况表明，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普遍正确的。一些强有力的变数干扰着所假设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和在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能够唯物主义地分析苏联的生产方式。同时，它对该制度略为淡化了的形式对依靠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影响也保持沉默。无论是巴兰（1957），还是弗朗克（1967），还是他们的多数追随者，都不能被正式地确认为对斯大林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精英集团没有进行过批判的人们。但是，看来他们都认为，有关的问题都主要是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在这些经济制度的本质中，不存在任何能够造成浪费和衰败的因素。迅速的发展被视为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它仅仅涉及剩余资本的积累和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设备的安装。他们从来没有准确地研究如何才能制止政治统治者对本国社会进行恐怖，如何才能使经济代理人不贪污，以及如何才能在那些拒绝世界市场而追随他们的政策的边缘地域国家里，建立能够维持效率的机制。再说一遍，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可能对此有一定的责任。总之，他把史前史和社会主义之间的

区别确认出来了，从而暗示了，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被局限在革命之前的时期里，而一旦完成了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它们再也不会构成什么问题了。

从70年代的初期起，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成为了一系列的批判的对像。^①一些批评家本身没有提出站得住脚的论据来，因为，他们把增长的记录理解为明显地与欠发达状况相矛盾，而且还忽视了帝国主义减少输出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他们非常肯定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不那么注意世界经济的结构是否会允许奇迹得到更广泛得多的推广。在边缘地域国家里的国内权力体系，都被他们视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他们并不承认帝国的控制对这些权力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因为在关于剩余资本转移的解释方面，关于欠发达理论的支持者们存在内在的弱点，他们的地位也就严重地被削弱了。后来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旨在对欠发达国家进行遏制、推倒和更广泛合并的项目取得了胜利，从而使那些关于欠发达理论的支持者们所支持的沿着苏联路线的独立发展战略彻底瓦解了。

六、展望未来：帝国主义结束的年代， 还是新的开端？

像沃伦（1973、1980）和哈里斯（1987、1990）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普遍的情调是要宣布回到马克思。他们的立场的逻辑意味着帝国主义有一种主要是历史性的意义：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建成了，协调主要是经济上的事情，文化上的均一化在迅速进行。他们也认为，暴力的手段已经发展

^① 霍华德和金（1992，第205~224页）。

到了顶点，对它们的充分使用，不能为任何合理的经济目的服务，而在今后的一体化中，合作很可能会处于主导地位。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还能找到帝国主义的残余。世界经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主导，它们还控制着用于调控的机构。它们执行的规则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些规则在正在兴起的市场中起了很野蛮的破坏作用，这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看出来，这些疗法和计划常常得到非经济性强制措施的支持。^①然而，虽然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编织成一个故事，把帝国主义描绘成活着的和活跃的，但是，按照这样的前景，与过去的150年的记录相比较，它已经淡化了。

认为它将继续削弱，是有道理的。这是制定美国战略的人们的伟大设计，他们正在绘制他们希望的未来世界体系的结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被纯化，要消灭其资本主义前时期的残余和不自由的做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被进一步调节，这既将涉及经济上的相互作用，又将涉及军事上的合作。全球监控技术和在全球范围的军事力量的使用规划，目前已经非常发达，它们今后还要改进，并被用来普及那些构成核心地区的特点的法律与秩序的条件。如果那样的计划获得成功，人们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不会再度发生，还可以认为，关于增长的趋同的经济学规律将比起过去任何时候更广泛和强烈得多地发挥作用。目前的趋势已经表明，各种资本主义之间的制度性差异正在削弱，而这些趋势还会得到加强。国际组织将能够加强其权力并演化成为世界政府。随着产权的巩固，剩下的对资本

① 乔治（1988）。为了解决债务危机而执行的休克疗法和结构调整计划，都成功地恢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改善目前的赤字，以及强迫执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但在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方面，它们的成绩是灾难性的。

流动的障碍会完全消失，以致目前的边缘地域国家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能够成为实现迅速发展的强大基地。此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将真正地得到普遍的推广，他的经济预言也将始终一贯地得以实现。此外，在异化、不公正、剥削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再也不必对待那么多的复杂情况，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将变得不那么四分五裂。^①

设计与此完全相反的前景也是非常容易的。在分散的国家里，继续出现不平衡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很多国家继续是极其强大和具有特殊性的。很多的一体化过程还有待完成，而因为缺少法律上的统一，这意味着，不同的政治权力机构在许多地方发生磨擦。假如在某个地方环境的衰退接近了绿色运动所坚持说的那种程度，在 21 世纪就会形成一次全球性的李嘉图式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但是，环境问题可能更多地带来暴力冲突，而不是长期不变的停滞状态。用武力解决分歧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一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告诫的那样，^② 他们所说的话，可以重新套入罗森贝格（1994、1996）和华勒斯坦（1983、1984）的马克思主义框架里。看来，导致增长上的离题的因素是非常强大的，并且是不容易逆转的。如果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和促进两极分化的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的明显的不平等就

① 布热津斯基（1996）、格尔钦和斯坦尼斯拉夫（1998）、果姆佩尔特和拉拉比（1997）、弗甲德曼（1996）、福山（1992）和世界银行（1997），旨在消除边缘地带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式的项目的基础，是比自由地改变宗教信仰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考虑。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要求加强协调的规则，因而要求有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简单地但不是不准确地说，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觉得，在由坏蛋和流氓管理的法律制度里（特别是在政治合法性问题预示着将来会出现政治混乱的地方），扩大商业业务的费用是越来越大的，请参看比如说卡普斯坦（1996）。

② 伯恩斯坦和蒙罗（1997）、弗里德曼和勒巴尔德（1991）、卡尔腾（1992）、亨廷顿（1996）、肯尼迪（1989、1993）以及米尔斯海默（1990）。

会继续扩大。因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来说，多数边缘地域国家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很可能只会花费很少的资源来帮助边缘国家实现发展。因此，新的传统帝国主义时代和新帝国主义的继续存在，都不能作为一种关于极糟社会的幻想而加以否定。

重新研究帝国主义

迈克尔·巴拉特·布朗

我在 40 年前开始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次邀请我重新研究 40 年来自己提出的论据，既是进行自我批评，又是进行自我肯定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回答批评自己的人们，此时可以接受或者拒绝他们的批判。我们可以考虑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论，也可以考虑作为该过程的结果而形成的自己的新思想。在本文里，我试图做到这一切事情，然后在最后，就我提出的核心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个问题，来作出判断。因此，在本文里，我以自己在早期的关于英帝国的历史研究入手，以最近从事的实际工作结束。这些实际工作是在受到帝国主义建立的不平等关系折磨最多的那些人中间进行的。

按照这样的观点，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但这种扩张采取的形式不只一种。在一种形式中，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制度被简单地复制了。新的人群在新的地点开始采用该制度，剥削劳动，以获取利润和积聚资本。他们互相之间开始按

照大体上是平等的条件进行交换，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在欧洲、美国、欧洲移民定居的英国保护地、日本以及最近在东亚的扩张中所发生的情况（巴拉特·布朗，1974，第96页）。在另一种形式中，建立了殖民地，但它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定居点，而是有依附性的地区，通过经济之外的手段，包括奴隶制度，要求这些地区仅仅供应有助于资本主义中心的积累所需要的货物或服务（巴拉特·布朗，1974，第96页）。正如乔夫·凯争辩说的那样，“它们没有被充分地剥削”，其含义是，没有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得可以在当地积累的更多的剩余产品（凯，1975）。

事实上，某些欧洲人，即在美国和英国保护地里的欧洲人，都是作为上述两个含义的殖民地开始的，但为了实现独立的工业资本的积累，他们争夺了自己的自由。在其他地方，即在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里，甚至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资本主义的积累大部分被局限于商人资本主义（巴拉特·布朗，1974，第186页）。这就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时所发生的情况。所出现的只有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形态相结合的商人资本主义（巴拉特·布朗，1974，第258页）。日本、亚洲部分地区和中国，除了通过不平等条约被强行打开的港口之外，都逃脱了直接的殖民统治，使它们有机会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巴拉特·布朗，1963，第56页）。在殖民统治之下，只有被纳入了殖民主义贸易之内的商人资本得到了鼓励，因此，在后殖民主义之下，商业资本家和拥有土地的人们，向统治者供应货物和服务（巴拉特·布朗，1974，第260~261页；1963，第180页）。

看起来，让商业资本家演变成为工业资本家是很困难的。在17世纪的英国，局外人进行了重大的斗争才把垄断商人赶走了（巴拉特·布朗，1963，第180页）。商人以一种价格买货，以另

一种价格卖货，他们拥有的关于生产过程的经验很少，而且尤其缺少关于工业生产的经验。他们甚至倾向于有些看不起在矿山或工厂或实验室把双手弄脏的那些人们，这尤其是继承了殖民主义政府的精英们的特点。工业革命，尤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随着新技术的产生，新的工业资本家阶级和新型的工人阶级形出现了（巴拉特·布朗，1963，第43页）。当然，许多第二和第三代的工业资本家通过让自己的子女和旧的商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结婚而进入了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但是，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工业资本和他们为了推动工业、矿业、种植业、铁路和海运的工业资本在整个帝国的扩张而进行的投资（巴拉特·布朗，1988，第29页）。

因为这个关于阶级的问题，从我的研究中出现的进一步的论点涉及在帝国主义时代里几个不同经济阶级很不同的参与。在我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怀疑经济压力推动着英帝国的运转——从罗伯特·克莱弗和怡和洋行和东印度公司到约瑟夫·张伯伦和塞西尔·罗德斯和英国的南非公司（巴拉特·布朗，1963，第43~44页）。但是，工业资本家与商人和作为商人和殖民地总督的贵族合作，从范围很广泛的英国中间阶层摄取他们的资本。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一些工会干部变成了帝国主义分子，但是，帝国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好处很少。对于那些在殖民地里拥有投资或官方职位的人们来说，帝国是一码事，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劳动人民不得不替殖民主义打仗，而当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的购买力崩溃时，他们必须面对失业（巴拉特·布朗，1972b，第81页）。

同样地，在殖民地里特别是在印度，殖民统治常常是通过地方王子、酋长、公务员队伍和警察队伍进行的间接统治。这些人是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桑赫斯特大学和它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类似的学校里教育和同化起来的（巴拉特·布朗，1963，第

178~179页)。与此相反，殖民地人民的多数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们被赶进矿山和种植园，以缴纳人头税金；或者被抓去当帝国军队的士兵，或者被派遣到遥远的国家当苦力；他们最好的命运只能是做个小农，通过殖民地的市场受剥削（巴拉特·布朗，1963，第160页）。在我的书里，没有提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或北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殖民地的剥削这样的概念，或者关于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剥削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而且还与事实不相符合。在核心地区和在殖民地里，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而且，一般来说，有关国家的经济越是贫困，两者之间的距离也越大（巴拉特·布朗，1972b，第88页）。印度一向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但拉丁美洲表现出的不平衡，也同样值得加以考虑（巴拉特·布朗，1974，第321~322页；联合国开发署，第42~43页和610页）。

一、对我的观点的批评

对我早期的著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上。

①我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学的强调和我对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忽视（费尔德豪斯，1973）。在近期，一些批评集中在我对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的忽视（戴蒙德，1997）。

②我坚持提出的这样的看法，即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而不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或者，它最多是两者结合的产物，但它是在工业而不是在商业为争取提高生产率的压力下形成的（凯恩和霍普金斯，1993a）。

③我的这样的论据，即在核心国家里的人民，即殖民主义列强里的人民，多数人没有从帝国主义得到什么好处（阿拉维，1964，第104页）。同时还有我提出的这样的问题，即核心地区

的经济发展是否以殖民地的欠发达为代价。我的看法是，那种欠发达甚至阻碍了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弗朗克，1966）。

④我的这样的看法，即关于进步的思想不成问题，而且，一般来说，全面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而不是拖后了人类能力的实现（沙宁，1997，第65~72页）。

多数的批评使我在自己的思想里，就我的几项研究的结论，产生了重要的问题和怀疑。在最近的20年中进行的许多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帮助我们弄清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人统治了全世界——里发生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及政治事件，然后又对曾经受殖民主义统治的人们实现了政治独立后的年代的意义进行了解释（戴维森，1978；戴维斯和胡腾巴克，1986；爱德尔斯坦，1982；霍布斯鲍姆，1987；兰德斯，1966；麦克劳斯基和弗劳德，1981；珀拉尔德和霍尔姆斯，1972）。

从我的早期著作发表后，我们已经目睹了发展理论的兴衰（莱斯，1996）和关于发展的研究的增长，其结局是关于发展的整个概念和关于进步本身的思想，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沃尔夫冈和萨赫斯，1992；鲍特里和拉赫纳马，1997）。这样的打击与旨在修改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相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则是我自己的研究的基础。马克思遵循黑格尔的做法，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若干阶段或时代。现在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结束了，从而否定了上述划分和甚至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概念（福山，1992）。这种否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联和与苏联相关的所谓社会主义试验的崩溃的结果。由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人们也要求对早先的关于技术进步的期望进行修改（布伦特兰，1987）。

在我写《帝国主义之后》一书的第一版本时，我就已经放弃了我关于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形态的信念，但是，我还是认为，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的计划经济，仍然是所有国家的人民的前进

道路（巴拉特·布朗，1963，第482页）。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犯了我的错误（巴拉特·布朗，1995）。我低估了人性中竞争本质的力量和它的压倒合作本质的能力。显而易见，人类社会是通过两者的平衡而发展起来的（康福特，1976，第16~19页）。女权主义者会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衡已经完全倒向男人的一方。我在非洲曾经专门研究了人类学家们的工作，它们向我表明，在对人类生存的要求方面，与欧洲和北美相比较，非洲大陆的严酷自然环境，对合作的强调始终要多得多（阿柯贝等，1990）。的确，欧洲和北美的这些条件促进了人类有了一定程度的竞争，而这导致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现在却威胁着人类和地球本身的存在。

我检查了我自1970年以来写的关于世界上若干政治经济制度和特别是关于非洲的书，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些新东西（巴拉特·布朗，1995、1996）。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不需要对我原来写的东西进行很多的修改。这个结论有点令人吃惊，而且可能是傲慢的。我的新的研究和个人的经历，在许多方面证实了我早先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若干特定的问题上，我已经对批评我的人们做了答复。对其中一些人，我是在1970年由梅林（MERLIN）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之后》（巴拉特·布朗，1970）的长篇前言里做了答复的。然而，本文给我一个机会，可以用更综合的方式答复问题，并且承认我在哪些方面是错误的，并考虑我的错误的原因。

二、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

我一直坚持认为，帝国和帝国主义始终是对经济问题的回答，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当顽固不化的。我高兴地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帝国主义活动是一种自由贸易帝国

主义。的确，我就是那样描绘 1824~1870 年之间的资本主义和帝国的（巴拉特·布朗，1963，第 51 页）。相对于其他资本家集团，在作为第一个工业列强的英国的资本家，拥有竞争上的优势，他们能够利用自由贸易，打垮对英国货物和资本的一切反抗。在美国后来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后，它也正是这样做的。在 1870 年之后，国家之间的竞争逼迫它们瓜分非洲和许多其他地方，这种竞争的基础正是经济竞争——是为了获取市场和原料源泉而开展的竞争。约瑟夫·张伯伦开展的争取帝国特权的运动的目的是保护英国的工业。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的，而不是仅仅在英国投资的（巴拉特·布朗，1963，第 101 页）。

当然，我现在不否认，而且我不觉得过去曾经否认过这样的看法，即政治野心进入了帝国主义冒险的动机。当我在《帝国主义之后》的第二个版本里回答 D.K. 费尔德豪斯的批评时（巴拉特·布朗，1970，第 xi~xii 页），我重新强调了这样的看法。在第一个版本里，我强调了两点，即迪斯累里关于印度的政治议事日程，以及来自殖民地本身内部的推动扩张的压力——它既来自总督们，也来自移民们——这一点后来被别人接受了（埃曼努尔，1972b）。但是，英国政府既没有剥夺迪斯累里在印度的“神气的代理领事”的财产，也没有取消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和放弃罗德斯在南部非洲抢占的土地。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走向印度的通道是英国在亚洲的投资的生命线。可是，对不起费尔德豪斯先生的是，为了让英国资本，英国需要对海外地区进行政治控制，其原因正是正在兴起的美国、德国和法国资本的竞争（巴拉特·布朗，1974，第 186 页）。

我对于我是否充分地讨论了帝国对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两种人的觉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更是没缺少把握。在《帝国主义之后》的第一个版本（巴拉特·布朗，1963，第 18 页）里，在《帝

国主义之后》的第二个版本（巴拉特·布朗，1970）的前言里，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政治学》的结尾里，在谈帝国对中心地区大都市工人阶级的影响时，我都试图讨论这种影响，当时我对道德上的腐蚀强调得比经济上的腐蚀要多得多。但是，爱德华·赛伊德的伟大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向我说明了，由于在19世纪有过做帝国的经历，英国社会全面腐败了，而作为属于英国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对此的许多方面却没有认识（赛伊德，1993）。更严重的是，我甚至没有正确认识受殖民主义压迫的经历对殖民地人民意味着什么。对贩卖奴隶的贸易、以契约束缚的劳动、在南部非洲的矿山里的劳动以及到处的种植园里的劳动，我理解的程度，相当于没有经历过那种悲惨生活的人能够理解的程度。

然而，由巴西尔·戴维森（戴维森，1992，第47页；1995，第79页）向我介绍和解释的非洲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工作，才使我意识到殖民统治对非洲文化的更深刻得多的影响。殖民统治者曾经试图贬低或甚至事实上消灭非洲对历史的记忆，并且以人为创造的关于酋长和部落对抗的传统取代历史（兰杰尔，1983），这些人为创造的传统完全相异于真正的非洲历史上的伟大帝国里的土著人民创造的民主控制和种族间纽带。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的历史，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印度的悠久历史太引人注目了，无法被如此忘却。就印度的伟大历史名胜古迹而言，要像人们在大津巴布韦做的那样，说这些建筑物不可能是当地居民建造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在马丁·贝纳尔纠正我们的被歪曲的看法之前，埃及一度被说成不真正是非洲的一个部分，希腊文明不是渊源于埃及的（贝纳尔，1987）。在印度和中国，却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

在我写的关于非洲的最新的书《非洲的选择：在世界银行的30年之后》里（巴拉特·布朗，1997），以及在我在里兹大学讲

的非洲研究课（巴拉特·布朗，1997）里，我都试图纠正我过去在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的理解方面所犯的过失。现在我已经明白，土生土长的人民的文化特征对经济发展曾经产生的影响，比我原来理解的，要更大得多。在日本、中国和东亚许多地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精神气质与土生土长的文化成功地相结合了，这与这种结合在非洲的绝对失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巴拉特·布朗，1995-2，第44页）。像W.W.罗斯托夫所做得那样，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乱堆在一起，把它们称为“传统社会”，并认为它们在发展中都将经过相同的阶段（罗斯托夫，1970，第4页），始终是错误的。我试图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我的确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会非常不一样。今天，我对此看法更有怀疑了，但我还是清楚地认为，提高生产率是发展的核心，这如同帝国主义的情况一样。

三、南北分野的地理解释

一位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即贾雷德·戴蒙德，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他提出，世界形成较发达和不那么发达的两个部分的大分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各个大洲原来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其能够被驯化的动物和被栽培的植物（戴蒙德，1997，第9章和第10章）。巨大的欧亚大陆从东到西长达5000英里，而且没有重大的气候差别，从而使其植物和大型哺乳动物种类更多得多，通过选择性的繁育，可以使它们变成对人类有用的作物和家畜，同时，因为没有沙漠或热带森林那样的大障碍物，它们还可以在整個大洲范围内扩散。

由此，在发展的差别上，戴蒙德明确地排除了种族上的解释。但是，他仍然奇怪地区分了直发人种和卷发人种，把他们分别称为“白人”和“黑人”（戴蒙德，1997，第379页，图19-

1)。这样，他就能够把埃及的早期文明纳入欧亚，而不纳入非洲——这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但直到马丁·贝纳尔发表其《黑色的雅典》（贝纳尔，1987）对此进行纠正之后，多数埃及和传统的学者都倾向这个观点。

戴蒙德的论据的核心内容是认为，生产和积累剩余食品，不管是通过农业的手段还是通过畜牧业的手段，使复杂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发展成为可能，然后由此演化了集中化的政府形式和有组织的宗教。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尽管美洲和非洲大陆的自然条件更贫穷，在那儿和在欧亚大陆一样，都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有许多关于玛雅人、阿兹台克人、印加人的历史著作，戴蒙德几乎没有谈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存在的帝国。尽管戴维森和其他研究非洲的学者最近发表许多著作（戴维森，1984），他也没有谈在非洲沦为殖民地之前的非洲帝国。

此外，戴维森继续说，“这些实现了集中化政府和有组织宗教的社会的后代，最终最早走到了统治现代世界的地位”（戴蒙德，1997，第266~277页）。

这完全不正确。苏美尔、埃及、中国和印度没有统治现代世界。中国将来可能会这样的，但统治现代世界的北美人的后代，不能说是最早的文明的直接后代，即使人们接受贝纳尔和其他人关于希腊文明和从而罗马文明起源于尼罗河的结论（贝纳尔，1987，戴维森，1984），也不能这样说。其实，我们可以认为，这正是戴蒙德最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这将意味着非洲大陆（不是西亚在非洲的扩展区域），尽管其自然条件表面上更穷困，最早实现了集中化政府和有组织宗教的形式。我们必须寻找苏美尔、埃及、印度和中国最早的伟大文明为什么崩溃了而欧洲人为什么后来统治世界的原因。

我没有找到论据来放弃这样的观点，即早期文明衰败了是因为，它们都实行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过度集中管理，欧洲和日

本的兴起是因为，它们实行了以靠降雨供水的农业为基础的更分散的政府形式（巴拉特·布朗，1963，第29～30页）。对此，戴蒙德争辩说，中国的集中政府比灌溉形成得更早（戴蒙德，1997，第283～284页），还有其他一些人批判了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和亚洲靠水利的生产方式的论点（安德森，1974a，第487页）。在《帝国主义之后》里，我以欧文·拉铁摩尔关于为了对付游牧民族侵略需要加强防卫的理解，补充了卡尔·维特沃格尔的水利论（拉铁摩尔，1951）。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帝国首都，比如说底比斯、波斯波利斯、德里、北京，都没有建设在农业地区的中心，而都建设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呢？我还补充了莫斯科的例子，在那儿没有水利，但始终有被侵略的危险。蒙古人的历史不能证明戴蒙德的论点。他们仅仅采纳集中的政府和组织了他们征服人民的宗教，但他们的骑兵几乎征服了欧洲。另外，正如戴蒙德说明的那样，皮萨罗是靠马匹在卡哈马卡征服了阿塔瓦尔帕巨大的军队（戴蒙德，1997，第77页）。

看来，我对欧洲的兴起和非洲、土生土长的人种统治的美洲以及亚洲的衰落，也有自己的地理解释。但是，我的解释的依据是一些资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我认为，这个依据，比起植物和动物繁育的结果，能够提供更丰富得多的解释。事实上，戴蒙德对中国未能发展补充了另一个地理解释（戴蒙德，1997，第414～415页）。那就是中国漫长的、不间断的海岸线和大陆外只有三个岛屿。相比之下，欧洲的海岸是弯弯曲曲的，而且有很多岛屿和由陆地包围的海洋，从而鼓励了竞争性贸易和出海活动。戴蒙德的确知道，在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之前，中国的贸易扩展到了东印度群岛各个岛屿，甚至跨越了印度洋，扩展到了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洲。在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之后，中国的贸易却结束了。但是，戴蒙德认为，中国的船队在15世纪的解散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典型局部政治偏差的结果。

这是中国朝廷内两个派别（太监和他们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典型的权力之争的结果。前一个派别认同于派遣和领导船队”（戴蒙德，1997，第412页）。

这正是要害的地方，这不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两个派别被特定地称为“海洋派”和“陆地派”（利维斯，1994）。靠贸易发财的商人阶级的财富在向传统势力的权力挑战，后者的基础是靠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沿着运河系统，为皇帝征收的贡税。商人们输了，其原因纯粹在于农业贡税的规模极其巨大。1512年，皇帝下令毁灭所有的远洋船只——当时，其数量是欧洲的船只的4倍；还禁止离开沿岸水域的一切航运活动。中国的发展被拖延了近4个世纪。在由此创造的空间里，欧洲冒险家可以自由地活动，日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起来。

关于帝国主义的地理解释，不仅必须以真正的历史事实否定，而且，还需要因为以下的理由加以否定，即它导致在被说成自然资源贫乏的大洲人民的命运方面，人们形成一种宿命论观点，从而完全无视欧洲的征服、奴役和殖民化的影响。由此，关于戴蒙德的书的评论强调了非洲缺少资源和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发展。其中一个书评的题目是《为什么骑在犀牛背上的班图人从来没有击败罗马》。书评中忘记了骑在大象背上的北非洲人差一点击败了罗马。它以援引埃美·凯萨尔的语录为开端，然后继续说：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仅没有发明火药、煤气和电气，而且，在沦为殖民地之前的时代里，甚至也没有能够掌握书写、扁担、犁和轮子（勒罗瓦，1997）。

戴蒙德竟然将他的“白色非洲”和“黑色非洲”之间的分界线划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即从几内亚的海岸起头，然后略微向南和东弯曲，走向非洲之角，从而把埃塞俄比亚人包括在白人之内（戴蒙德，1997，第379页）。一个不是那么具有倾向性的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定义，应该包括廷巴克图和伟大城市干诺。位于跨越沙漠的骆驼之道的南端的干诺市，正是骆驼队抵达和出发的地方。巴西尔·安德森说：

沿着古老的道路，有给骆驼队制作记号的工具——描绘得很粗糙的由驴或马拉的小车——它们是在很古老的时代里刻画的，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创建了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从西非获取黄金（戴维森，1984，第90页）。

没有任何人怀疑麦罗埃（MEROE）拼音书写文字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XUM）的塞伯伊（SABAEAN）文字，都是土生土长的人们创造的，而不是从西亚或埃及的文字抄袭来的（戴维森，1984，第37-39页）。

不幸的是，人们对非洲人的能力的偏见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戴蒙德的书刚出版不久，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就在伦敦的《经济学家》上发表题为《趋同、大自然、营养和成长的界限》的文章里说：

气候温和的地区一般比热带地区更容易养活密度更稠密的人口，从而就更容易促进更广泛的劳动分工的形成。

他写道并下结论说：

我们应该开始把下面这样的情况接受为正常的情况，即非洲和其他的热带地区都是由来自温带地区的出口养活

的……富国卡穷国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杰弗里·萨赫斯，1997，第21页）。

他没有解释这一点，即为了让农业企业保持消费石油、化肥和其他化工产品，北方国家政府都对食品出口给予大量补贴，以致非洲和其他与非洲相似的热带国家的农民，都无法与他们竞争，并且被从土地赶出去，进入凄凉的小城镇（C. 鲁宾逊，1989，第38页；联合国发展署，1997，第87页）。在那儿，有些人能够找到工作，从而为大的北方公司的生产供应廉价的劳动力。帝国主义没有经历多大的变化，因为，在以前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时，其中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有能力发展工业，并让自己的资本家开始走上独立积累资本的道路。使它们落后的，并非它们的自然条件，而是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它们的内在力量被削弱了。我承认，正是那种软弱被我低估了（巴拉特·布朗，1995，第171页）。

四、帝国和工业资本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主要修改的核心内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18世纪末的工业工人阶级以及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建设之间的联系。在80年代中期，佩里·安德森（安德森，1987）和杰弗里·英汉（英汉，1984）从不同的角度抓住了W. D. 鲁宾斯坦关于19世纪伦敦的财富的一些研究报告（鲁宾斯坦，1987），并将它们与他们从P. J. 凯恩和A. G. 霍普金斯1980年在《经济历史评论》里发表的题为《1870年到1914年英国海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文章（凯恩和霍普金斯，1986年和1987年）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凯恩和霍普金斯提出，英国的资本主义是“绅士般的资本主义”，帝国则

是英国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形式的扩张。这与佩里·安德森和汤姆·纳恩早先描绘的英国社会的图画非常相吻合。按照那幅图画，英国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主义革命或真正的工业革命，从而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社会不一样，没有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工人阶级（安德森和纳恩，1964）。英国国家机构的庞大体系被描绘成完整的整体，从诺曼人征服英国起，直至当代，其化身是王朝，今天仍然体现在女王的枢密院和继续存在的议会上院议员的特权上（科里根和塞耶尔，1985）。

这幅图画没有认识到，亨利八世以他任命的人员几乎完全取代了诺曼贵族，那些人员将商人和地主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这是当他们在整个17世纪受到外来挑战时建立的新联盟，也是英国革命后形成，并由1668年的“伟大的革命”确认的土地与资本之间的新的力量平衡（希尔，1972）。通过安排奥兰治的威廉上台做国王，新的统治阶级牢固地确立起来了。此后，来自土地的财富再也无法向首先来自商业而后来来自工业的财富提出挑战。英国银行在1700年的建立是国家新权力的标志。但是，在17世纪，在北美、西印度群岛、西非洲和印度，英国的殖民地已经确立了。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和联合法已经决定了殖民主义的关系。殖民地必须供应原料，而它们的工业发展将受到限制，一切贸易应该用英国船只运输。1699年，英国贸易和种植园委员写道，“在美国建造我们的种植园的目的让那儿的从属于英国的人们从事一些英国所没有的产品的生产”（里普森，1934，第173页）。

英国工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里，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加速了，它与新技术的运用一起，使一场工业革命的思想有了实质内容。但是，真正的革命在于新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多普，1946）。工业革命并不是商人或地主进行的，尽管两者的财富都起了作用。新的制造业阶级是所涉

及的技术变革的先锋，它很快地与旧统治阶级建立了联盟。他们找到的全国领袖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是一位纺织业企业家，在1834~1846年之间担任过首相，他废除了保护英国农业对付更便宜的外国食品的玉米法（这些进口食品对压低工业劳动力的价格具有实质意义），他引进了收入税，以取代对销售货物征收的税，他创建了警察队伍和邮政服务机构，还制定了银行章程法和公司法（这些法律使英国资本所有者在国内和海外获得了关键的法律保护）（西梅尔，1970）。

罗伯特·皮尔爵士也是保守党的最主要创建人。为了反驳修正主义的论据，我们必须回忆他对国家的管理。修正主义者认为，在19世纪，英国继续由地主贵族统治，而直到20世纪，工业资本对英国政府政策没有或很少有影响。然而，安德森和英汉的根本论据是认为，不仅旧的贵族继续掌权，而且商人的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合，也是英国在19世纪的财富的根源，英国帝国则主要是一个工具，用于管理那些阶级的商业利益，并非首先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延伸物（安德森，1987，第4页；英汉，1984，第97页）。

五、商业和工业

1987年，我在《新左翼评论》发表的文章里对佩里·安德森的看法作出了反应（巴拉特·布朗，1988）。在《新左翼评论》的另一篇文章里我对英汉的看法作出了反应。我重申了事实，仍然相信我的文章完全否定了他们的论点。此后，凯恩和霍普金斯将他们在《经济历史评论》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扩展成为一部分上下两集的著作，即《英国帝国主义》（凯恩和霍普金斯，1993a、1993b）。下面是对他们的论点的总结：

工业革命仅仅是已经成功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整个过程中，财产所有制的本质和政治权力的来源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英国的银行是从商业贸易中出现的，它们与工业的联系很有限。伦敦城¹⁾的财富和权力大大超过了工业的财富和权力。特别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商业服务行业受到了重视，而工业被忽视了。商业的收入弥补了出口和进口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在19世纪的下半叶里，伦敦不断扩张的商业和银行网络，创造了促使帝国大规模扩张的压力。这种扩张只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才开始的，它提供了在殖民地特别是在印度任职的机会，从而“使殖民地成了一个斗争场所……人们可以在那儿以绅士般的精神履行义务和争取荣誉”。英国工业的衰落远远不是势力下降的迹象，而只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城的猛烈推进力量的对应面，今天，随着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正在变得和贸易一样重要，这种力量并没有消失（凯恩和霍普金斯，1993b，第29-40页；1993a，第300-309页）。

这段话在今天意味着，虽然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已经把英国的工业大部分消灭了，但是，正如撒切尔夫人希望的那样，英国经济可以依靠服务行业。这个信息不应该阻止我们，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来自世界经济中的服务行业的收入被大大夸张了。服务贸易远远没有相等于货物贸易的价值，在90年代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大约为20%（没有包括利息和投资收入，而这两项能够使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加15%，但它们并非真正的服务收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1996，第224-262页）。

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若干说法，与安德森和英汉的说法一样，

1) 伦敦金融中心。——译注

可以用统计数据加以反驳，下面我就要利用这些数据。我已经提到了反尔的立法，特别是银行章程法和公司法，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即财产所有制的性质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还提到了对玉米法的废除，这保护了地主的农业利益，使政治权力来源发生了变化。贵族们在1962年麦克米伦内阁前一直支配着英国内阁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英国政治中它是权力所在的地方。应该记住的是，1914年，议会上院的多数成员拥有的做爵士的历史没有超过100年（惠特克，1963，第222页）。在19世纪的英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加重要得多。在伦敦之外的英国较大城市里的壮观的市政府大厦就证明了这一点（道恩顿，1989）。约瑟夫·张伯伦是在伦敦城之外出名和发财的一位内阁大臣，但不是惟一做到这一点的大臣（沙维尔，1988）。

修正主义者不仅喜欢贬低提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参考文献，而且还喜欢把它们放在引号里（阿里齐，1994，第192、199、208页）。新技术的发明者——纽科门、特里维西克、博尔顿、瓦特、阿克赖特、斯蒂芬森和布鲁奈尔——都不仅仅是一些工匠，而且是企业家，是探索新型资本主义的先锋。我们不可能把这类实现了工业革命的人们仅仅想像为成功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方面（库尔特，1938）。下面我们将考察关于19世纪国家财富来源的论据。

凯恩和霍普金斯有一个说法虽然完全不正确，但多次被人们重复援引，以致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它。这个说法认为，英国银行业是由商人和贵族创建的，它与工业的关系一贯很脆弱。几乎所有的英国银行的事实上都来源于工业和新的工业资本家中间——这些资本家不拥有土地，是信奉不从国教派的（汉密尔顿，1947，第224页）。英国中部的贵格教会的锻工们创建了劳埃德斯（LOYDS）公司；英国东部的贵格教会的裁缝们和他们在伦敦从事酿酒业和做银器加工的表兄弟们及堂兄弟们创建了巴

克利斯 (BARCLAYS) 公司；贵格教会的吉勒特斯会 (GILLETTS) 创建了巴克利斯 DCO (BARCLAYS DCO) 公司；贵格教会和其他布里斯托尔的船主们创建了全国省份 (NATIONAL PROVINCIAL) 公司。连那些为伦敦城海外利益的核心势力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来源于工业——J.P. 摩根是作为铜的冶炼者在斯旺西起家的，巴林斯 (BARINGS) 公司最初是在西部的服装工业活动的，霍尔家族是在南爱尔兰的船主，内森·罗思柴尔德起初来曼彻斯特是为了向棉织品贸易提供资金，詹姆斯·莫里森是在伦敦一家纺织品仓商行发财的，该商行销售来自兰开夏纺织厂的货物 (沙维尔，1988)。当然，他们在乡下建造了很大的房子，厄尔汉村民听到有人将他们那儿的的地主格尼称为一个“暴发户”会很吃惊的。在评论欧弗伦德和格尼在 1866 年的垮台和试图分析英国银行为什么没有像几年后拯救巴林斯公司那样拯救欧弗伦德和格尼时，凯恩和霍普金斯正是这样称呼格尼的 (凯恩和霍普金斯，1987，第 5 页)。贵格教会成员约瑟夫·格尼是该银行的创始人，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在拿破仑时代里被称为“银行家的银行” (拉波克，1922)。他真是暴发户！

在上面描绘的图案里，工业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起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论点允许我们相信的要密切得多。其第一个原因在于在 19 世纪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比他们说明得要重要得多。在占国民收入比重方面，制造业和矿业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在 1850 年而是在 1820 年超过农业的。然后它们继续增长，直到在 1901 年达到 40%，而此时，贸易和运输的总额达到了 23%，政府服务和自由职业达到 10% (迪恩和科尔，1964，第 175 页)。此外，从 1870~1914 年，英国制造业整个产出的大约 45% 被出口，在这个时期里，出口总量增加了两倍 (迪恩和科尔，1964，第 29 页)。大约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工业产品的市场营销

所需要的资金是用来自伦敦的贸易贷款解决的。这些产品由庞大代理商销售，他们分散在全世界，而在帝国内部还不到一半。随着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英国出口中资本产品的比重的增长，伦敦城的作用日益重要（迪恩和科尔，1964，第 31 页，表 9）。

随着美国和德国的竞争日益加剧。它们的钢铁产量在 1913 年都达到了英国的两倍，同年德国出口产品的价值达到了英国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 1938 年又一次两倍于 1913 年的水平（斯芬尼尔森，1954，第 260 页）。这样的竞争导致了张伯伦开展倡导首先购买英帝国产品的运动，但许多英国制造商乐于进口便宜的德国钢铁。伦敦城和工业界一样，在进口税率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多数金融公司都相当正确地将全世界视为英国的市场（巴拉特·布朗，1963，第 106~107 页）。张伯伦则有一个地方是正确的，即他提出，如果英国想保持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它就需要在保健和教育花更多的钱，并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兰德斯，1966，第 561 页）。最近发表的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生活质量的研究报告提出的结论是，“相当少的公共支出的增长额（每年的国民总产值的 3%）能够提高生活的质量，而同时在回报率上是正确的”（克拉弗兹，1997，第 617 页）。

因此，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帝国对英国经济究竟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好处，且听大卫·兰德斯如是说：

在新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中，各国的民族企业之间竞争性的斗争是最重要的惟一因素（兰德斯，1969）。

六、“绅士资本主义”的基础

那些互相竞争的民族企业必然需要国家的支持。与关于英国

是一个“守夜人国家”和“低税率国家”的神话（凯恩和霍普金斯，1993，第150页）相反，英国的国家不仅参与支持英镑的生意和担保贷款，而且还占领领土，鼓励移民定居并成长成为资本家，为了控制南非黄金而与布尔人打仗，在海外维持大规模的军队，用英国海军在世界海洋巡航，在1914年之前的年代里实行比其他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一倍的公共支出预算（皮科克和怀斯曼，1961，第166页；戴维斯和胡腾巴克，1986，第160～165页）。凯恩－霍普金斯的论点是从鲁宾斯坦那儿援引来的，得到了安德森的支持，他们硬说，这一切并不是保护英国的直接投资或出口贸易所需要的，而是为了维持“英国作为世界的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它是为在世界范围内众多的政治单位的多边交易服务的”（凯恩和霍普金斯，1986，第489页）。

因此，凯恩和霍普金斯的论点的核心结论是，新帝国主义“不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不是由于获取了新财产的简单事实”而产生的……而是“集中在伦敦城的绅士资本主义重新构建的形式和在国内各县的服务经济在海外的表现”。“服务行业的成长，包括集中在伦敦的金融机构的成长，在1850年后，是对英国在海外的存在影响最大的因素”（凯恩和霍普金斯，1987，第10～11页）。因为当时来自服务行业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和海外收入的五分之一（迪恩和科尔，1964，第175页；伊姆拉，1958，表4、13、14、20、21；巴拉特·布朗，1988，第28页），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小人物掌权的一个特殊例子。

毫无疑问，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内，英国工业下滑了。随着新工业化国家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英国占世界产量和贸易的比重不可避免地下降。但是，人们广泛认为，在1884～1886年利润、价格和出口额大跌的时期里，经济增长受挫。于是3个伟大的贸易和工业衰退调查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巴拉特·布朗，

1963, 第 81 页)。在 19 世纪末, 尽管还有周期性的倒退, 但增长恢复了, 出口稳定地增长, 其总额在 1913 年达到了比 1870 年大两倍的水平 (迪恩和科尔, 1964, 第 311 页, 表 83)。在 1870 年和 1913 年之间, 英国的就业人口从 1300 万人增长到了 2000 万人 (费恩斯坦, 1972)。这种情况并不像是安德森想像的那种“100 年的衰退”, 或时代的结束, 或反映英国的“没落”的“数据” (安德森, 1987, 第 41 页)。

在凯恩 - 霍普金斯“绅士资本主义”理论和关于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帝国的论点里, 至少有 5 个主张可以用统计数据来考证。

①在 19 世纪中期, 在英国的海外收入中, 贸易的收支平衡已经被服务的收支平衡超过了。

②在 19 世纪末, 英国的海外投资大部分投入商业和政府, 不是投入生产。

③在 1870 年之后, 英国海外投资超过了国内投资。

④在 19 世纪中期, 英国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在伦敦的活动。

⑤在 19 世纪里, 权力日益集中在商业 (或地主) “绅士资本主义”精英手中。

所有这些说法在事实方面的正确性都可以被提出疑问, 以致可以否定这样的提法, 即在 1860 年后, 英国帝国的建设, 依靠的是来自商业而不是工业资本的权力和压力。

第一个应该认识的事实是, 在 19 世纪 50 年代, 英帝国大部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巴拉特·布朗, 1974, 第 110 页, 表 4)。在此后的扩张中, 由于从已经建立的基地扩展边境, 帝国增加了很多领土, 但除了埃及和运河这个重要的特例之外, 所涉及的人口和经济资产相对小 (巴拉特·布朗, 1974, 第 186~187 页, 表 16)。第二个应该研究的事实是所运用的关于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定义。但是, 安德森和英汉两人都把酿酒业和航运业纳入商业活

动，而把来自海外投资的收入纳入服务行业的数据里，尽管那些投资大部分不是在服务行业里（巴拉特·布朗，1989，第126页）。

如果不把这些项目纳入商业和服务行业，凯恩和霍普金斯关于在英国的海外收入中商业收入超过工业收入的说法就无法论证。伊姆拉关于英国支付平衡的计算证明，出口和航运（与英汉坚持的说法相反，而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得那样，它们是生产的必要部分）（马克思，英文版，1978，第225—228页）的增长，即使在1870年后，都比商业服务的增长更快（伊姆拉，1958，表4、13、14、20、21；巴拉特·布朗，1987，第28页）。同样也不能说多数的海外投资是在政府股份里。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在1913年进行的对英国海外投资的积累的研究，展示了以下的比例：政府股份占30%（其中21%是在帝国内部）；铁路占41%（其中12%是在帝国内部）；公共设施占5%；商业和工业占6%；矿业和其他原料占10%；银行和金融占8%（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37，第153—154页；巴拉特·布朗，1963，第153页）。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用这些数据证明政府和商业的投资占全部投资中的多数。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13年，英国投资的运动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与国民收入关系的变化，而不在于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根据费恩斯坦提供的数据，从1865年到1913年，国内投资每年平均为国民收入的5.7%，海外投资为5.1%，当投资总额比较高时，后者的比重往往更高。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它特别高（巴拉特·布朗，1974，第1776页，表13，援引自费恩斯坦，1972）。因此，争辩说，国内工业因为海外投资增加而缺少资本是难于说服人们的，而如果说，因为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国内的购买力下降，迫使英国资本在海外投资，这就更容易让人心服口服。在这些因

素之外还要加上前面已经提到的教育方面的弱点，以及国内缺乏经营企业尤其是报废旧工厂和为开发新技术投资的能力这个缺点（兰德斯，1966，第567页）。在19世纪的英国，资金短缺很少被提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波拉尔德和霍尔姆斯，1972，第503页）。

人们已经证明了，在整个19世纪，国民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制造业、矿业和农业。当然，在伦敦城里的金融中心，总是有机会发财。W.D. 鲁宾斯坦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英国最富有的人们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和商业，不是来源于工业（鲁宾斯坦，1987）。安德森和英汉利用这个说法，来说明英国资本从商业得到的利益，比起从工业得到的利益要多，而这导致了英国工业从属于土地和商业（安德森，1987，第35页；英汉，1984，第30~32页）。这是他们的论据的核心，但鲁宾斯坦的数据受到道恩顿的怀疑，后者的依据是，对遗嘱检验的收入的使用，不能揭示在父亲死亡之前早就由父亲遗赠给儿子的私人工业企业的价值（道恩顿，1989，第128页）。

然而，论据既涉及权力又涉及个人财富；而修正主义特别是杰弗里·英汉提出的论点是，从1850年后，在伦敦城、银行和财政部之间有一种纽带，它后来支配了英国在国内和海外的政府管理和决策（英汉，1984，第127~134页）。按照英汉的看法，这都与维持英镑的权力相关，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海外投资，而是为了通过让伦敦城发挥为全世界范围的多边交易服务的票据交换中心的作用，来保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财政部的作用在于保证政府的支出受到控制，以便消除能够使人们就英镑价值提出问题的通货膨胀危险。英国银行为了同样的目的管理着利率。伦敦城为各地启动的经济活动的各种金融交流提供着机制——然后收取其佣金。上述纽带是由一个贵族金融家阶级操作的，他们是绅士般的资本家，远离工业资本的回旋（凯恩和霍普金斯，

1993, 第 125 页)。

这幅图案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虽然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很少的爵士头衔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赠与的。然而, 无论就英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动机, 还是就英国工业表面上对金融业的从属状态, 都不能说是由上述纽带造成的。如果没有英国工业及其出口和海外投资, 保险业、贸易贷款和其他城市服务对英镑的需求, 都将是忽略的。在许多关于海外投资的本质的修正主义论据中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在整个 19 世纪里, 它几乎完全是过去获取的利润为开展未来活动而进行的重新投资, 多数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新财富(巴拉特·布朗, 1974, 第 173 页; 克纳普, 1957, 第 438 页)。按照欧布赖恩的资料, 事实证明, 在 1900 年, 在英国资本家拥有的海外财产中, 35% 是直接的公司投资(欧布赖恩, 1988, 第 171 页), 这些投资主要是非常大的、通过利用保存下来的利润而在垂直方向上一体化的公司, 例如, 石油公司、利弗兄弟公司、科特斯和佩顿斯公司、布鲁纳蒙德公司等。

观察在 19 世纪英国的政治权力时, 应该将政府中心和伦敦城里的权力位置, 放在省里的权力位置的背景下观察。那个时候, 地方政府是有意义的, 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的的主要新工业城市。约瑟夫·张伯伦作为伯明翰市长的任期, 被历史学家约翰·沙维尔援引为“在整个城市社会里进行的政治进程的最精彩的图画”(沙维尔, 1988, 第 38 页)。当全国自由联盟在 1877 年成立时, 格莱斯顿在场, 而且祝福了它。有意义的是, 当时它的总部设在伯明翰, 其首任主席是张伯伦。

除了英国中部和北部的金属加工业、纺织厂、煤矿和造船厂外, 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是煤矿业、钢铁业和造船业的主要中心。许多来自北部和中部的富人的活动覆盖着整个工业和金融业的范围, 而且还拥有农业方面的利益。这样的一个人是亚里山达·亨

德森，即第一位法灵顿爵士，他在斯塔福郡拥有一家钢铁厂，代表斯塔福郡当了议员，提供了开凿曼彻斯特轮船运河所需要的资金，参加建造伟大的中央铁路和皇家烟草公司的筹资开办，退休后在牛津郡务农（道恩顿，1989，第140页）。我的祖父是兰开郡人，他经常说，“黄铜是在北方制造的，在南方消费的。”

关于在19世纪的英国存在一种绅士资本主义的整个图案，是以这样的看法为依据的，即早期的商人和地主寡头很顺利地转化成了金融资本的精英，英国乡村别墅被认为是这种看法的根据。提供了伦敦城里的经纪人们和代理以及帝国的殖民主义军官的中间阶级，必须被说成是通过公立学校和古老的大学里从拥有土地的贵族来的。从纯粹的数字来看，这是很荒唐的说法。在19世纪里消失的阶级是自耕农和较小佃农阶级（科尔和波斯特盖特，1946，第70~71页）。新中间阶级应该是来源于这些阶级的，我们也知道什么人建造了乡村住房。按照弗朗克林的看法，多数住房是由制造业主人建造的——当然，这些住房不是伯爵们和侯爵们的那些富丽堂皇的房子，而是数以千计的较小的房子（弗朗克林，刊登在沙维尔，1988年）。

七、南北分野的历史有多久？

本文用大量篇幅解释问题的目的是重新确立工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根源这样的论断，但它还没有回答对这个论断的又一个修正。这就是世界分成贫富的分野即南北的分野或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野，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确立了。持有这种论点的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中，工业革命只是很小的事情。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追索的更远，在1991年的题为《发展的欠发展》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现在认为，“同一的持续的世界体系”，包括其核心与边缘结构、在互相争夺霸权的对手之间的竞争、以及周期性的上下波动，至少已经演进（发展？）了5千年……在这个世界体系里，在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中，一些部门、地区和人员暂时地和周期性地占据领导和霸权的中心（核心）地位。然后他们不得不把荣誉地位让给取代他们的新的部门、地区和人员（弗朗克，1991）。

和戴蒙德一样，这种视角，是从希腊开始举行奥林匹克竞赛的时代起，来看世界历史的，以致对近期的世界的任何分析或比较都变得很空洞。乔万尼·阿里齐研究的历史跨度更短一些，不是5千年，而是5百年。他给自己在1994年出版的的书的书名是《漫长的20世纪》，但他把这个世纪视为“漫长的15和16世纪”、“漫长的17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的延续。在威尼斯时代后出现了热内亚时代，后来是荷兰时代，英国时代，美国时代，下一个可能是日本时代（阿里齐，1994，第364页，图10）。在每次兴衰周期中，他找到了一个以生产性劳动兴起的、最后以金融投机衰亡的帝国。他认为，在我和安德森及英汉的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矛盾；我们谈的是不同的时期和一个“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的不同方面。

阿里齐写道：

正是因为英国无论在做工业国还是在做帝国的方式上，都超过了威尼斯和荷兰联合省，英国在发挥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作用方面，其发挥的规模就能够在比其先驱曾经梦想过的规模要大得多（阿里齐，1994，第176页）。

这个世界体系论正是我不能接受的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它

关于 19 世纪的英国帝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当一个贸易中心不仅仅是作为临时储存转运——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里，英国的海外收入中有 10% 来源于再出口贸易（伊姆拉，刊登于巴拉特·布朗，1988，第 28 页）——中的货物仓库使用时，它就是进行贸易和市场营销的中心；而该作用可以扩大，使它包括其他货币市场和交流。在更晚得多的时期里，即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用金融投机情况描绘英国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的某些方面。但是，这种描绘缺少对帝国主义后面的动力的解释，而正是这种动力，从 19 世纪以来，推动着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大工业生产率，扩大工业资本乃至今天的规模非常大的工业资本。如果没有这个动力，英国和美国就只会关心全球商业的市场营销操作。

集中观察帝国的中心地区的金融活动有两种结果：首先，就那些工厂、矿山、种植园和小控股公司而言，它如果不是强调它们的绅士背景，就肯定强调它们的绅士性质；其次，它允许人们形成一幅关于抽象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图案，而边缘地区始终受到核心地区的剥削。现实却复杂得多。正如世界体系论学派接受的那样，无论在核心地区还是在边缘地区都有剥削（华勒斯坦，1982）。但在每种情况下，那都是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不是整个北方对整个南方的明显的剥削。

因此，提出整个地区和人民的霸权地位，只是为掩盖处在其下面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在没有对发展的各种形式进行考察之前而对发展本身进行的全面进攻而言，上述说法也是成立的。所有的形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人提到（埃斯特瓦，1992，第 6~25 页）。这是自称的后发展理论家们采取的立场，他们硬说发展时代已经结束，他们相信发展失败了；那些还在寻求促进发展的人们，要么是上了当，要么是自私自利的。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一切关系，在其本质上应该是对抗性的（拉赫讷马，刊登于鲍特里和拉赫讷马，1997，第384页）。

八、新帝国主义

我完全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20世纪4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发展甚至大部分的发展，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其含义是，由许多资本家集团对一些国家的全体人民进行全球性经济剥削。自从过去的殖民地的人民获得独立以来，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经济的，尽管过去的殖民主义列强在南部非洲，以及美国在越南、格拉内达、巴拿马、尼加拉瓜和波斯海湾，都在若干军事进攻中，曾经使用了非经济的力量。此外，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里，纯粹的经济剥削在继续进行，殖民主义列强和美国支持军事独裁者，以防止或干扰出现对剥削至少不同情的政权（丹·史密斯，1992，第148页）。

这种继续存在的帝国主义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延续殖民主义的贸易关系、安排殖民地向殖民主义列强的工业供应它所需要的原料。由于在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里权力被代表商业家族或地主家族的精英的政权继承了，这种关系被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的世界。通过接管殖民地的市场委员会和与国外矿业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那些精英保证了自己的发展项目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还保证了自己及自己的追随者积累财富（巴拉特·布朗，1995b，第126页）。这些财富中很多没有在他们自己国家里投资，而存入了瑞士的银行，或者投入了佛罗里达和夏威夷的房地产。菲律宾的马科斯和扎伊尔的蒙博托的抢夺仅仅是普遍的做法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从19世纪初，当西班牙不得不结束在西半球的殖民主义统治时，在拉美一直是这样进行的（弗朗克，1971）。

这样的贪污很少受到北美或欧洲大资本主义集团的严肃批评。而且，上述关系显然对负责供应初级商品的一度是殖民地的国家很不利。面对数量很小的大跨国采购公司，供应这些商品的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数以百万计的小热带产品供应商们，特别是咖啡和可可的供应商们，发现自己的谈判地位很脆弱（巴拉特·布朗，1993，第64页）。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时期里，商品价格很高，但此后它们一直表现下降的趋势，其部分原因在于天然材料的代用品的开发，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出现了受到大量补贴的北方农产品，与热带产品竞争（巴拉特·布朗和蒂芬，1992）。

其他一些更直接的剥削形式使一度是殖民地的国家进一步蒙受损失。在很多地区里，在为巨大的跨国公司经营的矿山和种植园里，继续被采用的工资劳动形式，很难与奴隶劳动和以契约约束的劳动区别开来（巴拉特·布朗，1995b，第311页）。但是，按照凯的理解，那种剥削不足于实现当地的积累（凯，1975）。在前殖民地国家的政府与海外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地方，被滥用了的让与价格，即特别是大矿业公司那种做法，导致了当地政府为自己的矿藏得到的要少于世界市场上的价值（巴拉特·布朗和蒂芬，1992，第102页）。那些政府不大可能抱怨，因为，它们还在获得自己的佣金，或者担心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丧失自己的生意。

第三种剥削形式最接近于世界体系论关于世界的看法。以前是殖民地的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在其领土下没有石油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向北方国家的银行借了大量的贷款，以购买价格上涨了的石油和它们的发展项目需要的其他投入。它们预计将能够用初级产品的出口偿还那些债务。但是，在那些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的同时，它们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了，而此外，世界的贷款利息迅速上涨了。这些国家开始举债，后来

积累债务，以致它们很快地占据它们海外收入的很大的部分（乔治，1992，第xiv~xv页）。各国的私人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调整了计划，发放了新贷款，使在80年代还不到1万亿美元的第三世界的海外贷款，到了90年代后期翻了一番（乔治，1992，第xv页）。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坚持这样的条件，即债务国如果想继续得到财政帮助，就必须执行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包括必须增加商品的出口，以偿还海外债务。因为所有的债务国都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商品就积存起来了，价格继续下跌（巴拉特·布朗，1995b，第88~90页）。

虽然看来这些剥削形式涉及的是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但捞到好处的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公司，而北方国家的消费者得到的好处很少，这很快地被一份关于世界咖啡和可可价格和当前给消费者的零售价格的报告揭示出来了（巴拉特·布朗，1993，第68页）。的确，北方国家一般的纳税人们一直支付了对农业的补贴，而正是它使南方国家的农民陷入了贫困。也是那些纳税人弥补了他们国家政府给银行减税造成的缺口，而那些银行被允许把因为第三世界的债务而遭受的损失列入专门的账目里（乔治，1992，第65页）。第三世界的精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除非他们必须向客户提供回扣，或者受到军事政变或本国选举的挑战（巴拉特·布朗，1995b，第126页）。

此外，这样也没有能够证明，在17世纪确立的世界分成世界体系论学派称之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两个部分的分野，不可能被结束。日本不仅从边缘里出来了，而且建立了另一种帝国主义。这使日本征服的地区发展自身的原料加工业和后来发展自己的工业（库明斯，1996）。南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还有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当地资本家集团，用日本的资金和机械开始和进行了自身的资本积累进程（卡斯特利，1996）。正如比尔·沃伦预言的那样，这不是贸易的重商主义资本

主义，而是充分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沃伦，1980）。在拉美，当然也有一些工业发展，但它受到了这些国家在收入上的极端不平等的制约；东亚近期的动荡可能暗示，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不觉得任何人认为中国已经达到极限，但印度尼西亚的收入严重不平等，这的确暗示，如果没有重大的政治变革，印度尼西亚不大可能进一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第43页）。

还有一个由反对发展的人们和后发展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那就是，那样的发展是否使其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的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因为我们享受着现代医药、电灯、暖气和空调、多次印刷、电讯、空运、公路、铁路运输以及用于做笨重和最单调的工作的工具和机械，我们很难会说，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一些，除非我们真正准备到修道院里生活的话。后发展主义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完全是诚恳和逻辑的事情（拉赫纳马，1997，第393-394页）。

就资本主义问题而言，关键的一点是，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平等，但如果它没有在不增加输者们的数量的情况下，同时始终扩大了受益者的数量的话，它不会存在那么长久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历史结束了，资本主义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他明显地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造成的破坏，已经开始超过它给其受益者带来的好处。地球简直无法继续承受那样的破坏。如果我们想延续地球上的生命，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布伦特兰，1987）。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有了重大的进步。在50年代之后，在发展中国家又出现了重大的进步（联合国发展署UNDP，1997，第23页）。下面援引联合国报告里的一段话：

自1960年以来，在比一代人稍多的时间里，在发展中

国家里，婴儿死亡率减少了一半以上。营养不良的百分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没有上小学的儿童的比例，从一半以上，减少到了不到四分之一。得不到安全水源的农村家庭的比例，从十分之九，减少到了大约四分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第2页）。

随后，后发展主义者们写道，“在50年代初期建立的旨在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的整个技术帮助系统，都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它们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拉赫讷马和鲍特里，1997，第190页）。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反映了他们的特点的。那样的对一切发展进行批判的人士们，向我们这些参加了那种帮助的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要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做自己的工作的“更深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用我们的咨询追求自己的目的，有没有“沉溺于对抽象的人类的虚假的爱”，此时，他们的确走得太远了（拉赫讷马和鲍特里，1997，第392页）。他们还说，我们不应该做那些工作，而应该试图发现马吉德·拉赫讷马所说的“人类的软弱无能中包含的提供补偿的力量”（拉赫讷马，刊登于拉赫讷马和鲍特里，1997，第393页），并且进入“自由的探索者的默想中的世界”（拉赫讷马，第401页）。正如我们应该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他们的立场的逻辑结论。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就是劝人们隐退到宗教、修道院，或退到祈祷和禁欲主义的生活中去的呼吁。这导致了大量的无私服务的事例、文章的被抄录、良好的农业实践、宏伟的教堂的建造以及今天在穷人中间进行的大量的执着的工作。但是，与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拉赫讷马的观点中，这都与一种强调精英作用的概念结合起来了，这个概念是他从孔子关于“臣”的思想援引的。按照孔子的那个思想，“臣”是“最有权威的人……是人们

最信任的共同体成员”，在创造好的社会方面，他们承担的责任最多，应该把他们与“民”即盲目的群众区分开来。通过关于“臣”的思想，应该建立一种秩序，拉赫讷马将它称为“美学的秩序，其基础是在差异中对善和和谐的追求”（拉赫讷马，1997，第389~390页）。我们要指出的却是，在修道院之外，群众的生活主要是在修道院的土地上不停地干活，为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生产食品，而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的节制并不总是那么明显，以致不能保证拉赫讷马宣扬的“在差异中的和谐”。

任何一个曾经把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当做自己终身工作的中产阶级欧洲人，必定是吃惊地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统治及其后果，对于数以亿计的世界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在对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劳动尤其包括了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的人民的劳动。但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又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撤退呢？有人认为，如果从前是殖民地的国家的人民，断绝了与原来统治者们的剥削性贸易关系，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好些（格罗讷迈耶尔，1992，第63页；请参看郎和海恩斯，1993，第126页）。但是，这些人民中，很少有人准备放弃减轻挖地、锄地和在头上顶着货物在不平坦的森林和高山小路上跋涉那样的笨重劳动或者通过无线电广播、电视、电话和电子邮件系统与其余人类联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帮助那些人们那样做的话，拉赫讷马却肯定会说，这是说明发展工作者很傲慢的例子。

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掉看来是很错误，但是，通过像拉赫讷马所做的那样，即问道，我们为什么“继续在危险的污染了的水里给婴儿洗澡”（拉赫讷马，1997，第392页），也解决不了问题。在不必接受“关于进步和发展的思想，对地方性社会的生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拉赫讷马，1997，第392页）这观点的情况下，对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批判，是可能的。在这里，

地方性的含义是，在过去某个时代里，小村庄社会比今天大都市社会是更幸福得多的地方。这顶多是一个不确定的主张，但今天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因为除了发生核灾难外，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生活。

几年前，华勒斯坦提出：

毫无疑问，16世纪的乡村生产者中，很少有人像今天的第三世界生产者那样，为那么少的报酬，做那么辛苦和那么长时间的工作（华勒斯坦，1982）。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应该如何证明或否定那样的说法，但华勒斯坦最近清楚地说明了，该说法不仅适用于乡村生产者，而且也适用于一切可与其相比拟的人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历史上的生命中取得的成绩进行详细总结”后，华勒斯坦下结论说：“从总的来说，我自己的总结是消极的，因此，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进步的证明”（华勒斯坦，1997）。

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这个制度在本质上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这一点我同意——而因为我们都那么赞扬它，我们都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连它的科学也在证明它是自我毁灭性的。这看起来是很可靠的论据，但其依据是这样的看法，即欧洲人的科学发明只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利用。马克思关于相互接替的社会形态的论点，或许在有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方面过于乐观，但是，他的论据的核心是这个观点，即新技术能够给旧的社会形态造成矛盾。今天的情况则最充分不过说明这种观点正确。我们对此后将出现的变化是否乐观，并非像华勒斯坦所说的那样，是关于两种文明的教育问题，而是关于一个人能够带来那种变化的男人和女人打交道的经验的问题。

我自己参与发展工作的经历使我很乐观，我完全不愿意按照

马吉德·拉赫讷马的建议那样，退到冥想的世界里，以“发现我的真正的极限和可能性”（拉赫讷马，1997，第393页）。和许多后发展主义者一样，我也在全世界的基层单位里的人们那儿，寻找始终存在的内在力量，但我预计他们不会退却到小的共同体里，并使自己与正在发生的技术进步割裂开来（巴拉特·布朗，1995，第212页）。在他们有机会得到某些新技术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的地方，仍然构成第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小农，已经证明自己很有能力来互相合作和加强自身在世界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是拉美、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咖啡农。在比如说双胞胎贸易公司（TWIN TRADINGS）那样的国外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络，用来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超级市场里销售他们的商品。在非洲的可可和花生生产者中间和在第三世界许多其他小农和工匠者群体中间，也实现可同样的发展——在这里我是特意地使用了这个词的（蒂芬和扎德克，1996）。

这种事态发展与在北方国家消费者中间出现的趋势相一致，该趋势就是人们对世界市场体系的不公正日益觉悟，人们对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对人而也对土地和环境进行的剥削的不可持续性质日益感到恐惧。多数小农在他们的合作社里，将各种对社会和环境都负责的做法相结合起来了。他们建立了有效的组织，他们以民主的方式工作，他们搞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间作，使他们在生产中不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在志愿的和自助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广泛增长的同时，他们指明了走向建立替代资本主义剥削等级关系的另一种制度的道路（巴拉特·布朗，1995b，第320页）。

在我早先发表的书里，我对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里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样的政府受到人民监督，它们在制定贸易和生产的计划时，所采

用的方式将能够向积累了巨额资本的力量提出挑战。在当时看来，各方相互赞同的计算机化的供求计算系统能够取代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巴拉特·布朗，1993，第10章）。事实证明，对于掌权者来说，那种想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接受的，而因为它们仍然涉及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它们也没有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兴趣。

然而，在世界经济的空隙里，即在志愿和非政府组织的增长和在非官方经济和黑经济中，各种合作组织的形式，维持了自己的存在。作为通过新技术而实现的信息民主化的结果，在它们面前开辟了完全崭新的前途。知识能够产生力量，而知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使世界经济的参数发生变化（凯里，1997）。在政府间达成的国际商业协定没有能够保护生产者对付巨大的公司，生产者自己的由新信息系统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取得成功（巴拉特·布朗，1997，第23~24页）。我们又一次有可能谈到帝国主义的终结。



回顾帝国主义

安东尼·布鲁维尔

请想像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图。欧洲国家的帝国横跨全球，分布在整個非洲和亚洲。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来自欧洲的移民取代了全部原来的人民。在世界主要的有人居住的中心，只有中国和日本没有被置于欧洲人统治之下，但通过与欧洲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强烈的震撼。除了少数的不重要的残余之外，欧洲人的帝国消失了，但世界仍然明显地打上了其影响的烙印。如果我们回到 18 世纪去，欧洲和亚洲看起来几乎是平等的——亚当·斯密把中国当做高度发达国家的例子，尽管他知道，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多。如果我们继续往回走到 15 世纪，当时欧洲人甚至没有意识到美洲的存在。在长远的时间范围来看，欧洲的帝国主义和其突然崩溃，是世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同时也是塑造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评估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理论。这不是很容易的任务。我们面临的情况，并非理论和不同的答案的筒简单

单被提出来，而是它们很少在应该问道的正确问题、在应该如何使问题概念化或者在什么东西可以组成可以接受的答案诸方面，很少有一致意见。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把不同的看法一个个地加以分析，并力图按照其自身的论据来理解每个看法。我在另外的著作里曾经试图那样做（布鲁维尔，1990），但要用不到一本书的篇幅来回答那些问题，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是，要争取提出若干相对简单的问题，然后评估所提出来的答案。

我觉得有3个大问题。首先，欧洲为什么取得了那么强大的统治地位，其统治为什么采取了对其居民在种族和文化上与欧洲统治者很不相同的巨大地区进行直接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形式呢？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帝国对沦为殖民地的地区和帝国主义列强本身的影响呢？特别是，帝国在多大的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不同部分之间长期存在的财富差异负责呢？第三，殖民主义帝国为什么崩溃了，帝国主义今天还剩下一些什么呢？

帝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在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原来的土著居民大部分被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移民取代了。这些移民殖民地有效地变成了欧洲的延伸物。与此形成对照的，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里，欧洲移民一直是居民的很小的部分，使欧洲人对人数大得多的非欧洲居民进行统治。有几个例子，例如南非和阿尔及利亚，在非殖民化时期里，事实证明它们的局势特别难于驾驭。我不想讨论欧洲内的帝国，比如说奥匈帝国，或者比如说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法国对布列塔尼的统治或者普鲁士对莱茵河地区的统治这样一些现象，其原因在于，我们应该把它们置于相当不同的国家建设背景下讨论。现在有时候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情况，是国家建设失败了的情况，或者国家的边界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将主要集中讨论英国帝国，因为它最大和最重要。

一、历史背景

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集中在 19 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里的“围绕非洲的争夺”。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来源于这个时期，它们当然涉及当时发生的事件（霍布逊，1902；希法亭，1910；卢森堡，1913；布哈林，1917；列宁，1917）。

然而，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对欧洲帝国主义采取了其最终形式的时期的这种强调，使人们看不到根本性的东西。在被争夺的非洲领土中，很多是人烟稀少的，所提供的经济上有用的资源很少。欧洲帝国主义的主要形式确立得更早。从 16 世纪之后，南北美洲被征服了和基本上由欧洲人占领了。在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在 19 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完结了。即使我们不考虑早期的帝国，掌握欧洲人的第二代的帝国的钥匙便是欧洲与南亚和东亚人口庞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光是印度的人口就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口的 4 倍，而欧洲帝国中最大的是英帝国，是围绕通向印度和中国的路线建立起来的。英国对印度的渗透是从 18 世纪发展起来的，在 19 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从来没有被置于直接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但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在对非洲的争夺开始之前很久，中国的市场已经被打开了。在对任何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进行评价时，必须把它们放在帝国的整个历史进程背景之下。

欧洲的海外帝国有哪些新特点呢？帝国毕竟从有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已经存在过，历史上始终有一些人民、城市或国家征服和统治其他的人民、城市或国家。这并非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早先存在的那些帝国产生了突出的影响——请想想比如说罗马帝国在欧洲的遗产，或者阿拉伯和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遗产。我们应该

寻找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英帝国和罗马帝国吗？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背景非常不一样。

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欧洲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它的是帝国的成长。这很容易说，而且经常有人这样说，但是，确定资本主义是什么，或者确定它出现的日期，要困难得多。很少人会不同意说资本主义涉及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并让追求利润的私有企业在市场上销售它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会坚持补充说，资本主义企业雇佣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尽管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喜欢说剥削奴隶的种植园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按照这样的定义确定的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控制全部经济活动。实际上，很早以前，在各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混合体里，早就有资本主义因素——这肯定可以追索到古代世界里。在不同的地方和时间，其比重是有差异的，但这从来不是一个要么有或者要么没有的问题。

在这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情况是，当在欧洲部分地区里资本主义的优势在增长时，伴随着它的是漫长的、缓慢的、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产量、人口和生产率都开始增长，虽然从绝对数字来看，其速率很慢，但它还是比人们以前经历的任何情况都快。连续的技术革新浪潮改变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其结果是世界以一种很崭新的方式，被统一成为单一的（很不平等的）体系。在此之前，不平衡的发展和帝国的兴衰仅仅产生了局部的或顶多是次大陆性质的影响。现在它影响全世界。

在16世纪里，在第一批欧洲帝国的时代里，用一般标准来看，在许多领域欧洲的技术还没有超过亚洲许多地区，但欧洲部分地区在航海技术、武器和导航方面已经取得了关键的优势。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进行的航行，是海洋被征服的标志（帕里，1981）。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有很多人多次来回横跨印度洋航行，但对早期的航海家来说，大西洋和太平洋提出了不同的

问题。只要简单地沿着海岸航行，就可以从印度航行到非洲，而季风的的活动形式使从亚洲到非洲横跨印度洋航行成为可能，因为在每个方向上，都有可靠的风帮助航海者。大西洋和太平洋却不一样。哥伦布和其他 15 世纪和 16 世纪航海家所做的事情是做出了榜样，让人们知道怎么样利用信风和西风来反复做横跨大洋的航行。

美洲首次为欧洲人的渗入而被打开（人数极少的从冰岛去的人很难算是打开了美洲）。其结果是历史性的悲剧，即“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健康灾难”（波尔特尔，1997，第 163 页；也请参看克罗斯比，1986）。但是，这种灾难，由于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居民原来是互相隔绝的，以致病菌也经历了单独的进化过程。一旦建立了接触，居民成为新疾病的患者，而他们对此缺乏免疫力。在新世界和旧世界，其效果很不一样，看来是因为在接触之前，居民的情况很不一样。旧世界人数更多的居民，促使病菌有了更快速的进化。在新世界的效果是灾难性的。人口下跌到了接触前水平的一个小部分。有些人仍然相信，是西班牙征服者消灭了一些地区的全体居民，或者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逼死。始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是，西班牙入侵者的相对小的力量，没有能力来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欧洲人还没有进入的地区里，也有居民灭亡，而同时整个的文明崩溃了。假如是阿兹台克人与欧洲人建立接触，而不是相反的情况，结果还会是一样的。

西班牙帝国的迅速膨胀很容易解释。西班牙人寻找的是黄金和白银。南北美洲蕴藏着这些金属的丰富资源（另外，假如需要征服的话，还有尚未征服的地区）。美洲居民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疾病使他们的人数大大减少。美洲的被征服和部分当地居民被新来的人员（包括奴隶）取代，是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对它进行解释时，不能采用解释欧洲人后

来在非洲和亚洲建立的帝国所采用的相同论据。

欧洲人对亚洲在任何有意义的规模上的渗透过程，都是在晚得多的时期里发展起来的。甚至在18世纪，人类居住和文明的三大中心——欧洲、印度次大陆和东亚——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几乎还是处于同一水平上，尽管欧洲的经济空间已经扩展到全球。比如说，英国和法国，控制了印度的一些部分，但我们不应该夸大那个事实的意义。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由许多国家和种族群体占据的次大陆。在次大陆的政治和战争中，某些欧洲列强是突出的参与者，但许多当地的国家和其他力量也是突出的参与者。印度在其内部和在外部的，如同欧洲那样，经历过帝国的兴衰。如果我们能够让时间停留在18世纪中期，即在克莱弗在普拉西取得胜利之前，或者在10年后黑斯廷进行的改革之前，那么欧洲人在印度介入的活动，不会看起来好像是印度历史中的不正常或特别有意义的事实。甚至在19世纪早期，当时已经很巨大的英国在印度建立的帝国，与它取而代之的莫卧儿帝国没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它看起来很特殊，但只有回头看它时，才是这样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人与非洲的接触局限与海岸。在这里，必须就贩卖奴隶的贸易谈一点情况。那种贸易明显地对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是如何产生的是很明显的事情——美洲严重缺乏劳动力，而在非洲可以获得奴隶。欧洲人控制了海洋。当时存在着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机遇，因此它就被抓住了。欧洲人并非（正常地）奴役非洲人——非洲人被其他非洲人抓起来，然后作为奴隶贩卖给欧洲奴隶贩子。奴隶制度在非洲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说这些话，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要减轻奴隶贩子的道德责任，或者缩小奴隶制度的穷凶极恶程度。我们的目的是解释所发生的情况，不是作出判决。奴隶贸易对非洲自身的影响难以评估，因为

缺少关于与欧洲或中东的直接接触之外的领域的记载，但是，那种影响应该是很巨大的。关键在于那个影响的表现是，在欧洲人没有直接征服非洲的情况下，非洲的内部事务发生了变化。

在18世纪，3个伟大的文明——欧洲、印度和中国——还是作为表面上平等的力量互相面对着，但它们之间已经丧失了平衡。技术革新的步伐开始明显地加速了。世界的地图画出来了，海洋被征服了。贸易的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导致了创利的机遇成倍增长，而新的生产方式为贸易创造了新机遇。不断扩大的贸易额，刺激了造船业和航运业的进步，增进了欧洲人的优势。历史的舞台布置好了。

二、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

在“漫长的”19世纪里，也可以说，从《国富论》的发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的帝国在全球扩展。这是任何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必须解释的现象。我将简单考察一些代表性理论（如果想看更全面的阐述，请参看布鲁维尔，1999）。

许多理论的明显特点是，它们都集中研究资本输出，而不研究简单的货物贸易。对历史记录进行简要讨论，是对后面有帮助的前言。在19世纪晚期里，对外投资主要是证券形式的投资（给外国借款者的贷款，或者购买其他类型的金融资产）。在进入20世纪之前，即在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有效地完成了之前，由公司对海外物质性资产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没有启动起来。因此，直接投资不大可能是建立帝国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建设帝国的最后阶段也如此。因此，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焦点，必须是证券投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大部分证券投资的去向是独立国家或者主要居民是英国移民而且快要独立的英国的自治领地。在19世纪里，英国在海外的新投资，

大体上相等于已经存在的海外投资的利润，因此，英国得到的净收入很少，这很令人感到意外。当然，在这过程中，海外资产的总额的确不断增加，而如果对处于平衡的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进行干预的话，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霍布逊（1902）制定了第一个详细论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提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里，因为工人的消费受到贫困的限制，而资本家将收入的大部分储存起来，存在着消费不足（或者过度储蓄）的慢性倾向。他争辩说，因此，在国内，虽然存款不断增加，但投资机遇不断减少，而在海外，对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他人也讲述过同样的故事。列宁的论据看来是一样的，虽然他表达得很含糊，以致很难说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罗莎·卢森堡（1913）也有类似的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虽然她用它辩解的是对海外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对进行海外投资的需求。

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现在已经不时髦了。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形成最终结论的领域，但霍布逊自己的理论缺乏说服力，而后来没有人对它们做了很多的改进。反对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的主要论据是，国内的投资本身就能够扩大国内的需求，以致同时实现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推崇消费不足论的人们的典型想法是，低消费必然意味着低需求和很少的投资机会。这看法多半肯定不正确。不管对该理论的评价是什么，事实是否定霍布逊的。在英国，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海外投资主要涉及对原先投入海外的资本的利润进行再投资，而不是抽调多余的国内存款。多数投资不是在殖民地，从而削弱了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在19世纪最后的15年里，实际工资在增长，而利润和存款的比重没有增长。海外投资毫无疑问是其原因之一，但硬提出它是对帝国主义的解释的中心因素，并把它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海外投资与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

趋势”联系起来。有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也被提及，虽然在他实际上写的著作中很难找到那样的论据。马克思争辩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将下降，因为“资本的有机组成”将提高。他的某些追随者们提出，因为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倾向，在欠发达的地区里投资，就可以克服利润的下降，从而为发达国家征服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一个动机。在这里，只需要说，现在人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样的倾向缺少理论和经验上的依据。

另一套理论将帝国主义和垄断的上升联系起来。霍布逊用垄断解释了可能产生不平等和从而产生消费不足的根源。希法亭（1910）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和可能更扎实的论据。布哈林（1917）跟随了他，使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更加明确。列宁也暗示了从布哈林和希法亭接受过来的类似论据。希法亭-布哈林的论据没有联想到已经巩固地确立起来的垄断公司，而联想到了垄断权力还是比较脆弱的体系。这些体系采取的形式是卡特尔（公司间的协议），它们很容易解体，还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威胁。垄断权力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它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排除外国的竞争。一旦这一点确立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旨在排除外国竞争对手的帝国主义扩张的动机。

这是更有道理的论据，至少作为对19世纪末围绕非洲的争夺的解释是这样的。作为对最大的帝国即英帝国的兴起的解释，它是脆弱的，因为，英帝国主要的扩张是在更早的时期发生的，而那个时期任何人都不会描绘为确立了垄断的时期。的确，直到建立帝国的晚期，英国保持相对非垄断化的状况。作为对发展得较晚的欧洲列强突然参与争夺地盘的现象和对殖民主义战场里欧洲列强之间的剧烈竞争的解释，希法亭-布哈林的故事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上面讨论的理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欧洲人的作

品，那些欧洲人都想解释他们生活的年代里，即在 20 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解释帝国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图。因为那些理论的作者对欧洲之外的世界知道得很少，他们就欧洲之外地区的事态发展，能够说的事情很少。其次，他们的论据有共同的结构。资本主义面临着某种能够使它陷入困难的潜在问题，而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个问题会恶化。帝国主义提供一个暂时的（但仅仅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都被迫采用帝国主义的政策。霍布逊以为，一种改良了的、更平等的资本主义，能够在不搞帝国主义情况下生存下来。其他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惟一的答案是，必须通过革命打倒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很快就会发生。因为今天资本主义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了，而且很健康，所有这些理论中，没有一个看起来有丝毫的道理。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解释欧洲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里的看上去不可阻挡的兴起呢？与其寻找可以称为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单个因素，不如去寻找事情内部稳定的发展变化规律。在整个 19 世纪，技术和经济继续发展，而且从其原来的中心扩展到了其他国家。这些国家都在欧洲，或者有欧洲移民定居。某些国家建立了帝国，另一些国家没有能够这样做。非欧洲的地区（只有一个例外，即 19 世纪晚期的日本）都被甩在后面了。经济史专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描写和理解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成长过程，而且今后还需要大量的工作，但是，从最广泛的概括来看，欧洲占据领先地位，没有什么使人感到意外的地方。在世界经济统一之前，不同地区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有效地实现自身的进步的。欧洲是第一个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可避免地形成。当然，这是在全面的殖民主义渗透之前发生的——帝国主义对差距的扩大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放后讨论。

在 19 世纪里已经产生的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显然是帝国

主义现象的背景。欧洲是资本主义的这个事实，也是帝国主义的背景。发展创造了新需求和新市场，从而也创造了贸易的新机遇。运输费用大大下降，这促进了贸易，但也减少了在远方施展军事力量的费用。军队可以和货物一样，用新的火轮运送各地。投资机会产生了，同时也产生了把技术转让到过去不了解它们的地区的机会。的确，投资和技术转让——为了改进运输和建立新的出口产品生产线——常常是贸易的先决条件。

世界经济被稳稳当当地统一了，使世界出现了经济和军事权力极其不平衡的局面。虽然这本身不足于解释为什么欧洲人的优势导致了直接的殖民主义统治，但这可以说明其背景。国际贸易掌握在欧洲人手中——他们拥有知识、轮船、资本——因此，是欧洲人渗入了其他大洲，而不是反过来。争端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争端几乎清一色都是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欧洲商人和投资者要求自己本国的政府提供支持。贸易一向具有政治和军事因素倾向（在中世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但现在其程度比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在不同的地方，事情的发展方式很不同。在一个极端上，哥伦布到达之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社会，很早就有欧洲人渗透进去，在大屠杀下完全崩溃了，然后被征服到完全屈从欧洲人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和日本从来没有被置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部分的解释可能在于欧洲，或者至少在于欧洲人在不同地区可以获取（或认为可以获取）的东西。被认为有黄金的地区遭受猖狂的入侵。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因为没有人认为那儿有利可图，在几个世纪里没有人去。但是，主要的解释在于不同的非欧洲社会的不同反应和能力。

在围绕非洲的最终争夺之前（当时每个欧洲国家都想在为时太晚之前抓到自己的一份），欧洲列强始终首先喜欢尽可能与当地统治者做交易。这样做更便宜，且费用始终是关键。必要时，

它们可能进行干涉，成立傀儡政权，或者在它们能够进行有效控制的地方部署驻军。一般来说，实行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只是最后的选择。很多问题取决于当地的条件（请参看卡拉格尔和鲁宾逊，1953；鲁宾逊，1972，1986；鲁宾逊和卡拉格尔，1961）。直接征服中国或日本看起来始终太昂贵和太冒险，虽然可以用更便宜的方法对它们施加压力（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对中国进行了轰炸，佩里司令的军舰也威胁对日本进行轰炸）。如果历史更宽容一些，印度也许不会沦陷，但正在英国和法国互相打仗而在印度的利益迅速增加时，莫窝尔帝国（它本身在来源上是外来的政权）在分裂。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国帝国事实上几乎是偶然的、一点一点地、“在突然丧失思维的时刻”建立起来的。它没有计划。就领土的获得而言，每次都是偶然性事件的结果，每次都可以有相反的结果。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故事。由于局势的原因，由于决策者和在实践中执行政策的人们的偏见和目标，帝国注定要增长。这一切的基础是经济上的运动（这是商人的运动，不是政府的运动），还有实力的严重不平衡，前者的目的是寻找获取利润的新机会，后者则保证了英国政府能够真正进行干涉，在全世界保护自己的公民。在19世纪的晚期，已经有了人们都认识的关于帝国的意识形态，还有一个殖民地事务办公厅，其任务是就帝国的未来制定计划（一般没有效果）等等，但那是建立帝国的结果，不是其原因。

虽然欧洲人是沿着有巨大多样性的道路，在很不同的时间，把特定的领土纳入自己帝国的，但是，在20世纪初最终形成的情况是，那些领土都变成了相当一致的结构的部分，它们都由殖民主义官员统治，而这些官员有标准化的角色和制服，并且是以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其内容是强调欧洲人的优越性，同时强调欧洲人有义务教育它们的公民和实行公正的统治（这种

意识形态当然包含很多虚伪的东西，但它并不始终是完全虚伪的)。帝国的官僚化是由欧洲国家的官僚化和统治巨大地区和众多人口的任务派生出来的。需要有规定、程序和先例，但这种表面的统一性掩饰着一个由很不同的社会组成的脆弱结构。那些社会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由于不同的理由，而被征服的，它们命运注定要经历很不相同的发展。

三、帝国主义的影响

人们经常硬说或暗示，目前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帝国主义的结果。我已经争辩说，欧洲在技术和经济上相对于世界其他部分的领先地位，是在帝国主义形成之前就确立的，是使帝国主义有可能形成的因素，但下一步应该是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帝国主义一旦形成了，它对富裕的和贫穷的地区之间的鸿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解释不同地区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差异，那么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帝国主义对长远的增长的影响，即对帝国的中心和帝国统治的地区的影响。

以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一套问题是很困难的，这是由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造成的。为了能够测量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与一个“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即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而本来会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因为帝国主义的成长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一体化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想像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世界，而不陷入纯粹的幻想是很困难的。从其定义来看，一个“与事实相反的情况”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我们不能拥有独立的事实根据的事情。我们或许可以观察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比如说贸易和投资的形式，并就殖民主义的控制对那些形式的歪曲，试图形成一些想法。在原则上，我们有可能将被征服了的地区与没有被征服的地区进行比较，但是，完全

逃脱了欧洲人的控制的地区很少，而这些少数的地区，可能是因为特殊因素才做到这一点的，因此，进行比较的结果将是歪曲的。因此，有人有时说，日本在经济上成功是因为它从来没有作为殖民地被占领，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拥有特定的力量，它才成功地抵制了西方的控制，还致力于应对和超过西方。

四、受 益 者？

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从它们的帝国受益的话，这些受益是什么呢？帝国主义可能带来的经济收获可以在4个题目之下列出来：（1）掠夺的财富；（2）不平等贸易的收获；（3）来自投资的利润；（4）间接的效果，比如说潜在竞争对手的消灭。上面的第一个题目可以很快地讨论清楚。掠夺肯定进行了，但像黄金或艺术宝物那样的东西，从长远看，其经济受益很小。从勒索和贪污得到的收获也可以列入这个题目之下。毫无疑问，在殖民地机构里服务的某些个人发了大财，但在国家水平上，这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是很小的。间接的效果，即题目（4），是最难以确定的。我不试图做到这一点。我只想说明，没有一个人说服我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长远经济受益的重要来源。因此，我要集中讨论贸易和投资，它们几乎肯定是两个最重要和最容易测量的因素。

首先，让我们考虑以下中心都市地区从不平等贸易可能获得的受益。在这里，回忆一下国际贸易理论的若干基本知识，是值得的。某些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一方从贸易中受益，另一方必然吃了亏。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正常的情况是，贸易对双方都有益。帝国主义列强毫无疑问从与它们的殖民地的贸易中受益，但这本来是它们的目的。问题是，与贸易的形式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情形相比较，它们是否发了更大的

财？讨厌的难题出来了，即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简单的或确定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提出这样的问道，即帝国主义列强是否有过一些办法来试图改变进出口交换比例，使其对它们有利，而如果是这样的，它们是否的确这样试图过，所产生的效果又如何呢？最常用的策略多半是强迫殖民地仅仅与大都市进行贸易，从而把竞争对手从殖民地市场里排斥出去，并防止殖民地生产者寻找其他购买者。这种做法对进出口交换比例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如果在大都市—殖民地体系里有足够的竞争，而且大都市为贸易开放，这种做法就不会带来什么差别或者只带来很小的差别。竞争会使殖民地里的价格与大都市里的价格保持一致。大都市里的价格本身通过贸易与世界的价格相联系。另一方面，在大都市的市场被垄断了的地方，在殖民地和在大都市的市场里采购货物的商人，都同样地会因为受到垄断价格影响而蒙受损失。在垄断贸易集团控制与殖民地贸易的地方，情况可能会对殖民地更坏一些。综合起来说，这样，大都市国家可能受益了，虽然市场倾向于抵制任何非常大的歪曲。如果殖民地的出口产品的价格被迫下降得太多，生产者会转而生产别的作物，使价格重新上涨。如果大都市的产品以极高的价格出售，其代价将是贸易总量的下降，从而使总的受益也减少。应该补充说的是，殖民地也经常被允许排他性地进入大都市市场，从而在那儿受益，而其结果是让大都市消费者和其他潜在的产品供应者吃亏。

对大都市从歪曲的贸易得到的受益的任何量上的估计，必须以对应该或事实上的价格的（根据“与事实相反的情况”的）估计为依据。荒谬的是，有人提出了关于大都市的巨额受益（和边缘地区的损失）的估计（例如，埃曼努尔，1972a，第369页），但它们的依据是没有确定的或者幻想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我如果说，我应该得到的是我所得到的两倍（或者10倍），我就

总是可以提出，支付给我的报酬过低了。可以进行的惟一有道理的比较，是在事实上的贸易和独立国家之间的贸易的比较。在没有详细的对一个个产品的研究（做这种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很难提供），看来不可能做出任何准确的估计，但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都市国家的受益很小。由于前面已经谈到的理由，操纵进出口交换比例的范围是有限度的，而且，除了在极其少数的情况下，这些极限不大可能被达到了。与GNP总额相比较，与殖民地的贸易很小，因此，作为GNP的百分比，受益是一个较小部分的另一个较小部分。赤裸裸的事实正是，因为殖民地很穷，它们是相对小的贸易伙伴，给大都市提供的受益也就很小。

如果有人争辩说，大都市由于便宜货物的进口长期受益，还有其他因素可以考虑。从改进进出口交换比例得到的利益，最不可能被完全地甚或大部分地转化成投资，从而被转化成增长。在任何收入增长额中，被储蓄的部分是相当小的，而其中一部分作为海外投资，没有投入大都市的经济。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一边说，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储蓄过度需要进行海外投资的出口，而同时又说，大都市因为进行不平等贸易而在投资和增长方面受益。如果储蓄已经过高，从不平等贸易得到的任何利益，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确，廉价的材料，可能使大都市制造商们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处于优势地位——这是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有意义的动机——但那将导致制造业先进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发生变化，而不是在整体的殖民地和大都市之间的鸿沟的扩大。

我们也可以争辩说，通过开放本来完全不会参与世界经济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受益了。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我们要首先注意到，由帝国主义以这种方式创造的贸易，可以对双方都有利，其次要注意到，始终存在着其他可选择的方案。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没有能够进入通过帝国主义的征服而打开的地区，

投资将简单地集中在更小的领域里。其后果会是什么，难以弄清。

来自投资的利润，更容易测量，尽管不同的调查者提出了不同的结果。一般的共识看来是认为，来自海外投资的回报，大体上与来自国内投资的回报一样。假如不是这样，就会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投资流始终倾向于使回报均等化。海外投资的回报总额（与回报的百分比相对照），与国内投资的利润相比较，是相当小的。因为多数海外投资不是在殖民地的投资，从在殖民地的投资得到的总收入甚至更小了。惟一的例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的英国。当时，英国的海外投资在数量比较有意义，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那样，海外新投资大体上相等于与来自更早的投资产生的利润，从而使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最小化了。事实上，海外投资回报登峰造极的时期，正是英国开始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时期，而那些国家的海外投资不如英国，其帝国的财富也不能与英国相比拟，这就暗示，拥有殖民地对经济增长的帮助很小。

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要支付一种很没有意思的费用——军队的费用和殖民地行政等的费用。它们都是实质性的费用。在大都市国家自身的内部，存在着悠久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它可以追索到亚丹·斯密和他之前，其依据是，帝国主义的好处（如果有什么好处的话），归拥有特殊利益的集团占有，而费用必须由作为整体的纳税人来承担。一批作者曾经试图计算整个帝国主义事业的收支平衡，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其中，最近发表的结算报告之一所下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一个赔钱的事业，“它对经济增长，既不必要，又不够”（欧布赖恩，1988，第200页）。其他作者可能得到了有些差别的结论，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帝国主义获取了任何净利益，它们也是很小的。

如果帝国的受益那么小，那么帝国为什么形成了，并坚持存在下去呢？我争辩说过，许多吞并是特定的、可能是临时的、局

部的条件的结果。一旦承担了义务，就很难在不冒“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的情况下取消该义务。尽管如此，围绕非洲的争夺暗示，建立帝国被视为是可取的。甚至在事实证明被争夺地区对它们新主人完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看来，有若干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有一些拥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指望获得利润，而在政治经济学里，众所周知的一种结果是，团结一致的压力集团有可能推动对全体居民不利的政策得以通过。其次，国家荣誉和威望也受到挑战。第三，当时的特殊条件促进了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上有可能被欧洲人征服的部分，几乎全部都被占领了。比如说德国那样的新帝国主义列强，或者像法国那样的其帝国与其作为全球列强的欲望相比较小的列强，都知道这可能是它们最后的机会，而英国看到，自己的地位、领土以及利益范围受到威胁。权力和地位比起狭隘的经济受益更加重要。

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理由，它让我们认为，以前是殖民主义列强的国家（还有从来没有拥有过有意义的帝国的其他国家）现在拥有的财富，与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从长远看，实际的收入取决于生产率。富国之所以富裕在于其公民的生产效率比更贫穷的国家公民的效率更高，而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根源是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争辩说，帝国对资本积累作出了贡献（虽然我在上面争辩说过，其效果可能很小），但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什么事业可以对其进行投资的。我看不出靠什么的有道理的方式，才能通过拥有殖民地，来对技术的进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直接地从被征服国家的人们学习一些东西，因为后者在技术上不如前者那么先进。我们能否争辩说，殖民地市场带来的回报被用于促进技术进步，以致发明创造受到鼓励？我们很难这样说。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新的发展的目的是在殖民地的运用或在殖民地市场上的销售，但我们很难想出有意义的事例来。所有的重要进步，所瞄准的都首先是先进中心地区

的国内市场，它们仅仅是作为副产品转送给殖民地使用的。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从加利略到信息技术的开发，现在世界更加富裕，人口也更多了。殖民主义是能够排斥殖民地，使后者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这是另外的问题，下面还要讨论——但是，以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今天很富裕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曾经搞帝国主义。

五、败 家？

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而对它在帝国主义控制的领域里的影响进行评估，甚至更加困难了。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被纳入欧洲人的帝国的地区是非常多样化的。某些地区在欧洲人首次侵入时，其居民还是靠捕猎和采集食品生活的。我们怎么能够拿出一个既适用于这样的地区又适用于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伟大文明的说法呢？第二，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渗透的影响如此深远，制定一个“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即说明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究竟会发生什么，成为几乎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就殖民主义统治的效果而言，有两种互相成对照的看法。一方面是人们经常争辩说，殖民主义拖延和干扰了发展，使殖民国家贫穷和落后。另一方面，有人（比如说马克思）争辩说，殖民主义给他们带来了现代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好处。这第二种观点现在非常不受欢迎，这不是因为它被事实否定了，而是因为它被认为在政治上不明智。我在这里要强调，我不关心帝国主义的道德观，而只关心它的效果，首先是它在长远上的经济效果。不管我们就帝国主义的道德观持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都不应该让道德或政治因素影响我们的经济分析。

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应该考虑前面考虑过的两个主要题目——进出口交换比例和海外投资的回报。大都市列强经常试图

改变进出口交换比例使其变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是普遍性的，它也并不总是有效，但殖民地的进出口交换比例毫无疑问经常在恶化。没有表达出来的替代方案（“与事实相反的情况”）是自由贸易。我争辩说过，大都市的受益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殖民地里的效果同样很小。典型的殖民地通常更穷和没有那么多样化。甚至小小的降价可以对增长的潜力产生重大的效果。另一方面，完全崭新的贸易机会出现了。在这里，“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又是很关键的。就某些殖民地而言，如果所思考的替代方案是与欧洲完全没有联系的方案，新的贸易机会可能会使它们成为受益者，但如果该替代方案是按照更平等的条件引进新贸易的方案，它们就可能成为败家。

计算被送回大都市的海外投资利润的数额是相对（但仅仅是相对）容易的。从总的来看，该数额肯定是个正数，但这不足以承认下面的说法有道理，即那样做的结果使殖民地变得更穷。在利润是垄断权力或对自然资源掠夺的结果的地方，情况是相当直接的——在那种利润没有被抽调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下，关于抽调利润是一种损失的说法将得到支持。然而，当送回去的利润代表大都市投资者生产性投资的回报时，情况就更不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如果人们能够争辩说，国内投资者能够在不减少其他投资形式的情况下，提供所需要的资金，那么送回去的利润可以作为损失来看待，但这种情况最不大可能出现。如果不够找到更便宜的资金来源，所支付的利息的差异，应该作为殖民主义统治费用来计算。如果可用来替代海外投资的惟一方案是完全不进行投资——而当时必定经常是这样的——那么，甚至在减掉了送回大都市的利润后，殖民地应该是经常还有净受益的。

因为其他因素几乎肯定更重要得多，坚持进行这种计算，或许是不值得的。例如，请考虑一下马来亚的橡胶工业。如果仅仅考虑橡胶贸易的条件和由种植园主人送回国的利润的金额，我们

就不会抓到问题的要害。整个橡胶工业是英国的创造。只是在英国秘密地派人从亚马逊地区获得橡胶苗，然后在英国繁育它们，最后把它们送到马来亚后，马来亚才成为世界市场上主要的橡胶生产者。如果马来亚一直保持独立，这件事情会发生吗？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要通过与某种假想的替代情况进行的比较，对橡胶工业的发展的总效果进行评估。

马来亚是一个特殊的明显事例，但类似的发展几乎到处都发生。殖民主义列强引进了新的工业和新的生产方式，同时破坏或甚至禁止另一些工业和生产方式。它们修改了法律框架，使法律带来它们几乎无法弄清的对发展的影响。它们建立或重构了教育制度，就基础设施投资作出关键决定，等等。人们经常争辩说，帝国主义列强把它们殖民地排斥在关键工业的建设之外，从而使它们被排斥在享受持续技术发展的好处之外。肯定有很多情况符合这种模式，但也有很多情况是帝国主义随着其侵入带来了新技术。在缺少完善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制定一个损益平衡表。

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明白人们是如何用表面上很扎实的论据，硬说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是现代化的载体的；但我们可以同样容易地明白人们是如何要么通过否认现代化有益，要么通过争辩说其好处被故意地压制下去，而提出相反的看法的。谁也不能怀疑帝国主义的效果是根本性的，但要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究竟会发生什么，并没有合理的办法。

六、帝国主义的垮台

殖民主义帝国的整个巨大组织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崩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的独立是关键的事件。直到该时刻，帝国的版图大部分一直保持了半个世纪前帝国主义扩张登峰造极时

的状况。在两个十年之内，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来（除了俄罗斯帝国这个有些特殊的例子外，它坚持存在到共产主义的倒塌）。有两个关键问题应该提出来。首先，为什么发生了如此突然的崩溃？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多大的变化呢？帝国的崩溃真的是一个转折点，或者是像一些人争辩说过的那样，仅仅是掩饰以其他方式继续搞帝国主义的外衣？

帝国的崩溃不难解释，至少用一般性论据解释是不难的。我争辩说过，帝国多半是因为偶然因素兴起的。从总的说，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建立帝国的需要，搞帝国的费用始终很大，它从来不是很有利可图的，虽然特定的地区在特定的时间是有利可图的。费用和好处的平衡很容易改变。当然，那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起作用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费用和好处。帝国的机器一旦建立起来了，就有了自身的惯性。人们所下的赌注是个人生涯和投资。从心理上说，帝国已经变得重要，特别是对于不肯承认自己对世界的作用在缩小的国家来说，就是这样的。然而，同样的是，在大都市内部的政治变化，能够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走到前面来。明确地维持帝国的社会基础很小。

认识到帝国始终有潜在的脆弱性是很重要的。帝国从来没有，也从来不可能单单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当然，压倒一切的力量们的威慑是存在的，但它仅仅是在几乎从来不需要使用它时存在的。例如，在印度，英国的存在（军队和文官相加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人口的0.05%。伟大的帝国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人们把它们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因为在其他列强建设帝国时，美国忙于扩大自身边界，还因为美国的土著居民被有效地消灭了，它没有继承有意义的殖民帝国或者欧洲式的殖民主义传统（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实质性的殖民地，即菲律宾，但美国已经答应菲律宾独立）。因为

美国没有自己的帝国，它一般很高兴看到其他国家丧失其帝国，尽管这仅仅是因为它期望通过建立更松散的势力范围来受益。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想从欧洲（它们在那儿的影响同样是革命性的）散播出去了，使帝国主义的敌人们获得了武装。僵局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一旦印度的例子给人们指明了道路，整个大厦注定要倒塌。在这个普遍性的层次上，还需要说的事情很少。那些过程有时具有令人震惊的破坏性——请看阿尔及里亚和越南的战争，还有印度的分裂——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它们都很快地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地区实际上在它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条件方面很不一样，它们几乎同时赢得了独立。各个帝国是一点一点地成长的，但它们像纸牌搭起来的房子那样崩溃了。

七、帝国主义之后？

非殖民化究竟带来了多少真正的变化？形式上的帝国的结束，并没有消除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衡，而我争辩说过，它们构成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究竟什么改变了？在军事和政治的层次上，新国家的独立真的是充分的。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占领过殖民地的列强的军队撤离了，新的国家军队取代了它们。新统治者经常对从前的殖民主义列强持有些敌视的态度，并决心有利地表现他们的独立。他们接管或者创造了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机器。

当然，这一点仍然是确切的，即民族国家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强国向弱国施加压力，但是，有若干理由使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相对弱的国家可以比在19世纪更好地捍卫自身的独立。首先，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框架现在覆盖着全世界，并发挥着能够实质性地——虽然不是战无不胜地——阻止侵略的因素的作用。如果强大的国家被视为尊重别国的独立，它们就会从中受益。其

次，强大的国家不会互相合作来欺负更弱的国家，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直到 80 年代，苏联一直抗衡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虽然它在对待别国的行为的记录方面，是任何主要国家中最糟糕的。现在情况再也不是这样的，但一批亚洲国家的力量在增强，它们肯定将抵抗任何新的殖民主义冒险企图。美国是唯一能够作为新帝国主义的中心采取行动的列强，但在令人害怕的越南战争的经历之后，它不大可能这样做。

然而，政治独立本身没有使富国与穷国中间的不平衡发生变化。帝国的崩溃与发达国家进入持续繁荣和成长的时期同时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比任何时候都扩大。很快就有人提出，形式上的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束，掩盖着经济帝国主义的继续。这并非令人感到吃惊。拉美的经历加强了这种感觉。在 19 世纪初，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帝国崩溃了，但是，美国明显地超过了欧洲，而拉美大部分地区仍然相对贫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前者包括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后者包括拉美、亚洲和非洲）。这种思维方式鼓励人们把拉美与非洲和亚洲过去是殖民地的国家划分在一个范畴里，尽管拉美的独立有悠久的历史。

本文的篇幅有限，所以只能非常笼统地纵观所涉及的问题。我将对关于帝国主义后的世界的两个对立的看法进行对照。一个看法被认同于所谓的依附论，它把世界视为两极化了，即分成一个中心（发达国家，包括主要殖民主义列强）和边缘地区（欠发达国家，包括从前是殖民地的国家）。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即中心受益，但边缘的发展受阻或被歪曲，而且两极关系不断被复制。按照这样的看法，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里的地位，是决定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阻碍发展的内部因素，都是世界体系里过去的和现在继续存在的分野的结果（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1969a，1978a；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参看布鲁维

尔，1990)。在我看来，另一个看法更多更多地接近现实。该看法把世界体系视为开放的和不断变化的。按照这个看法，不同的国家都面临着许多可能性和机遇。穷国可以赶上来，也许是很快速的，虽然不能保证它们会那样做。任何特定地区的发展既取决于该地区的内部因素，又取决于贸易的机会，但这些因素太多样化，以致不能用两极的中心—边缘体系概念来理解它们。

事实的记载强烈地否认依附论的看法。我们即使是以最随便的眼光去看那些记载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发展速度方面，不同国家，不同的时间，都表现巨大的差异。在天平的一个末端，有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它们非常迅速地赶上来了，而在天平的另一个末端，有一批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这些国家则多半是小的非洲国家。在许多情况下，收入的下降，可以和比如说内战或其他形式的扰乱相联系。在不同的时期里，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1965~1985年的时期里，巴西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在1985~1995年的时期里，人均收入实际上下跌了。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国家的（比如说）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但这些数据并没有现实意义。（顺便地说，目前人们明显地偏向于按照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争辩说富国经历了比穷国更快的发展。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是增长带来财富。例如，现在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的韩国，是作为低收入国家开始的，通过快速的增长致富了。任何一种在增长和财富之间的互联，都必须以开始增长时的财富作为基础，尽管这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显而易见，增长率方面的巨大差异，必须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的特定因素加以解释。从除了依附论之外的任何一个视角看，这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具有不同历史、社会结构、资源等的不同地区，当然发展得不一样。在边缘一词里，以及在认为边缘地区在经济上的最重要事实在于它们与中心地区的关系这一思想里，有某种明显高人一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从某种

意义看，依附论仍然是帝国主义历史的意识形态俘虏，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参看基莱，1995）。

当然，简单地拒绝简单化的中心—边缘分野，是不够的。情况很可能仍然是世界经济以某种方式倾向于反对穷国。我们能够说什么呢？首先考虑一下贸易政策。在帝国主义崩溃时，强加于殖民地头上的贸易限制结束了，尽管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继续享受一些好处，即在某些传统产品方面，它们在殖民主义列强的市场准入方面，享受优惠条件，从而从中受益。这并非意味着贸易变得自由了。在某些部门，尤其是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发达国家作为对来自本国生产者的压力的反应，制定了很有限制性的政策。主要的败家是发达国家自己，在那儿，为了将资源从其用途更有利于生产的地方，转移到效率很差的、走下坡路的部门，消费者支付了更高的价格，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丧失了贸易机会。应该补充说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本身也经常制定了极其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其结果是它们几乎肯定蒙受了损失。

情况始终是这样的，即对贸易限制效果的任何评估，都取决于为了进行比较面使用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标准的贸易理论暗示，歪曲的贸易比没有贸易更好，但比自由贸易更糟糕（关于贸易的好处的标准理论受到了批判，但没有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替代理论）。关于支持自由贸易的标准理论，有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例外，那就是对幼稚工业的保护，它常常作为对第三世界限制性贸易政策的论证而被援引。这例外是有效的，但它仅仅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效，即它促进了其发展的工业部门，确实将成长到再也不需要保护的地步。用这种标准考察的结果是，限制性政策的失败多于成功。关于关税政策的详细研究经常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还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里，有效保护采取了明显荒谬的形式，即某些活动的保护性关税高得不合理，而另一些活动的保护性关税却很低或者是个负数。

总之，对贸易的干扰，的确可能阻碍了发展，但某些破坏性最严重和不合理的限制，是由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执行的。

现在考虑一下资本的运动。在殖民主义时期的框架下，已经讨论了主要的问题。对对立国家来说，它们可以自由地在国际市场上借钱，它们一般没有理由把资本的流入视为一种危险，或者反对外国投资者把利润送回自己国家。流入的资本能够明显地促进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借钱始终是正确的。我将简要地讨论殖民主义之后的时期里的两个新方面：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 80 年代出现的债务危机。

简单地说，跨国公司是在一批国家里搞商业活动的公司。多数跨国公司的总部在发达国家，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总部设在印度、韩国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就外国跨国公司在任何特定国家里的活动而言，关键问题是，这种活动为什么是由一家外国公司开展的呢？我们可以认定，在关于当地情况的知识方面，当地公司是有优势的，因此，对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跨国公司带来了当地公司缺少的某种新东西（可能是技术知识或者管理技能）。除非跨国公司被给予了特权（有些公司的确获得了特权），它所获取的超过正常投资回报的利润，反应着它作为公司的特定能力的市场价值。对内投资可以向当地的公民提供获得这些能力的机会——欧洲在 80 年代欢迎日本的对内投资的原因之一是，当地人希望由此把明显成功的日本管理方式的一些秘密学到手。一个人们多次讨论了的特定问题是让与价格 (TRANSFER PRICING) 的问题。有人断言，公司对用于确定公司内部贸易价值的价格进行操纵，目的是使公司承担的税收义务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它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才会感到意外，但是，除了对税务律师之外，这很难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人们总是会试图逃税，任何税务和征税制度都要考虑到这一点。总之，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表现，但它没有向穷国提出特殊的问题。

对许多国家来说，债务危机显然是很严重的问题。大体上说，所发生的问题是很明确的。在70年代，一批（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地利用了它们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石油价格。主要的败家是主要的石油消费者，即发达国家，但没有自己的石油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遭受了损失。为了解决问题，至少在短期内，这些国家想借钱。石油生产国获取理论利润，很愿意借给那些国家。同时，发达国家的综合性政策反应导致通货膨胀率迅速上涨，实际利率降低了或者变成负数，从而鼓励了借钱（以不同的利率条件借钱）。不可避免的反应是80年代到来的，当时，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实际利率被强行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以致给大量借钱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无论如何不想小视债务负担给世界一些最穷国家的人民的痛苦，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它，即它是特殊条件的产物，它不是制度的结构性特点，或者在开放的资本市场里借钱的必然后果。它与帝国主义（或者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说世界经济特别地倾向于反对穷国，是没有证据的。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有保障，或者它很简单和不必支付费用的——发展从来不是这样的。

八、结 论

帝国主义是两个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一个过程是资本主义在当时是支离破碎的世界的一个部分里的出现和发展，另一个过程是此后的单一世界经济的创造。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特定阶段或特点（比如说消费不足或垄断的兴起）联系起来的理论，是缺少说服力的，而且是没有用的。在最一般的层次上，我们能够说的一切是，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1）世界经济的统一将导致互相不包容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之间发生冲突；

(2) 冲突将以对最强大的制度有利的方式解决。在更特定的层次上，必须从许多不同的和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不同地区里帝国主义的不同阶段进行个别分析。它们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普遍的职能性需要的实例。

帝国主义的效果引人注目地不平衡。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新的世界经济使殖民地的面貌完全改变。我们可以结合特定实例描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长远影响，但正是因为那些影响非常长远，我们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判断。我们无法猜测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究竟会发生什么，从而就缺乏进行比较的有意义的基础。特别是人们经常提出的关于第三世界是因为受其帝国主义主子剥削而今天很贫穷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个看法是正确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里，变化是来自内部的。所有的事实暗示，帝国对帝国主义中心的发展的长远影响是很小的。拥有帝国和没有拥有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以相似的速度和沿着很相似的路线发展起来了。当然，这些阐述中没有一句是想为帝国进行辩护的——帝国主义权力的行使经常是粗暴的、随心所欲的、侮辱性的，但是，在道德上对帝国主义过程的义愤不应该干扰关于其长远结果的讨论。

现在世界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其他制度的残余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分成了数量众多的国家，它们在法律上平等，在国际上受到承认，都具备现代民族国家一切根本性的要素。这是新的情况。在 21 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更像一个世纪或者更久以前的欧洲经济——当时欧洲有许多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独立国家——而不那么像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20 世纪的欧洲的历史让我们记住，冲突、暴行和巨大的挫折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但同时也让我们记住，正如欧洲的各个地区先后做到的那样，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赶上来。



霍布逊的《帝国主义》： 历史有效性及当代意义

格里高里·P. 诺维尔*

这种军事机构和庞大的武器工业的结合，在美国的经历中是一个新的现象。其综合影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甚至精神上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每个办公室里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发展的紧迫性。然而，我们不能不去理解其严重后果。它涉及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活，还有我们社会的结构本身。在政府的各个委员会里，我们要警惕，不能让军事—工业综合体系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正当的影响。

——摘自艾森豪威尔总统 1961 年 1 月 17 日
发表的告别演说

* 作者感谢 P.J. 凯恩、小威廉·达里泰、本杰明·福德汉、大卫·斯基德莫尔、大卫·吉普斯以及约翰·雷格为本文草稿提供的评论。作者感谢许多参加后凯恩斯主义网站 <http://esf.colorado.edu/pkt> 上的讨论的人们。

霍布逊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报告》^①（下面简称《帝国主义》）是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虽然它遭受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判，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的先进继承者的发展，虽然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世界体系模式被提出来了，但是，以学术上的成功为标准来衡量，霍布逊的书仍然是读者们都非常欢迎的著作。该书的简装本到处都可以买得到，而只要在互联网上浏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著作都援引它。该书可以被确定为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最伟大的争论著作之一：它与伯克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同样辉煌、深刻和充满激情。它启发人们对它进行攻击和辩护；它使其读者两极分化，还使其读者不仅仅思考其历史内容，而也思考其信息是否可以普遍运用。那个信息是：在那个时候，什么是真理？它现在还是真理吗？如果是的，它现在怎么样是真理？

像费尔德豪斯（1961）那样的保守派希望证明，该著作那个时候是错误的，从而“现在”（今后任何时候）是错误的。一些激进的理论也忽略了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②的三因素分析中的若干要素。该分析的基础首先是消费不足，第二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第三是军事化广泛、种族歧视的社会后果和它们的文化效果。

本文考察霍布逊的《帝国主义》的逻辑。我争辩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霍布逊在该书里提出的论据的基石，都对理解资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我将从讨论消费不足开始，接着讨论霍布逊

① 在本文里，所有标有页码的语录，都来自霍布逊（1902）。请注意，在提供更原始的发表日期的地方，比如说霍布逊（1902），在参考资料目录甲提供了更新近的发表日期和出版社。那些页码指的是这些更新近日期。

② 请参考霍兰德（1996）关于马尔萨斯的简短讨论。

的政治模式，然后讨论对他的批判。

一、霍布逊的经济学：消费不足、至善主义、海外投资

在学术上，关于消费不足的观点是首先由曼德维尔和马尔萨斯提出来的，然后被西斯蒙第和罗伯图斯^①接过来并传过去。然而，学者们说明了，消费不足论的思想，曾经在英国商业报刊上传播过，在英国议会听政委员会里被一些人代表过，在美国商业报刊上出现过。^②霍布逊把曾经被用来论证帝国主义的理论“社会化”了。资本家们曾经用生产过剩来解释为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工人阶级的代表们的反应是把消费不足作为要求提高工资的合理依据。

霍布逊宣扬消费不足论的《帝国主义的根源》（1902，第71-109页）的开头是关于19世纪晚期工业生产的巨大发展的讨论。伴随着它而发生的工业的集中，大大扩大了财富的不合理的分配。通过工业的集中，雇主们能够决定劳动的价格。工人个体不得不为了获得一个职位而互相竞争，并且接受所能够得到的任何价格。^③

不平衡的劳资双方之间的谈判地位，导致了霍布逊去怀疑经

① 请参考布里尼（1976）和M.巴拉特·布朗（1974）关于这个线路的深入分析。请参看佩勒尔曼（1996）描述的19世纪晚期的理论与实践。霍布逊援引威尔夏（1900），后者是加利福尼亚房地产巨商，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是根据他的姓命名的。

② 请参看加迪斯（1994）、伊思灵顿（1983、1984，第6-39页）、凯恩（1978，1985）

③ 齐克（1996，第186页）描绘的关于个人的图案是：“除非繁荣的市场有充分就业……就处于资本主义下的令人反感的地位。”在凯恩斯的《总论》（1964、1936）里，没有提到霍布逊关于劳动的结构性弱点的观点。

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该理论认为，从总的来看，任何的生产活动，都将产生足够的消费能力（工资），以购买所生产的东西。^①凯恩斯的立场断然与萨伊的立场相反：充分就业的基础是足够的投资，足够的投资则取决于需求，而无论是需求还是投资水平，如果带来了充分就业的话，那仅仅是范围很广泛的各种可能结果中的一个结果。与此相反，霍布逊（第81页）看起来接受了萨伊的前提：“随着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的出现，消费的力量诞生了。”如果没有实现劳动和资本的充分使用——按照萨伊的定律，情况始终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悖论的惟一可行解释是，拥有消费能力的人们拒绝了运用该能力来形成对商品的有效需求”（第83页）。有效需求的缺乏根源在于在工人和工业之间达成的工资交易的不平等。在构成了19世纪晚期的特点的高产量和工业的集中的条件下，这样的倾向达到了令人感到痛苦的程度。在工业没有那么集中的其他时代里，为了能够雇佣劳动力，一个工业部门必须和数量更大的其他工业部门竞争。工业的集中的发展使个人的消费水平滞后了，同时它使工业家手中的财富大量增长，而这些人不能花掉所有这些财富。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继续看到的那样，霍布逊所下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会和开明资本家（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反对搞托拉斯）的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政府安排后，才能实现萨伊氏定律所描述的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他的结论与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仅仅是许多可能的平衡状态中的一种状态的结论很相似，但是霍布逊强调的是重新分配和军事经济的政治，这与凯恩斯对影响投资者情绪的因素的集中考虑，完全和根本不相同。

在19世纪的晚期，集中了的工业条件，有利于卡特尔和托

^① 请参看亨伍德（1997，第202页）和凯兹（1996）的著作里对萨伊（1803）的讨论。

拉斯的创建。霍布逊（第 85 页）认为，这样就“以盲目的过度生产代替了对产量的调控。”卡特化使某些大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而且还使工资滞后于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倾向进一步恶化了。

财富在社会上层的集中，成为了获得最大国内投资所需要的消费的障碍。“富人永远不会天真地花费足够的钱来防止出现生产过剩”（第 84 页）。因此，这是过度的储蓄。“如果收入的分配方式好得能够避免出现过度储蓄，在国内就会有持续利用资本和劳动的情况”（第 87 页）。在没有关于重新分配的政策的情况下，富人将试图在海外投资。然而，在海外投资在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上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就会有围绕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的竞争。这种竞争所采取的形式是构成了 19 世纪晚期的特点的、旨在占据领土的帝国主义大争夺。

霍布逊的这种思想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从后来的凯恩斯视角来看和用凯恩斯的词汇来考虑。和凯恩斯一样，霍布逊争辩说，与工人和穷人相比较，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集中在其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人们手中的收入，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最大。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看法，如果没有很好的回报前景，人们不会进行投资。需求不足的状况导致投资不足的状况。如果从霍布逊的角度来重新表达问题的话，应该说，把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这个事实本身，同时创造了投资不足的条件。^① 海外投资向富人们提供了更好的替代方案，使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尽管

① 凯恩斯（1936，第 373 页）主张重新分配，但他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霍布逊。“因此，我们的论点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在当代条件下，财富的增长——正如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它迄今为止取决于富人的禁欲——更可能将被那种禁欲阻止。因此，维持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的主要社会依据，也就被消除了。”

这种替代方案能够迫使英国工人阶级陷入失业和工薪减少的困境。

与此相反，凯恩斯（1936）虽然确实讨论了收入分配，但没有把“萨伊定律的失败”归咎于谈判桌上劳资双方之间的不平等。他把萨伊定律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对具有下一特征的货币经济的操作，即在该经济中，控制投资的是胆小的投资者，他们对未来的担心使今天的投资减少了，从而使今天的收入和投资减少。从凯恩斯认为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未必倾向于充分使用资源这个含义来看，凯恩斯的观点是更加“本质性地”反对萨伊的理论的。霍布逊的更激进的看法指出，工人阶级和消费者阶级软弱的政治权力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凯恩斯的谨慎的看法更多地把消除投资者阶级的恐惧的方法指出来了。霍布逊认为，经济制度既能够产生实际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结果，又同时具备实现萨伊说明的那种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政治潜力——条件是资本家不完全控制经济制度。霍布逊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人的立场的精髓，它认为，要使资本主义发挥最佳作用需要搞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立场的内在理论矛盾，没有能够阻止后来几十年中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促进国内繁荣、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减少它们在全球的战争方面，取得了相当令人尊敬的成绩。

消费不足是霍布逊明确确定的资本输出的机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政治的阉割，可能部分地在于它对这个问题的逃避，而其原因在于它的依据是封闭的经济。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没有投资的基金，必须作为没有被使用的银行收支平衡余额积累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银行发放的新贷款与被偿还的旧贷款之间的比例在下降。关于封闭经济的假设，使这位经济学家没有考察控制着资本输出的制度性结构。

与此相反，霍布逊准确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

能够确定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资本输出的自然比例有多大。在他的书里，他事实上谈了两种资本输出机制：一个是确定了的（消费不足），另一个是暗地里存在的（自然比例）。其后果是，我们不知道，海外投资必须降到什么样的水平上，才能说它是非帝国主义的。霍布逊就这个课题做了一些建议，但都没有说服力。资本和劳动的充分利用（第87~88页）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不会存在的。不能像在国内那样生产得那么好或者那么便宜的货物，通过国际交流的正常过程，仍然会被购买的。那样的国际采购是健康的，而不是盲目贪婪的生产者，在竭尽全力地玩弄一切贸易或政治手腕，来为自己的“过剩的”货物找到市场。

霍布逊的看法部分地接受了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而且，我们很可能可以推测说，存在着某种动力，把“真正的和需要的”海外投资与采购靠帝国主义海外投资生产的海外产品，互相区分开来。^①

霍布逊没有能够解决两个问题，即良性海外投资的水平和作为帝国主义组成部分的不良投资的门槛。这刺激了各种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或关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都认为，海外投资是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固定的，或者至少是不断重现的特点，而试图把资本输出与列宁提出的最高阶段——或者霍布逊的卡特尔和综合体——认同起来的努力，都是搞错了方向或注定要失败的。重要的理论家们支持了关于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固定特征的论点，虽然他们一般都很谨慎地把它

^① 指出霍布逊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说，他没有解决任何其他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最近出版的关于环境调控的论文集（尼沃拉，1997）的不同作者们轻率地认为，一个生产者的调控费用的任何增长，都将更加刺激他在海外投资，但是，他们没有致力于说明，如果没有环境调控的恐怖的话，海外投资的正常比率应该是多少。

划分成为若干形式的阶段。这些作者包括卢森堡（1913）、阿明（1974、1980）、华勒斯坦（1976、1980、1989）和阿里齐（1978、1994），但并不局限于这些作者。这些人的理论或多或少认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结局难于预测。霍布逊（1902）、希法亭（1910）和列宁（1917）却认为，战争、革命或社会改革（霍布逊持这个看法）有可能使帝国主义得以结束。但是，霍布逊作为自由主义改革家的立场，使他陷入了比其他理论家更严重的困境，因为人们要求他区分良性的和不良的海外投资。这个责任他却回避了。^①

霍布逊对萨伊阐明的平衡状态的高质量阐述，导致他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财富的不好的分配——一个阶级能够比其他阶级夺取总收入中更大的份额——既创造了失业（消费不足），又创造了海外投资（从而为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他的立场使人们怀疑他可能是米尔盖特和伊特维尔（1983）称其为非至善主义者的那种人。对非至善主义者来说，工会或商业卡特尔的活动干扰着走向一个充分就业平衡状态的天然倾向。这种平衡状态是通过货物和劳动的价格进行连续调整而实现的。由商业公司综合体或劳动合同歪曲的价格导致对资源的不充分利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担心，如果非至善主义者对凯恩斯的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话，凯恩斯就成了阐明“例外情况”——一个集团成功地歪曲了市场而不是阐明规律性的东西（适用于一切市场）的经济学家。这种看法导致新古典主义的综合观点，它把凯恩斯的工作的意义严格地限制在一套不正常市场条件之下，从而把它限制在传统经

^① 希法亭（1910，第233~234页）看到了资本主义演变成为完全的卡特尔的潜力。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剥削和战争的结合，可以逼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作者们需要某种帝国主义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请参看巴兰（1957）、斯威齐（1942）以及斯特拉齐（1959）。

济学一个角落里。它与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对立的。^①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会指责霍布逊对工会的支持。

在国际关系方面，非至善主义理论最明确的声明是曼库尔·奥尔逊的《国家的兴衰》(1982)。奥尔逊认为，凯恩斯仅仅是一个阐明工业卡特尔和工会造成的市场不平衡状况的理论家，他无法理解除此之外凯恩斯还有什么意义。在上述状况下，价格不能适应市场，市场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这也意味着，产量不会达到最高的水平，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将面临衰落的危险(奥尔逊，1982，第224~232页)。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国家将患上有组织的“分配联合体”的病，这犹如胆固醇在中年人的血管里积累那样；奥尔逊引人注目的论点是，战争（特别是输掉了战争）能够帮助清理堵塞的血管，使国家摆脱了那些瘟疫般的分配联合体，从而使劳动和商品的价格达到它们在自然平衡状态下的水平。因此，被打败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增长方面都超过了获得了胜利的英国和美国。衰退的原因是僵化的工资制度，不是需求不足；靠赤字预算来花钱和其他的凯恩斯主义措施，都是为了使由分配联合体窒息的经济复活而设计的政策。按照米尔盖特和伊特维尔的非至善主义者。

霍布逊是像奥尔逊那样的非至善主义者吗？不是。奥尔逊的论点在本质上是反工会、反社会福利、反卡特尔的，虽然看来，他的反托拉斯立场不如他对福利国家的敌对态度那么强烈。霍布逊的改革纲领包括重新分配、通过工会活动提高工资、反托拉斯和自由贸易政策。如果他对由市场驱动的走向充分就业平衡状态趋势的存在完全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需要如此强烈地主张从政治上对权力进行再分配。用他的话（第90页）来说：“因此，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天然敌人，因为，它们从‘帝国

^① 请参看帕利书里的讨论（1996，第37页）。

主义的’阶级那儿剥夺构成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力的剩余收入”。奥尔逊也主张重新分配权力：要消除像工会那样的实体的权力。但是，霍布逊认为，工人阶级在消费方面的能力，与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这个政治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而能够脱离这个政治问题的天然市场平衡状态是不存在的。打断工会活动等于取消了寡头政治和寡头统治。^① 如果没有被剥夺了其财产的人群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整个国民经济和管理它的国家，都将被移交给了正在发展的工业和金融寡头统治。寡头统治和寡头政治的结合将决定自身的平衡水平上的经济活动。它有利于财富的不好的分配、海外投资、以及维持整个帝国主义结构所需要的军事能力的发展。正如霍布逊所断言的那样（第93页）：

攻击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都是徒劳的……除非被砍掉的是它们的经济根源，以及帝国主义为它们工作的那些阶级，被剥夺了寻找这个出路（即海外投资）的剩余收入。

因此，我们回到了那个令人烦恼的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要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霍布逊，就海外投资问题，确定它在帝国主义产生前的某种自然水平。^② 在这个由市场决定的水平之上的某个点，海外投资变成有害的，或者帝国主义的。因为霍布逊的《帝国主义》一书对此没有提出直接的解释，我们在霍布逊其他著作中的一个著作里寻找问题的答案。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③ 里，霍布逊考虑，早期的资本主义——比如说像

①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卡勒基（1952）强烈反映了霍布逊的观点。

② 阿里齐的精辟的《帝国主义的几何学》（1978）强调指出，霍布逊的模式不能运用于更早期的资本主义阶段——霍布逊自己也这样做。

③ 这部著作最初在1894年发表，在1906年修改（这是本文引用的版本）。因此，它既是在《帝国主义》出版之前，又是在其之后发表的。

意大利的共和国和后来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实践的那样——应该首先是依靠对农奴和奴隶的剥削，而当时的关系是剥削性的，但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霍布逊，1894，第10-11页）。主导18世纪贸易的商业垄断公司和殖民地，是某种中间发展形式，^① 各国（英国、法国等）的国内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也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以致还没有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霍布逊（1894，第34页）说，“国际障碍的垮台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的加强，将被视为机械工业的发展的最重要效果之一。”但是，在爱尔兰和在美洲的殖民地里，英国的制度禁止发展制造业（1894，第37页），而其禁止方式并非纯真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

一切现代的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指导性动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寻找市场的压力，这些市场首先是投资的市场，其次是推销国内工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资本的集中走得最远和存在着严格的保护制度的地方，这种压力必然是最强烈的。（1894，第262页）。^②

因此，霍布逊清楚地意识到了旨在争夺对国际资源的控制的更早期的斗争。但是，他没有采用与阿里齐（1994）和华勒斯坦（1976、1980、1989）相同的方式，即给这个漫长的历史冠以资本主义的称呼。他古怪地把现代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留给了机器时

① 霍布逊提出，“在晚期的中世纪里，已经有一些其规模可以容忍的单个资本主义组织的事例”（1894，第20页）。但是，它没有把这个关于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扩展到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

② 《帝国主义》一书坚持了这个立场：在71页上，它提到市场和制造业，同时提到剩余利润的投资出路，但在73页它说，“更大得多和更重要的是资本寻找外部投资领域的压力。”

代。列宁按照马克思的传统把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于霍布逊，帝国主义好像是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最充分的形式存在的阶段。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的进化中，最主要的物质因素是机器”（1894，第27页）。由此推理，只有在机器充分发展起来之后，资本主义本身才能充分发展起来。在此之前的时期，都是商人主导的，劳动力资源不足，没有进入机器时代，而对霍布逊来说，这一切也意味着大投资需要广阔的市场领域，跟随在其后的便是工业的集中，卡特尔化，保护主义，以及多余利润的积累，由此走向在海外投资。

霍布逊不能够宣传回到某种更早期的关于海外投资的自然比例的理想——或者投资和充分就业的平衡水平——因为，按照他的看法，这些领域既不好，又不是充分的资本主义。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把储蓄资金全部投入到生产性新投资项目的时代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仅不可能回到那样的时代，而且霍布逊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论据：一个国家要么朝着阶级政府、寡头统治、帝国主义和消费不足方向运动，要么朝着实行重新分配和包括自由贸易、反托拉斯政策和充分就业的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运动。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工会进行有组织的努力，以组织社会民主主义。从它控制国家的牢固权力基础，那种社会民主主义将能够推行政治改革，而充分就业平衡状态正是将取决于这些改革。

因此，霍布逊不可能是像奥尔逊那样的非至善主义者。奥尔逊认为，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都是从这样的一个政治结构产生的，即这个政治结构是以支持它的经济过程为基础的，而如果那些过程不受到干涉，就将倾向于走向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与此相反，霍布逊认为，搞重新分配、有充分就业平衡状态的经济的实现，是国家干预的产物，是组织起来了的工人阶级所推行的。

这意味着，霍布逊主张的经济的基础是由国家组织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① 如果在霍布逊理解的世界里，有外贸和海外投资的一个自然比例的话，这是因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决定了自己能够沉溺于某些李嘉图主义式的高效率。非帝国主义的海外投资比例是一个由政治决定的标准，不是一个用数学决定的对比较优势变数的反应。^②

虽然一直受到经济学家注意的书是霍布逊和芒默赖的《工业的生理学》（下面简称《生理学》），但《帝国主义》一书关于消费不足的短短的一章，是与更早期的著作的决裂。^③ 在《帝国主义》里，霍布逊理解储蓄是一种金融或货币资产，而在《工业的生理学》里，储蓄被理解是生产了的但没有被消费的货物，正如“储蓄 = 生产 - 消费”这个公式所反映的那样。^④ 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实是，《帝国主义》没有导致对金钱的不中立性的批判。虽然霍布逊发动的对财政机构（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攻击，比凯恩斯的攻击更尖锐，但霍布逊的攻击不是以对投资者的担

①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国家和权力分配更感兴趣。例如，帕利（1996，第11页）认为，后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的延伸，它包含“承认一切经济制度都是社会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作为社会制度来分析。”工资的膨胀被视为“围绕收入的斗争的症状”（达卫森，1991，第89页）。其他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持有这种观点（请参看苏斯杨和拉赫，1997；拉沃瓦，1992）。但是，这些观点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

② 这个结论和弗里登（1994，第28页）的观点很相似，他写道，“霍布逊主义的自由贸易，只有在合理的社会控制和协调的框架内才是自由的……经济自由涉及向垄断挑战，从而涉及公众监督的固定措施。”

③ 马格努森（1994，第149~150页）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其焦点在于霍布逊的观点的其他因素。

④ 霍布逊和芒默赖（1889，第36页）。请参看巴克豪斯（1994，第85~86页），他争辩说，霍布逊和芒默赖没有解决储蓄的矛盾，即它可以作为资本全部投资，但也可以以窖藏的钱财形式存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公式，储蓄 = 收入 - 消费（凯恩斯，1964，第63页）。

心的分析、对流动资金的优先考虑以及凯恩斯的分析中的其他内容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关于消费不足的分析与《生理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坚持指出权力和财富的积累方面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机器的生产、工业的集中以及卡特尔化的发展的特点。霍布逊支持工会和社会主义，还极力主张执行反托拉斯政策、对投资进行社会监督以及重新分配财富。《生理学》较温和的改革建议是要对储蓄征税（霍布逊和芒默赖，1889，第203页）。

更根本的是，《帝国主义》再也不是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生理学》把消费不足（霍布逊和芒默赖，1889，第205页）视为慢性的，但看来，它这样说的含义是“周期性发生”：否则该书不会像它所做的那样（霍布逊和芒默赖，1889，第203页）谈周期：“在一切消费不足的时期里……征税应该有清楚的方向，以使其成为对消费的最小的制约因素。”《帝国主义》对主导阶级的政治权力的攻击没有许诺将取消商业周期。更确切地说，它通过扩大综合需求和通过财富的再分配而促进和平。

霍布逊的深刻认识也导致他犯了不该犯的错误。《生理学》已经分析了法普战争刺激充分就业的效果（霍布逊和芒默赖，1889，第165~185页）。霍布逊对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猛烈攻击与更早期的工作有联系，他显然对军事开支的干扰性效果感到担心。霍布逊认为，军事开支是财政上的绝对费用，同时也是道德上的费用。道德上的费用继续存在下去；他所犯的愚蠢的错误——的确是这样的——在于他没有看到，在投资和需求持续不足面前，军事支出能够像毒品刺激吸毒者那样刺激经济成长到更高的综合收入水平。事实上，这样的认识会加强他的论据，因为，正是它奠定的基础，使军备竞赛能够自我维持，不管海外投资的回报如何——这是那么多的对霍布逊进行批判的人们集中研究的问题。现在教科书都介绍 $Y = C + I + G$ 这个

公式^①。其中，G 的增加——在这个事例里是军事支出的增加——将能够使国民收入增加，并通过创造足够的需求，从而克服凯恩斯探讨的投资者的担心，来导致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形成。的确，这种特定的推动力，使帝国总效益问题增添了整整一个内容，因为，假若帝国提供了增加 G 的理由，从而提供了增加 Y（综合国民收入）的理由，那么，不管计算出来的实际财产或甚至综合的海外投资的回报如何，这就会是一个赚钱的事情。^②

如果以上所述成立的话，帝国主义没有给经济造成财政上的净损失，不管计算出来的来自海外帝国回报和与该帝国相关的支出如何。这是一个棘手的逻辑问题。一方面，经济的集中导致停滞。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解决办法可能使综合收入增加，尽管它（通过加强寡头势力和集中的财富能够致使经济停滞的条件）加强了能够使综合收入减少的条件。一个可以与此相比拟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人，即他同时踩着刹车踏板和加大油门踏板。汽车可能向前运动，但是，同时整个系统蒙受很大的损失，帝国主义社会的状况也是这样的。

理智地说，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驾驶者（一个反对托拉斯、主张自由贸易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即他试图以合乎对整个汽车的逻辑评价的方式驾驶汽车。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却是汽车里的驾驶者，即帝国主义的精英们，实现了足够的前进运动，而同时又足够地掩盖了其他方面的破坏，以致汽车里的其他乘客都对其前进运动感到满意。在进行论战时，霍布逊试图争辩说，帝国主义社会相当于没有前进运动的汽车。在现实中，帝国主义这辆

① $Y=C+I+G$ ，其含义是：（全国收入）=（全国消费）+（全国投资）+（全国政府支出）。宏观经济学家把“全国”去掉，因为关于这个综合的讨论是假定的。

② 请参看戴维斯和胡腾巴克（1986，第 166-194 页，第 306 页）；例如，爱德斯坦（1981）试图计算帝国的利润率。

汽车是能够做前进运动的，而且足以满足其余乘客和特别是开明的工会官员。霍布逊依靠的正是这些人的政治能力。在论战中较容易提出来的论点——霍布逊暗示它是正确的——是，应该做的选择是，要么以每小时零英里或者非常缓慢的、令人不满意的速度前进，要么以舒适的每小时 70 英里的速度飞速前进。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暗示，军事化国家有可能使社会就业的汽车以每小时 60 或 65 英里的速度前进，而在这样的状态下，霍布逊喜欢的工会官员们，会比起更换驾驶者，更加喜欢去打瞌睡。工人阶级的这种顺从，事实上是令人感到悲观的现实，马克斯·韦伯在写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集中精力写的正是这个问题。^①

这样，评价帝国主义的实际性不能是简单的经济学上的事情。虽然霍布逊没有抓住或者模糊了凯恩斯主义的 $Y = C + I + G$ 公式关于“像受毒品刺激的吸毒者那样受了刺激的经济”可以获得能够增加收入的好处的含蓄暗示，但是，他还是看到了更大的问题：让社会这辆汽车以这种方式运动的费用异常地高，即使某些乘客和驾驶者都感到满意。军事化的凯恩斯主义创造的国际政治环境，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将引向战争。

争夺权力的斗争，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和战争。这种斗争始终是霍布逊的宏观模式的基本原则：在他的思想中，“各个国家的安全”（第 89 页）受到威胁，各国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凯恩斯嘲笑了那些对长期的结构性赤字感到担心的批评者，他提醒他们说，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的。霍布逊则和凯恩斯不一样，他担心的是，作为帝国主义争夺的后果，在短期内，我们，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死亡的。在那种考虑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冷酷地把一种充分就业的军事化经济，作为重新分配放在首位的充分就业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替代方案提出来。霍布逊

^① 维贝尔（1968，第 901～940 页）。

关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观点，与他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稳定的观点是不可分割的，而对国家经济管理的一种军事化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在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的确，按照霍布逊的设想，凯恩斯主义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的政治上单一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根源于寡头集团的活动，如果我们想理解需求不足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我们必须理解该集团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议事日程。^①

通过对经济周期、需求和投资的变化以及多种就业均衡状态的研究，凯恩斯使经济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帝国主义》一书里，霍布逊抛弃了这一切，以发展政治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里，是通过调节利率和通过赤字（和重新分配——如果我们坚持按照《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决问题的话）对需求的管理，来克服需求不足的。根据需求的增长和减少，像把工具从工具箱里拿出来那样，经济手段出台了，被运用了，然后被撤销了。

霍布逊的战争循环不是这样的：一旦启动了，它不是对国民收入和总需求的内部浮动，而是对与其他也在武装自己和执行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威胁，作出反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逻辑是，它要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永久特点；对军事生产的每次促进，刺激对手去做同样的事情和相反的过程。军备竞赛没有逻辑的结局，除了战争之外。军事化的经济，最终会对私人消费征税，并把公共支出引向导致了消费不足的寡头主义重工业。军事化经济使财富上的不平等加剧，并导致这样的悖论，即甚至在面

^①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从不同的政治视角评价凯恩斯主义思维的后果。请参看布罗克（1977，第107页）、科林斯（1981，第1~20页）、图齐恩（1997）的分析。凯恩斯本人说道，“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来说，使其国家支出达到能够证明我的观点所需要的规模、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战争条件下。”（科林斯援引，1981，第12页）。

对战争机器对需求的刺激的情况下，消费不足论的倾向也得到加强。该过程顶多是通过潜在战争的费用来缓和经济周期的。作为一种经济工具，它是有缺陷的，因为，经营集团不可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来调节军备竞赛的节奏，并由此使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威胁。军事机器完全被埋置在整个经济里，^① 而对霍布逊来说，这个事实和其有害的后果，比起他的关于宏观经济的一章——在该章里他解释了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还会有经济周期——更加重要得多。^②

因此，霍布逊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成就之一是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军事—经济综合体系”的组织分析。在他的书的第46到107页，该组织作为一个累积的图式出现。他的论点不需要详细的文字解释，读者可以将霍布逊的总结性断语（第106页）和在本文开头已经援引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讲话相比较：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有力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和金融利益的这种欲望，即利用公共的资金和公共的力量，来为它们的剩余产品和剩余资本，巩固和开发私人的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是战争、军国主义和“有精神的外交政策”。为了执行这种政策需要大大扩大公共支出。

① 我们没有在本文里介绍巴拉特·布朗（1974）关于帝国主义的优秀论文。这有若干原因。首先，该文主要展开约翰·鲁宾逊的思想。其次，该文除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外，完全没有提到霍布逊。而在提到他的地方，提的是《生理学》，不是《帝国主义》。最后，它无视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作用，而如果一个人想在霍布逊主义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肯定是符合逻辑的），这个体系是分析的根本组成部分，这特别是因为，通过军事支出来管理需求，正是国际体系里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② 这里的对军事—工业体系及其对综合需求的效果的强调，表明作者在理解下面讨论的爱德尔斯坦（1982）对经济循环的强调方面有困难。

二、霍布逊的政治模式

霍布逊的论点认为，帝国主义代表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这与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分析很相似。后者的著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发表后的 10~15 年内写成的。^① 然而，如果我们提出的关于消费不足的论断是正确的话，我们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惯用的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语言，来理解霍布逊的政治模式。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同类著作是波拉尼的《伟大的变革》(1944)，该著作认为，处于社会的全面崩溃边缘的市场经济正在摇摇欲坠，它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正是因为为了使市场能够继续运转，国家进行了日益增多的机构革新和对市场结果（不管它是商业或者财富的分配）的操纵。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霍布逊—波拉尼的模式可能证明，市场是安置在精致的政治机构或者外壳之内的，如果没有了它们，资本主义是不能存在的。^② 霍布逊关于精英集团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的控制的描写，与马克思主义的描写的线路是一样的，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自由贸易、反托拉斯措施以及非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国家有可能不是资本的必然性的奴隶。“如果你保障本质上和形式上的人民的政府，你就保障国际主义；如果你保持阶级的政府，你就保障军事帝国主义和国际政府”（霍布逊，第 171 页）。

① 阿里齐（1978）声称，布哈林（1915）、希法亭（1981）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模式。我同意布鲁维尔（1980，第 112~113 页）的看法，即把霍布逊视为与关于帝国主义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模式相联系，但不是它的一个直接的部分。

② 普热泽沃尔斯基（1990，第 69~72 页）争辩说，马克思没有提供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国家不是资本的再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

霍布逊比艾森豪维尔提前 59 年预见军事—工业综合体系。批评他的人们，从他的著作里的主要章节中，^① 抽出了他的冷静计算的财政分析，但是，搞帝国主义的费用比那个分析要更多得多。在帝国主义的计划后面，集结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金融界，它发放证券和出售股票，从中获取佣金；^② 军队（也是作为官僚集团的），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竞争，使预算不断增加；军队的士兵，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失业者队伍中招募来的，认为参军为他们开辟了发展自己生涯和征得尊严的道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他们是在海外殖民地的职位的候选人；各个政党，它们在议会里支持帝国主义，为此获得丰厚的捐款；还有新闻界，它与重要的金融和工业机构有财政上的联系。^③

① 请参看关于对霍布逊的批判的部分。

② 霍布逊接受了那个时段的反犹太主义（请参看阿伦特 1951 年分析）。这在《帝国主义》（1902，第 57 页）里的一句话表现出来：“他们由最牢固的组织纽带团结在一起，他们处于每个国家的商业资本的核心本身，而就欧洲而言，他们主要是由一个奇怪的民族的人士控制的，这些人士背后有好多个世纪的金融业经验。”霍布逊的《南非的战争》（1900，第 189～197 页）里还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内容。但是，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1894）在讨论金融业的发展时（第 235～272 页），完全没有提犹太人，而把金融业视为与种族无关的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但是，里面还有两处比较中立地谈到了犹太人的作用，这次又与南非有关系（第 266 和 268 页）。在《帝国主义》里，霍布逊在结束他关于金融业的分析时，提到了放债阶级（第 109 页）。假若他想把帝国主义套在犹太人身上，他使用的“阶级”的英文词 classes，既不会是现代时，也不会是复数的。霍布逊达不到现代政治正确性的标准，考虑到他在种族和一般的帝国主义问题上持有先进的多元主义观点，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帝国主义》首先主要是强调阶级利益的著作，请参看马格努森（1994，第 147 页）。

③ 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法国帝国主义对新闻界的贿赂。由石油大王卡鲁斯特·古尔本基安（请参看诺维尔，1994，第 99 页）签名的文献里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费斯（1964，第 133 页、第 157～158 页）两次提到这一点。但是，霍布逊指的主要是相互交织的所有权关系，而不是对编辑们的贿赂。

工业的首领们获得海外投资——例如在执行建造铁路的合同时——的好处，但也获得各种合同，让他们建造巨大的轮船和其他武器，以支持帝国主义的计划。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得到了工作，而要不然它就失业。^① 总之，霍布逊描绘的图案，又一次预见艾森豪威尔关于军事—经济综合体系的警告（即该体系的影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甚至精神上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每个办公室里都可以感觉得到”）；而且当然比艾森豪威尔的担心（“我们永远不能让这种综合体系的规模影响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过程”^②）走得更远，因为他争辩说，军事—工业综合体系在本质上就是民主自由的腐蚀者。

教育学也被席卷在帝国主义浪潮之中。在小学里，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歧视充斥着每天的议事日程。

为了夺取国家的儿童，为了将其自由玩耍变成常规的军事训练，为了培养好斗精神中的野蛮心理的残余，为了用虚假的理想和假英雄毒化他们对历史的初步认识……

为了建立……对道德世界的地理中心主义观点，使人类利益从属于国家的利益……

为了养育始终是傲慢的种族自豪感（第 217 页）。

在大学的层次上，

指责教师们不忠诚是不必要的，他们一般是根据自己内心最高尚的思想进行思维和教育的。但是，尽管如此，在商业利益认为有必要采用选择和控制的³艺术，在所控制的学术

^① 霍布逊对加强效果没有概念。请参看巴克豪斯（1994）。

^② 艾森豪威尔总统 1961 年 1 月 17 日的告别讲话。

利益上运转的商业利益，就会对真正的教学进行选择和控制。……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对教师的解雇，而在于对教师的任命，在于关于应该教授哪些科目的决定……即使在我们英国的较老的大学里，对级别和金钱的屈从，表现得非常露骨，而且，在发展新的体系时，在学术界的心目中，对经济援助的需求必然显得很巨大，以致这里反映出来的危险是日益增长的危险……是预计的、潜在的赞助者的手束缚着我们大学里的学术自由（第218~220页）。^①

这里，霍布逊又预见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后者告诫说，“国家的学者陷入雇佣他们的联邦政府、给他们分配的项目以及金钱的力量的控制的前景，始终存在着——它是很严重的，必须加以关注。”^② 某些美国政治学家仍然认为学术界里存在这类影响。^③

霍布逊预见到了意识形态中的黑暗，他不仅预见到了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而且在更小的程度上，还预见到了在1979~1980年之间的人质危机和1990~1991年反对伊朗的战争时，席卷美国的狂热情绪。他并没有解决如何改变帝国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他的一生中，他担心的巨大冲突，不是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了两次。尽管如此，他制定的有预测性模式的明显的准确性，并没有使他在科学的美国政治学家中赢得尊重。那些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顽固性，反映的是霍布逊政治—经济学模式的系统产出和对该模式的进一步肯定。

① 霍布逊期望公共基金教育能够避免产生这些毛病，但他不可能知道，国家立法机构可以像私人赞助者一样干扰工作。

②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1年1月17日的告别讲话。

③ 请参看奇尔科特（1994，第2章，特别是第40~48页）的讨论。

三、霍布逊和批评他的人们

本文的这一部分考察对霍布逊的若干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以及我们根据今天的知识，可以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

霍布逊提出，保护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因素，但英国不是搞保护主义的。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财政的一章（第95~108页）争辩说，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寡头们喜欢隐瞒搞帝国主义的费用。他们的做法是通过发放证券来解决军事扩张的资金来源，而证券的基金来源于关税。霍布逊显然没有考虑收入税可以作为另一种建立基金的机制，尽管在与拿破仑打仗时和此后，英国都使用了收入税。然而，那时有一个重要的保护主义运动在兴起，而霍布逊错误地预计了其成功。^① 他还把保护主义和卡特尔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据更牢靠得多：在这个时期里，卡特尔化在英国的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进行卡特尔化的合法权利，很可能是工业界为了不全面要求关税保护而得到的补偿。下面这一点，也是正确的，即霍布逊的论点的主要内容之一指出，主要的依赖于英国的地区，当时曾经或正在朝着保护主义方向运动。^② 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确朝着关税保护方向运动。^③

霍布逊从英国的情况推断出来的军事化社会，看起来更适用于解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或许是民主统治的顽强性，证明

① 请参看布朗写的历史（1943）。

② 爱德尔斯坦（1981、1994）讨论了靠进口税保护的殖民地能够产生利润的情况。

③ 弗雷耶尔（1992）就卡特尔化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请参看麦克罗斯蒂（1907）、奈默尔斯（1956，第47页）承认霍布逊引人注目地预见保护主义的发展。

了霍布逊没有能力来看到英国民主机构的力量。或许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即他根据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分析，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大体上具有预测性的理想典范，而那个国家可怕地符合那个典范。然而，霍布逊没有能够预计打仗的过程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谈判能力在战后得以加强，并通过谈判推动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这正是科尔科（1994）发展的论断。

霍布逊没有考虑金钱、利率以及资本的深化（奈默尔斯，1996）。霍布逊把自己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宏观经济的政治模式，他没有发展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中立的金钱的批判。资本的深化的含义是，过度的储蓄——像霍布逊描述的那样——不会发生，因为，在很高的投资水平下，更大的创新可能导致不能促进生产的资本储蓄被取代。很高的投资率导致技术改革，这些改革能够“在消灭过多的储蓄方面，发挥和战争一样的作用”（奈默尔斯，1956，第40页）。但是，这种批判没有能够考虑到卡特尔阻碍投资的程度。弗里耶尔（1992）沿着这些线条区分了卡特尔和托拉斯。他争辩说，后者可能更有效，但英国的法律和时间偏向前者。塞洛斯-拉比尼（1956）的确争辩说，在停滞不前的经济中，纯粹的取代资本将更加现代化，从而将提高生产率，但他的论据没有支持奈默尔斯的批判。塞洛斯-拉比尼争辩说，改进了的取代资本将使劳动力失业，从而使利润增加，但同时使总需求下降——而这符合霍布逊的处方。戴位斯和胡腾巴克（1986，第96页）援引钢铁和武器公司维克尔斯的现代性和高回报；但是，那样的公司的繁荣符合霍布逊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论点；他显然从来没有认为，在整个的时期里，所有的工业都会停滞不前，或者他不会把劳资双方在谈判中的不平等，都归咎于工业的集中和生产率的提高。

霍布逊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现象（卡拉格尔

和鲁宾逊，1953)。霍布逊肯定在历史知识方面足够强，以致知道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英帝国在扩张，而且还拥有一些处于其非正式影响之下的地区。由于卡拉格尔和鲁宾逊强调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帝国主义，他们显得仅仅抓住了分析的一个部分，并且以某种方式树立了一个稻草人。霍布逊可能没有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贸易进行足够的研究。尽管如此，他对其他时期的研究（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里）表明，他把对外国经济的商业剥削和帝国主义互相区分开来。尤其是《帝国主义》一书，其基础是一个综合论据，即它认为，经济是由一个工业—金融精英集团控制的，而这个集团组织成为了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系。这个精英集团通过卡特尔、保护主义以及托拉斯控制经济，这种控制就是消费不足的根源；而把那种控制组织成为一个具有不断扩大的军事机器的对外投资机器，是该精英集团对同样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些条件有没有可能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里形成的？可能是没有的。首先，在19世纪的开始时，乡村地主的影响还很强；该阶级的主导地位首先与商业形式的剥削相联系，霍布逊把它划入与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不同的范畴里。第二，在工业里竞争很激烈。在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存在时，资本家搞卡特尔化是有困难的，作为其后果，吸取剩余利润（或者论断利息）的能力也减弱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从总体来说，进行消费的边际倾向（被消费的收入与被储蓄的收入之间的比例），应该是更高一些。这意味着，资本家的剩余产品更少，而且，因为竞争的效果和稳定的需求——它不受不灵活的（卡特尔化的）商品价格抑制——的存在，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也更加稳定。按照霍布逊（和凯恩斯的）理解，这应该意味着，资本家将更加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促进生产。这种经济，不管它的周期性有多么强烈，不会面临那种能够致使寡头集团同时获得扩大其在政治领域

的影响的动力和手段的停滞不前的状况。^① 霍布逊的论据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发展，是 19 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现象。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没有海军的军备竞赛，没有围绕正式控制的地区的高度紧张关系，没有社会的日益军事化和关于社会的宣传，因此，它没有构成霍布逊所担心的对安全的威胁。霍布逊阐述的帝国主义论的依据是这样的国际背景，即在该背景下，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从而促进了各个国家的民族精英或寡头集团采取日益充满对抗性的政策。与 20 世纪的战争相比较的话，19 世纪的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最恶劣的战争，并不算什么。霍布逊以明显的担心描写了 20 世纪战争的基本轮廓。^② 卡拉格尔和鲁宾逊把自由贸易时期的帝国主义等同于像霍布逊和列宁那样的作者关心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只有在忽略军事—工业综合体系和国内的卡特尔化的前提下，他们这种观点才能站得住脚。这样说等于说他们的比拟完全不是一种比拟。^③

爱德尔斯坦（1982 年）的分析。这是关于 19 世纪中期和晚期的投资行为的最尖端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之一。它对霍布逊关于

① 达里泰很喜欢这个论据（1992，第 164 页）。达里泰争辩说，“就欧洲和特别是英国而言”、殖民主义经济“表现了两种类型的引人注目的和独特的跨部门的一系列联系。因此，加倍效应相当强”。但是，虽然重商主义的奴隶贸易致力于实现对双向货物销售的垄断，它没有寻找实现对英国内货物生产的垄断。这样就产生了对投资的刺激和强烈的加倍效应。在霍布逊主义的世界里，不公平的分配和卡特尔化使储蓄集中起来，对投资泼冷水。在理论上，消费的边际倾向将是更低的，从而使加倍效应减弱。

② 凯恩（1990，第 34 页）描述说，霍布逊完全没有预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说法与霍布逊是写《帝国主义》的作者这一事，是很矛盾的。也许这是“您最可怕的噩梦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比您愿意相信的还要更正确得多”。

③ 科特勒尔（1991，第 42~47 页）对卡拉格尔和鲁宾逊的论点进行批判，他的依据是经济和外交的评估，没有讨论消费不足理论。

过度储蓄的假说进行细致的讨论（爱德尔斯坦，1982，第171～195页）。作者详细地分析了若干互相对立的关于储蓄和投资的假说。从这个意义说，他的书是评估导致了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力量的一次公正和严肃的努力。爱德尔斯坦（1982，第195页）的确对霍布逊的论点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他还特别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看来，一个重新制定的关于过度储蓄的概念，符合1877年到1890年和1903年到1913年的对外投资高潮特定时期的事实。”^①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书的结论还是相当消极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英国的）形成国内资本的新机遇并没有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困难。……被忽视的或许是回报较低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回报少于实际上执行的典型的回报最低的海外项目”（爱德尔斯坦，1982，第311页）。这种前景倾向于使人们的视角从过度储蓄转移到比较优势带来的资本流。

但是，爱德尔斯坦的宇宙不真正是霍布逊的宇宙。特别突出的是，爱德尔斯坦没有像霍布逊那样强调工业的集中和卡特尔，以及它们对综合的储蓄和投资的影响。他提供的数据，不能让我们真正明白，在卡特尔化了和没有卡特尔化的部门里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也没有考虑到，通过把利润吸收过来，卡特尔化的工业能够使非卡特尔化的商业部门陷入萧条。^②对于霍布逊来说，在为政府的购买武器计划的订单影响下，重工业能够扩张或至少维持更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萧条的非卡特尔化经济部门却仍然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这正是因为收入被抽调了，以便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卡特尔化部门购买货物。我们已经看到霍布逊为什么不研究军事—工业综合体系对收入的

^① 爱德尔斯坦（1981，第83页）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② 这是卜勒基（1952，第18页）、希法亭（1910，第233～234页）、巴兰（1957，第85页）和霍布逊（1927，第44页）自己提出的观点。

效果，但是，就爱德尔斯坦而言，因为他试图根据牢靠的数据来分析宏观经济上的行为，他对军事—工业综合体系对综合的收入和储蓄的影响的忽略，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戴维斯和胡腾巴克（1986，第160~163页）注意到了，英国维持了“世界上最高的人均防务开支”。他们还补充说，如果英国将军事开支减少到德国和法国的水平上（按照霍布逊的观点，这两个国家本身是在帝国主义层次上支出过高的军费的），其军费开支将以全国的储蓄的12%减少。按照新古典派经济学的观点，任何在军事方面花的资金，都将自动地被重新投资在其他的经济部门里。然而，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如果不在军事方面花资金，慢性的消费不足困难会加剧。

军事上的花费可能抵消了霍布逊预计的需求上的不足，并且影响爱德尔斯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结果。霍布逊可能没有把事情说明得很清楚，但是，一位靠着所掌握的80年来的事实的优势而写文章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在自己对投资者行为的估计中忽视这些变数。^①从经验数据来看，军事开支有可能削弱消费不足的效果，但是，那样的发现，也将加强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组织和政治结构的论点。具有自我讽刺意义的是，军事开支可能增加了国家的综合收入，并导致了综合储蓄扩大，而本来投资者希望把这些储蓄投放海外。

最后，爱德尔斯坦很少注意英国陷入流动资金陷阱的可能性。在一个存在着卡特尔化和非卡特尔化工业的两层次经济制度中，军事开支带来的对需求的刺激，将主要为前者带来好处。经济中的有竞争力的部门将压低利润和不吸引投资。在海外的投资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者逃跑了，但是，他们的目的主要不是追求在海外的更高的回报，而将主要是逃避在国内的风险，即让

① 爱德尔斯坦（1994）重新忽略了这一点，而且是在本来是很挑衅的地方。

钱在低息证券中沉没下去的风险。就那些低息证券而言，利率的变化对证券资产价值带来的风险，大于其近期的回报。^① 在降低利率没有能够推动投资的时候，到海外投资可以代表从低回报状况中的逃避，也可以代表海外投资替代方案的拉动。这就能够解释爱德尔斯坦发现的情况（1981，第84~85页）的悖论，即和在海外的投资相比较，在英国国内的投资（它们平均起来是低回报的）的风险要更高：一般来说，较低的利率表示着市场对更低的风险的评价，但这不是在流动资金陷阱里。在整个帝国主义时期里，在金融部门里，逐步巩固的银行业，偏向于促进对备用金的要求逐渐增长，即从6~15%，这种在金融部门里的集中所产生的效果，在国内贷款和资金供应方面，在不顾利率是多少的情况下，创造了强大的紧缩通货倾向。^②

简而言之，爱德尔斯坦的分析考核了与（某些）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相符合的变数，但他忽略了构成霍布逊的分析的许多关键变数，从而忽略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经济的某些显著特点（卡特化、托拉斯化、保护），而这些特点是霍布逊和受到他影响的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连爱德尔斯坦对霍布逊关于储蓄的观点的暂时支持是误导性的，因为爱德尔斯坦将数据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而霍布逊却放弃了作为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的消费不足论点，并转而把它更多地视为控制倾向支持战争的一种政治经济的寡头集团背后的经济理论和推动力量。

费尔德豪斯的批判（1961）《帝国主义》一书的美国版本的

① 凯恩斯（1936，第202页）。请参看达里泰和霍恩关于银行是推动人们借贷的论点（1988年）。

② 比兹（1935，第87·88页）评论了被外国放贷银行吞并的国内放贷银行对储备金的要求的调整。在合并后经过了调整的对储备金的要求，有可能使可供于放贷的资本减少57%。假若这在全国同时发生，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贬值。相反，因为银行巩固了，它成了持续的压力。

前言的作者声称，费尔德豪斯的论文很有说服力，而且写得很精练（西格尔曼，1965，第 xv 页）。但是，该前言没有感谢霍布逊作出了这样的语言，即一般的学术界将服务于帝国主义。无论费尔德豪斯的文章，还是西格尔曼的前言，都是冷战的产物。^① 费尔德豪斯探讨的是古典经济学，在他关于霍布逊的讨论中，我们找不到凯恩斯主义（1936）的蛛丝马迹，而关于卡勒基（1969、1952）、多马尔（1947）和鲁宾逊（1949）的痕迹更少了。^② 显而易见，费尔德豪斯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够把霍布逊的工作视为连续的经济学传统的一个部分，而轻率地忽视了凯恩斯的《通论》^③ 的贡献，却把霍布逊的理论胡乱地拼凑成古典经济学和错误的理解的大杂烩。费尔德豪斯完全没有描述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活动。只有学者才会如此疏忽；艾森豪威尔总统绝对不是这样的。

费尔德豪斯将意识形态和他掌握得很不好的初级数学结合起来。他断定说，“在其他的英国的……铁路债券和工业债券可以得到超过 5% 的利率”（费尔德豪斯，1961，第 198 页）。也就是说，投资者为什么到回报较低（在大约 3.94 ~ 4.97% 之间）的海外投资，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们很难想像比此更加愚蠢的观点。首先，他把一个平均数的一个分数抽出来，然后硬说，因为平均数的一个分数较高，一般是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率的。

-
- ① 马格努森（1994，第 154 ~ 160 页）也探讨了费尔德豪斯对霍布逊的批判。
- ② 请参看施奈德（1994，第 104 页）的讨论。他提供了鲁宾逊（1949）和多马尔（1947）的语录，还研究了霍布逊对哈罗德和多马尔设计的增长模式的意义。
- ③ 克拉克（1990）分析霍布逊—凯恩斯的关系，认为，凯恩斯是在完成其《总论》的写作后很久才发现霍布逊。但是，在提出凯恩斯（1919-2）可能是间接地接受了霍布逊有影响的著作《帝国主义》时，克拉克有一点点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业和政治，种族和文化竞争的事业和政治，垄断、限制以及排斥的事业和政治，它们扮演了乐园里的毒蛇的角色。”

然而，平均数的本质是，它就是由较高的数值和较低的数值产生的，因此，将英国国内证券市场中价值较高的证券抽出来，然后将它们和另外的地方的证券平均价值进行比较，是贩卖意识形态，而且还是错误的。

考虑到有关机构把长期利率确定得很低，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值得的，即投资者为什么寻求其风险保险费高于某些海外投资项目的某些英国国内投资项目。一个答案是：因为英国经济没有关税，它面对的风险更多，而投资者更乐意把钱投入在有关税的国家里。特别是铁路，它们的回报取决于它们能够制定的运输价格，而那些价格取决于货物的价格。运输关税保护的货物的铁路，有可能获得比运输没有关税的货物的铁路更多的利润，^① 由此，投资者正确地认识到，在受到保护的比如说印度或美国的经济中的铁路，是投资风险少于边际的英国铁路。^② 就其他的工业企业而言，自由贸易的英国的比如说纺织厂或者钢铁厂，显然比德国或美国的同类企业，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的风险。面对国际竞争的企业，必须支付更大的风险保险费。^③ 投资者应该知道这两种铁路之间的差别，即一条铁路因为给没有效益的客户运输成本很高的产品而面对竞争上的后果，而另一条铁路不是这样的。它们也应该知道，哪个钢铁公司面对竞争，而哪个钢铁公司却征得了有利可图的制造无畏的战舰的合同。综合数据不会自然而然

① 格罗斯维诺尔（1885，第88、92页）。他把铁路股票价格的上涨与关于煤炭工业达成了建立卡特尔协议的新闻联系起来。投资者知道，铁路会为价格更高的煤炭收取更高的运输费用，而当一家煤炭“联合企业”破产时，运货量会减少。

② 爱德尔斯坦（1981，第78页）说明了，在海外的铁路投资，比在国内的更有利可图。

③ 爱德尔斯坦（1981，第84~85页）认为，在英国投资赔钱的风险，比在海外投资更高。

地表达促进收入分散的特定因素。

英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能够建立关税制度，不说明霍布逊的模式是错误的，而说明机制是不够确定的。在英国，工业获得了搞卡特尔化的合法权利；在法庭里可以宣布卡特尔合同有效，对卡特尔的监督和卡特尔的实施是会计事业中的公认专业（弗雷耶尔，1992，第3、13、19页）。这是工业为了同意不制定关税而得到的补偿；如果要使英国能够提供一个市场，使自己分布在全球的债券人能够赚钱来偿还英国给的贷款的话，金融部门就需要有自由贸易。此外，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从作为英国财政事业的必然结果的英国货物的销售受益。^① 自由贸易政策并非完全是消极的；但不必说的是，高额的资金与投资所发生的国家的关税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关税反过来保护投资的回报。^②

英国经济的合法卡特尔化不同于比如说美国那样的经济的托拉斯化。托拉斯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买下来，然后把效率最低的竞争对手关闭了。卡特尔是为保护包括最弱的成员在内的所有成员而设计的联盟。托拉斯是通过市场份额和规模经济学，以旨在实现现代化的投资，来征得更高的利润的。与此相反，在卡特尔的成员中，不鼓励进行新的投资，因为，新投资打乱生产指标的安排，而且引起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卡特尔合同的合法实施是一个选择的地方。即使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英国有霍布逊式的消费不足的一个处方：通过卡特尔化形成很高的价格，一个通过卡特尔化的定价制度获取额外利润的精英集团，压低的需求；削弱了对在国内进行投资的刺激——其原因在于需求减少和必须

① 请参看爱德斯坦（1981，第90~91页）。

② 除了关税外，贷款担保和土地赠与是很重要的。请参看凯恩罗斯（1953，第187页）。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此，合法的卡特尔化只能提供一点保护。这些力量造就了正好推动输出资本的那种环境。^①

费尔德豪斯攻击说，霍布逊建造了一个依赖海外投资的模式，然后把像非洲和远东的在经济上相对没有意义的地理资产拿来作为证据。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大部分是在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那样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连支持霍布逊的人们也迷失方向了。^② 在19世纪，人们对世界的资源还非常不了解。美国广袤的草原被开发后，美国的小麦出口不仅使德国地主面临被毁灭的危险，而且也使运输他们的小麦到市场上的铁路也面临这种危险。这至少是“铁路与黑麦之间的联盟”^③的合理根源的一个部分。没有一个人预计波斯会出产石油，而当它开始出产石油，这就使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大大复杂化了，被看成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设施的威胁。^④ 如果我在美国建造一条铁路，我不希望看到其出口市场的价值受到来自澳大利亚或阿根廷或者别的地方的竞争产品的威胁。如果我出口南非的钻石和黄金，并从中获取巨大利润，那么，如果另外一个人在非洲某个地方发现同样的资源，我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⑤ 我能够允许那个人不是我自己吗？霍布逊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答案：因为帝国主义者能够把夺取海外领土的费用转嫁给别人，因为他们从制造战争机器的事业中受益，而该战争机器帮助他们夺取这些领

① W.P. 肯尼迪发现，在19世纪晚期，对英国高技术事业的投资短缺。这与这里和霍布逊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

② 例如，斯特拉齐（1959）；斯威齐（1942，第303页）把殖民主义扩张与垄断经济学等同起来，但他没有飞跃到主张保护来自进一步的生产发展的投资。

③ 意即工业与农业的联盟。——译注

④ 请参看诺维尔（1994，第45~79页）。

⑤ 作为说明新资源能够如何意外地被开发的例子，戴维斯和胡腾巴克（1986，第60页）谈到秘鲁是如何在修建好一条为银矿服务的铁路后发现了铜的。

土，加上他们从在股市上出售证券并收集所产生的利息受益：为什么就不去夺取眼前看到的一切呢？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我的最好的政策，它可以保护现存的投资，并且特别是可以保障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不能夺取某种资源，使其能够在我的卡特尔化了的的市场里竞争。这就是争夺国际领土的斗争的真正本质。如果我想保护我在阿根廷或美国的小麦或矿藏的投资，并对付在今后几年内可能开展的新生产，较好的办法就是去获取新的资产，比如在非洲的新资产。即使我对于那儿有些什么并没有把握，即使我一旦获取了那些资产没有在那儿进行投资的具体动力——因为那些投资有可能与我在其他地方的投资进行竞争——我也要那样做。

因此，某个地区获得或者没有获得一定数量的投资，是仅仅具有最小的意义的。霍布逊是正确的。在海外投资的倾向是和在海外夺取越来越多的领土的需要相联系的。其原因在于，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回报和价格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任何一项投资的利润都没有保障。这是因为，如果此时另一项新投资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以致国际上的价格迅速降低，回收主要投资的能力将受到威胁。这将对工业资本和提供了进行物质性投资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的金融家的威胁。按照逻辑，他们应该在帝国主义的企业里合作；这种事业的内在规律是，从总的投资和总的回报的角度来看，许多或者多数夺取的领土将表现得很差。

和费尔德豪斯关于霍布逊的观点有关系的是霍布斯鲍姆的观点（1987，第61页），后者讽刺说：“反对反帝国主义的文献的弱点在于，它们不是真正地解释经济和政治以及国内和国际上的事态发展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前后的学者认为，那些变化非常引人注目，以致要寻求对它们的全面的解释。那些文献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当时的学者觉得‘帝国主义’既是一个新的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核心的事态发展。简而言之，这种文献中很多是在

否认事实，而这些事实当时是很明显的，现在仍然是明显的。”

四、霍布逊之后的霍布逊理论

我提出了维护霍布逊的《帝国主义》的论据的轮廓。这些论据超越了霍布逊自己的论据。我争辩说过，军事—工业综合体系会产生一个促进需求的效果，而霍布逊没有能够考虑这一点。我就所夺取的领土和夺取它们的经济动力之间缺少联系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据。我争辩说过，与自由贸易和在伦敦大都市里集中的银行业相结合的卡特尔化，很可能和霍布逊提出的互相结合的托拉斯和关税一样阻拦国内的投资。我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资本输出与凯恩斯主义的流动资金陷阱的一个形式相联系。

我们还在谈霍布逊吗？是的，但也不是的。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根源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我扩展了霍布逊的论据，所采用的方式很可能会使他自己感到满意的。我不认为，我为对帝国主义的解释奠定了最终的框架。我主要是认为，继续对《帝国主义》感兴趣是有道理的，还提出，它提供了一个继续研究的似乎有理的框架。霍布逊的核心课题是寡头政治、寡头统治、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对投资的控制的潜力以及收入的再分配。我会争辩说，这就是对当代的读者有吸引力的真正的霍布逊，这不是被狭隘地认做殖民主义的解释者的人。纵观广阔的图案，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伟大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的衰落，加上与此相结合的这些国家成为注重财富重新分配的福利国家的演变，大体上符合霍布逊的观点。亚布拉罕关于魏马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的分析（1986）也如此。该分析将军国主义的力量同相对于保护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主导地位的劳工和面向国际的工商业的虚弱相联系起来。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即拥有最发达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系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

也拥有最弱的社会福利计划，这正如福特汉（1998，第103～130页）写道的那样，不是纯粹偶然的事情，而是在最高层次上的自觉决策的结果。这些都是霍布逊的社会分析的组成部分的主题。

霍布逊强调社会需要对投资进行控制，这在今天是不受欢迎的，在他那个时代也不受欢迎。^① 请考虑一下其后果：假定英国的市场达到了一个饱和点。在钢铁工业里，工资和收入的分配立即集中了收入，限制了勉强地进行消费的倾向，并且使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集中在精英集团手中，而该集团认为，通过在国内投资来获取足够的回报的前景是很暗淡的。同样的经济过程使政治权利集中起来和意识形态的局势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英国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国外出售更多的铁路。今天的物质性资产的拥有者们认为，最安全的收入是在日益增长的现有投资市场里。他们更喜欢在这里进行投资，而不那么喜欢在比如说电气化那样的新技术中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因为投资者阶级热衷于为现有生产形式寻找市场，电气化的速度放慢了。

在理论上讲，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可以与此不同，即它可以选择在电气化方面进行投资，从而提供国内投资，扩大国内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减少对增强旨在满足固定利益的需求的需要。^②

在这篇文章正在被撰写的时候，加利福尼亚的石油工业（CHEVRON公司、ARCO公司、UNOCAL公司）正在从其市场中摄取主要的垄断资本利息（通过按地区制定价格的办法），

① 朗（1996，第5页）回顾霍布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演讲是如何不断地被沙文主义者打断的。

② W.P. 肯尼迪（1987）就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部门为什么一般投资短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而且在俄罗斯和里海地区的海外石油事业中是一个主要投资者。20年来，该工业一直压制了关于投资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新型替代燃料基础设施和车辆的政策建议。世界进行了反对伊拉克的战争，后来对它进行封锁。因此，被保留的不是殖民地，而是当前的投资的活力和运输方面的消费形式。^① 霍布逊的分析的所有组成因素都在这里，这些因素包括：市场的集中、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剩余利润、受压制的国内研究和投资、在海外的投资、战争以及在涉及综合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决策中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参与的情况（这完全归罪于执政的政党的全面腐败）。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一种窒息人的意识形态环境，它在一切层次上（大学、新闻、电视、电影）向我们保证，我们的做法是公正和正确的。

对投资的社会监督，有可能使新的运输技术诞生。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里海和俄罗斯石油资源供应的获取，将成为一个链条，它将把进行投资的石油公司和旨在维持它们所依赖的技术落后、破坏环境的运输系统的激烈斗争联系在一起。在海外支出的资金，应该在国内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不仅为加利福尼亚人带来和平，而且也为世界带来和平。霍布逊关于寡头统治的市场使资本被输出而不带来投资（或者导致错误的投资）的论点仍然继续有现实意义。

在大家都非常了解国际劳动分工的人力费用的当今时代里，^② 激进的改革家不是以很赞赏的眼光看待对霍布逊关于一种

① 已经公布的关于围绕空气质量的斗争的报告很少。已经公布的关于这个斗争与加利福尼亚公司在海外的投资行为的关系的报告是不存在的。在诺维尔（1990）可以找到关于这些问题中的若干问题的介绍。

② 曼德尔和古尔德史密斯（1996）写的《反对全球经济的案例》提供了一系列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它们表面上都反对霍布逊，但实际上接受了霍布逊的许多看法。

积极的自由主义的新国际主义（朗，1996）的观点的。但是，霍布逊对第三世界受到的剥削的富有同情心的批评（第223～284页），与当代对墨西哥或其他地方的**马基拉多拉斯**的批判，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使我们处于什么地方呢？像阿里齐（1994）或华勒斯坦（1976、1980、1989）的作者们的精明能干使他们超过了霍布逊的帝国主义模式，正如整个的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传统超越了霍布逊的消费不足理论那样。但是，考虑到欧洲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相对软弱的地位和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政党，霍布逊提出的问题将继续具有现实的意义。考虑到构成霍布逊的工作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价值的主导地位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他的工作要么将在《帝国主义》提供的基本框架下讨论，要么将完全不加以讨论。^①

俗称为现实主义的关于国家行为的理论，首先鼓吹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和国家权力的最大化。该理论继续证实，霍布逊关于学术界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心，是非常准确的。霍布逊有一句话至今仍然是他最富有预见性的话（第188～189页），在这句话里，他总结了和否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学术著作：“这样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即它认为，因为世界好比一个斗鸡场，一个接一个的回合使更弱的战士被消灭，互相争斗的国家最终留下一个效率最高的国家，来在粪堆上主宰世界。”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的美国

① 美国有一个左翼多元主义传统，它坦率地讨论资本主义的冒险和过失，但它并没有处于边缘，而具有活力。各种例子包括比尔德和史密斯（1934），施哈特斯奈德（1935）、塔尔贝尔（1936）和基（1942）。新多元主义的分析包括吉布斯（1991）、斯基莫尔和哈德森（1993）、弗格森（1995）、福德汉（1998）、布恩（1992）、科克斯（1994）、诺维尔（1994）和若干其他人。请参看科克斯（1996）的文章。

学派。^①

因此，霍布逊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和它对学生的强大吸引力，完全在于它的关于权力的解释。霍布逊写的是关于他自己时代的帝国主义的著作，但是，因为他的清楚的解释持续有效，他通过自己的著作确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里，由国际资本的主导地位产生的失调。

①： 请参看朗（1996，第86-90、119-120、243-244页）提出的关于与霍布逊相比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有见解的分析。有些著作，例如勒波弗和里斯-卡彭（1995）的著作，对占主导地位的参照体系感到失望。然而，应该提及的是，在像马翰（1890）那样的人的传统著作，在把经济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方面，比现实主义的后继者，更容易看得懂。

第二一部分

帝国主义和发展

早期马克思主义对 资本主义式发展的批判

约翰·威洛拜

一、简介：古典的和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经济学先驱

发展经济学是 1945 年之后出现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来自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作出了反应，开始研究那些在地球南方许多地方里阻碍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的结构化了的过程。在 50 年代末，在美国的基金会和政府机构大规模的经济帮助下，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关于欠发达状况的文献。像 W. 阿瑟·刘易斯、昆纳尔·米尔达尔、拉格纳尔·努尔斯科和阿尔伯特·希尔施曼那样的学者，都赢得了很大的学术上的知名度，而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非常愉快地进入了这个领域。其结果是，在西方世界里，几乎每个教授经济学课程的大学，都至少有一个发展问题专家在其系里工作。

虽然这个经济学分支只是不久前开始存在的，但我们可以雄

辩说，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归功于关于发展的考虑。亚丹·斯密的“思索”提出了战后的发展领域里的专家们所关心主要课题。他提出，为促进增长，提供适当的刺激和产权框架是很重要的；加强资本积累是需要的；商业具有促进经济的作用（斯密，1910）。他的这些论点仍然是发展理论许多主流的核心课题。

然而，在40年代的晚期，在许多新的文献里，都没有谈到斯密。这可能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在国家经济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也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出现了的这种情况，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自由资本主义明显地失败了。此外，因为许多理论家寻找严格的经济规律，他们把斯密在《国富论》里的工作视为很精彩的阐述，但学术上很平庸（熊彼德，1954，第185页）。

因为这个原因，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后来的著作——虽然它们在制度问题上相对贫乏的——对经济学专业关于增长的分析的再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W. 阿瑟·刘易斯说，他的文章《在无限的劳动供应下的经济发展》（阿瑟·刘易斯，1954）——该文理所当然很出名——是传统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延伸。此外，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仍然是许多关于发展的文章的核心概念（李嘉图，1951）。最后，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学的理论有这样的优点，即它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机制。这个观点认为，农民和工人是不会思维的不断繁殖的兔子，故该观点对政策制定者没有指导价值，但是，这并不重要。马尔萨斯至少提出了，在物质生产和人均收入的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对这种联系可以加以探索和改变。然而，马尔萨斯的观点具有引起偏见的性质，因此，在现代人口科学建立后，它对早期发展理论便不再有意义了（马尔萨斯，1966）。

进行上面的暂短考察的目的不在于说明其他的传统和早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没有对发展经济学作出贡献。然而，我们还是

可以说，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继承者——除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初级工业理论之外（熊彼德，1954，第505页）——很少地努力于改进受斯密影响很广泛的尝试，即旨在把我们对历史进化的理解和经济力量相联系起来来的尝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关于商业和增长的理论方面，也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新突破，使得正统经济学家能够超越李嘉图的贡献。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理论和政治巨人中的两个人——罗沙·卢森堡和列宁——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边缘地带里资本主义式发展前景的观点（列宁，1960；卢森堡，1913）。此外，20年代，在还缺乏经验的苏联，就国家在促进迅速的工业化方面的作用问题，开展了很有针对性的讨论。在这些伟大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其他人试图解释应该如何落后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之间建立联系。该辩论不仅集中探讨促进储蓄的过程，而且也涉及了农业部门的性质、国家应该促进的投资形式、应该在农产品出口和资本商品的进口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由市场提供的刺激框架的适用性（爱里希，1960）。

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的犯罪般粗暴和超级的工业化运动，使这些生动的辩论暂时被中断了。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动的冷战，阻碍了西方早期主流发展理论家们去直接运用这种富有活力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自己也倾向于忽视20年代的辩论——虽然在卢森堡和列宁之间的早期分歧，在激进的依附论和生产方式学派的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它与现代发展理论的联系很脆弱，但是，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过程和适当的发展政策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发现以新的和具有潜在创造性的方式提出重大问题的旧传统，总是很有用的。发展经济学的最近的发展，使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的许多准确的提法变得过时了，但是，对这些著作的研究说明，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仍然确定着今天的发展经济学面对的重大挑战。的确，最近发表的关于工业发展的不平等和强迫性的批判文章，仍然可以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获得重要的认识。

二、理解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列宁和卢森堡

卡尔·马克思对后来的两代人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提供了有限的指导。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希望理解世界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地区的资本主义式发展过程。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强调说，在工业化前的生产方式的被破坏和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提出这两个过程能够共存一段时间，也许是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理论的主要贡献。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两重性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扩散的关键（马克思，1972a；1972b）。

除了这种认识之外，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在新社会关系的创建中政治压力的重要性。他争辩说，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的建立，需要在这些社会进行财产的剥夺，同时确立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马克思把这种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同他关于社会破坏和持续的经济两重性的描述相结合起来了，这暗示着，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过程需要有联合的强制性政治统治（马克思，1976）。另一方面，马克思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式的演变的理论讨论，倾向于把原始积累过程定位在资本主义诞生的美丽的黎明时刻。这种两重性意味着，那些踩着导师的脚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就发展过程中国家暴力的中心地位问题互相之间产生分歧。对强制性统治的强调，也能够使人们对马

克思自己关于发展过程最终是进步的过程这一信念提出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激烈的辩论，出现在革命之前的俄罗斯，这是不足为奇的。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争辩说，资本主义在破坏农民组织的平均主义公社结构。此外，他们坚持认为，出现这个过程是因为，资本积累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之外生产的。按照这个思想流派，在大批群众陷入贫困的环境中，消费不足的问题特别紧迫。这个尖锐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农民生活的猛烈进攻。

这种前景没有在革命前的俄罗斯激进分子之间获得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年轻的列宁强烈拒绝关于资本主义面对消费不足和在公社式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存在着什么进步的东西的论点。列宁在其最早的主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1960）里，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了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辩护。这部著作很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其作者后来的知名度很大，而也是因为列宁善于将精心的经验性研究和认真论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能力。

列宁以探讨马克思这样的原始论点开始阐述的，即资本主义使农民继续分化，还使他们当中很多人丧失土地。列宁根据农村人口相对于各种抽取剩余产品的过程的关系，对他们的地位进行划分（的确，这种对剥削的概念化，和晚得多和更抽象的约翰·鲁默尔的工作 [1982]，具有引人注目的相似性）。虽然年轻的列宁承认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严酷的加剧，他坚决反对俄罗斯激进民粹主义的基本主张。首先，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利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提出的再生产方案，来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任何与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关的慢性消费不足问题。第二，列宁坚决坚持认为，对前资本主义农民生活的破坏，最终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此表示欢迎。

这后一种论点使我们回忆起比尔·沃伦在 1970 年提出的引起

争论的论点，即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欢迎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先锋的进步作用（沃伦，1980）。因为列宁在后来的著作里经常提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寄生的和反动的，从他的这部早期著作里广泛援引一些话就能说明。列宁说：

一个人只要想像家长制农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小生产者的令人惊奇的分化，他就能够被说服相信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正在把世代代保持不变和墨守陈规的经济和生活的古代形式打碎到只留下其根本基础，正在破坏在中世纪农民的分化中生存下来的农民的稳定生活，还创造出需要而追求联系、统一和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整个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的新社会阶级（列宁，1960年英文版，第382页）。

后来，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里扩展了自己的立场，即他强烈主张使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而他的理由是，这种参与会促进（妇女和儿童的）发展和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创造无可比拟地优越于前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家长制的僵化的生活条件（列宁，1960年英文版，第546～547页）。列宁显然认为，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拥护这样的未来，尽可能为资本主义积极发展进行鼓动。前资本主义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反对由封建势力主导的政治秩序，以便创造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有关系的那些政治经济条件，使有效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出现，并且最后推翻资本主义。

年轻的列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讽刺意义的自觉追求，部分地根源于他这样的评估，即资本主义能够提高俄罗斯生产者的社会生产效率，从而使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能够实现更高得多的文化水平。他深信——和第二国际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资

本主义能够以允许其实现扩大的再生产的方式来促进增长的。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第一部分里，他利用大量篇幅，通过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案运用于俄罗斯的情况，来为这种前景进行辩护。列宁试图证明，我们能够按照正确的部门比例来制定输出产品的价值，以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资本货物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生产的商品，可以毫无问题地和农民经济中生产的不变和可变的资本进行交换。

这是最初的尝试之一，其目的在于发展一种将现代的资本主义部门和前资本主义的农村部门联系起来的模式。这个技巧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因为，它需要对资源在经济不同部门之间的可能流动，作出随意和不现实的设想（鲁宾逊，1951）。然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是可以被视为更具综合性的凯恩斯主义或卡勒基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关于经济联系的更详细的投入—产出分析的先驱。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扩大的再生产方法很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利用它就资本主义有没有内在的破坏和暴力倾向的问题，提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的论据。

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可以公正地被称为对资本主义的野蛮倾向的危言耸听的认识，她而且是与这样的认识联系得最密切的理论家。她争辩说，对资本主义来说，原始积累始终是必要的，因为，它必须打破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以便为必然是过剩的消费品（或者可变资本）打开市场，并通过强制手段获取短缺的资本货物（或者固定资本）。一般来说，连最同情卢森堡的评论家们也否定卢森堡这样的观点的细节。该观点就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公平的资本主义交换，来扩大再生产的论点。然而，毫无疑问，在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卢森堡是第一位以一定的准确性描写了这样的事情，即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称之为“欠发达的发展”的事情（弗朗克，1969b）。

卢森堡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成就是她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很有风格的描述。她坚持认为，

资本主义必须……始终和在一切地方都开展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以毁灭它遇到的自然经济的每种历史形式，不管它是奴隶经济、封建主义、原始共产主义，还是家长制的农民经济。在这场斗争中，主要的方法是政治力量（革命、战争）、国家的压迫性征税以及廉价的货物（卢森堡，1913，第369页）。

他争辩说，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或者，用她的术语来说，天然的经济形式——解体后，资本主义将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性的演变，即它将使简单的商品生产和构成这种经济的基础的相关农民社会解体。

对卢森堡来说，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被这种吞食一切的过程视为进步的。卢森堡所描绘的社会解体，不会为物质性的文化水准的持续提高铺平道路。至于生产者从传统枷锁中被解放出来时，并不能改善生活条件一事，其原因之一是，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国际积累网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卢森堡指出过

埃及的例子，正如中国的例子，或者更近期的摩洛哥的例子，都表明了，军国主义是资本积累的执行者，它在国际贷款、铁路建设、水利系统以及类似的文明工程背后躲藏。东方国家不能足够快速地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然后继续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以致被国际资本吞并了（卢森堡，1913，第439页）。

其后果是，东方国家的人民以新的枷锁取代传统的枷锁。新的枷

锁是西方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锻造出来的。

列宁从来没有接受卢森堡为了解释资本积累的贪婪性质而发展的理论模式。他从来没有接受认为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对前资本主义形式不停地施加暴力来扩展的观点。另一方面，革命后的列宁的确发表过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的论点，而这使他形成了同样的结论。西方资本主义反对东方国家人民的全球性扩展，开辟了充满超级剥削、战争以及停滞不前的时代（列宁，1939，第99页）。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希望实现和平的发展的话，它们就必须找到适当的政策，来把贫困的生产者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三、布尔什维克革命和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在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发展理论的贡献进行评估时，许多当代的主流和激进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忘记了，20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判断自己的政策的成功时，所使用的手段甚至完全不同于当代激进分子使用的手段。列宁、卢森堡和代表这种传统的其他人——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此外，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没有说社会主义正确是因为它是一条走向物质上的富裕的效率更高和公道的道路。正相反，他们更多地认为，促进物质上的发展的道理在于这样的假设，即在物质上很富裕的环境里，建立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和政府的管理都将更加容易。革命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目标是，要创造允许生产者调节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社会，不是扩大物质性的社会生产效率本身。

这种传统的顽强性可以最清楚地从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看出。在1918~1920年之间，革命前的俄罗斯的

工业经济解体了。在从事农业的内地和城市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居民，都试图返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前辈，只是在相对近的时期里离开了那些村庄的。货币的供应爆炸了，所造成的货币上的不稳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当局不得不以实物解决食品和原料的供应——有时要利用暴力做到这一点。继续留在要害的工业里的少量的工人，收到由各种货物组成的包裹作为工资报酬。工厂根据政府命令工作，它们得不到货币形式的补偿（诺维，1969，第46~82页）。

那样的条件使多数俄罗斯人陷入了贫困，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脱节时的贫困。到了1920年，饥荒在全国蔓延。没有一个负责的领袖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尽管如此，许多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都拥护看上去是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尽管这个时期是与严重的破坏相联系的。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以赞赏的眼光看待主要城市人口的迅速减少或者日益逼近的大批群众的饿死。正好相反，像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那样的左翼共产党人争辩说，作为交换的有用工具的货币的消失和由此产生的由国家指挥的易货经济组织，将有可能允许新的国家建立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式，这种形式的基础再也不是对个人利益或资本积累的追求（费尔兹尔，1979，第xiv页；塔尔布克，1989，第85~89页）。

这是一种在没有首先创造条件来使无产阶级能够有条件发展自己的情况下，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托洛茨基是首批对此提出问题的主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多伊茨尔，1954，第497页）。然而，是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迫使了列宁去制定面向市场的政策，该政策后来作为新经济政策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把这些很像是调整结构的努力，解释为允许私人在市场上做生意，引进可预测的征税制度，限制向国营工业提供的资助，以及支持以黄金为担保的新货币。列宁坦

诚地承认说，这种回到资本主义刺激的转变，只有在它导致了城市的和工业的经济的的增长后，才能被证实是正确的（诺维，1969，第120页）。

列宁呼吁农民和工人之间建立一个联盟，这只是部分地掩盖了列宁对俄罗斯农村的落后状态的不耐心的态度。布尔什维克的早期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创造条件，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秩序。考虑到俄罗斯农业的巨大规模和相对的分量，我们对这样的情况不必感到奇怪，这情况就是，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活动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变成了关心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那些活动家们和经济学家们的首要研究对象。

四、农村—城市的连接和关于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理论与实践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有资格被确认是第一个试图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关心的问题不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更快和持久。正相反，他希望的是发展一些政策，以加强国家的工业部门，并使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不冲垮没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和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明确地认识到，他正在进入没有绘制过地图的领土。在他写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批评论文章里，他在开头部分指出，一个或更多的欧洲或美洲的国家，“处于很好的地位，以致可以向工业上落后的苏维埃俄国显示其直接的未来的形象。”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人类社会现在（仅仅）能够模糊地看到在未来的时期里‘其运动的自然规律’”（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4页）。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大规模的工业在国家或者苏维埃的控制下的演变，以及它和日益商业化的农民经

济的关系。

农业部门的小型商品生产将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吗？对这个问题，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的思想里，他丝毫不怀疑这两点，即列宁最初制定的农村的资本主义式发展模式仍然适用，而农民的一些部分的日益富裕，为国家提供了实现发展的一个机遇。尽管如此，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担心富农的资本主义将被加强了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利益，将冲垮国家的部门。对他来说，确定国家应该如何对付这种危险，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显而易见，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苏联国家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稳定的担心，并非不正常的情况。布尔什维克在 20 年代进行的关于他们当时的地位的讨论，反映他们对于既要统治主要是由乡村农民组成的社会，又要在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里生存，感到很不安（S. 科亨，1973，第 181 页）。对于几乎全体领导人来说，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于要促进苏联工业实现尽可能快的增长，而同时要防止农民建立独立的积累资金的循环体系。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在其 1922 年写的题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文章里，特别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该文里，他争辩说，苏维埃国家面临 3 项经济任务：

①要在一个保证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的鼓励制度基础上，扩大大规模的工业的生产。

②要在和农民合作而同时“通过资本一向采用的办法——即商业和贷款——控制小生产”的情况下，扩大国家的农业生产。

③要改造小农的生产的技術基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 22 页）。

从这 3 个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软弱的政治地位的逻辑，导致了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这样的任务，即它们使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离开了革命前制定的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

目标，而走向了探讨那些涉及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的问题。由此，就旨在建立不把报酬和生产上的努力相结合的报酬制度的任何尝试而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相当快地否定了它们有生命力。与此相反，他的文章把焦点放在了政治，比如说国家对商业和贷款的垄断。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乐观地肯定了那样的措施，说，它们将允许无产阶级（即国家）控制和监督经济活动，并且将农民的贸易和国家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这样的措施将使制定计划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得多。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试图描述能够最有效地将国家工业部门和乡村农民的部门结合起来的国家政策，在那些尝试中，有一个主题出现，那就是，他日益坚信，为了加快工业积累的速度，必须采取非经济的措施。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在这里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强调，我们需要促进他称之为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事业。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要求对财产关系进行强制性的重新组织，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明确地重申了这一点，看来，他这样做是为了指出，任何一个非资本主义式的物质性发展将要求国家支持的强制性措施。该术语的含义是，国家必须对居民的一些部分使用暴力，以建立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

不幸的是，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因为引用了这个庄严的、充满政治意义的术语，模糊了自己这样的相当谦虚的论点，即要有限度地使用国家权力，来推动发展过程进入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渠道。他争辩说，计划机构当局应该确立对贷款的控制，操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贸易的条件，并且确立更加详细的（但仍然可以预测的）征税方法，以便为工业投资项目，从农民那儿摄取更多的资源。

他的关于那些强制性措施的论点后来很突出，因为，事实很快地证明，新经济政策只是部分地成功。新经济政策的确很快地恢复了城乡之间的商业关系。农业部门的确从破坏性的饥荒时期

中反弹回来了，在1925年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工业生产也开始恢复。然而，这些成功，都没有能够掩饰人们后来称之为“剪刀危机”的严重困难。农业生产的更加迅速的恢复，加上与此相结合的新国家企业的垄断经济活动，导致了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诺维，1969，第93~96页）。

布哈林——新经济政策亲农民公告的最热情支持者——最初的反应是呼吁深化新经济政策，具体办法是降低工业品价格和允许私营资本家们与国家的工业托拉斯进行竞争。与此相反，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这个危机的反应则是主张加强工业化，其办法是执行一个由国家支持的投资计划，并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增加向农村里的富裕分子征收的税”，来解决该计划需要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47页）。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由计划当局决定的高度优先的工业项目。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理由的。政治上的理由是对以农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可能将瓦解社会主义事业的担心。他的关于国家领导的工业化的经济论据是以两个因素为依据的，它们是：他对苏联经济条件的更加综合的评估；他关于工业积累的要求的全面理解。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在他的经济分析的开端正确地提出，在1917年和1918年通过革命剥夺了土地后，俄罗斯农业更加具有了平均主义的性质，这意味着，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工业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他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这将导致压力增大，但这是因为要进口更多的消费品，不是因为生产资料短缺。他争辩说，平衡的工业增长要求重工业和轻工业共同发展。因为如果让市场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配置投资资源，一些部门就会变得没有利润，计划的制定者们应该善于预见未来的工业需求，并且把资源输送到上述那些部门去。面向市场的企业家们是从短期看问题的，克服这个缺点的办法是，要采用瞄准需要大笔固定资金投资的项目的计划制定过程。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非常明白，能够使资本被固定在大型项目里的资源转移，也能够威胁国家的主要盟友的生活水平——这个盟友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他在很说明问题的一个段落里写道：

在今后的几年里，（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很快，因为，工业在积累流动资金后（流动资金的供应仍然非常短缺），将开始恢复固定资金和重新开动城市建设，而这些都是需要“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任务，这不仅将使必须纳税的小资产阶级付出代价，而且还将影响工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26页）。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也很明白，通过进口，可以获得更便宜的消费品和农业原料。然而，他在一次分析（该分析既预见了依附论，又部分地描述了在苏联崩溃后俄罗斯面临的现实）中说，如果贸易不受限制，苏联的工业将被消灭，因为，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它是无利可图的，是毫无用处的……农业……将受到严重的折磨……因为，整个国家被改造成为世界资本的一个农业半殖民地（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64~65页）。

在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所有的著作中贯穿着这样一种担心，即在优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帝国主义的强制手段前，不成熟的国家部门将可能解体。他坚持主张，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将资源的流动从……新经济政策的原始积累渠道，转移到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工厂里去”。这样的政策将能够使资本积累从属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30页）。这样的政策的经济论据是，和对以农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依赖相比较，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将更有效地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管理的潜力。尽管如此，坦诚地承认，他主张的发展过程将受到以下3个矛盾的目标的刁

难：提高工资与促进资本货物的积累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合理化与减少失业之间的矛盾；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与发展国内技术能力之间的矛盾（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79，第230页）。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成就之一是，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任何一个发展政策的制定者，都必须面对非常严酷的选择。

这部著作作为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日益激烈的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多伊茨尔，1959，第99~103页）。在列宁在1924年初逝世后，关于苏联的国家和经济的未来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关于经济政策的争端变成了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工具。新经济政策的最善于雄辩的辩护者是布哈林——他以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最热情的支持者。虽然布哈林在历史上有这种不始终一贯的问题，但他一直毫无动摇地认为，如果允许农民的私人部门成长的话，新的经济将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布哈林关于通过让农民致富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呼吁，意味着要放慢发展的速度，要对能够向农业部门提供所需要的原料和所希望的消费品的工业进行投资。

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之间产生了分歧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布哈林日益担心，如果从农村里摄取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看起来维持着苏维埃权力的微妙的社会平衡，将受到破坏。在经济的层次上，他坚信，加强“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战略，将破坏支持着农业生产和市场营销的脆弱动力。此外，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不一样，他不那么相信国家企业在事实上能够组织经济上能促进生产的投资项目。因此，他与此相反地经常建议，要采取措施，来通过允许私营商人和富裕农民与国家部门进行竞争，迫使价格降下来和增加竞争的压力（塔尔布克，1989，第142~144页）。

在某种意义上，在新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下

面这些争论，反映着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经济学的起始阶段变得很重要的发展理论家们之间的争论。

①国家应该向什么样的程度计划发展，以克服由资本主义的竞争逼迫的短期行为？

②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使边缘地带的经济面临变成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永久性半殖民地的恶运？

③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之间的适当比例应该是多少？

④国家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改变对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以鼓励工业？

在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早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现代的发展理论对这些政策选择的理论和实际后果进行了更严格得多的考察。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经济目标方面，和主张私人发展的计划制定者们相比，早期的理论家们表达得更清楚。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早期的著作没有始终一贯地暗示社会主义计划将导致物质生产更迅速地增长。与此相反，他争辩说，国家资助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将更有效地维持苏联的国家制度，并允许随之而来的物质上的富裕（加上预计之中的西欧的政治变革），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布哈林害怕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解决办法，因为，布哈林怀疑它的经济效果，而且对它派生出来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心。

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之间也有共同点。虽然布哈林不愿意抑制富农经营企业的能量，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怀疑农民合作社抵制富农影响的能力，他们两人都主张进行更大的努力，来鼓励在农村创建市场营销、贷款和生产合作社。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争辩说，这些机构将能够使国家在对与国家部门自愿进行的相互交流给予更大的刺激的同时，更有效地监控生产和商业活动。布哈林同样地相信，通过鼓励自愿集中资源，可以获得经济

和政治上的好处。农民不仅将从规模经济受益，而且合作社的成立，将限制个别的富裕农户与农村社群中更贫穷的成员建立剥削性的贷款和劳动关系（爱里希，1960，第164页）。

一项合理的综合政策，本来可以提高工业化的比例，而同时维持俄罗斯农民面对的基本的市场刺激结构。然而，在1928年启动的斯大林的集体化项目，使实现这样的政策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看，斯大林强调迅速工业化和以严厉手段从农民摄取剩余产品，这使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给予国家的强制性统治的主张显得很有先知般的预见性。考虑到集体化的暴烈性质，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这个术语再也不是个隐语。也许是因为这些理由，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离开了托洛茨基受到围攻的阵营，而支持斯大林的伟大转变。

事实上，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关于国家资助的工业化的期望。那种工业化将使受到抑制的农民资本主义与一个发展的事业结合起来，而那个事业许诺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远远不是一个冒险主义的激进分子，因此，在斯大林主义过火运动之后，他在20年代提出的建议看起来是很谨慎的，甚至是保守的。

他本人意识到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不能促进俄罗斯生活在物质方面得到合理的发展。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斯大林过分强调第一产业即资本货物的生产。考虑到30年代初期是充满危险的时光，这是非常勇敢的行动。他呼吁重新强调消费品的生产，还预言说，如果不能纠正苏联经济中的失衡，这就将导致重工业永远过度膨胀（费尔兹尔，1979，第xlii~xlvii页）。因为这个批评是很敏感的，而布哈林对步伐更慢的工业化进程的热衷支持似乎是合理的，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这位主张超级规模工业化的人和布哈林这位新经济政策的辩护者，都以他们的生命付出了追求经济上的真理的代价。

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估

早期的关于国家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最引人注目方面之一是，布哈林、列宁、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托洛茨基等，一方面都从发展的潜力论证自己的政策正确，但另一方面也都同样地从政治效果论证自己的政策正确。成功的含义基本上是，要找到那些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政策。人们认为，成功的一个根本性的表现是劳动的经济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们明确认识到，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将导致共产主义事业被毁灭。的确，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有时认为，必须在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形成的制度化环境和人均物质生产的增长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认识了维持苏维埃国家（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意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框架，从而可以理解斯大林为什么最初决定搞农业集体化，而后来大力推动重工业的建设。

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世界经济崩溃了，这模糊了在10年前进行的大辩论的政治因素的极其重要意义。斯大林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胜利，从而既克服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不前，又奠定了富裕的共产主义秩序的基础。对于在自己国家对广泛的贫困化和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感到担忧的西方人士来说，这些胜利在表面上是牢靠的。计划、在农村创造集体财产关系以及转变对农村生产者的贸易条件，越来越多地因为其积极的经济效果，而被论证是正确的。

就是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 and 列宁在革命后做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质分析，能够而且事实上被继续用于论证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制定的政策。虽然50年代和60年代的多数发展理论家不同意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是，下面一些论点采纳了20世纪初期的

理论家们和活动家们的某些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应该增加投资，鼓励不平衡的增长（希尔施曼，1958）；在不损害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从农业部门抽调大量产品是行得通的（刘易斯，1954）；对当前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依赖使第三世界国家注定永远保持农业国的身份（普雷布施，1959）；为了使欠发达国家摆脱永远产生贫困的进程，需要让国家采取行动（米尔达尔，1968）。

发展经济理论肯定没有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理论上的更大的严谨性和对经验的更深入的研究，逐渐地导致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过程。理论经验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统制的发展政策的局限性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些政策主张“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而不考虑它在农村和国家部门里，在对成长的刺激的消极后果。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些问题是敏感的，但从来没有以系统的抽象化和严谨的经验性依据讨论这些问题，以致没有能够使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观点有效地结合起来。

那样的结合本来可以运用年轻的列宁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经验主义方法。他的目的在于研究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便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进行干预，以促使这个进程采取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因为现在斯大林主义的事业崩溃了，而无论是列宁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卢森堡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都不能恰当地说明当代的资本主义的事态发展，我们被推回去了，必须研究列宁原来考虑的问题。对于试图对付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的进步人士们来说，这些问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旨在找到民主的，而且又保证将创造持续的物质繁荣的强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我们回到了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理论问题，说明我们可以从对这些卓越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失败的更严肃的研究，学习很多东西。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扩散主义

J.M. 布娄特

一、简介

马克思主义的庄严的老颂歌《国际歌》开头的两句话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该歌曲被创作时，即在1888年，世界上多数受苦的人们，都在很遥远的地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和在那儿死亡，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些地方的了解却很少。他们坚信马克思遗留给他们的世界模式：在世界的欧洲部分里，历史进步是自然出现的；世界的其余部分通过这种进步的扩散获得了其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洲人的世界里发生，然后社会主义将扩展到世界的其余部分，并且解放世界上一切地方的受苦的人们。

今天，我们会给这样的观点贴上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的标签。它肯定是这样的。但是，马克思的时代里的每个欧洲思想家，都接受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的模式。马克思在当时

可以获得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事实材料，大部分是书和文件，而它们是扩散主义的代言人或代表机构编写的报刊文章、殖民地政府文件以及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写的书等等。^①此外，鉴于马克思受到了传统的德国教育，而他生活在知识分子的环境里，马克思没有理由来怀疑传统的历史所阐述的欧洲在全世界里的决定性作用。总之，马克思怀疑了他遇到的一切没有根据的关于精英作用的学说；但当那种学说涉及他不了解的地方和人民时，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问题来。

但是，虽然马克思不可能被指望去拒绝欧洲中心扩散主义模式，我们不能以同样的理由原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欧洲已经散播了足够的可靠的资料，它们都说明了非欧洲社会的本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以致任何一个人，只要选择那样做的话，都可以就在非欧洲世界里欧洲的扩散的天然性和必然性，提出问题来。然而，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拒绝那样做。在伯恩斯坦、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和那个时期里的其他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中，欧洲人的世界仍然被看作为了过去和未来的历史变革进行斗争的场所，而非欧洲世界被视为由欧洲扩散出来的结果的接受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持有的观点，与欧洲的主流思想家的观点，没有明显的差别。

^① 马克思当然也阅读了欧洲学者和旅行家写的一些书，但这些书又是表达扩散主义或者殖民主义观点的。在他逝世前不久，马克思开始系统地阅读关于非欧洲世界的书。请参看克雷德出版的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本》（马克思，1972a）。恩格斯1884年写的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引人注目的方式离开了欧洲中心主义。在本文里，凡是我提到马克思的地方，读者应该理解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除非在上下文里明确否定。在这里我遵从一个对恩格斯不那么公平的习惯。

二、欧洲马克思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少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开始怀疑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的模式，至少是该模式的重要部分。卢森堡争辩说，资本主义的生存有赖于从非欧洲世界输入的财富，因此，非欧洲世界对欧洲的影响很重要，反过来，欧洲也对非欧洲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篇论文里，欧洲指的是欧洲本身，加上欧洲人定居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美洲）。列宁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和卢森堡不一样，他坚持认为，殖民地和其他被统治的地区，将成功地进行解放斗争，从而将制止，甚至击退欧洲人靠之获得了对非欧洲世界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统治的扩散过程。^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本质上，在欧洲中心扩散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其中之一我称之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宣布，欧洲在过去和今天都处于中心地位，在历史过程中任何时期里欧洲都是优先的，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和可取的。与此相对立的学派可以被称为非扩散主义的或均变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广泛地否定那些主张。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始终都有共产党人和主张进化的社会党人。一个学派怀疑欧洲的传统欧洲中心扩散主义学说；另一个学派拥护它。多数非欧洲世界——现在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怀疑和拒绝该学说；欧洲世界里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马克思

^① 请特别参看卢森堡（1908～1909、1913）、列宁（1915a、1916a、1916b、1916c、1921a、1921b——这是一个短文系列，它们共同提供关于他的模式的轮廓）。

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人如果要成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必须完全认识另一种世界模式，而马克思没有并且不可能有那种认识。

三、以欧洲为中心的扩散主义^①

在讨论到了这一点上，我们应当休息一下，并研究一下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欧洲中心扩散主义学说的演变情况。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当时欧洲人开始创造各种学说，以说明他们自己与他们正在征服和剥削的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在拿破仑时期之后，殖民主义得以加强了，使欧洲人在他们征服了或者打算征服的地区里，获取了很多关于那儿的非欧洲人的知识。这样，上述学说被巩固成为一个理论，或者更正确地来说，巩固成为一个世界模式。在 19 世纪里，这个模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本主张的基础之上：

- 欧洲是自然地发展和进步的。
- 非欧洲地区自然地停滞不前并保持传统。
- 欧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某种知识或精神素质，某种理性，它们导致了技术和社会方面的发明和革新。
- 非欧洲地区没有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理性素质。
- 欧洲的优越地位的次要原因在于其优越的环境。
- 非欧洲地区如果要发展，自然的办法是接受从自欧洲扩散出来的东西，它们包含新思想和信仰、商品、移民以及殖民统治。
- 作为对这些礼物的部分报酬，非欧洲地区自然地向欧洲提供原料、种植园产品、劳务和艺术品。

^① 这部分里的讨论是布娄特（1993）第 1 章的总结。

因此，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即欧洲部分和非欧洲部分（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两者之间的互动包括文明特点的向外扩散和价值的相应扩散。

这种欧洲中心扩散主义模式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比其他人优越，他们对非欧洲人的征服和剥削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和合适的。总之，它是论证殖民主义合理性的依据，它在欧洲的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则可以从欧洲人（无论如何至少是欧洲的精英集团）向殖民主义赋予的重要意义得到解释。它构成了当时多数伟大的理论的基础，这些是关于欧洲自己的和其余世界的本质和历史的理论。世界历史就是欧洲的历史；为了解释从前的欧洲历史中的任何事实，人们都要回头看从前的欧洲的历史，而不是看外部世界，因为，进步事业的扩散是向外的，不是向内的，而非欧洲世界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发明的、没有历史的（我把此称为“隧洞历史”）。19世纪的所有欧洲思想家显然都接受这种世界模式的某一个形式。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没有掌握非欧洲世界的历史和进步的事实。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这个学说没有被抛弃，而只是被修改和软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采取了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形式。欧洲的历史过程仍然具有**独特性**。非欧洲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其某些部分在一定的时期里也进步了，在技术和社会方面也前进了，但都比欧洲缓慢。历史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阶段还是在欧洲发生的。今天，非欧洲地区实现发展的唯一道路是，要沿着欧洲过去走的道路走，即走到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要接受从欧洲扩散出去的现代资本、技术以及社会价值；要将它们的经济与欧洲的公司结合起来；要接受非正式的政治控制。欧洲中心主义扩散主义的学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它必须说服现在已经拥有政治独立的非欧洲人接受这样的认识，即走出贫困中而实现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是接受从欧

洲扩散出来的东西和接受欧洲的主导。

四、古代社会

我现在要描述某些对今日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理论，并且批判它们。因为这是一篇短文，描述和批判必须是简短的和略微具有提纲式的。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我曾经讨论了这些理论，而如果其他一些著作看来具有援引价值，我将毫无羞耻地援引其他著作。焦点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欧洲和非欧洲世界的互动的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支柱之一是这样的思想，即历史是经过一系列阶段前进的，每个阶段都与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原始共产主义向阶级社会让路了。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奴隶社会或者奴隶制度式生产方式。此后是封建主义，即封建式生产方式。然后是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未来世界将是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社会的消灭。和其他 19 世纪中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马克思本人相信，希腊和罗马是第一个真正有阶级的社会，其基础是奴隶劳动。因此，阶级社会是在欧洲兴起的。阶级社会的诞生则预示了进化过程的诞生：其他的处于阶级社会阶段或无阶级社会阶段之前的社会，以及可能还有古代的野蛮社会，都不存在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倾向。马克思因此把独立的社会发展视为欧洲的发明。当然，这就是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的核心主张之一：在中心地区欧洲有独立发展，在边缘地带非欧洲世界没有这种发展。

直到大约 20 世纪中期，在欧洲思想界里人们广泛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希腊人发明了进步。今天我们都知道，与古代希腊文明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其他文明，也是有进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把希腊抬举为历史的首要推动者，至少部分地是种族歧

视和反犹太主义的产物。^①然而，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或忽视新的证据，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维护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即马克思曾经接受的、但现代学术界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即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是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开端。然后该理论坚持说，在古代里，只是在罗马和希腊才有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另一个理论的出发点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相关的东方暴政理论。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不放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是惟一的或一个历史推动力的观点的情况下，拒绝提出阶级斗争是希腊—罗马奴隶制度开动起来的理论。我们可以提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做），曾经存在一种古代生产方式，然后断定构成其剥削基础的是奴隶制度和雇佣劳动（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雇佣劳动）。但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广泛坚持认为，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历史的发动机（这是随便说的）。（例如，请参阅安德森，1974b；帕德古克，1976；曼弗雷德，1974；德圣克罗瓦，1981；葛德列，1981，米罗纳基斯，1993~1994）。我们知道，在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文明同时存在的许多文明中，包括中国汉朝的文明和印度的孔雀帝国（MAURYAN）文明，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们把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结合起来了（参看埃尔文，1973；哈比布，1969）。我们也知道，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奴隶制度才是非农民劳动的最重要形式：在希腊和罗马，在任何时候，奴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被抓获的俘虏或者由别人抓获的奴隶（芬利，1981；伍兹，1988）。这只能在军事征服条件下或者在非常强大的贸易经济条件下发生的，而这两种情况在雅典帝国里的历史都很短。我们很难把这两种情况考虑为在

^① 请参看贝纳尔（1987）、阿明（1989）、惠特曼（1984）。

历史上是始终一贯的情况或者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需要抓获或者买卖奴隶的情况意味着，古代奴隶制度从来没有处于长期的平衡；还意味着，古代的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不能以关于在社会内部发生的社会演进的理论来解释，而只能以关于征服和对外贸易的理论来解释。此外，奴隶劳动是其占支配地位的剥削形式的地理区域也相当有限；或许在汉朝帝国里，在其大小可以与雅典帝国相比拟的一些高度发达地区里，存在着与雅典帝国相类似的奴隶制度。最后，正如哈比勃（1969）所争辩的那样，在古代印度存在着某种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但是，它是在基本上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产生的——从而颠倒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顺序。在任何情况下，提出地中海欧洲的奴隶制度是进步的摇篮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在马克思的年代里，关于欧洲在整个历史中具有独特的进步性的信念，与当时人们广泛接受的东方暴政理论有联系。这个理论规定，非欧洲文明从来不知道自由概念，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这些文明天生地是暴政。最普通的解释把简单的种族主义和只有基督教教徒才能真正自由的信念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思索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亚洲文明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阶段的正常顺序进步，而停留（这是他们的想法）在本质上是无阶级的条件下，以致停滞不前了（请参看布娄特在1993年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和当时多数思想家一样，他们根据在亚洲整个历史中明显占了主导地位的暴政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但是，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而且，他们试图从自然条件角度对这种暴政进行解释。他们有点勉强地提出，其原因在于亚洲的下旱气候（他们以为这是亚洲的特点）；因此，其原因在于对灌溉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1975，第75-80页）。庞大的灌溉系统，需要进行暴政，以管理运河、配置水资源等。这样，亚洲文明就产生了独特的亚洲生产方式的特征，在这个制度下，有还没

有分化为阶级的农民社群，还有一个以暴政管理事情但不进行剥削的管理阶级：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因此没有阶级斗争，进步很少或者没有进步。但是，事实上亚洲大部分地区不是干旱的。在许多地区里，灌溉不重要，而在它是重要的地区里（比如说在生产水稻的地区里），水渠系统一般是由当地管理的或小型的事情。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到的西亚大型灌溉体系的情况而言，相关的阶级社会和欧洲的一样古老，争辩说统治阶级强制性发展了灌溉系统，还是争辩说相反的情况，都是完全一样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简直是不好的历史地理。但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还在继续提出它（例如，葛德列，1969；贝利和罗贝拉，1981；拉科斯特，1969；梅罗蒂，1977；也请参看1957年出版的由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威特弗格尔写的书《东方暴政》）。这个理论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个基础，因为它支持着欧洲中心扩散主义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在欧洲，进步是自然的。

五、资本主义的兴起

对于马克思来说，奴隶生产方式或古代生产方式向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让路了。马克思坚信，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是欧洲的现象（马克思，1972a）。这个观点已经无法继续支持了。众所周知，若干其他地区（日本、中国、土耳其等）在某个时期里也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社会里，甚至在哥伦布前的中美洲，都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构成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封建经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更喜欢用的替代概念）组成部分的农奴制度、庄园制度和其他事情（布娄特，1993）。阿明（1985）和许多其他人现在使用更广泛的概念，即纳贡生产方式，因为他们认为，纳贡是许多或多数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欧洲封建主义仅仅是纳贡形式的一个地区性变种。尽管有了新的证据

和更新的理论，许多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欧洲的独特生产方式（赖克拉奥认为，它后来相当自然地扩散到了美洲）。他们当中一些人接受关于纳贡生产方式的思想，但坚持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扎根于地租和剥削的欧洲进步形式，另一个是扎根于征税的没有进步的形式（威克汉，1988）。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个观点论证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即因为资本主义只能从封建主义产生，而封建主义是欧洲的独特现象，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诞生。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欧洲中心扩散主义核心信念之一是我称之为隧洞历史的那个看法。该看法认为，欧洲历史的事实，必须用欧洲历史中从前的事实加以解释，不必真正注意从其他地方进入欧洲的引起各种结果的力量。马克思持有这种观点。直到最近，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接受这个观点，至少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公平地说，在60年代之前，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作为欧洲积累的财富的来源、作为导致欧洲内部的社会变革的力量以及作为技术和其他变革因素进入欧洲的扩散渠道，殖民主义对欧洲具有重大意义。列宁和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分析了殖民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但只有若干非欧洲人的著作，特别是詹姆斯（1936、1970）和威廉斯（1944）的著作，才开始对非欧洲地区对欧洲早期历史的意义进行描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历史学家加快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关于这些地区在1492年后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的新知识（布娄特，1993）。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的讨论（希尔顿，1976）。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那个时候，参与讨论的人中，没有一个真正意识到了来自欧洲之外的新证据，以致讨论的主要问

题是这样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欧洲农村力量，还是欧洲的城市和商业力量，尽管一些参与者（霍布斯鲍姆、斯威齐、多普）发表评论说，关于非欧洲封建主义的证据正在被提出来，这很可能将逼迫人们重新考虑过渡问题。所有这些人不能被视为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这只是缺少信息的问题。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之后，人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非欧洲地区和它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重要意义的证据，以致主张欧洲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革命的兴起仅仅归因于中世纪欧洲的任何隧洞历史理论，都应该被划入欧洲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内。许多人提出了那样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罗伯特·布雷讷尔提出的理论（请参看阿斯顿和菲尔品在1985年编辑的布雷讷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和其他人的评论的文集；也请参看布姿特在1993年和1994年写的关于布雷讷尔的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布雷讷尔用了200页的文章论述了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一次也没有提到17世纪中期（按照他的理论，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了很久）前的非欧洲地区。他争辩说，英国农民在与封建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时失败了，使大规模的佃农阶级兴起，这些佃农租了土地，雇佣了没有土地的农民，成为第一批真正的资本家。因此，资本主义是在英国的农村兴起的（不是在城镇里，不是在欧洲其他地区，不是在非欧洲地区）。布雷讷尔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把该理论用于谴责反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特别是斯威齐、华勒斯坦、弗朗克）的观点的方法。他们争辩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过程，不是欧洲内部的过程。布雷讷尔露骨地断言，非欧洲地区在历史上没有重要意义证明了第三世界主义是错误的，即使在今天，欧洲还是社会变革的中心（布雷讷尔，1977；葛德列，1969，也有类似的推理）。布雷讷尔的理论得到了若干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请参阅比如说伍兹，1988）。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其他

的隧洞历史理论。阿明（1976，1988）和其他人，包括本文作者（布娄特，1989，1993；布娄特等，1992），又批判了那些人。

欧洲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些关于文明的除了经济、生产方式等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理论。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必须议论一下这两个理论：关于欧洲人在历史上的独特理性的思想；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论。第一个理论可以很快地抛弃，因为与其说它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不如说它是保守史学的特点。在主流的历史思想界里，人们相当重视维贝尔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全部历史里，或者在历史中多数的时期里，欧洲人拥有独特的理性主义，使他们在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之下，具备更大的发明能力、革新能力和进步能力（请参看琼斯，1981；曼，1986；兰德斯，1998）。马克思那儿没有这个观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很少有人支持该观点。布雷讷尔提出其一个形式，并争辩说，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诞生产生了某种精神，该精神带来了迅速和持续不断的技术过程（请参看阿斯顿和菲尔品等，1985；沃伦，1980；请参看布娄特1994年写的批判）。布雷讷尔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在技术上不断前进的观点推演了他的这个观点（但是，马克思考虑的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不是中世纪晚期的农业经济）。在相信欧洲人在历史上获胜的原因在于他们比非欧洲人更具有理性的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包括梅罗蒂（1977）和斯密（1992）。

六、民族问题

由于相当明显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非常注意解释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民族问题（布娄特，1987）。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主流思想家们之间存在一种共识，即他们都认为第一批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英国和法国，而它们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在

17世纪和18世纪里的政治胜利有某种关系。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考虑应该如何理解旨在建立新民族国家的斗争的问题，还考虑应该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和怎么样参与该斗争的问题。其结果是提出了若干关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些与保守理论很相似，有些很不一样。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些理论把民族运动视为基本上独立的发明，虽然它们一般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的或通过暴力的）扩散有关系；另一些理论把民族主义本身视为一个欧洲的现象，它从其在西北欧洲的诞生地向外扩散了。主要是涉及欧洲民族问题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广义上说，是非扩散主义的，或者是认为民族运动是各国独立发明的（请参看恩格斯，1974）。马克思和恩格斯争辩说，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说服了本地资产阶级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进行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有道理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接受了德国或黑格尔的学说的一点内容，认为种族集团天然地倾向于拥有自己的国家（同样地，这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有道理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没有道理的）。在民族问题上，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非扩散主义理论是由列宁在1914~1923年的时期里提出来的。^①他争辩说，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内部（像在俄罗斯那样）和在殖民地里压迫种族社团，因为这样做是积累的绝对要求。不仅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上升而对这种压迫进行斗争，而且工人和农民甚至在承受更大的压迫，还承受超级压迫（即他们承受的剥削比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承受的要沉重得多）。因此，民族运动是相当自然地兴起的，而且它们是由多个阶级组成的（它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殖民地的情况下，它们是进步的和——这是偏离了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渴望获得它们的斗

^① 请参看列宁（1915a、1916a、1916b、1916c、1916d、1921b）。

争的胜利的，从而击败殖民主义和创建新的国家。这种概括的理论是第一个关于中央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世界模式的归纳，它认为在这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离心的和向心的力量和互相来回进攻的斗争。这个世界模式是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性理论关于第三世界与欧洲的关系的基础。

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的完全是扩散主义的理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出发点是列宁早期的观点，是列宁在还没有分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动力时提出的观点。斯大林在1913年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对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基本冲击力在于它争辩说，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现象，民族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进步的，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成功地组成新的国家。那些笼统拒绝民族主义或反对某个特定的民族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始终利用了这个观点（布娄特，1987）。斯大林的理论从这样的公理出发，即民族运动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一个方面。只有当某个特定地区里的资本主义在开始兴起时，它们才是进步的；在其他一切情况下，它们都不是进步的，而是轻浮或反动的。斯大林说，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兴起了；因此，民族运动再也不进步，虽然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权利必须得到承认（这里他提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是纯粹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它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从西欧出来的、扩散到世界各地的一个浪潮，而民族主义只不过是那种扩散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这种基本的理论由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加工成为了两个相差很大的理论。一个思想体系大体上与占主导地位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一致（斯奈德，1957；克杜里，1970；黑耶斯，1960；安德森，1983）。按照这种观点，民族主义是欧洲的一个思想，其本质是关于自由的思想，随着欧洲的影响的扩散，这个

思想也扩散到了全世界。（殖民主义当然是自由的对立面，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向殖民地人民灌输了关于自由的思想。因此，在殖民地里，解放运动被认为不是因为剥削和压迫产生的，而更多地是欧洲一个有吸引力的思想对扩散的到来的反映。）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乐意把造成社会变革产生的首要原因归咎于一种思想，即纯粹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请参看鲍威尔，1907；戴维斯，1978；德布雷，1977；埃伦莱克，1983；纳恩，1977；布娄特在1987年发表了批判文章）。与此相反，第二个理论是以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为基础的，但它确认（和斯大林一样）民族主义直接反映资本主义的扩散，即它是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例如，霍布斯鲍姆（1962，第174页）争辩说，在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之外实际上没有有意义的民族主义，因为在那些地区里资本主义还没有真正开始上升。后来，资本主义的扩散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导致了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出现。霍布斯鲍姆说，今天，民族主义到处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只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它曾经是有合理性的过程，它现在是这个过程的非理性的和一般是愚蠢的残余（霍布斯鲍姆，1977b）。另一个维护这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奈格尔·哈里斯（1986），他说，事实上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兴起，其成果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因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没有理由存在了；的确，现在再也不存在一个第三世界了。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有很多人拥护“一切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七、殖 民 主 义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有历史上的连贯性，从一个关于欧洲在过去的社会进化中的地位的象征理论，到另一个关于欧

洲在今天的作用的抽象理论——和不那么抽象的政治。我们不妨回忆布雷讷尔的一个观点，即因为资本主义是从欧洲内部的现象诞生的，具有“在历史上发展的阶级结构的”欧洲（布雷讷尔，1977，第91页），仍然是大家正在关注的焦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通过核心地区里的创新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积累的自我扩张过程”（布雷讷尔，1977，第29页）；那些今天断言第三世界即边缘地带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们——他称之为“第三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布雷讷尔，1977，第92页）——都在主张空洞的民粹主义：真正的动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包括日本）里。葛德列（1969，第58页）沿着基本上相同的线条辩论：西方表现了“最纯粹的阶级斗争形式”并“单独地创造了超越阶级组织的条件”。布鲁维尔（1980）、哈里斯（1968、1986）、沃伦（1980）和许多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相同的观点。与此相对立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关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互动的观点，是由一批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来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阿明（1976）、奇尔科特（1984）、弗朗克（1984）、詹姆斯（1970）、赛伊德（1979）、华勒斯坦（1974）和沃尔夫（1982）。

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的各种变种很相似，该理论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欧洲中心扩散主义的现代形式。两者都争辩说，资本主义是在没有外界帮助情况下在欧洲兴起和发展的，今天的第三世界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从欧洲的向外扩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序曲：是手段，不是终点。两个集团里许多理论的共同的基本主张如下：

①过去的欧洲殖民主义对于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很大的意义。

②殖民主义没有使边缘地带欠发达（但16世纪在美洲发生的大屠杀暂且不论）；它以各种方式使它们改变，这有时是很痛

苦的，但一般来说，这导致了它们（通过殖民主义的“监护”）走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③在政治的意义上，非殖民化是一项积极的变化，但在欧洲核心地区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是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资本主义过程的持续扩散。这些资本主义过程包括现代思想及制度和现代技术，还包括在核心和边缘之间的比殖民地时代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

④这些过程综合起来被称为全球化，它使现代资本主义扩散到边缘地带，从而将消灭两个部分之间的经济差异（对于奈格尔·哈里斯，这是反映“第三世界的终结”的信号）。

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其他的历史学家，对认为殖民主义过去对欧洲的发展不重要的信念，提出了责问。卡勒亚诺和其他人争辩说，欧洲人在16世纪获得了美国金条，与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卡勒亚诺，1972；阿明，1992；弗朗克，1992和1998）和资本在欧洲的集中（布娄特，1993），都很有关系。一批历史学家争辩说，殖民主义的过程帮助了工业革命的启动和持续。C. L. R. 詹姆斯（1938，1970）争辩说，在18世纪，在大西洋经济和早期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方面，圣多明戈的奴隶和欧洲的雇佣工人一样重要。埃里克·威廉斯争辩说，奴隶制度、奴隶种植园以及奴隶贸易，都动员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威廉斯，1944；也请参看索罗和恩格尔曼，1987）。一批历史学家把反映在殖民主义时代里技术从亚洲到欧洲的扩散整理成资料了（请特别阅读李约瑟，1954到1984）。弗朗克（1998）争辩说，如果不是因为若干经济因素的干扰，某种工业革命本来是会集中在现代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争辩说，殖民主义支持着资本主义，如果没有他称之为超额利润和超级剥削的现象——它们是改善欧洲工人生活的因素之一——在欧洲就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殖民主义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某种关系这个事实，但他们把它的意义贬低到最低的程度。我们看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用欧洲内部早先存在的事实和力量来解释欧洲的最初的兴起，而这个观点延伸到殖民主义时期。例如，霍布斯鲍姆在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书里，对外部因素的意义作出了很低的评估。他写道：

工业革命不能首先，或在任何程度上，以外部因素加以解释。……在16世纪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如果在世界某个地方发生工业革命，这将是在欧洲经济内部某个地方（霍布斯鲍姆，1968，第35~36页；也请参看霍布斯鲍姆，1962，1975；沃伦，1980）。

在殖民主义是否使殖民地欠发达的问题上，即在是否把殖民地从发展的道路赶出去了的问题上，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争辩说殖民主义的确带来的是倒退，而非殖民化是进步的。但是，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从相反的立场进行争辩。他们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观点，该观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腐蚀殖民地社会里的当地社会和经济结构，它尽管如此使它们摆脱古代的枷锁，从而使它们为了社会主义做准备。一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雷讷尔，上面援引了他的观点）坚持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技术潜力已经耗尽了的地方和时间，才能有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因为欧洲是最发达的地区，欧洲必然是现在和未来社会进化的中心。鉴于这样的关于殖民化过程的观点，一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沃伦，1980；霍布斯鲍姆，1977，1990）问道：综合起来看，对殖民地人们来说，殖民主义是否那么坏？在更早的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曾经赞扬过殖民主义（请参看伯恩斯坦，1909）。一句话：殖民主义

是当代最具灾难性的过程，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倾向于支持殖民主义，要么对它有复杂的感情。多数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几乎所有的非欧洲学者坚持相反的观点。广义地说，在殖民主义之前，非洲和亚洲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多数地区不是落后或者传统的。公元在1500年，即在殖民主义的前夜，某些非欧洲地区和欧洲一样发达（布娄特，1993；弗朗克，1998）。殖民主义扼杀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它没有把发展作为殖民主义者的礼物送来。

八、帝国主义

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今天的世界上，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几乎消失了。^①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把他们的欧洲中心扩散主义世界模式扩展到了今天。我们不能把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成纯粹的扩散主义学派和完全的非扩散主义的学派。因为要压缩篇幅，我将对照一下两个纯粹的或极化的理论：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论。

全球化理论倾向于把殖民主义时期和此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描绘为基本上或者部分地处于资本主义前阶段的国家。在近期，资本主义已经扩散到了这些地区，它变成了全球性的，由此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有好处的变化。工业革命正在向外扩散到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变成工业化国家，从而正在现代化。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对某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鸿沟在缩小，没有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重要差别的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沃伦，1980；哈里斯，1986；威洛拜，1995）。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很接近主流学者的观点，虽然它的根子在早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有相当多的

① 当然还有少量的典型殖民地，最重要的是波多黎各。

证据否定这个观点。只是在很少的地区出现真正的工业化。这些地区都是在早先的时候已经拥有规模可观的重工业的地区。巴西、印度、墨西哥是突出的例子。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墨西哥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从数量来看，巴西和印度有很多工业，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与它们的（巨大）规模相比，它们的工业化程度未必超过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其他的地区里，我们看到一种在国内经济中确实处于边缘的工业：核心地区的企业的分厂；主要为核心地区消费者生产产品的装配厂，它们一般都只使用核心地区的原料；等等。这不是综合性的工业化，不是工业革命的扩散。所说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是幻想。医学上的进步的确扩散了，人们的寿命更长了。但是，我们可以怀疑第三世界的实际收入是否增加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存在很多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那样的增长，都掩盖着一个分化过程，即富人在变得更富有，穷人在变得更贫穷。

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很不一样的世界动力。列宁（和卢森堡及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公设：资本主义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现在是第三世界——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和寄生性的。它不导致发展：列宁认为，它导致贫困化和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观点

① 很有趣的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列宁的理论的。他们本质上假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扩散。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们援引列宁的早期著作，在那些著作里，列宁的确坚持了他后来抛弃的扩散主义观点。他们也强调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a），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册子因为要回避检查，回避了讨论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对列宁来说，这些方面正是帝国主义的关键问题——而主要讨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经济学。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到了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歪曲的看法，使它显得基本上重申了希法亭和考茨基的经济分析，而不是一个关于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带的关系的一个完全崭新的理论。我在“评价资本主义”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布娄特，1997）。

是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思想的基础：在政治思想的历史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然而，应该提出来的问题是，列宁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是否仍然存在，它是否仍然主导第三世界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第三世界激进学者争辩说，今天和过去一样，欧洲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要么是腐蚀或消极，要么顶多是造成发展和欠发展的相混合的原因，这种混合在某些地区是积极的，在另一些地区是消极的。这些学者争辩说，资本主义在很早以前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从质量上来看，它对多数以前是殖民地的国家的影响，仍然和非殖民化以前一样，虽然存在一些突出的例外（例如某些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国家）。他们争辩说，全球化是新殖民主义，和过去一样，它的影响将是导致贫困化和反抗。有一些证据有利于说明这两个理论正确。然而，（在我）看来，大部分证据有利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而且，全球化理论如此牢固地依赖于欧洲中心扩散主义，以致仅仅就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怀疑它。

许多学者和活动家都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在本文里试图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可以加以确认、分析和消除。如果去掉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个理论将更加强大和更加有用。

第七章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和 帝国主义：新前景

罗纳尔多·蒙克

在 70 年代，拉丁美洲关于依附问题，干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甚至使该讨论偏离了方向。在整个后殖民主义时期里，这可能是第三世界的一项讨论对西方一个范例的最重要的一次干预。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依附论在 80 年代陷入了僵局。人们认为，有一个看法是没有争论的了，这个看法是，不管全球化被视为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是新的妖魔化，但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辩论，的确已经被美好的全球化的新世态所取代。本文试图弄清这些过程，并对在当今的新时代里，依附论和帝国主义论（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可以有什么意义，进行重新思考。我相信，这种努力既不能是随便（重新）确认过时的保守概念，又不能是不经过思索的拥护最新的认识。我更多地认为，这种努力在于坚持依附论方法的某种精神，这非常像雅克·德里达认为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德里达，1994）写作的那样。

一、小 引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在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体系——的第一个理论思考浪潮，是在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里发生的。总的来看，帝国主义意味着欧洲对非洲和亚洲的侵略性扩张，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以及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争夺的兴起。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然而，虽然他认为，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全球性的冲突，但从总体来看，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发展生产力。罗莎·卢森堡虽然更明确地考虑资本主义对非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但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扩张主义的。与列宁相反，卢森堡不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她也不认为，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发展有联系。她认为，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扩张运动的一个部分，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这样，列宁最终接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和合法性，而卢森堡始终认为民族主义的反应是不合适的。他们两人就当时被认为是欠发达世界的地区没有能够说出多少看法来。

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探讨的第二个发展浪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的。这些理论从对列宁的理论的某种解释——它们坚决反对卢森堡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开始集中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在作为第三世界开始兴起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辩论涉及的范围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的准确性质、摄取剩余产品的方式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这些理论都认为，在世界经济的发达的一极或中心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日益扩大。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团结的话语，自然而然地从这种

分析中产生。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 70 年代的兴起，这种讨论开始丧失其在分析方面的吸引力。阿尔及利亚、越南以及甚至古巴民族解放的最终结果意味着，在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泛人群中，这样的词汇和政治方针也开始丧失其吸引力。关于民主的问题开始凸现了。

60 年代，在拉美出现了研究民族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依附论方法。它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作出了反应。看来，列宁、卢森堡以及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仅仅在帝国主义对他们自己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的影响方面，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现象感兴趣。现在却应当集中关注被西方国家征服、剥削和变成了殖民地的国家。这是自下而上的观点，是后殖民主义的行动，甚至是一个排外主义的反应。它拒绝了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欠发达——并在等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使它们现代化——的观点，而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这些国家是发展不足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积极造成的。在非西方国家（70 年代是南方国家）里的发展不足，只不过是西方发展带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古巴革命对关于依附论问题的讨论产生了强大的激进化影响，因为，看来它怀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持续的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实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依附论却坚决认为，资本主义使发展停滞不前（虽然某些作者当然承认了实现独立的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的扩散不带来发展，而更多地导致农业地区的停滞不前和资本外流。民族工业资本家不是《共产党宣言》里谈到的充满生命力的取胜的资产阶级，而顶多是帝国主义弱小的伙伴，而且从属于农业利益。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不导致发展，而只能加深发展不足的情况。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资

本，更重要的是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决裂，这是实现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战后通过美国霸权主义领导下的帝国主义发展而实现的与西方的国际一体化，被视为导致第三世界的民族分裂的加剧的原因。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式发展，在本质上是畸形的发展，其形式不正常的增长使走向改良主义的或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有机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选择，不是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而是在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两个明显的方案之间。简单地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成功，法西斯主义的漫长黑夜将降落在大陆上。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多数激进的分析认为，要作出的选择是在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例如，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模式等）之间的选择。

二、剖析依附论

目前有很多关于依附论方法的兴衰和可能的复兴的可靠的论述（请特别参看凯，1989），以致我们在这里可以集中探讨某些突出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依附论作为一种讨论来对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要研究各种不同的环境是如何接受它的。由于该概念被认为是含糊的，美国的一批作者试图使它具有操作性，基本上是使它量化。依附论的若干标准被分离出来了，然后把它放在跨文化框架上，用全部的量化方法进行测量。这些学者以为，其结果将表明依附的程度，它被简单地理解为从依附状况，经过相互依存走到独立状况的连续的直线。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1977）早就拒绝了美国学者这种对依附论方法的非历史的、形式主义的理解。在拉美，问题从来不在于对依附程度的测量。依附论的方法主要被认为是，从历史—结构角度，来批判性地集中研究由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国家里的阶级冲

突和阶级联盟的特定本质。当然，在那个问题里，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一整套的政治立场。在文化界对依附论的接受方面，另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是，讲英语的国家对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非常重视。这样说不是想贬低弗朗克作为反对一切传统而被人们讨厌的、尽善尽美地进行综合以及不惧怕应对新问题的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然而，他的作用导致了依附论的观点在拉丁美洲以外地区被歪曲了。对依附论的许多批评，事实上是对昆德尔·弗朗克的批评，它们完全不能适用于像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那样的拉丁美洲作者（请参阅帕尔马，1978）。对这个过程进行的后殖民主义分析，应该把这视为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带的又一次（错误）理解。弗朗克现象的另一个效果是，关于依附性的辩论被过分地个人化了。有时候，昆德尔·弗朗克是否正确，或者他是否改变了想法，似乎比相关的问题更加重要。这种个人化甚至影响了拉丁美洲，使人们毫无意义地去辩论谁是依附论的真正创始人（请参看多斯桑托斯，1996，1998）。这些都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当然，因为将军们、游击队员们、民族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们，都使用了依附论，它就没有统一的政治归属。它是一个不固定的、可变的观念，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它。在不同的背景下，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以意味着相当不同的东西。然而，只要我们想到民主、社会主义或女权主义是如何也有很不一样的含义和解释时，这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必然要成为一个问题。我想像中的分类，应该将对依附论的改良主义的、激进的、方法论的理解加以区分。改良主义的态度最好的例子是像泽尔索·弗尔塔多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那样的经济学家。在60年代中期，他们意识到了拉美经济委员会有局限性，因为它依赖于外资的输入。像特约多尼约·多斯桑托斯和鲁伊·莫罗·马里尼那样的激进依附论作者不仅寻求揭示依附性资本主义

(实际上被视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规律,而且也提出,人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在野蛮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卡普托和批萨罗提出:“我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发展我们的国家”(卡普托和批萨罗,1974,第51页)。这就是人们在当时的情绪(蒙克等,1984)。

依附论的第三个变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该变种寻求发展一种方法,以理解各种局面。它既反对那些想测定依附程度的经验主义者,又反对那些想建造适用于一切局面的关于依附性发展的综合理论的人们。这个变种的方法是历史的和辩证的,承认其研究对象仅仅是边缘地带里的资本积累的特定路线和阶级斗争。卡多索(和法列托)说:“历史—结构的分析说明着基本的趋势,资本的扩散是通过这些趋势进行的,也在其中找到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过程的极限”(卡多索和法列托,1979)。卡多索在依附论方法的系谱学作用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这就是,他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发挥作用,然后一直保持发挥作用。我们不仅有他试图对全球化时代里的依附性加以重新解释的最近著作(卡多索,1993年),而且还有他当今作为巴西总统的角色所写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始终一贯的,它们都说明他相信,在依附的社会里,存在着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足够大的空间。连反对卡多索的计划的人们——他们认为该计划是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也承认这种始终一贯性(请参看卡马克,1997)。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剖析依附论(作为覆盖和综合其特定组成部分的广泛示例),某些方面将变得很清楚。在剖析时,我们寻求揭示讨论中的矛盾和假设。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不同,它不是从另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讨论或优势地位的角度出发来做到这一点的。依附论被说成犯了很多的罪过,这方面的连祷文很长。比如说凯(1989,第175页)列出了经济主义、乌托邦主

义、理想主义、结构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折衷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全球主义、决定论等罪过。在某个时间，某些变种可能具备了这些特点中的某些特点，但是，这种笼统的批判总有一天必定打中其目标。也许下面的说法是正确的，这说法是，实证主义的假设—推理方法（欧布赖恩，1975，第11页）会包括可测量的事实以验证其严格的假说，因此，按照这个假说，依附论是不合格的。依附论也不能取代看来从来没有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理论。然而，无论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满的辩护者来说，还是对那些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来说，依附论仍然是一个挑战。前者相信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世界中，而后者曾经爱恋第三世界主义，但后来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更时髦的理论或政治追求。

依附论的方法从总的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卡斯塔涅达和赫特，1981），可能仍然是安全的。这并不是说它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方面，而是说，那些方面大部分被视为各种经济过程的衍生物。就马克思主义关于最终的决定的正统（但有争论的）概念之所以当时仍然存在而言，这并不是依附论的独特特点。这种经济主义与某种机械的分析相联系，这种分析具有机能主义的特点，机能主义认为，一切事情是由无情的规律决定的。在多数的依附论分析中，政治代理的问题并没有突出地提出来，而如果它在政治实践中被提出来了，它往往是以极端的唯意志论为特点的。最后，我们可以在不担心有矛盾的情况下说，多数依附论变种，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形式。有时候，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外国的（罪恶的跨国公司），而民族的发展应该有更多的内在民主。也就是说，考虑到了它是在殖民主义之后的局势下兴起的，而且当时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这并不令人吃惊。重新确立如果不是敌视也是忽视民族问题的大都市马克思主义（沃伦，1980），很难说是适当的反应。

依附论在另外一个领域也是相当弱的，这个领域里研究的是提供发展的另一种可行选择的问题。消除依附性状况往往被解释为脱钩，即与世界经济的脱钩，并执行某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政策，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柬埔寨式的灾难。当然，从对更多的自力更生的探讨和对另一种发展的探索的角度来看，有更详细的关于消除依附性的工作（请参看穆诺斯主编的书，1981）。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依附论方法是更近的时期里关于发展的替代模式的工作的先驱，该项工作则后来作为后发展而被人们所知（拉赫讷马和鲍特里主编的书，1997）。在回顾70年代的辩论和整个讨论领域时，可能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社会主义（其定义并没有确定得很清楚，但古巴显然是所指的对象）被简单地认为是对依附性问题的答案。社会主义被认定是对拉丁美洲的民族发展战略的失败的容易成功的、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这样，社会主义不仅简直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需求，而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战略，而且，受到这种精神鼓舞的人们（他们当中当然不包括卡多索），看来都忘记了，各国也有富有活力的——尽管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式发展。

当它们从特定的立场后退时，各种依附论方法都倾向于以典型的现代主义方式，采纳注重研究总体的研究方法。全息主义的总体性视角把事物的总体状况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由事物的总体决定的。正如萨罗蒙·卡曼诺费茨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没有划分层次的分析，倾向于否定或忽略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运动，从而模糊了这些部分与总体之间的多种关系（卡尔马诺维奇，1983，第16页）。自80年代以来，在批判性的探索中发生了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这使我们对既然注重总体（社会、帝国主义等）又自以为公正地拒绝一切其他视角的总体视角，更加感到警惕。看来现在大家更清楚地明白了，没有一个理论视角能够（或者甚至应该）解释一整个社会里的社会

关系和政治实践的一切形式。目前人们更多地会认为，依附论这种注重总体的野心，是傲慢的，是迷失方向的，以及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没有包括或甚至没有看到很多东西是封闭的。在其许多变种（包括卡多索的变种）的核心内容中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这种野心。强调总体的视角的这种有机统一，未必被为多样性和分裂成碎片的状况而举行的庆贺仪式所取代，以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假如我们把雅克·德里达关于词句中心主义的概念运用于发展理论，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连最激进的批判是如何很容易地滑到了正是它们要批判的东西的形式、逻辑和内在假定的”（曼佐，1991，第81页）。词句中心主义思想是通过参考外部的、其真理性普遍有效的假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而它的基础是自我组成的、自我参考的、最终是循环的逻辑。依附论看来肯定符合这样的描述，这正是它从来没有真正从发展的示例中突破出来的原因。总的来看，依附论所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即它简单地把主流发展理论在操作中所运用的二元对立面颠倒过来。当某个人说必须加强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时，另外的一个人说必须脱钩。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本身很像是作为二元的对立面运作的，它们共同占据同样的讨论领域，双方互相不可分割地与对方的观点相联系。总之，作为理性的西方进步模式，这两个理论视角共同拥有同样的发展愿望，共同占据作为合适的手段的国家领域和国家干预。这可能是发展理论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这种僵局同样地是启蒙模式和现代化计划的僵局。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发展理论在80年代陷入了僵局（请参看布斯，1985，以及蒙克对此的一个批判，1999）。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由原来批判主流发展模式的、而现在想回到原来的行列中去的人们自己造成的僵局。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人们广泛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之中，这导致了人们放弃建

造发展理论的替代理论的计划。然而，同时人们在争取实现依附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的努力方面真正失败了（请参看奇尔科特主编的书，1981）。依附论方法的支持者和从更传统生产方式入手的研究方法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没有结论。依附论继续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存在下去（请参看拉雷恩，1989），但马克思主义在90年代的几乎完全的崩溃对它的冲击很大。最后，如果脱离了依附论在其中产生的背景研究它，我们就不能理解依附论方法。我们最后还要指出，除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外，它与拉丁美洲的资本积累的一个特定阶段有联系，在该阶段里，老的民族资本家正在进入一个危机时期，而许多社会集团（包括像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那样的开明机构）都在致力于重新确定方向。当然，最终是新自由主义发挥了超越这个僵局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同时从右翼的、改良主义的和革命的立场出发克服了僵局，但事实上它伪善地给自己披上了后者的外衣。

三、全球化还是新帝国主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已经消失了，但我们可以争辩说，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的最近的变种。鲍勃·萨特克里弗就此说：

在这个论述中，全球化被简单地视为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权力的加强，其手段是跨国公司的渗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的债务上的依赖性以及通过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萨特克里弗，1999，第147页）。

因此，正像马克思所发现的一样，全球化被解释为在资本渗透到

世界经济每个角落，导致的登峰造极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把世界经济当今的阶段与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发生的国际化相比较。保尔·赫尔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1996年）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修正主义的例子。他们致力于让人们对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关于全球化没有替代方案的思想带来瘫痪性政治效果看得更相对一些。然而，他们所做的关于国际化的量化分析，带来了最近20年内发生的真正质变的危险观念。19世纪的殖民帝国的全球规模，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具有“稠密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关系网络，它们都超越任何单一国家的控制”（黑尔德，1995，第20页）。有点简化论和经济主义色彩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为它们告诉了反对全球性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平常的商业可以满足战略上的需要。或许全球化不仅仅是老一套东西，它或许还有其他的内容。

的确，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关于作为完全崭新的一个东西的全球化的文献，它已经在学术市场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角落。现在，全球化概念的膨胀（和相应的贬值）可以和依附论概念相比拟。全球化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不管这是从一个灵丹妙药的立场还是从妖魔化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理解——而且它的指导原则正在作为我们正在跨进的时代的新常识而被人们接受。全球化被视为显而易见的和不可抗拒的事情，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然而，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和易变的术语，它掩饰的东西可能比它揭示的东西还多。全球化是典型的总体化思想，就其已经明确了的目标而言，它包含着深刻的目的论。一个富有批判性的小组很有说服力地争辩说，它是有缺陷的，其原因在于其技术决定论（信息技术不能创造新的社会）、实在论（它把复杂的由社会造成的事件简化为一个问题，比如说简化为后福特主义）、工具主义（它把全球化的特征和全球趋势的现实结合起来）以及它返回到了已经没有人相信的过时的趋同思想（阿穆尔

等，1997，第183-184页)。看来，在我们对周围世界进行分析时，将时代和认识论结合起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很差的向导。

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变成全球化的宣传员或者对它进行妖魔化。如果那样的立场存在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二元的立场。如果关于全球化的新文献保持谨慎和有合适的条件，它们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当今的阶段。阿斯·阿明是以“像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更加杂混和互相贯穿的全球性的、遥远的和当地的逻辑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混合的关系”解释全球化概念的(A. 阿明，1997，第133页)。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将能够克服全球化世界观的内在简单化做法之一，这个做法是把全球的情况理解为有活力和在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各地的情况与此相对立，它们是固定的、静止的地点。阿明的做法向我们指出了方向，即对在全球化时代里出现的旧的和新的社会问题，要采用杂混的、开放的、灵活的和多极化的解决办法。发展这样的理论也是值得的，即虽然全球化发挥削弱各国力量的作用，但它也可以创造条件，以扩大民主化和多元化，并加强反对它的力量。如果说带有传统伪装的帝国主义呼唤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只是刚刚开始看到可能反对全球化的无数形式中的某些形式。

我们或许应该从这样的真理出发，即与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浪潮发生时相比，今天的世界更加复杂。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最近完成了篇幅达3卷的并称之为“信息社会”的研究报告(卡斯特尔斯，1996、1997、1998)。该作品的雄心壮志肯定和马克思的3卷《资本论》一样远大，但是，前者的影响能否像在其封底上写的评论硬说的那么大，这仍然有待观察。它确实证明的事情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唯物主义的(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具有持久的力量，我们不必躲避在声称“凡是固体的东西，都将融化成空气”的格言背后。尽管我们不

必同意卡斯特尔斯提供的全部分析（其中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可以提出争议，特别是从我的观点看，他否定了工会运动，请参看蒙克即将发表的著作），我们可以接受他的一个观点，并把它当做我们分析的出发点。这个观点是，在本世纪末，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卡斯特尔斯，1998，第336页）。他把这个新的伟大转变追溯到3个互相有联系的过程，它们是信息技术革命、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人权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的网络社会的基础是随着这些过程而进行的重构，在这样的社会里，空间是流动的，时间是无止境的，前途是未确定的。就这些新的伟大转变是如何影响拉丁美洲的问题而言，已经有引人注目的研究报告（请参看科申奈卫茨和史密斯主编的书，1997），这些报告看来更新了依附论的批判内容，但同时是更灵活的，而且必然论的特点也削弱了。

世界不仅更加复杂，而且对生活所谓的第四世界的西方黄金圈之外的人们更加粗暴，卡多索（1993）很有说服力地把这称为新的依附性。新的全球主义精神根本没有开创民主的发展。把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发现，直到70年代晚期，在收入上与西方的差别保持了相当稳定，为西方水平的36%，但到了1995年，该百分比已经降到了25%。在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方面，只有智利能够与亚洲的“老虎”（现在不那么健康）相媲美。当然，有一些国家简直完全不能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按照卡多索的说法，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比他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描写的联合—依附性发展更残酷得多的现象：“南方（或者其一个部分）要么加人民主—技术—科学的竞赛，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并经历‘信息经济’的蜕变，要么变成不重要，没有人开发和剥削，以及不能被开发和剥削的地方”（卡多索，1993，第156页）。依附性时代的民族主义反应再也不是可行的反应。如果有一个比被开发和剥削更加糟糕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完全不被开发和剥削。

最后，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个新理论绝对必须包含的内容，是对文化方面的更好的理解。当今关于发展的辩论看来是围绕文化问题开展最深刻的批判。因为，无论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只能被理解为没有反省的简单过程。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就与雷蒙德·威廉斯关于它的定义有联系，按照那个定义，文化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制度，……一个社会秩序必须通过它进行联络、被复制、被感受和被开发”（威廉斯，1981，第13页）。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是社会的某一个层次，不是与比如说经济或政治相割裂的，但涉及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塑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方式，以及我们确定自身周围世界的内容的方式。目前已经有重要的和成熟的著作，它们将文化纳入了关于帝国主义的阐述中（赛伊德，1994），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人对文化和全球化感兴趣（汤林森，1997）。与从政治经济视角发表的较为消极的评论相比，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后果被视为更加复杂。看来，与旧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所坚信的那样相反，我们目睹的事情，并不是世界的简单的单向式西化。通过以后殖民主义视角看问题的方法，欧洲被地方化了，而伊斯兰主义正在披上旧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外衣。文化研究，其中特别是新的文化政治，正在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批判性的视角，使我们认识为什么现实是由社会建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得到恢复的特定领域之一是它与其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了，新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没有理性特点，都和一个世纪以前完全一样（参看弗列迪，1994）。

四、后依附性？

昆德尔·弗朗克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依附性死了，

依附性和阶级斗争万岁》(弗朗克, 1977)。的确, 我们可以说,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 依附性还完美地存在着。在最近的大约 10 年里, 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基础是来自华盛顿的共识。它的一条教义说, 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将实现趋同(请参看爱德华兹, 1995)。然而, 1997 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很坦诚地说: “一般地说, 在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 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 没有发生趋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第 72 页)。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 事实上, 在国际经济体系内部, 第三世界国家的“向上运动大大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第 77 页), 而且, 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两极分化。因此, 在 1965 年, 在有数据可查的 102 个非产油第三世界国家中, 有 52 个国家集团收入最低, 但在 1995 年, 这个数据已经上升到了 84 个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收入上的趋同, 是令人吃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第 78 页), 然而这完全符合依附论的基本原则。

拉丁美洲的经济结构主义和依附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交换比例。联合国开发署 1997 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在这个方面发现, 自 70 年代初以来, 累积起来, 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出口交换比例下降了 45%。仅仅在 1980~1990 年之间, 正当全球化开始上轨道时, 商品的价格下降了 45%。被一些人大肆吹嘘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 也不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 在 1970~1990 年之间, 在制造业产品方面, 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出口交换比例下降了 35%。依附论的方法也始终集中研究在第三世界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和在内部的收入的两极分化。现在, 联合国发展与贸易委员会 (UNCTAD) 1997 年发表的关于全球化、分配和增长的报告确认了, 在拉丁美洲, 各国平均的人均收入, 从 70 年代晚期相当于北方水平的

三分之一，下降到了今天的四分之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1997，第1页）。在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和跟随在其后的经济增长减速，并不是导致拉丁美洲收入分配恶化的惟一原因，因为，在比如说阿根廷那样的某些国家也存在这种局面，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后来恢复了，而且甚至实现了经济奇迹。

虽然依附论研究的紧迫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甚至的确恶化了，但我要争辩说，我们不需要转到采用后依附论的方法。其部分原因在于它始终具有的、不能简单地修补的内在矛盾，尽管保尔·詹姆斯的确试图按照这样的脉络去发展一个后依附论的方法（詹姆斯，1997）。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需要走得比修改旧范例更远。现在不仅世界因为全球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且，后结构主义使用于认识世界的批判性方法被革命化了。我要争辩说，在与普遍的现代性和特定的发展的关系方面，我们现在明显地处于一个过渡的时代。博阿芬图拉·德·苏萨·桑托斯勇敢地（我认为正确地）断定：“现代性的范例已经耗尽了其实现革新的所有可能性”（苏萨·桑托斯，1995，第ix页）。对主导范例的基金批判——这对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同样有效——必然将是以后现代主义为出发点的，但是，它未必接受以后现代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过分的事情。相对于非常喜欢北方关于网络社会的观点的、自鸣得意的保守后现代主义，我们可以巧妙地提出与其相对立的一种激进的、竞争的和解放思想的后现代主义。

对现代主义社会理论进行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基本特点是，它瓦解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伪装。从一个第三世界视角来看，认为全世界可以根据真理、正义和理性的客观普遍性标准分析的想法，是特别肤浅的。当有人问哈贝尔马斯他关于推论的理性的普遍模式能否在第三世界有用和第三世界的斗争在西方是否能够有用时，他的回答是：“我很想说，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存在的。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局限性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我希望把这个问题

题继续转给别人”（哈贝马斯，1985，第104页）。我相信，这个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们也倾向于把该问题传下去，但后来是第三世界理论家们自己把它抓起来了。一个关键的后现代主义课题是赖奥塔尔德发表的观点。他说，这个运动（理论）在本质上意味着“对这些叙述的怀疑”（赖奥塔尔德，1984，第xxiv页）。没有比关于发展的理论（讨论或意识形态）更清楚的叙述。由此派生的观点是，启蒙运动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思想掩盖着处于它们下面的权力关系。要求被承认自己掌握真理等于是要求被承认自己应该掌握权力。任何人都没有合法的权力来代表别人说话。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个观点的主要后果是，“惟一的、优先的或者独一无二的对没有被人们思考过的事情进行范例式思考的方法，是不存在的”（霍伊，1996，第130页）。因此，对揭开发展的秘密的万能钥匙的寻找，以及发展问题专家的专业知识，都应该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

米歇尔·富科对关于第三世界问题的研究产生过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自己对这个课题的不关心。例如，阿尔图罗·埃斯科巴尔写了一篇富有想像力的富科主义文章，对关于发展的讨论进行了拆析。该文里跟随富科关于权力、知识和讨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本看法，其核心内容是

西方的建立纪律和标准的机制向第三世界的扩散……以及作为支配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而由西方国家生产的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埃斯科巴尔，1984~1985，第377页）。

从这样的视角来论述发展，所涉及的是使差别固定下来和确定什么是它的标准的问题，此外还要确定，什么偏差确实在创造了作为不同于西方发展的发展不足状况。理性的西方形式和覆盖在发展的论述（事业或实践）上的权力及知识，都试图使第三世界及

其人民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状况。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或许最振奋人心和影响最深远的互动，是在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发展之间的互动（请参看马尔桑德和帕尔帕尔特主编的书，1995）。西方的女权主义花了一些时间来努力理解关于差别和第三世界的不同状况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其中，詹德拉·莫汉迪坚决拒绝承认，与西方妇女的现代理想相对照，第三世界妇女的形像是，他们都很贫穷和没有权力（莫汉迪，1988）。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实在论的批判，代表了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真正的方法论上的突破。对实在论来说，一个群体的特征是先天性的，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在历史上和在不同的文化里，它们是不变的。与使用实在论的或普世主义的范畴的人相反，后现代主义和某些女权主义争辩说，像妇女（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父权制或第三世界）那样的范畴，必须根据历史和文化上的特定条件来理解。在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开始研究发展问题时，简·帕尔帕尔特提出，它集中研究的是“在知识、语言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以理解作为反抗和权力所在的地方的当地知识”（帕尔帕尔特，1996，第264页）。我们现在更容易得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发展过程中，有大量的、不稳定的以及发挥重构作用的因素参与。

显而易见的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上，旧的和新的社会运动，都是对发展没有能够解决穷人的需求的一种反应。这些社会运动所表达的，看来不仅是为了争取权力或资源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而也是一种文化方面的斗争，其目标是实现自身的本质特征。它们在发展的非神秘化方面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在拉丁美洲，多数国家被排斥在发展过程之外。正如索妮亚·阿尔瓦雷斯和阿尔图罗·埃斯科巴尔争辩的那样，该地区的社会运动“代表着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明确的希望，这个问题是，要为了以更能促进生活条件真正改进的办法来组织社

会，想像和实现不同的手段”（阿尔瓦雷斯和埃斯科巴尔，1992，第329页）。从这样的运动可能会形成以获得权力为基础的真正的替代性发展战略。在最近进行的关于拉丁美洲新社会运动的辩论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既不是文化主义的又不是政治简化论的文化政治。关心本质特性（例如内在的或性别的特性）的不仅仅有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文化内涵的社会运动，而也有旧的社会运动，比如说工会运动和城市运动。索尼亚·阿尔瓦雷斯和与她合作写书的作者们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对一切社会运动来说……集体的本质特性和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相联系”（阿尔瓦雷斯，达格尼诺和埃斯科巴尔，1998，第6页）。构建社会的含义的方式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一切社会斗争都是围绕感知和理解进行的。文化是政治性的，政治是文化性的。

拉丁美洲特定的后殖民主义形势向关于发展的正统理论提出了特别有活力和新意的挑战。从社会运动和独裁政权被消灭后的形势涌现出了新的乌托邦的后发展方案，它们使公民社会更普遍地恢复了元气。费尔南多·卡尔德隆广泛地综合了关于社会运动、民主和发展的文献，他指出，

有相当可观的证据说明社会逻辑在发生突出变化……进行政治活动的新形式，从事社会活动的新形式……将政治和社会、公共和私人相联系的新形式（卡尔德隆，1986，第300页）。

社会运动是发展的危机的症状，但是，它们也至少部分地导致了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中产生一种新的后发展情绪。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是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但是，看来，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复杂的现实中，它们的种子已经存在了。

作为一个结论，现代主义的局限性不能以二元的、与其相对

立的反现代主义来加以克服，可能是后现代主义才能提供充满可能性的新前景。这肯定不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幼稚的、年代学式的认识，那种认识相信，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或者认为，在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地区里，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已经实现了。拉丁美洲各国的社会肯定仍然受到现代发展的失败和前现代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折磨。然而，就在后现代主义观念出现之前，拉丁美洲的杂交文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在拉丁美洲，始终有人对西方/北方提出的理论和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复制。费尔南多·卡尔德隆和与他一道写书的作者们解释说，这种不同信仰的结合所指的是这样一些过程，即

把旧形式变成新形式的创造性的蜕变过程，把普遍性的理论和概念变成成为在当地能够被人们理解的形式翻译过程，以及为解释的具体形式提供历史框架的过程（卡尔德隆、比斯齐特里和雷纳，1992，第35页）。

这是我们为了想像一个后发展领域而需要去完成的人物。

五、结 束 语

和批判性的社会科学里的普遍情况一样，在当今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文化上的转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再也不重要了。它所呼吁的是要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多数激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是，它们都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看来，激进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资本主义模式是无比强大的，通观一切的、无限扩张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将是能够自我复制的。看来，它很难从这样的外壳里出来，然后在这里和今天思考出一个

替代方案来，并由此制定一个变革的战略。J. K. 吉布森－格雷厄姆（1996）已经开始对这些摇摇欲坠的结构进行富有想像力的拆析。他力图让人们怀疑作为经济和社会主题的资本主义，并帮助人们使当今的对全球化的迷恋非神秘化。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涣散的、多元主义的看法，是动摇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的潜在力量。它和说资本主义是纸老虎的老的毛主义口号（早就被人们忘掉了）不一样，但其本质特点和关系只是部分地确定的，它始终可以被瓦解。从杂交的立场出发，拉丁美洲所处的地位，很有利于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并进行向资本主义挑战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这里至少有一种潜力，可以在非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它可能有文化上的共鸣的一切地方里，创造一种经济上不一样的空间。

如果我们采用宽广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60年代关于依附论的辩论，是与对本质特性的寻找相联系的。辩论涉及拉丁美洲的本质区别的确定。在60年代，辩论是围绕社会的本质和如何改变它的问题进行的，而在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回到了对文化上的本质特性的寻找。这种重新思考是在启蒙运动事业看来正在自然发展的时代里进行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欧洲的理性主义陷入了危机，拉丁美洲对它所缺少的本质特性的探索重新启动了。这不是单纯的文化主义，或者从旨在建立一种替代性理性的项目中分散精力的活动。的确，文化因素在关于发展和依附的辩论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安尼巴尔·基哈诺这位在早期的关于依附论的辩论中的关键人物，现在集中研究“拉丁美洲……正在开始通过互利、互助、平等和民主方面的新的社会实践重建自己。这些实践是在国家和私人资本之外组织的和反对它们的机构里进行的。”（基哈诺，1995，第216页）。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化计划的替代方案，正在实践中被制定出来。在不是只能失败的、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计

划相对立的、简单的二元立场。其精神肯定是与关于依附性的辩论相一致的。

依附论只看到一个敌人：美国的帝国主义。在后现代时代里，在杂交的社会形态里，在全球化下，没有统一的敌人。因为由依附论描述的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不平等继续存在，甚至加深，不对称状况的性质现在更加复杂。卡尔西亚·坎克里尼争辩说，权力的新的文化重组意味着，我们需要分析“当我们从（关于社会政治关系的）批判性的和两极的观念转到分散了和由多种因素确定的观念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卡尔西亚·坎克里尼，1995，第323页）。如果错误地引用葛兰西的话，我们可以说，看来，我们在拉丁美洲政治中目睹到的情况是一种范例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旧东西还没有完全死去（它会死去吗？），而新东西刚刚开始形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全球化的地区性计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或靠信息活动的扎帕替斯塔斯（ZAPATISTAS）游击队这两个混乱的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世俗组织，可能不仅仅是结构上的不均匀性和杂交的结果。把这些具有像征意义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过渡性政治时期的标志，可能更有意义。我想跟着苏萨·桑托斯争辩说：“我们的过渡是一个范例的认识论上的过渡，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过渡，虽然这不那么容易看清或者还处于更加原始的阶段”（苏萨·桑托斯，1995，第445页）。

德里达（与时髦的做法相反）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精神汲取启示”（德里达，1994，第88页）。其原因在于他想忠于关于激进的批判的思想，而这是一个始终愿意开展自身的自我批评的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正当其他占主导地位的范例开始崩溃时，依附论的精神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以及拉丁美洲的这种批判理论传统能够更新其创造性（德拉佩纳，1994）。聪明的老人卡尔西亚·坎克里尼在他关于拉丁美洲的杂交文化的分

析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克服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文化的
方法之间的错误的对立。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里的最后一句话
说，我们需要找到在不成为原教旨主义的情况下成为激进的人
的道路（卡尔西亚·坎克里尼，1995，第 348 页）。我同意这个
说法。

第三部分

全球主义还是帝国主义？

第八章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全球主义^{*}

萨米尔·阿明

最近的 20 年里，在占主导地位的讨论中，人们把全球化这个术语用来笼统地说明当代社会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现象。该术语从来没有被人们与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逻辑或全球化展开的帝国主义规模相联系起来。这种缺乏准确性的做法，使我们懂得，我们正在面对无法回避的情况，即不管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全球化将平等地把自己强加给一切国家，不管它们的基本选择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因此，它将作为全球空间的缩小所产生的自然规律发挥作用。

我将说明，我们正在面对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它被用于使目前阶段里处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的战略合法化。我还将说明，作为其结果，全球化的同样的客观条件，并不是没有任何

* 本文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博士生卡斯塔尔迪翻译的译文，她目前正在完成关于塞内加尔的舞蹈形式及其社会意义的论文。

可能的替代方案，而是能够从不同于提供给我们的视角的政治视角来加以考虑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容和社会影响本身是会有差异的。因此，全球化的形式，如同任何其他东西那样，取决于阶级斗争。

此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毫无疑问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阿里齐，1994；拜罗赫，1994；布罗代尔，1979；弗朗克，1978b；森特斯，1985；华勒斯坦，1989）。从至少两千年前，丝绸之路就不仅促进了货物交流，也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及宗教信仰的交流，这——至少部分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即古代世界一切地区的进化。尽管如此，这些相互作用的机制和程度，很不同于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所变成的情况。全球化不能与构成其发展基础的制度的逻辑相分割开来。在资本主义前存在的、我在另一个地方确定为纳贡制度的那些社会制度，都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该逻辑就是，经济生活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秩序的再生产，这与资本主义正好相反，因为资本主义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在古代社会里，权力是财富的来源，而在资本主义下，财富组成权力——我在别的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确定在古代和现代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的这种对照的特点，意味着在机制及影响方面，古代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下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古代全球化向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赶上更发达地区的某些现实的机会（阿明，1996b）。根据特定的情况，这种可能性被实现或者没有被实现，但这仅仅取决于相关社会的内在决定因素，特别是它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对最发达地区代表的挑战的反应。关于这种成功的最突出的例子，可以在欧洲历史中找到。与纳贡制度的中心（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相比较，在其发展方面，欧洲是处于边缘的和发展较晚（直到中世纪）的地区。然而，欧洲是在很短的时间（在1200~1500年之间）内摆脱了

自己的落后的。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它把自己确立为一种新的中心，和在它之前存在的中心相比，它在潜力上更加强大，是促进更加有影响的演变的因素。我把这种优势归结于欧洲封建制度的更大的灵活性，而这正是由于于纳贡制度相比，它是处于边缘的一个形式。

相比之下，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现代的全球化，因为其本质就是促进两极分化的（阿明，1996b）。因此，我认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身，使其体系的成员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这种全球化不能提供赶上来的机会，因为那取决于体系成员的特定条件。相反，从发展较晚的状态赶上来，始终激活唯意志论政治，而它们又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单边性逻辑发生冲突。因此，这种政治不能被确认为旨在脱钩的反对体系的政治。脱钩这个术语，就像我提出来的那样，不是自给自足和旨在“从历史中退出来”的荒唐尝试的同义词。脱钩的意思是使自身与外界的关系，从属于自身的内在发展的主要需求。因此，这个概念与呼吁要适应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趋势的另一种概念相对立，因为，那样的单向调整必然的结局是体系最弱的成员日益边缘化。脱钩意味着要成为一个积极塑造全球化的因素，逼迫它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

对这个命题的证明，依赖于我打算进行的对两件事情的区分，一件是表达价值规律的、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典型特点的普遍机制，另一件是该规律的全球化形式。在资本主义内部，经济从其对政治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了，成为直接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决定着社会的再生产和演变。因此，我们争辩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正是在于要在全球范围开发经济，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置于经济需求的从属地位。现在，指导这些进程的全球化的价值规律，不能被简单化理解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相关的抽象层次上运作的价值规律。在这个层次上分析的价值规律，

假设各种市场在一切领域都实现一体化，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产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一体化的。另一方面，全球化了的价值规律是在市场的全球化之中表现的，但这些市场仅仅在两个领域运作：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被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分割成许多板块。这种对照，表达两个方面的结合，其中一个方面是现代世界和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而另一方面是不同的政治社会（不管它们是否独立的社会）的继续存在。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典型特点。这种对照本身带来了世界的两极分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成许多板块的情况，必然使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恶化。由其本质所决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的两极分化，采取了与资本主义先前的扩张阶段的基本特点有关系的的形式，这些特点表现为与全球化的价值规律相一致的形式。这些形式是由两个方面的结合产生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关于压缩的市场（其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割状况的继续存在）的规律，另一个方面是以把这些压缩的市场组织成适当的形式为目标的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政治。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分割开来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家的想像中。这些适当的政治形式，反映着构成体系内社会的特点的内在社会统治方式，以及它们被全球体系纳入的方式，即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处于中心）纳入的，还是作为受支配的组织（边缘地带）纳入的。

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时期（1500～1800年），可以被认为是从封建主义到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该时期里，我们看到各种适当的政治形式（建立在封建势力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妥协基础上的旧政权的绝对王朝）与造就了最初的两极分化形式的政治进程的结合。这些政治进程是：用军队和海军对大商业垄断公司进行保护、对美洲征服（美洲被塑造成为当时的体系的边

缘地带，其专门的任务是以对积累商业资本有利的方式进行生产）以及与其相关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布罗代尔，1979；弗朗克，1978；华勒斯坦，1989）。

从工业革命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从1800~1950），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其基础是在工业化中心与被阻止进行工业化的边缘地带之间的差距（阿里齐，1994；拜罗赫，1994）。确定了新型的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这种差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产生的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相反，它是有计划地造成的，手段是既维持经济方面的措施（向新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强加的“自由贸易”），又维持政治上的措施（与新的边缘国家里的传统主导阶级结盟，把他们纳入买办体系里，进行军事干涉，以及最后，进行殖民主义征服）。这些全球化形式，是在工业中心里的典型政治制度下表达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政治制度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英国、法国、美国），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是在建立适当的民族市场过程中进行的民族统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德国、意大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开明专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奥匈帝国、日本）。上述领导社会的联盟的多样性，不能使我们忘记它们的共同特性：所有这些形式，都致力于孤立工人阶级。它们同时确定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和极限。

这个复杂的体系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其部分特点是，从19世纪末起，在中心地区里的工业和金融经济、垄断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从1917年起，苏联分离出去了。此时，全球化的特点是中心内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增加，边缘地带的殖民化加剧，在竞争的深化中，这是重要的赌注之一（阿明，1993a；弗斯特，1986）。在这种演变的同时，新的政治形式被塑造了，它们至少部分地把中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与体系相联系起来，甚至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下，也是这

样的。在现代历史中的 150 年里指导了造成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彻底地改变了。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力量的关系，这种变化有益于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工人阶级（他们在中心国家里获得了以前从来没有占据过的地位），有益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那儿，解放运动恢复了各国的独立），有益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当时它表面上是实现脱钩和赶上去的事业的最成功战略）。同时，对美国相对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中心的主导地位的确认，改变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条件。

我在别处发表过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论文，其依据是对两个方面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这种新认识，这两方面，一个是组成世界的 3 个集团，另一个是随着它们产生的其他形式的全球化（阿明，1993a）。因此，在相关的社会内部组织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点出：（1）构成旧中心的特点的伟大劳资妥协（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政治等）；（2）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正在搞现代化的模式；（3）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我更喜欢把它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历史中这第三个伟大阶段的特定的全球化，是（由美国）进行协商的结果，是由这些协议保证的妥协所划定和控制的。这些条件不像以前的阶段那样，由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单方面地直接控制的。这是因为这个阶段是由关于发展的讨论（也就是说要赶上来）主导的，也因为它是由或多或少是激进的脱钩实践主导的，而这些实践与资本主义的运作的单方面的逻辑相矛盾。

由于构成这个阶段的基础的 3 个模式的削弱和崩溃（西方的福利国家削弱了，苏联模式消失了，世界南方边缘地带国家重新被置于买办阶级统治下），以及占主导地位资本有利的力量关系恢复了，这个阶段结束了。在那些条件下，正在形成全球化替代方案的新形式，以后我还会谈到它们和它们所带来的冲突的。

在前面的分析里，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内在两极分化的强调，具有本质性的意义。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简直否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这种永久性特点。该意识形态继续声称，全球化提供机会，各国社会可以根据与它们相关的理由，来抓住这些机会，或者不抓住它们。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即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至少部分地也曾经幻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赶上来是有可能的。

我提出来的和我在前面几页上粗略地描绘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使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也不是其最高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永久特点。

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关于资本主义最近阶段的讨论，是从属于这些阶段的特定社会关系需要的，它限定着那些阶段的特定全球化概念。在这里，全球化这个术语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那些讨论不准许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

从1880—1945年，这个讨论的特点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按照列宁主义的口气）。说它是自由主义的，其含义在于它的基础是，即使国家政策实质上操纵市场的作用，以让它们为占主导地位的联盟（例如，保护小农的农业，以保证小农在选举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服务，也要肯定市场的自我调节原则。说它是民族主义的，其含义在于，无论在其对内方面还是对外方面，国家政策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市场的再生产。说它是帝国主义的，其含义在于，在垄断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代里，这些政策强调国际竞争，并且把它转变成充满暴力的国家间冲突。但是，虽然占主导地位的讨论轻而易举地承认前两个特点（它通过把这两点同实行议会民主联系起来使它们合法化），它不承认它的帝国主义特点，它也从来不谈这一点。

此外，它不了解有全球化这个术语本身，甚至把它和反爱国主义的普世主义及其耻辱相混淆。相反，这个讨论促进一种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其职能是把公民中的多数人（如果不是一切人）凝聚在垄断公司的国家后面。因此，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继续由殖民地化和对非欧洲人的憎恨所决定。但是，人们几乎完全不讨论这些事情，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1917年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目标被宣布而引发的停滞，不被接受：那完全只不过是一个野蛮和不合理的偏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段里，占主导地位的讨论改变了；我确定它的特点是关心社会成员和民族主义，是在受控制的全球化内运作的（阿明，1993a）。当我说它是关心社会成员时，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基础正是历史性的社会妥协，这些妥协把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东方和南方国家人民的各个阶级结合起来（或者主张实现这种结合——它们大部分成功了）。关心社会成员不等于社会主义，即便为了推动相关的社会项目，在某些地方使用了后者。当我说它是民族主义的时，我的意思是说，上述妥协是在政治国家的框架之内确定的，而且是在公共国家权力的有计划的政治之中执行的。全球化的术语被引进到了那些讨论之中，尽管它只被用于自由世界，该世界把共产主义国家排斥在外，宣称那些国家是极权主义的。这种全球化被似乎是对大自然的考虑合法化，这种考虑是：我们的地球在变小。这种考虑和我们在当代的讨论中听到的考虑很相像。尽管如此，它的帝国主义特征已经从以前的殖民主义形式中分离出来了，边缘地带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把后者击败了。帝国主义的冲突也同样地被消除了，因为以美国（它已经变成了某种超级帝国主义）为首的联盟被有关国家接受甚至被加强了，其理由是要共同建立对共产主义的防御。甚至欧洲的建设不考虑全球化等级制度问题，它接受在北约之下的运作。

战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从两个含义看，是独特的。首先，这是因为它是按照社会关系运作的，而那些关系给劳方安排的地位，并不揭示资本主义的特定逻辑，而与此相反地表现那种逻辑和反对制度的人民和民族逻辑之间的妥协。在不考虑伟大的农业改革或集体化情况下，工资增长（它是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发生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险、国家对工业化的管理、收入的再分配，都不是由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利润最大化逻辑产生的，而是人民和民族的社会项目所追求的目标的表现。在互相冲突的社会逻辑力量之间的这种妥协，迫使了资方去适应个人和公民的要求。自相矛盾的是，正是这种压力，才使构成这个时段的特点的全球范围的强劲和史无前例的增长得以实现了。因此，这个模式是今天提出来的和强加给世界的模式的对立面。今天的这个模式的基础是资本的排他性逻辑和它关于对它的调节取决于各国工人和居民的说法，而这种逻辑和说法反过来又使经济陷入停滞不前之中。作为对这些社会妥协的逻辑补充，随着它产生的全球化，由保证它的各国控制。因此这个时段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单方面逻辑的两极分化效应得到削弱的时段。这种削弱表现为东方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强烈的节奏。

实现了有关的这些妥协的社会模式，都因为它们的成功本身，达到了它们的历史极限。因为构成它们的基础的课题（福利国家和物质生活无止境的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对现代化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已经被耗尽了，而同时没有创造能够让人民的和民主的力量继续前进，这些课题表现为幻想（阿明，1989b）。然后就为发动资本的强有力的攻势创造了条件，资本成功地推行了自己的逻辑。在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成员国拒绝了第三世界国家在1975年提出的世界经济新秩序项目（这是旨在更新受控制的全球化的一个项目，它能够促进普遍的增长）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重新陷入买办阶级统治下。这在所谓的“结构性

调整”计划中表现出来，这些计划实际上致力于消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前几十年中获得的成就。在撒切尔和里根宣布要从1980年起拆散福利国家，而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跟着他们走之后，新自由主义变成了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最后，东欧和苏联的苏维埃体系在80年代末的崩溃，使野蛮的资本主义现在一帆风顺，开始重新征服这些社会。

重新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单边逻辑，由到处都以相同方式执行的政策表达出来：高利率、公共社会福利支出的缩减、旨在充分就业的政策被取消、对有计划地让工人重新失业的追求、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减税、非调控化、私有化等。这一整套措施使反对工人和反对人民的霸权主义集团重新上台了。这种逻辑排他性地发挥了有利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和特别是其最强大部分即金融资本（它们也是资本的最国际化的部分）的作用。因此，无论在其国内方面。还是在其国际方面，“金融化”是当今的制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在后一个方面，资本的排他性逻辑，是通过两个措施表现出来的，这两个措施中，一个是取消对任何资本转移的控制，不管转移的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投机性投资，而另一个是采取自由地和以浮动汇率换汇（阿明，1995；1993b；比尔德，1989；切斯尼亚斯，1994；克勒耶、弗罗贝尔、亨里赫斯，1980；帕斯特勒，1992）。

资本的单边规律的重新确立，没有启动新的扩张阶段。相反，它带来的结果是停滞不前的螺旋，因为对最高利润的追求，如果它不遇到强有力的社会的阻挠，它将几乎致命地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是马克思的贫困化规律）。这事实上可以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当今的体系的所有成员国中看到，正如它在国际层次上同样可以看得到那样。这种不平等又产生危机，也就是说，日益增多的剩余资本找不到自己在扩大生产中的出路。此时，在位的力量排他性地对危机管理感到担心，因为它们无法为此找到

一个解决办法。此时，在全球化了的新自由主义讨论中隐藏了一些政策，它们完美地与危机管理相一致，而危机管理的惟一目标是，要为剩余资本创造财政出路，以便避免产生资本最惧怕的那件事情：大规模的贬值。无论在国内层次上，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金融化是这种管理的表现。高利率、浮动汇率和自由换汇、投机性的转移、私有化、美国收支平衡的赤字、南方和东方国家的外债，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必须在危机管理的框架里加以认识。我们必须向它的经济方面加上补充性的政治战略，我同样确定这些政治战略是危机管理的手段。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消除各国开展反抗的能力，以使有效的人民社会力量不可能被组织起来。为了这个目的动员了种族主义，以使国家的爆炸合法化：要有尽可能多的斯洛维尼亚人，要有尽可能多的车臣人，这就是这里极其冷酷地追求的目标，而它被掩饰在关于承认“人民的权利”的假民主的讨论背后！其他的手段同样地被动员起来了，它们的范围是从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鼓励到对公众舆论的操纵。我们看到，在现实中，为了民主和人权进行的干涉，都是严格地从属于帝国主义大国的战略目标。双重标准是它的规律。这些政策的一般做法是，先把人民的民主愿望的实质内容完全掏空，然后在进行鼓励内战的干涉（它也包括所谓的低强度军事干涉）的同时，通过我称之为“低强度民主”的办法为管理混乱局面做准备。

无论是关于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和关于扩散得很广泛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动乌托邦，还是那种乌托邦带来的对混乱局面的政治管理（这不是对任何形式的新全球秩序的管理）的实践，都不可能成功。为了减弱其破坏性效果和限制爆发暴动，列强体系试图在混乱局面中实现起码的秩序。在这个框架下产生的调节，通过把边缘地带的3个地区分别被连接到了3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北美贸易协定已经把墨西哥（将来还有整个拉丁美洲）挂在美国大

车后面，欧洲联盟内部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联盟把非洲国家置于从属于欧洲的地位，而东南亚国家联盟能够在南亚和东亚促进由日本主导的地区的建设（阿明，即将发表；亚钦和阿明，1988）。欧洲的统一本身受到这种与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相联系的新帝国主义重组的动荡的影响。让新自由主义原则来控制欧洲的事业，使欧洲的事业本身变得很脆弱，而随着抗议和拒绝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运动得以开展，欧洲的事业将甚至变得更加脆弱。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这些新自由主义原则，是通过关于优先创造共同货币（欧元）的决定而表现出来的，而对该共同货币的管理，正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以致损害了进步政治和社会项目的共同进展。

今日的全球化体系的矛盾是巨大的，而这些矛盾注定要恶化，因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人民进行反抗，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分歧加深，而那些反抗的发展又不能不使那些分歧加剧。

这些矛盾中最大的一个矛盾，由全球体系的新两半的强烈对照表达出来。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美洲、西欧及附属于它的非洲、东欧和苏联的国家、中东和日本，都受到了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事业的确立相关的经济危机的打击。相反，东亚——中国内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直到最近的经济危机于1998年打击它们之前，都广泛地逃脱了经济危机，其原因正是在于统治它们的力量都拒绝服从无序的全球化的指令，而这种全球化却强迫了别的地方接受它。印度处于这个新的东方和西方之间。这种亚洲的选择——关于其历史渊源的讨论会使我们偏离主题——是该地区成功的根源；正当在世界其余地方经济停滞不前时，这个地区的经济在增长。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是，要刹住东亚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这种独立性。美国为此动员了由这次经济危机创造的条件。美国为此致力于实现拆散中国的目标。围绕

这个目标，就可以让东亚地区的组合逐渐地结晶出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利用的是日本的依赖性，因为日本需要华盛顿的支持，不仅为了能够对付中国，而且也为了能够对付韩国和甚至东南亚。为了这个目的，美国还主张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取代非正式的东亚区合作。

欧洲是第二个受到可预测的动荡折磨的地区。欧盟事业的前途实际上受到威胁，因为，统治阶级顽固地坚持执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还因为，人民中各个阶级的抗议理所当然地在增长（图勒蒙，1994）。但是，这个事业同样受到东方的混乱局面的威胁。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目光短浅的逻辑，导致了选择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进行拉丁美洲化。这种边缘化，很可能对德国有利，它发挥的作用是有利于全球的演进的，而这种演进有利于建设德国的欧洲。在短期内，这种选择有利于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因为，德国和日本一样，选择了继续跟随在美国后面。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选择带来的危险是，它会使现在处于休眠状态的欧洲内部争夺得以恢复。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里，游戏还没有结束。在拉丁美洲，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爆发恰帕斯起义同时发生，而这并非偶然。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议把自己的模式扩展到整个美洲，但这个项目现在在南美各国首都里遭到了质疑，因为那些国家对这种有利于不受控制的全球化的选择有怀疑。虽然南美洲市场（MERCOSUR）项目（由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组成，向智利、巴拉圭、玻利维亚开放），最初是从当时没有人反对的新自由主义角度创立的，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它不会演变成一个独立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地区，尽管那只是相对的独立。

直到今天，对全球化矛盾的管理，为美国霸权的维护提供了新的机会。“减少国家的作用”这个口号意味着，在一切地方都要减少国家的作用，但美国是例外。美国靠它的双重垄断地位，

即美元的势力和军事干涉的势力，支持了扮演荣耀的第二的角色德国和日本，维持了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面对着东亚，华盛顿试图防止东亚与欧洲和俄罗斯结盟。

全球体系的未来，比如说反映力量关系的全球化的形式，控制其可能的稳定性的逻辑，这些大部分仍然是不清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有那种愿望的人们，能够无偿地游玩制定各种未来前景的游戏，因为什么都抗议被想像出来。与此相反，我建议，在结束本文提出的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时，对两个问题进行考察，一个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相一致的演变倾向，另一个问题则与此相反地是，在当代世界条件下人民的斗争可能确定的战略的和反体系的目标。我在另外的著作里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围绕我称之为塑造当代帝国主义的、促进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的“5种垄断”的现象表现出来的。这5种垄断是：（1）对新技术的垄断；（2）对全球范围上的金融流动的垄断；（3）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获取的控制；（4）对通讯和媒体的手段的控制；（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阿明，1996a；1996b；1993b；卡萨诺瓦，1994）。通过工业和金融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和为它们服务的国家的有时互补有时冲突的共同活动（因此反映了这里提到了的非经济性垄断的重要性），这种垄断的作用得以实现。总之，这些垄断确定全球化了的价值规律的新形式，它们使从对工人的剥削得来的利润和超额利润，集中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成板块的情况，这种剥削是有差异的。因此，全球化了的价值规律的这种新阶段，不让富有活力的边缘地带通过工业化赶上来，而确立了新的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下，生产活动是在边缘地带进行的，而这些边缘地带被置于了次要的从属地位，起着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担任下属收款员的作用（这个制度使我们回想起初级资本主义的“放债”）。

想像与这种形式的价值规律的统治相一致的未来全球化的景象，是不困难的。传统的占制主导位的中心，将继续保持其领先的地位，所重复建立的等级体系已经看得见了：美国将保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为，它在研究与开发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元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系统的军事管理的垄断）；跟随在其后是日本，因为它在研究与开发作出贡献；然后是英国，因为它是金融上的副手；最后是德国，是为了控制欧洲。东亚、东欧、俄罗斯、印度、拉丁美洲的活跃的边缘地带，将构成体系的主要边缘地区；而被排挤到边上的非洲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将被抛弃，它们将陷入仅仅威胁它们自身的灾难。在中心地区本身，重点放到了与上面谈的5种垄断联系起来的活动，其后果是正如我们已经所说的那样，必须用“两种速度”来管理社会，而其基础是人民的重要部分所面临的边缘化、贫困、报酬很小的工作和失业。

这种全球化——它就是在正在实现之中的选择背后组织起来的那种全球化，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通过把它说成是“向普遍的幸福过渡”使它合法化——肯定不是致命性的。相反，这个模式的脆弱性十分明显。它的稳定性使它以为，各国人民将永远接受留给它们的非人道条件，或者人民的革命将永远很偶然地发生，这些革命互相没有联系，以各种幻想（种族主义的、宗教的）为鼓舞源泉，然后进入死胡同。显而易见，通过媒体动员和军事手段的配合而对这个体系进行的政治管理，将被用于维持主导今天情况的这个局面。

与此相反，能够就如何击败这种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问题，作出有效答案的战略，必须把削弱相关的5种垄断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还必须在这种前景之下，更新和重新定义脱钩的选择。这些战略必然是具体的，是以对政治和社会上的人民力量的有效动员为基础的，而且是在适合于每个国家的条件下运作的。在不详细讨论这些战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人民的反体系斗争阵线的

伟大原则列出来，那些阵线必须围绕这些原则把自己组织起来。

首要的要求是组织反垄断（反帝国主义或反买办）的人民民主阵线。如果没有它们，不可能有变革。力量关系以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人民阶级的方式的转变，是击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战略的最重要条件。这些阵线不仅必须确定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以及达到那些目标的办法，而且还要考虑是否需要质疑全球体系里的等级关系。这意味着，它们的民族主义内容不能被忽视。我们在这里与此打交道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进步概念，它与受到资本的战略鼓励的、目前占据了政治舞台前方的一切蒙昧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以及沙文主义的提法，保持了很大的距离。这种进步的民族主义，不排除地区性合作；相反，它需要促进很大的区域的建设，因为这是开展反对上述5种垄断的有效斗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与此打交道的是，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它们完全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力量主张实现的区域一体化，因为那些力量把后者视为用于促进走向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过渡的传送带。在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南亚和东亚层次上的、以迫使资本适应其要求的人民民主社会联盟为基础而进行的一体化；还有欧洲的一体化（从大西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加上洲级国家（中国和印度），共同构成着另一种全球化的模式，我称之为真正的多中心世界的项目。在这种框架里，就资本市场（这方面的目标是激发这些市场来投资，以扩大生产的体系）和金融体系或者商业协议而言，我可以想像用于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技术形式。这些计划的组合，将竭尽全力地促进国家社会层次和全球性组织层次上的民主化雄心壮志。因为这个原因，我把它们置于从全球性资本主义到全球性社会主义的漫长过渡的前景里，并把它们当做沿着那种过渡的一个步骤。



关于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陷阱

普拉帕特·帕特奈克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最近的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国际化，是刚过去的 50 年中产生的积极影响的事情之一（《印度人》，1996 年 10 月 2 日号）。他哀叹说，国家主权本来应该保护国家免遭内部灾难和内部冲突，并且争辩说，为了预防内部屠杀，需要建立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国际力量，即某种国际警察。

我选择加尔布雷思，因为他是这一流派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对他的观察背后的真正人道主义，很难进行丝毫的怀疑。他对民族抱负足够敏感，以致致力于实现“在理智的、由历史推动的国际主义和国家荣誉及主权之间的妥协”，而反对粗暴镇压后者。他对统治的危险也很敏感，以致建议把国际警察的角色交给联合国，而不给美国。

虽然这一流派中其他人的洞察力可能都不如加尔布雷思敏感，但毫无疑问，这一流派本身现在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我称

这一流派为资产阶级国际主义，它**提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实行国际主义**。这必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经常谈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区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至少有4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相信一种人道的资本主义秩序能够遍及整个世界，不仅在世界的北方，而且也在世界的南方都如此；第二，相信在这种秩序下能有进步，不仅在世界的北方，而且也在世界的南方都如此；第三，相信这样的主张，即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灾难和内部冲突”与资本主义毫无相干，而正相反，是这些社会中的独立和内部力量的产物，而这些力量根源于构成这些社会的特点的前资本主义环境；第四，相信甚至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冲突都“不是实质性的”。概括地说，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依据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看法，该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和谐而不是在国家利益冲突基础上的潜在进步和人道力量。

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的依据是两分法，它把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大都市里，视为一种进步，它与落后、反动和不人道的前资本主义结构形成明显对照。这些观点使我们想起发展经济学的二重性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将现代与传统的部门互相区分开来。按照这种观点，发展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相对于传统的部门，现代的部门太小；如果去除束缚现代部门增长的镣铐，这一问题就能被克服，而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部门将保持扩大，直到整个经济发生变化和实现现代化。同样，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认为，现在有一个进步和人道的国际主义潮流，与各国国内的落后和反动潮流形成对照；一个国家一旦向前者开放，它就会走上发展之路；建设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都进步的社会，要具备的起码的和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向前者开放国家的门户。

有一点很清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里，也会有很多人接受这种观点。我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某些栏目中，经常碰到这样的

观点，即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在印度代表一剂治疗地方自治主义的灵丹妙药。的确，甚至在左翼圈子中，也能发现这种观点的追随者在。这并不是像第一次听到它时那样使人感到惊讶的事情。因为，即使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开拓性主张后 60 多年的今天，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任何地方，不加批判地相信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的确是革命的作用，仍然是许多左翼组织的特点。

我强烈反对这种看法，并要在这篇文章余下的部分对它加以批评。然而，首先我要把我的批评同其他人的批评区别开来。在这里，与二重性经济模式进行比较是有用的。对这些模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批评：通过以伦理上的依据对现代化概念的拒绝；通过对所谓的落后部门的落后的否定；通过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强调（仅仅确定两个部门，不能很好地反应这种复杂性）；通过对现代化部门拉动落后部门而不是相反被后者拉了后腿的能力的怀疑等。然而，此外，有一种批评认为，两个部门之间的上述两分法不真实，两个部门之间有辩证的关系，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因此这种批评拒绝二重性的经济模式，认为它有根本性的缺点。我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的批评，正是沿着后面这条线进行的。全球化不是医治地方自治主义的灵丹妙药，因为，全球化和地方自治主义是辩证地互相联系的。加尔布雷思所关心的国内冲突和内部灾难，不能用贴着他的标签的国际主义来克服，因为，这种国际主义本身就是造成这些冲突和灾难的源泉的一个组成部分。让我来详述这一论点。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外部征服为基础的。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一生中所能完成的著作的主体部分里，他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分析时，把资本主义看作好像是一种封闭的体系。这个事实倾向于使某些左翼圈子中的一个信念得以延续，这种信念是，资本主义的外部征服和统治，虽然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但它们都

是资本主义的非本质性附属物，并不是它的运转的本质的一部分（后来这一点在熊彼德的著作中被重复）。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广泛地写了关于殖民主义的文章，但它们是与他著作的主体理论部分相分开地写的；他在一生中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当列宁通过把垄断、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一体化到理论的体系里而扩展马克思的分析时，他强调要抓住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系统地重新进行对作为开放体系征服其他非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当时，标志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已经摆在议事日程里，它迫切需要列宁为了立即进行革命干预的目的，而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分析当时存在的总形势。（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对资本主义和欠发达之间的辩证法的解释方面，提供了关键性的领导，但它的文件是作为一个行动计划而不是作为理论作品而设计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罗莎·卢森堡曾试图把资本主义对外在部分的征服，与资本主义的运作结合起来。但是，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基本问题上模棱两可的，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他同爱德华·伯恩斯坦领导的修正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论。如果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正如她所争辩说的那样，是通过它与前资本主义部门的相互作用实现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前资本主义部门被融入资本主义部门本身。换句话说，这种相互作用完全可以意味着，被征服了的、贫困化了的前资本主义部分，继续拖延其存在，而并不意味着，随着时间的迁移，世界正在变成越来越纯粹的资本主义。然而，在卢森堡的观点中，虽然在一些地方，她承认前一种可能性，但总的看法与后一种说法相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关于崩溃的理论，她为该理论辩护，反驳了伯恩斯坦对该理论的嘲笑，把该理论当做重建革命事业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个体系的内部运作正在推动它走向崩溃的话，那么，革命传统力量强调的该体系在历史上

的短暂性，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她以下面的方式为崩溃理论进行辩解：如果资本主义需要前资本主义部门，如果这些部门因为被资本主义所同化而不断消失，那么，一个时刻就将到来，即那时世界将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以致没有留下即席进行积累的可能性；体系达到了崩溃点。

如今，因为资本主义显示出了比以前预想的要大得多的后备力量，具有实质意义的是，不仅应当对他的运作进行重新分析，并且认识到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还应当使这种分析大大超越卢森堡的分析。至少应该在以下两个领域做出努力：

第一，资本主义（这里我们指的必然是大都市资本主义）对其外面的前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地区的需求之所以产生，必须被视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市场、原材料、劳动力以及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即不仅仅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范围；而且也是因为它需要居住在距离较合适的地方的后备劳动力，以便能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这个看法是帕特奈克在1997年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争辩过，后备劳动大军，对资本主义的运作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事实上，即使在国内后备劳动力减少了，以致体系获得了它作为成就宣传的可敬的高就业率，在外部地区的后备劳动大军，对其生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普遍的几乎充分的就业。这（和这样一个事实，即落后地区的发展，将对非再生类资源的有效供应产生巨大压力）表明在发达和落后经济之间有根本性的冲突。在资本主义下，国际和谐，与阶级和谐一样，都纯属空谈。

第二，正如说这句话本身所预料的那样，外部地区继续是外部地区。如果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与外部地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其产生的原因正是在于两者仍然是不同的实体，尽管相互之间有关系。如果二重性经济模式的二元论，排除了关于它们的相互联系的看法，那么卢森堡关于世界将成为越来越纯粹的资本主

义的一元论观点，排除了关于这两个实体都具有独特性的观点。

这两个实体间的冲突，通过把力量（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意识形态领导权、操纵以及制造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麻木相结合的办法，以使核心国家满意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麻木，常常因为对核心国家的从属这个事实本身，而自发产生。对这种征服的调解将在以后进行考察，但是要指出的一点是，正是这种征服，对于加尔布雷思所提到的所谓国内冲突和国内灾难，要么是它们的直接引发者，要么是为它们的发生创造了条件。那些国内冲突和国内灾难不仅是这种征服的附属物，而是使这种征服能够持续下去的极其重要的过程。

我要在此明确一点。我的论点并不仅仅是声明，目前的国内灾难和国内冲突，都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只是征服的历史经验才甚至在今天还留下了冲突和灾难的遗产；我也不是仅仅指出，虽然有正式的非殖民化这个事实，但因为征服还在继续存在，伴随着征服的这些灾难和冲突，都在继续出现。这两种说法都有说服力，但事实上我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观点，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征服的形式和轮廓在不断变化；还有，我的看法是，加尔布雷思用充满激情的词语谈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最近经历的国际化，是征服的一种新形式，它带来了大量的新灾难和冲突。让我举两个最近的灾难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我关于它们都与当前进行的全球化进程相联系的观点；第一个例子涉及食品问题，第二个例子涉及民族或社群冲突。

几乎每个谈论第三世界国内灾难的人，都会把非洲饥荒作为这种灾难的主要例子举出来。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一致把非洲饥荒的原因，归结于一系列的内部原因，从人口的高增长率，到非洲农业效率的低下，从干旱的存在，到缺乏基础设施等。当然，援引这些因素中的每个因素，当然也有某种正确性，但在援引它们时，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非洲作为一

个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农产品的地区的一体化。的确，这种一体化一向存在着，但在最近几年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苛刻要求下，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非洲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陷入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奴役下值得研究。虽然石油价格的上涨本身对非洲国家的支付平衡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由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所管理的制造业产品价格却在攀升。这意味着，进出口交换比率发生了变化，而它不利于欠发达的、生产初级产品的经济，其中应该包括非洲国家。因此，非洲经济之所以目睹不利于自己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变化，主要不是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主要是因为石油上涨后大都市资本推行的战略（帕特奈克，1986）。然而，由于进出口交换比率发生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变化，那些非洲国家就欠下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债，还欠了该机构掩盖的商业性贷款供应者。因此，非洲是因为外部的原因才陷入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控制下；这是大都市资本的行为的结果。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非洲资产阶级的罪行，即它的贪污腐败和恣意挥霍。但是，在这种贪污腐败和恣意挥霍，以及这个资产阶级对把自己与大都市联系起来的嗜好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事实仍然成立，即促使非洲资产阶级去找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直接原因，是从外部强加的不利的进出口比率。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大都市资本利润的缩减，迫使了非洲国家屈从于布雷顿森林机构，并通过那些机构屈从于大都市资本。也是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形成的屈从，并没有局限于非产油国家；通过今天被称为“石油引起的债务陷阱”的办法，它也把产油国家包括在自己的范畴里。最初看到了自己收入增加的产油国，野心勃勃地启动了各种大项目。进出口交换比率最初发生了有利于它们的变化，后来因为制造业产品价格通过行政手段上涨了，进出口交换比率发生了不利于它们

的变化，因此，它们试图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支出，它们自信地认为，产油国家永远不会存在还债方面的困难。然而，事实上，在两次石油冲击之后发生的不利于它们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变化，始终没有逆转；没有发生第三次石油冲击。它们也陷入了债务陷阱，以致不得不屈从于布雷顿森林机构。

这种征服的一个后果是，农产品出口得以促进，但牺牲了粮食作物的生产。U. 帕特奈克（1996）提供了一些关于 80 年代非洲国家粮食作物产量及其增长率的估算数字。她的数字包括非洲粮食作物中的谷类作物（小麦、玉米、大麦和小米）、块茎作物（马铃薯、木薯、甘薯）和大蕉类作物（香蕉和大蕉），并且用 5 公斤块茎作物或蕉类作物相当于 1 公斤谷类作物的公式，将它们加起来进行统计（她还援引印度和中国的数字，以便进行比较；但是，这两个国家对粮食作物术语的解释不同，对印度来说它只包括谷类和豆类作物，不包括马铃薯；对中国来说，它包括谷类、大豆和马铃薯）。早在 1980 年，已经有 46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着低水平的人均粮食作物产量，人均的毛产量约 138.5 公斤（甚至在为了纠正可能发生的估算过低把该数字提高 20% 后，该人均产量也仍不到 166 公斤），这低于印度（190 公斤）或中国（285 公斤）。然而，在 80 年代发生的事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粮食作物产量不断下降。就整个次撒哈拉地区而言，在 1980 年到 1987~1989 年之间（三年平均），人均粮食作物产量下降了 11.5%。就 6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该产量下降了 20%。

我们可以争辩说，这种情况本身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即使农产品的出口是通过调整种植而积，在挤掉粮食作物生产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用赚来的钱支付粮食的进口，从而大大地抵消了国内生产的下降，以致如果进行与没有农产品出口的状况进行比较的话，人均供应是改善了。然而，非洲的情

况否定了任何这样的期望。在 1980~1990 年，在撒哈拉以南的 6 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每个国家购进的粮食（即全部进口粮食和所获粮食援助之差）的绝对数量都减少了（表 9-1）。

表 9-1 粮食统计数据

| 国家 | 进口粮食 (千吨) | | 所获援助粮食 (千吨) | | 购进的粮食数 量的变化(千吨) | 人均卡路里的 变化(%) |
|-------|--------------|------|----------------|---------------|--------------------|--------------------------|
| | 1 | 2 | 3 | 4 | 5 | 6 |
| | 1980 | 1990 | 1979~ 1980 | 1989~ 1990 | 1980~ 1990 | 1979~1981 到 1989~1991 |
| 坦桑尼亚 | 399 | 73 | 89 | 22 | -259 | -2.17 |
| 埃塞俄比亚 | 397 | 687 | 111 | 538 | -137 | -9.92 |
| 乌干达 | 52 | 7 | 17 | 35 | -63 | -6.0 |
| 尼日利亚 | 1828 | 502 | - | - | -1326 | 15.45 |
| 肯尼亚 | 387 | 188 | 86 | 62 | -175 | -9.86 |
| 扎伊尔 | 538 | 336 | 77 | 107 | -232 | 1.54 |

来源：栏 1~栏 4 摘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栏 6 摘自粮农组织的《粮食平衡简报：1992-4》，罗马，1996 年。

注：栏 5 = (2-4) - (1-3)。因为关于进口的数据涉及阳历年份，而关于援助粮食的数据涉及作物年份（7~6 月），它们的比较只能提供大体的情况。因为援助数据来源于援助国，就将 7~6 月数据与第二年的 1~12 月数据相比较，以把拖延送达的援助粮食计算在内。

从购进粮食绝对数量下降的情况，至少能得出两个逻辑推论：第一，在任何地方，如果我们看到，为了促进农产品出口而调整了种植面积，使人均粮食生产下降了，同时人均粮食供应也减少了的话，那么，以最贴切的意义来说，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必须归咎于导致了前一种情况的过程。第二，是综合的人均食品生产能力的下降。后者必须是对前者进行加工所归纳出的最接近的情况。第二，即使在调整了种植面积以促进农产品出口，但人

均粮食供应量并没有下降，那么，人均粮食供应没有提高，其原因在于种植面积的调整。

从6个国家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适用于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即在任何地方，如果调整了种植面积以促进农产品出口（这个现象看来很普遍），这种调整就是观察到的粮食供应变动的最贴切解释。

可以肯定，有若干长远的问题，与非洲的农业有关系。由于这样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即非洲人口增长率很快，人口每年大约增长3%，从任何意义上讲，改善非洲人均粮食供应，是一个令人胆怯的问题。但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作物，变成了向国际市场出口农业产品，而这个变化的时间，与进口事实上减少了的时间大体上相一致。这样一个事实暗示着，对非洲各国国内粮食供应的直接的、制约性的抑制，应该在全球化里去寻找，而不是在常常被提出来的其他任何长期因素中寻找。因此，全球化奠定了严重食品短缺的基础，而食品短缺周期性地爆炸性地发展为饥荒。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全球化为为什么没有按照传统经济学想像的那样，尽管人均食品生产下降，导致食品供应增长？原因如下：由于处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束缚下的所有第三世界经济，都一起被要求扩大初级商品的出口，这些产品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始终被压低。结果是，在履行了还债义务和进口放开的制造业产品之后，剩下来的自由外汇的数量太少了，以致不能维持人均粮食进口的水平，更不用说扩大它。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世界食品库存量创记录的年头里，非洲国家却经历了饥荒：一方面，它们丧失了国内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它们手中可用的外汇太少。

然而，这种困境一直是加尔布雷思和其他人赞扬的那个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非洲今天看上去离不开人道主义援助和离不开整个的一支“侵略军”以保证援助到达面临死亡的灾民手

中的话，我们应该记住，非洲倒退到如此地步的过程，正是由那些带来了人道主义援助和“侵略军”的势力主导的！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谈到的只是非洲，但适用于非洲的说法，也适用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使它们的经济向世界市场力量开放的全球化，必然瓦解它们的食物安全，使它们在类似饥荒的条件中很脆弱。可以肯定，这并非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惟一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有3个相互独立的经济方面的影响：第一，通过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和使它们面向出口，来确保便宜的初级产品的供应；第二，向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的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开放它们的经济；第三，向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业产品和服务开放它们的市场。这3个过程的净效果是使停滞不前状态长期延续下去，恶化第三世界内部的收入分配，以及使第三世界国家降低到它们在殖民主义时代所处的地位。过去，第三世界国家正是从这样的地位出发，通过长期的争取非殖民化的斗争，争取摆脱这种地位。众所周知，殖民地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极易出现饥荒，而这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谈论的问题。

现在我来谈内部灾难的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第三世界内部，沿着宗教或种族线条发生的自相残杀式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加剧，也不是与全球化进程没有关系的。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如下谈这个问题。把各种不同的集团铸成一个建设中的国家，是争取非殖民化斗争的一个后果。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全球化过程使非殖民化斗争受挫，特定集团的意识开始凸现，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这些特定集团的意识从来没有被消灭，它们只不过被压倒一切的国家意识掩盖。但是，如果这种压倒一切的国家意识削弱了，这些特定意识就会凸现，而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自己被全球化进程所吸纳，国家意识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拥护，很自相矛盾地被一些次

处于国家之下的民族的特定意识的加强所伴随。

但是，全球化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含义上加剧了国内矛盾和冲突的。它对此也做一些很特殊的贡献。在这方面可以区分4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有时，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大国为了纯粹的物质原因，向某些原教旨主义力量提供直接的鼓励和支持。它们的原教旨主义使它们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而相关的资本主义大国又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这种社会支持。而且，显而易见，对这些势力的支持，并促使他们上台掌权，带来国内冲突的加剧。最近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为加强对中亚石油的控制而支持的塔利班，这至少到1997年为止是这样的（麦肯西，1998）。

第二，全球化意味着普通人生活恶化，但国内一部分富人不仅更富，而且密切地与西方认同，还纵容过度消费，因此，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精英集团的情绪，必然在人民中开始滋长。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情绪会蒙上一层原教旨主义的色彩，而在进步和民主运动有受过镇压的历史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然就是伊朗，在那儿，国王的上台和美国对左翼及民主运动的镇压，带来了富有讽刺意义的后果，即原教旨主义运动通过反消费主义的巧辩，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来夺取政权。尽管这种原教旨主义反动、独裁、残忍以及令人反感，然而，它还是代表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种扭曲的变种。

第三，还可以有另一种原教旨主义。它利用人民的贫困，不是为了实现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不管它多么扭曲，而是为了选择某个少数集团，并说它是贫困的根源。从这种意义上看，它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由于这种选择不危害帝国主义的利益，却正相反地使人们的视线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转移，后者也就倾向于喜欢那种原教旨主义。当然，这些情况并不是说帝国主义必然支持这些势力夺取政权的努力。但是，帝国主义把那些势力当

做用皮带拴的狗，这个术语是M.卡勒基（1972）使用的。这些买办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它们当中，当然也会有分化，而其中一些部分反对帝国主义的渗透的某些方面），都试图通过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全球化的国内精英集团采取绥靖的态度，但它们是通过对某些不幸的少数集团进行屠杀和发动暴乱，来做到这一点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想起来的明显例子，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浪潮，它使像BJP党那样的代表地方宗教势力的党在印度夺取了政权。值得注意的重要的一点是，这和反帝国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样，即全球化进程以及人们生活因为失业、消减工资和消减补助金等的不断恶化，使它得到了加强。

最后，全球化倾向于助长分裂主义运动，而这些运动也可能表现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例如锡克教教徒的分裂主义），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引发国内冲突。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在富国，都会出现这种分裂主义（帕特奈克，1995）。第三世界经济中的发达地区能产生分裂主义倾向，这是因为，随着经济进步在全球化了的环境里越来越取决于直接的外国投资的流入，那些地区认为，如果它们摆脱了陪伴它们的落后地区的负担，它们从跨国公司那儿吸引那种投资的机会将更好。我们应该记得，第一个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是立陶宛，而它是最富的；第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它也是最富的。虽然无论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两个例子还是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因为落后地区感到它们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使它们的落后状况得以延续下去，它们就形成分裂主义倾向。

所有这些情况不足为奇：全球化必然使一个国家经济上的一体化破裂，因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时，每个地区都在与其他地区竞争，而且，每个地区的商品价格，不是根据国家层次上的决定来确定的，而是由世界市场确定的。分裂主义只不过是这种破裂的产物。

因此，正是构成着全球化和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使一系列的种族意识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凸现了。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困境培育着以这种意识为基础的冲突。因此，国内冲突出现是事务的一个方面，全球化和资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的另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远远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辩证地互相联系着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了这样冲突，即它们虽然是由全球化创造的物质条件滋生的，但它们本质上位于意识领域。然而，全球化还会产生另一种类型的冲突，它们是人们之间围绕现有资源的冲突，而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是，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化的人们，迫切要求生存。传统的例子又来自非洲。最近在非洲发生的最严重冲突的地区，即中非（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和撒哈尔地区，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即在那儿，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得最突出，而替代性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围绕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斗争，变得如此激烈得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所谓部落和种族斗争，也是旨在保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生存的斗争。一些人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冲突就属于这一类型。

一旦我们能够注意先进和落后经济在地位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术语，在两种背景下会有非常不相同的含义。以民族主义为例。加尔布雷思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于他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事件，使民族主义术语被注入了不可取的内涵。对于他们来说，资产阶级国际主义好像是某种能够确保那些恐怖事件不再重演的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主义和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码事。因为民族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基础，不管它的背景是什么，就把它当做一个没有分化的范畴加以诋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不管那种诋毁可能是多么善意和幼稚的），因为

这样做等于是与帝国主义压迫不谋而合。甚至对整个一系列蔑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激进倾向而言，这种说法也是适用的，因为，那些倾向反对的是——一切民族主义。

如果我们抛弃一切不分青红皂白的概念，而取而代之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显得仅仅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特别会显得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的确，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产生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合二为一的四场不同的战争组成的，而其中，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最突出和最具决定性意义），但也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斗争创造了空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最近的一个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大国在目标上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这种相对的团结不应该束缚住我们：一个促进了这种团结的因素，是国际上流动的金融资本的出现，它防止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封闭国家空间。但是，这种团结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一条反对第三世界的共同阵线，其结果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空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因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面临被追求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推翻的前景，它本来就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苏联的崩溃毫无疑问是限制这种空间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这种崩溃本身，不是与资本主义大国的相对更团结无关系。（在 1998 年 P. 帕特奈克和 C. P. 赞德拉斯卡尔的著作里，可以读到关于印度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机遇的更充分的讨论。）

因此，加尔布雷思说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是一种有着两个相当不相同的组成部分的进程：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相对团结的进程，它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相对立；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团结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国旨在确立反对第三世界共同目标的进程，这个进程消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

的空间，打破它们旨在实现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努力，强迫它们接受由这些大国控制的全球秩序。发达国家成功地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事实，只能支持我所提到的论点。世界贸易组织对第三世界内部的食物安全和自力更生产生的不利影响，已经被很多人讨论过（请参阅比如说达斯古普塔1998年的著作）。这两个方面当然是相互联系的。此外，虽然对任何渴望第三世界解放的任何人来说，希望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恢复到战争恐怖重演的地步，是绝对邪恶的，但是，假设这两个进程共同构成着一个走向国际主义的逐步进程的说法，也显然站不住脚。

社会主义者一向支持国际主义。但是，相信当前的全球化是走向那种国际主义的一个步骤，相信它代表在走向该目标的道路上的某种中间站，是极大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全球化和其资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一起代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进步力量必须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第三世界里实行民主的民族主义纲领进行斗争。当然，在这个苏联已经崩溃、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的世界里，为实现上述纲领而奋斗，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力量目前遭到的挫折，以及资本主义大国当今建立的共同阵线，都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我们都必须参加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其条件如何。



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分析

詹姆斯·佩特拉斯

一、简介

人们是以多种含义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的。比如说国家的全球性相互依赖、世界体系的成长、在世界范围的积累、地球村以及许多其他的概念，都根源于这样一个更一般的思想，即资本、贸易和投资，再也不局限于民族国家。按照其最一般的含义，**全球化**指的是货物、投资、生产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对于许多维护全球化论断的人们来说，这些流动的规模和深度，都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它具有的自身的机构和权力结构，取代了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从前的结构（赖克，1992；欧曼，1997；鲁阿尔德，1990；沃特尔斯，1995）。

全球主义理论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意义的批判进行辩论（塔普，1997；马格多夫，1992；克鲁格曼，1996；爱德尔斯坦，1982；泽文，1992；韦斯，1997；罗德里克，

1997)。该辩论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的，那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当今的阶段是代表一个新时代，还是基本上是过去的延续呢？还是说它是各种新发展的混合体系呢？通过讨论全球化这个术语本身是否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即可不可以用它理解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运动的组织和性质，我们可以理解上述问题。与全球化概念相对立的是关于帝国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即它力图确定上述运动的背景，方法是确定它们在不平等的权力和在互相冲突的国家、阶级和市场之间的位置。

本文是在理论层次上和在实践中层次上都重新思考全球化概念的一种努力。今天，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扩散到了世界几乎每个地理区域，把一切国家的经济归入在其统治之下，还在一切地方为了私人的积累剥削劳工。这个事实引出了若干特定的分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文里加以讨论。

首先，从概念性和历史角度的分析看：资本、货物、技术的跨国流动的源泉是什么呢？全球化究竟是晚期资本主义还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现象？如果它是后者，那么它和后来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在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造成了资本、货物、技术跨国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社会动因是谁呢？那些流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情况在更早的时期里已经存在的话，为什么今天说它是新鲜的事情呢？如果走向全球化的一个直线进程是不存在的，那么，考察资本、货物、技术的向外流动（世界市场）和向内流动（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的周期性倾向，不是更为合适吗？如果流动的方向是可变的，决定其方向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和组织机构和阶级因素是什么呢？在更一般的理论层次上，如果因为不同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货物、技术的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变来变去，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理论家的主要论点是认为全球化是不

可避免的，而批评他们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偶然性的。

我们将批判性地分析全球化理论家们的若干基本前提：关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论断；关于它代表一个崭新的思想；对替代方案的否定。我们还要分析在它的自负的论断和缺乏说服力的解释之间的差距：关于自己是社会理论的精华的说法和几乎等于是胡扯的结果之间的差距。因此，引进了“关于全球化的胡扯”这个概念，以突出在全球化的陈词滥调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在下一个部分里，我们将通过集中研究劳资关系和国家权力，来分析资本、货物、技术跨国流动的增加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基础。在本文这部分里探讨的假设争辩说，在积累陷入严重危机的背景下，政治和阶级的权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一些有利条件被创造了，使原先封闭的地区里的流动增加了。技术的革新，起初是这些增长的流动的结果，后来是它们的原因。

促进了外部的流动的政治变革，也对分配产生了突出的影响。这里的假设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权力的增强，使资本解放了并由此运动了，但同时也使财富重新集中。这里的假设是，理解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用，目的是论证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国家资源日益被转移给资本都是正确的。它争辩说，尽管全球化理论在学术上的确价值不大，但它还是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目的服务，即它被用来在意识形态上论证日益扩大的阶级不平等的合理性。

本文最后一个部分集中探讨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反抗和反对，以及替代它的方案。如果前面阐述的关于资本、货物、技术跨国流动的分析，在指出了阶级和国家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的方面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由此推理说，改变阶级关系和权力，使当前的劳资关系被反过来，可以创造全球化的替代方案的基础。本文的最后部分考察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是私有化和它的局

限性。该部分还考察反抗的状况。在本文的结尾，提出了对全球化教条提出问题的替代方案。

二、概念的和历史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资本、货物、技术的国际流动，是沿着3条路线进行的。首先是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征服；其次是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第三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每一条路线体现不同的关系，并且有不同的后果。资本在帝国—殖民地之间的流动导致了不平等的积累，而它带来的劳动分工，使帝国的中心地区有经济的多样化和工业化，而沦为殖民地的地区，要专门生产原材料，从而容易受到原材料流动的变化的损害。国际资本流动的第二条路线是发达的帝国中心之间的流动，双方是互利的，因为，海外的资本受到了调节，使它能够补充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即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和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经济与其帝国的中心地区的关系的限制。第三世界内部的交流的主要时期是在它没有沦为殖民地之前和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的工业化阶段。

理论上的关键在于资本、货物、技术国际流动的扩展的漫长历史、源泉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关系和后果。历史的事实是，美国、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着长达几个世纪的与海外市场联系、交流和在该市场进行投资的经验。此外，从它的早期成长是以海外交流和投资为基础这个含义来看，在北美和拉美，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日就是全球化的。从第15世纪到第19世纪，拉美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比在第20世纪更重要。同样的事情是，英国在17世纪的资本的形成，有三分之一是以国际奴隶贸易为基础的。因为它诞生时是全球化的，国内的市场只是在19世纪中

叶才开始有意义，而这归功于雇佣劳动的增长、当地的制造商以及使在面向国内和面向国外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国家的作用。

从全球主义到国内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的重大意义，是以中间阶级的出现为基础的，这些中间阶级下了决心，要在反对金融家、生产饲料的出口商和生产粮食的出口商的政治经济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这种转变不是很顺利的：在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它以两百万人的性命为代价，使搞全球化的庄园主屈从于西部的农场主和东部的工业家。在 19 世纪，在主张全球化的人们与国内生产者就经济的方向进行争斗的时候，内战和海外干涉席卷了拉美。在亚洲，为了使亚洲全球化，进行了重大的战争（鸦片战争、贝雷到日本的远征等）。当时，正在兴起的国内生产者，在传统的精英的领导下，对此进行了反抗。问题在于现代的正在兴起的生产者认为，以欧洲的商人、制造商、当地农业精英和矿业精英为基础的旧帝国形式的全球化，是对发展的重大障碍。全球化的直接敌人是衰老的皇帝（中国）或者腐败的独裁者（拉美）这样的事实，不应该模糊这样的事实，即在 15 世纪到 19 世纪出现的全球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严重障碍，美国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直到 20 世纪，全球化的客体和主体是特定的社会集团。虽然资本和货物跨越了国界扩散出去，但这是集中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扩展的结果，无论在输出资本的国家，还是在接受资本的国家里，都在各个阶级之间，提供了不平等的好处。今天，即使是原来纯粹是接受资本、货物、技术的国家本身也变成了出口者，上述的倾向甚至更加突出。今天的关键区别在于，来自原先的殖民地国家里的跨国资本家们，也参与了资本输出和建立地区性的主导地位的活动。

中国、韩国、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就是许多例

子中的几个例子。然而，要害问题仍然是，新积累中心的复制和来自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的亿万富翁的加盟，没有从质的方面改变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拉美、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仍然继续专门从事初级货物的出口，并以很高的剥削率和在支付的利息（佣金）以及服务费用（保险和利息）方面的巨大不平衡提供劳动力。要害在于资本、货物、技术流动通过当代的不平等关系的扩展，是过去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继续。全球化的主体是主要的商人、投资者以及服务的提供者，而他们的政策客体是对像国家里的工人、农民以及民族生产者；前者与后者的利益是不同的和互相对抗的。因此，被描写为全球化的那个过程，在本质上是过去的情况的继续，其基础是剥削性的阶级关系的深化和向原先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地区的扩展。目前的关于全球化是个新现象的说法和关于我们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一个新阶段的论断，主要是以这样的论断为依据的，即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和扩展足以确定新的时期。全球主义的思想家们忘记了，过去的经济活动，比现在的更加深刻地扎根于国际交流和生产；他们还忘记了，今天的基于国际流动的扩展，只是最近出现的事情，它还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要发动机。此外，资本主义扩展轴心从国内生产和交换（扩大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转移，始终取决于决定经济政策方向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

将全球化概念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进行比较和对照，以凸现前者在分析上的弱点和后者的优点，是很有用的。就各个概念的说服力而言，有若干方面应该考虑：权力的尺度，所代表的具体方面，对地区、国家和阶级的不平等的理解，收入、投资、支付项目（佣金、利息、利润、租金等）的流动方向。

全球化概念主张国家的相互依存、它们的经济的共同性、它们的利益的互相一致性、它们的交流的共同受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强调的是搞帝国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和银行对欠发达国家和

劳动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在今天的世界上，显而易见的是，搞帝国主义的国家并不依赖于它们与之进行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有许多不同的供应者；运行的经济单位大部分由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股东拥有和操作；所支付的利润、佣金、利息是以不对称的方式向上和向外流动的。在国际的金融代理机构和其他世界性机构里，帝国主义国家拥有超过比例或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支配的国家是低工资地区，是利息和利润的出口者（不是进口者），是国际金融机构事实上的俘虏，它们高度依赖于有限的海外市场 and 出口产品。因此，关于帝国的概念比起全球化概念所基于的假设，更好得多地符合现实。

就社会的力量——即跨国的资本、货物、技术流动的主要动力——而言，全球化概念强烈地依赖于关于技术变革加上伴随它的信息流的含糊概念和关于市场力量的抽象概念（沙森，1997；卡斯特尔斯，1993）。与此相反，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认为，跨国的公司和银行和帝国主义的国家是资本、货物、技术国际流动的驱动力量。对重大事件、世界贸易条约以及地区性一体化计划的考察，将迅速地否定任何强调技术上决定因子作用的解释：确立全球交流的外壳或框架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头目们。在那个外壳里，资本运动的主要交易和组织形式，发生在跨国公司里，而且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其雇员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根据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任命的）。技术革新是在促进这种权力结构的参数范围内运作的。因此，与关于全球化的概念相比，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能够就资本、货物、技术在全球的运作的社会动力，向我们提供更准确的理解。

涵盖着在世界、国家和阶级层次上的长期和短期的大规模收入流动的数据，始终一贯地表明，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被统治的国家、投资者和工人以及农产品出口商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都在扩大。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假设与这种结论相一致；关于全球化

的理论的假设，在这方面，也被证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此外，在资本、货物、技术国际流动的扩大和不平等的扩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不平等指的是在国家之间和在国家内部企业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理论为了保住面子而能够采取的最佳措施是，从争辩说全球化能够带来普遍的繁荣，转移到用关于不同的贡献应该得到不平等的报酬这个观点，来论证不平等的合理性。在这方面，论证是以为自己服务和同义反复的方式进行的，其核心是对资本的贡献的强调和对劳动的作用的贬低。甚至在这个方面，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更接近要害问题，因为，它集中说明劳动如何创造价值 and 资本是如何占据价值的问题，即它说明了受剥削的地方（劳动、被统治的国家）不同于进行积累的地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公司、国家）。

收入、投资以及佣金的国际流动的结构，不符合全球化理论家们提出来的任何一个关于互相依存的世界的概念。与此相反，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资本向帝国主义的公司的单向集中和单向流动。

在军事政策和情报行动的方面，上述说法同样有效。干涉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从帝国主义的中心到被统治的国家。军事领导机构并没有互相渗透，只有帝国主义中心的军事机构扩展到被统治的国家。在法律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提出治外法权的要求（即要求承认它们的法律高于其他主权国家的法律）——打击目标是被统治的国家。

这些经验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争辩说，与全球化的概念相比，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具有更大的科学使用价值。无论是作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解释，还是对它的组织原则，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今天的世界里的斗争，不仅仅是在不同的概念、历史或分析的框架之间进行的，而也是在活生生的活动分子之间进行的。

理论上的解释极其重要，因此，研究一下参与这些斗争的政治力量，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三、对“全球化”的支持者、反对者和持有矛盾心理者

虽然有各种类型的国际交流不是直接地植根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被统治国家之间的交流以及由人民调节积累的政权之间的交流），我们将集中研究资本、货物、技术的全球流动的帝国主义成分。

在世界的政治经济中本质上有3个阶级：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反对者和受剥削阶级以及既受剥削但又受益因而在其反应中动摇的那些国家和有矛盾心理的人们。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全球化的支持者，始终是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正在上升的国家。按照这个逻辑，主要的支持者是霸权主义的国家。显而易见，它们的优越的竞争地位，使它们在开放本国经济时，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而有很多可以受益的。尽管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第一，在上升的民族国家里，不是一切阶级都受益——受益的主要是大型的主导公司。第二，在宣布全球原则（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自由汇款）的普遍性的同时，上升的国家经常限制准入，以辩护政权的盟友（在经济的落后部门里），另外还建立有特权的贸易区，以排斥竞争对手。

上升的国家和它们的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企业是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同时，在受统治的国家里，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它们相对应的人们，也是全球化的坚强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内部的分野和结构上的效果同样很关键。农产品商业和金融阶级、进口商、矿产出口商、大制造商或者承包出口市场产品的血汗工厂主人，都是全球化的坚强支持者。

因此，全球化既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现象，又是一个阶级的现象。不对称的收入流动，影响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市场的成长，但促进着出口飞地的迅速成长和参加全球循环的当地阶级的致富过程。

支持全球化的第三个集团是从属于前面两个集团的因素，他们是与国际循环有联系的高级别国家官员（自我塑造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和出版商。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他们炮制理论和概念，以论证全球化的计划、战略和策略，并且开有关的处方。在被统治国家里，有大批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曾经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有名望的大学里受过学术上的辅导老师的训练。学者们在为被统治国家制定经济纲领时，他们的目的经常是要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此获得利润很大的咨询费用。他们的进入了政府的过去的学生，制定政策，参与腐败的商业活动，通过私有化政策积累巨额私人财富。

第四个促进全球化的集团是商人阶级：货物的进口商和出口商。他们既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又是它的受益者。例外的情况是当大型外国商业公司取代当地商业集团。除此之外，这个部门，特别是当它与当地生产者没有联系时，是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原则的坚强支持者。

只要这个集团保持其国家权力，它就是很难对付的一个构造。其主要权力基础在于其结构性的地位——在进行贸易、金融和投资交易的交汇处——加上它可以用于支付政治运动和社会组织的费用的金钱的数量。然而，作为特殊的重要资源的金钱，不是惟一的资源：社会权力和群众组织是潜在的关键平衡力量。

全球化的反对者能够靠他们的数量弥补他们在经济力量上的不足。在被统治国家里，特别是在拉美和亚洲的一些部分地区，以及在更小的程度上还有在非洲，全球化的主要反对者是农民运动。自由贸易政策导致了当地生产者被毁灭了，因为他们没有能

够和廉价的进口粮食进行竞争。给出口农产品生产者的资助，使小生产者受到损害，而刺激了土地占有的扩大以及贷款和技术帮助的集中。因为农产品生产者的公司在大型企业里引进了技术，当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从而创造了大批背井离乡的生产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消灭了非传统作物（可可、罂粟等），小农的小小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其结果是，在比如说巴西、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厄瓜多尔、巴拉圭、玻利维亚这样的关键国家里和其他地方，涌现着人数日益增多的大批激进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

第二个重要的反对全球化的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被统治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在法国、德国、韩国、巴西、阿根廷、南非和许多其他国家里的工人，都参加了反对全球化政策的总罢工。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他们反对的是转移工厂的危险，对退休金、保健计划的假期的消减，以及最重要的是，就业方面日益增长的不安全。在被统治的国家里，工人动员起来了，以反对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专横跋扈的管理、漫长的工作日以及日益减少的社会福利。

第三个反对全球化的阶级是公共雇员中的多数人，对预算的大量消减、私有化和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都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无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还是被统治国家里，这个阶级都进行了反抗。

第四个阶级是小业主，特别是在省城的小业主。国家公共资助的消减、非工业化、矿业和运输业的私有化，都使国家内地贫困化，而使财富集中在中心城市里的少数飞地里，从而影响了那些小业主的生活。廉价进口产品的洪水般流入，使许多当地生产者破产了，从而广泛引发了公民在建立多部门联盟基础上对政府提出抗议和进行对抗。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韩国、印度和秘鲁——至少在藤森独裁之前——都广泛地发

生了这类事件。

在过去，我们会把缺乏竞争性的国家或新型的工业国家纳入反对全球化联盟里。然而，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和管理阶级已经变成了全球循环的受益者，而且是根据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帝国主义命令确定政策的，这种做法难以坚持下去。

还有第三个范畴，即对全球化持有矛盾心理的阶级：特定的政策会使这些人既受益，但又蒙受损失。该范畴包括比如说：这样一些工业部门，即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有困难，然而，社会福利的消减和工资水平的降低，使他们受益。还有因为海外的竞争的厂家，他们转移到从事进口或者其他商业活动。消费廉价进口品的低工资工人。丧失了家庭成员和看到自己产品因为进口产品的竞争而跌价、但同时又可以依靠自由兑换的海外来的汇款维持生活的农民移民家庭。对这些部门的摇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干预、组织和斗争。当全球化的阶级掌权时，这些有矛盾心理的阶级宁愿适应全球化的包围，而不那么愿意进行反抗。如果当反对全球化的阶级处于上升的时候，有矛盾心理的阶级会参与公民的罢工，要求扩大政府的保护，并盼望国家对血汗工厂和装配工厂进行调控。

今天，全球化的支持者、反对者、有矛盾心理者之间的分野，存在在各个阶级之内，即使主要的受益者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之内，而受剥削者存在于受统治国家里。然而，要害问题在于把互相竞争的支持者和受剥削的反对者相联系的国际网络并没有发展得很均匀。支持者们拥有自己的国际论坛和组织，从而是共同行动的。受剥削的反对者仍然分散在各个国家里和在国家之间。反对者在结构上有共同性，但他们主观上很分散，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然而，关键问题是，支持者和受益者控制着民族国家的核心，它们有能力把它作为很强大的武器利

用起来，以创造全球性的扩张。反对者很软弱，其部分原因在于组织上——反对活动是围绕各个部门的要求开展的，它们都没有国际联系和意识形态上的义务。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关于公民社会的陈词滥调和关于民族国家不合乎时代要求的说法的扩散，在争取国家权力的斗争中，反对者被迫靠边站了。反对者的解决办法没有认识到，在各个阶级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世界里，民族国家继续有力量来塑造世界。

支持者、反对者和有矛盾心理者的结构，与全球化政策在分配上的结果密切相关。在地理上对财富进行了重组。帝国主义国家（北美、西欧、日本）、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沙特阿拉伯、韩国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集中了世界大部分资产和财富。同时，在受统治的国家里，在从私有化计划中涌现出来的新财团的亿万富翁经理们当中，形成了财富的飞地。

在受统治国家里，贫困化的关键区域是城市郊区、乡镇、省城以及较老的矿业和海港地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从前的工业区和农业地区，特别是存在富有战斗力的工会的地区，都受到打击。

在工人阶级内部，儿童、妇女和少数民族得到的工资低于一般的工资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保险。他们的主要防卫是跳槽更换工作，在百万富翁华侨拥有的沿海工厂里工作的大陆中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工作场所里，外来移民工人、没有调控的部门（所谓的非官方部门）以及做临时工的年轻人，都受到全球资本雇佣和解雇的绝对权力和其转移资本的威胁的恶劣折磨。在拉美和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随着工资和薪金水平的下降，走下坡路的公务员、教师和保健工作者，都处于社会斗争的中心地位。

在多数老工人和新工人正在经历生活水平的相对或绝对下降时，在金融、血汗工厂、群众性娱乐以及毒品、色情出版物和走私活动中，出现了新的亿万富翁阶级。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东欧，

后者很强大。

对全球化的态度很清楚地是由结构性的地位和其分配上的后果决定的：其意识形态和普遍的吸引力，扎根于其对深刻的阶级基础和阶级上的不平等的神秘化。关于普遍性和抽象国际主义的呼吁，被其与民族国家和扎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持续密切联系否定。

四、全球化的周期性本质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其本质的变化和指挥国家的特定资本家集团所伴随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有时还受到劳工运动、左翼政党和经济过程（经济危机、衰退、通货膨胀、崩溃等）和技术突破的影响。这些变化对于确定对内和对外投资的方向和两者的比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扩张，交替地依靠了全球的流动和内部市场的深化。由重商主义资本家、贸易公司以及奴隶贩子领导的早期殖民主义征服，是早期全球化（15~18世纪）的动力。保护主义和民族工业的成长（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促进了国内工业的成长，而使作为积累的核心成分的全球流动相对减弱。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前殖民主义的生产制度（其中，比如说在印度，纺织业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点）基本上面向国内市场和（或）遥远的非欧洲贸易（即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殖民化为定居的移民铺平了道路，他们取代了原来土著经济精英集团的统治，重新调整了经济的方向，使其面向世界（欧洲和后来北美）的市场。在19世纪，由当地出口精英集团（矿主、地主、商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全球化进程深化。拉美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变得更加突出，除了像巴拉圭的例子之外。巴拉圭曾经试图执行和欧美的做法相类似的政策。

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推动走向由外部因素刺激的成长最后一次运动（在目前的运动之前）启动了，但德国和美国是值得注意的例外。后者将对正在兴起的工业提供大量保护和有选择性的对外帝国主义扩张结合起来。当时的全球化所涉及的门户开放经济政策，远远超过今天的实践：旅行不必使用护照，不存在管理劳工和环保的法律，对外汇不实行控制，限制中央银行权力（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克鲁格曼，1996；爱德尔斯坦，1982；霍格费尔德，1997；泽文，199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个时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个时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短暂的恢复，但 1929 年的全球性大萧条使它彻底结束（或者说，在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看来是这样的）。在 1945 年和 1997 年之间，全球化或者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重新出现了，但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只是在 80 年代后期以来才加速的。即使在今天，在它近年来迅速增长了的情况下，全球贸易并没有占构成国民总产值的货物和服务的大部分。

在第三世界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门户开放政策被削弱了，原因在于涌现出来的新制造商和中间阶级生产者，都要求在国内市场得到更大的保护和发展。

因为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相对增长了，一个阶级分化过程发生了。这两个阶级中，一方面是民族生产者和与其结盟的人民阶级（劳动者、雇农、农民等），另一方面是全球主义的出口商阶级（商人、大地主、矿主等）。1929 年的崩溃决定了全球主义战略的命运，尽管它没有彻底取代出口商阶级。从 30 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拉美的国民总产值越来越多地以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为基础，尽管当地生产者继续依赖于出口精英来获取外汇以支付资本货物的进口。在 70 年代，这种局面开始改变了，各国开始重新按照全球主义的办法依赖于资本、货物和技术在国外的流动。然而，这种旨在创造强劲成长的新动力的努力是很漫长和非常不成

功的。在拉美国家中，智利拥有最丰富的符合世界市场条件的资源（矿藏、木材、海产、水果）。在上述转变中，它最成功。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率最高的国家，因此，其经济是最不可持续的。多数其他国家相对少地依赖于对资源的开发，因此，它们长期维持各个经济部门和阶级的合理增长率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亚洲、北美和欧洲，旨在推动各国更加依赖资本、货物和技术在国外流动的运动是不平衡的：虽然它在全局上是增长的，但同时它也是有选择性的（即它是和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和促进一体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但同时也在财物、支持和促销方面，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

因此，全球主义主张的与国际交流有深刻联系的经济的建设，是一个出现得很缓慢的、有周期性变化的过程，它仍然与民族经济有密切关系，并且在其海外项目方面高度依赖于民族国家（巴尔利，1994；曼，1997；佩特拉斯和莫尔利，1995）。主要的动力来自多数跨国公司，它们的利润大部分仍然来自国内市场，尽管它们的海外收入的百分比在增加。构成着跨国公司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技术革新的补助、工厂建设、对出口的促进、对劳工的控制、免税措施等，都仍然由民族国家制定。

哪些因素影响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周期性变化呢？从本质上看，我们可以确定3个普遍的、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变化，比如说战争、危机、新市场的开拓；其地位上升到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出口商阶级；为了进一步执行旨在对外扩张的经济战略而对国家的组成进行的变革和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在历史上，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远远不是直线式的过程，而是不断在较长的时间被打断和破坏的过程。在历史上，至少在过去的世纪（19世纪——译注）里，直线式发展不是规律，而是一种例外情况，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竞

争导致了各国采取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措施，战争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的反抗使资源被输送到国内。

当今的全球化浪潮是最近的事情。在拉美、欧洲和亚洲，它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它的社会支持的基础很成问题。即使作为一个经济纲领，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合法性提出问题。不容置疑的是，主张扩大对国际交流的依赖的倾向在增加，各国日益愿意推动和深化该过程。在目前的条件下，在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损坏工人、职工、农场主和农民利益的效果。与全球主义国家战略的决裂，也将带来一个社会经济脱节的时期，还将使金融公司、跨国公司经理和支持他们的阶级付出特别高的代价。然而，要害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的崩溃、革命左翼的失败以及劳工和社会运动的相应削弱，都为全球主义政策的强制执行，提供了最充分的条件。

高额利润的政治本质，可以从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其成长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看出。在目前的全球主义时期里，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成长表现了很差的结果。在促进全面的成长方面，所谓的技术革命，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或者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技术上更落后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智利和土耳其，成长得最快，这主要是基于对劳工的广泛或高效剥削、原料的提取以及便宜的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因此，资本的国际化进程是以开发新疆界和确定谋求高额利润的对方为基础的。它不是以发展和深化生产力为基础的。因此，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正在创造更多的资本主义、更多的工资劳动者以及更多的出口或进口，但从总的来看，它没有能够克服停滞不前的倾向。

如果外部机遇不能导致强劲的成长，出口商阶级地位上升的原因何在呢？答案应该在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权力的转移和它从帝国主义中心到其余世界的扩展来寻找。事情的基本事实是，西方的资本家阶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

使工人阶级遭受失败：在对国家的控制、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在工厂的层次上是在工作制度、工资、谈判权力、就业方面；在个人的层次上是在安全、觉悟、恐惧方面。

因为工会运动高度官僚化了，而且脱离基本会员群众，又高度依赖国家给它的好处，资本家阶级利用了它来削弱劳工的谈判力量。这是从70年代早期开始的，而在90年代加速的。资本家们制定了露骨的资本主义战略，在福利问题上拒绝任何让步，但工会官僚们却坚持关于社会契约和福利国家的老概念，从而不能也不肯制定反资本主义的战略，或者考虑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家们掌握了国家，劳工却仍然只是一个压力集团，一个局外集团，只是与部门的斗争和狭窄的工资问题有联系。资本家们控制了群众媒体，工会却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性媒体；资本家们的反工会法律一个接一个地出笼，使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紧，工会却随着其会员的减少转向搞服务。

阶级斗争在全球主义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如果我们将英国、美国与法国、德国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就很清楚。在英国和美国，全球主义走得最远，在那儿罢工很少，而经常失败，在法国和德国，工会坚持发挥罢工武器，使工人仍然保持较大的国有部门、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工业。在第三世界里，在劳工受到国家的最严重压迫的地方——墨西哥、智利、阿根廷——走向全球主义模式的过渡走得最远。

在过去的经验中，也能够看到相反的情况。从3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进步瓦解了出口商阶级的权力，还使国内市场的成长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福利国家的创建和国有企业的增加，都是出口模式的崩溃和支持它的阶级的危机和转移的产物。在欧洲、亚洲、东欧、拉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以及在非洲的民族主义政权的成长，都迫使了西欧和美国的资本家阶级为拉拢工人阶级，以通过提供工资和福利上的

让步进行竞争。搞出口的资本家们被强迫去解决国内需求。工人和农民的战斗精神使全球主义有所缓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使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实行社会福利。

巴西工人阶级在 1964 年的失败、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在 1966 年的失败、拉美工人阶级在 70 年代的失败、苏联的崩溃、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以及美国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的转变，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使国家政策从一个在全球主义和福利中间进行协商的力量，变成一个直接为资本、货物和技术国际流动服务的工具（佩特拉斯和费尔尤克斯，1996）。

阶级力量的变化和国家的重组，是支撑国际流动的成长和全球主义作为合法权力的意识形态兴起的基本条件。

五、全球化：过去和现在

当代的全球化和过去的不同吗？答案取决于我们观察的是什么。在过去，在出口商阶级占据主导地位时，从全球主义对成长的影响来看，全球主义比当代更重要得多。在 16 世纪和 19 世纪之间，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和当时新近被殖民化的国家。尽管如此，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农业地区和甚至在欧洲的一些部分，在一些整块整块的区域或国家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是刚刚出现或者完全不存在。今天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的国家或地区。今天的市场交换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这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许多地方的交换。

第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很多的地区是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制度组织起来的，是某种集体主义的形式，它们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内运转。在最近的 10 年里，这些

地区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范畴，从而服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即使在苏联的多数地方里，多数未来的资本家们都与16世纪英国的海岛、强盗和奴隶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从事通过非经济手段积累财富的勾当。

有重要意义的连续性在于全球化的源泉和其不平等效果这两点上。全球化源泉的中心在发达帝国主义国家里（虽然具体国家有变化），全球化对帝国主义关系中的阶级和民族国家产生着不平等的效果。今天，如同过去，主要的贸易是通过欧洲、亚洲以及北美主要国家的经济中的巨大公司进行的。今天，如同过去，利润大部分被通过投资、贸易、租金和利息互相连接的统治阶级获取。在过去和今天，民族国家是组织全球性扩张的首要政治工具：贸易条约、补助、对工会的控制、军事干涉、意识形态宣传（自由贸易理论），都是民族国家管理精英集团发挥的重要职能。当时和今天一样，民族国家无法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投机高潮和低潮、生产过剩趋势以及停滞不前的危机。

当代全球主义表面上的新特点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正在从一个漫长的面向内部的成长时期走出来。在那个时期里，阶级力量的联盟所执行的意识形态（凯恩斯主义、共产主义、劳资合作）和政策，都使在国外的交流和投资从属于受到保护的工业的成长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在面向国内的发展上升之前的经济历史，我们将发现它与当今全球主义的形式具有重大的结构上的共同特点。

和过去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事实，即以前的面向国外发展的时期，因为爆发了战争和出现了萧条，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目前的形式还没有进入它的最终阶段——虽然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明，历史上的那个特点将重现。例如，在过去和现在，投机活动都超过了生产性的投资；崩溃之前都是漫长的停滞不前的阶段，在美国、日本和西欧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随着不平等的加

剧和社会的不满的加深，全球主义有可能进入一个这样的阶段，即用一位投资银行家的话来说，在这个阶段里它将“达到这些解决办法在政治上被接受的极限”（《纽约时报》，1997年6月20日，第A~10页）。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今天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扩散到一切地方，目前是惟一的经济制度。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直接反对者不是其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包围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而是处于体系内部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等）。反抗不是由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精英或被排斥的阶级进行的，而是由创造价值的被纳入了体系之内和受它剥削的人们进行的。

全球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运动的规模更大（霍威尔斯和伍德，1993；塞尔尼，1999；丹尼埃尔斯和利弗，1996）。财富跨越国界的转移，特别是金融的运动，大大超过了过去的运动。使这成为可能的是植人社会里的大型组织网络和新的电子技术。然而，不管这些运动多么大，都是通过老的网络运行的，那些老网络是今天的全球主义扩张高潮爆发之前建立起来的。各种不同种族后裔的网络（华人的、印度人的、中东人的、犹太人的等）和扩展的家族财团（特别有效的是亚洲的华人后裔）影响着现代的银行和投资渠道。在西欧和北美，从前已经存在的家族或阶级网络，通过电子技术的革新，深化了他们的影响。因此，在流动规模增长的同时，决定性决策单位被安置在各国的跨国公司里。

在当代的全球主义下，信息的传输和积累更加快速，数量也更大，但是，看来，在开辟高速成长的新阶段方面，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甚至日本和韩国，即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靠新技术推动发展方面最领先的国家，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尽管克林顿采取了自我赞扬的态度，美国还是在增长率几乎不能赶上人口增长的水平上徘徊着。技术不同于过去，但是，这一点本

身，既没有导致新阶级结构形成，也没有提供新经济动力或国家结构。新技术扎根于从前存在的阶级、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矛盾和规则之中。声称信息是新的资本的概念，当然是胡说八道。关于大量的新信息和倍受赞扬的输入并处理信息的职员们是经济的新首脑的思想，也是胡说八道。

信息积累和交流的关键在于对其分析和使用，还有其概念的框架，因为指导信息分析员工作的问题，正是根据这个框架制定的。这些并不是独立的因素，而是植根于权力结构的个人或阶级——这些结构在某些时候将信息转化成为利润，在另一些时候却将其转化成为亏损。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信息是获取利润的重要因素，但是，它能够那样做，那是因为，有资本家雇佣信息收集员来做卑下的工作，即打印图案、表格和曲线，总结数据，然后把它们整理成简要和实用的形式。

资本运动的速度使资本能够改变其地点，也使它能够迅速积累起来，但这仅仅是简单地加速已经存在的流动性，并不导致资本总额有任何增长。速度与生产力的成长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主要是在平行的领域里运转的。货币经济与真正的经济职能的关系是很微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对真正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说，在金融市场或者交易所严重崩溃时，它就产生影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尽管在速度和规模上有新特点，但它没有在质的方面明显改变真正的全球经济的结果和运作。它顶多通过使个别代理机构更容易地进入更多的调动资金的地点，扩大了资金运动的独立性。但是，它也是相对的独立性，因为，各国政府之所以选择了对这个领域不进行调控，不是因为规模扩大了（每天数万亿）和运动很容易（触摸一下电脑按键就可以了），而是因为得到最大好处的民族国家（美国、西欧、日本）都已经实现了非调控化。正因为高速计算机能够在每秒之内处理几十亿个项目，以及正因为资本和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了更大的一体化，现

在可能提出一套新的规定。

最后，当代的全球化深化和扩大了国际劳动分工：用于制造汽车的零件是在位于在遥远的民族国家里的工厂生产的。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承包给了不同地区的劳动者。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工作输出到第三世界以及在帝国主义中心里保持一群低工资服务行业工作者和高工资管理精英的过程，已经有所发展。变化在于现在让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参与制造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化（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家们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在第三世界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部分工业产品，主要用于国内的消费，而且由国内的主人生产。当然，也有少数一些国家，在那儿，而且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文化服务和金融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的出口产品和投资者。

让我们回到文章这部分最初的问题：当代的全球化是否不同于过去的全球化？答案是，在数量方面，是“是的”，在结构和决定全球化过程的单位的分析方面，是“不是的”。此外，过去和现在的主要区别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课题——事实上，前者终结了（危机和崩溃），而后者还相当健康。

六、全球化——不可避免性和偶然性

全球化理论家们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这样的思想，即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技术推进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将趋同，使除了以资本、货物和技术跨国流动为基础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增长都被排斥（欧曼，1996）。他们断定，全球化是历史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它将使一切国家和经济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这种论断不是科学的，而更多是一种标准。一个早先提出来的更原始的说法谈到历史的终结，在那个时候，市场、民主和繁荣使一

切冲突、专制政权和贫穷的统治都结束了。

关于特别是政治经济过程的不可避免性的概念，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驳斥，它的历史是漫长和可耻的。对于被经济的景气吸引了的观察家们，历史似乎是预先决定的结局，而且这说法适用于未来所有一代代的人。这种看法的依据一般是关于历史的狭窄看法，按照这个看法，所有的事件都是预先注定的，都必定形成当代的特定结局。在他们关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明显看到同义反复的论证：所发生的是应该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是单独的一套事件的产物；在现在存在的情况与一切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即前者没有过去的冲突或矛盾的过程。这种看法认为，历史是个直线式过程，它由预先决定了的事件组成，这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标准的情况是，一般条件相同的各种状况，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例如，相同的经济过程和殖民化经历（结构性的共同点），导致了很不相同的结局。在 20 年代和 40 年代，中国都同样地欠发达：在前一种情况下，反革命成功了，在后一个时期里，革命胜利了。同样，因为偶然因素——政治干涉、觉悟、组织能力、战略等——在世界大战后，各国的后殖民主义结局是不一样的。

在过去，全球化的出现是由大量的结构性和历史性条件决定的。由更早的全球化周期滋生的正在兴起的互相对抗的阶级和国家关系，导致了政治分裂和全球化的相对衰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衰落。在全球性扩张的每个阶段，涌现了一些全球主义理论家，他们用“英国保障的和平”、“美国世纪”等言词，美化、论证和感谢全球化过程的领导阶级。

更善于思考问题的全球主义理论家们，至少了解了全球主义扩张过去的衰落，从而试图制定不同的研究路线，即掩饰过去的缺点，突出当今的全球性世界秩序的单一性（克鲁格曼，1996）。

通过忽视过去的矛盾和它们今天是如何超过过去的，全球主

义思想家们倒退到一种技术宿命论。通过空洞地断定新的计算机或电子具有神秘的功能，他们希望说服或者欺骗公众去相信，新的全球体系是克服了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冲突的科学、技术和理性的产物，并且是由它们指导的。与此相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重大的阶级冲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出现，被归类在一个容纳剩余项目的范畴里，该范畴还被贴上了“与时代不相符合的现象”的标签，或者被描述为过时的集团或思想家们的最后挣扎。

但是，贴标签不能解释问题；把剩余项目拼凑在一个范畴里，也不是恰当的解决办法，这样不能对付集中在全球主义命令的旋涡里的正在发展的运动。在拉美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前扎伊尔）农村和小城镇的新的社会运动与大城市里的斗争之间的联系，法国、韩国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新一代人日益富有爆炸性的情绪，这一切都说明，为了使全球市场里的份额最大化而在国内进行的剥削，带来了内在的深刻分裂。

为了能够在不那么强调哲学而更强调分析的层次上对付关于不可避免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研究当前的全球化形式的根源、动力以及未来前景。增加或者运用技术，没有产生大力促进全球性增长的效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全球性的过程是由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里的更基本的决定塑造的，为了促进它们，技术和革新被一体化到这些过程之中。全球主义的根源主要基于政治变化，它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的特定资本主义变种的兴起有关系。

最早启动这一套的人们可以在智利找到。他们纯粹是军事政变的产物，后来得到了里根和撒切尔政权的扶持。这并不是说，在这些政权上台之前，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没有在世界市场上活动。要说的是，搞全球化的人，不得不与当地资本、工会和其他的人民政治力量共享权力和资源。因此，在国内市场通过福利国

家实现发展的主张和推动资本、货物和技术跨国流动的主张之间达成的妥协被破坏了——通过政治权力，即要么通过军事独裁，要么通过大选产生的政权（它们也选择性地运用权力）。

因此，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战略的根源，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项目的结果，不是市场的自然发展。事实上，在全球主义之前的时期里，技术上的重要突破，都是发生在各种非全球主义背景之下。这就驳斥了技术全球主义者们塞进他们的论战中的意识形态解释。

在全球主义项目的根源、推进和未来命运中，存在的偶然性不是不可避免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七国首脑会议（G-7）为什么不断地多次企图不合理地和疯狂地扶持要倒台的政权（墨西哥），或者通过在前苏联加速严重破坏生产和使数百万人落入贫困的经济改革，以及通过在东欧扩大北约的组织，来使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逆转。全球主义项目的持续需要一定条件，其持续存在是不稳定的，它在长远上的继续存在是有政治极限的。对这一点，全球主义的思想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实践全球主义的人肯定意识到了。因为全球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让它面对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

七、作为全球主义鬼话的全球主义： 陈词滥调和现实

脆弱的社会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有人代表它们发表夸张的论断。他们相信，关于那些制度是不可战胜或不可避免的说法，能够弥补结构上的弱点。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围绕出口资本家和金融家的全球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整个意识形态建筑。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和对现实的纯粹想往，能够维持一个要不然是很脆弱的政治经济制。这观点反映全球主义政

治家们头脑很简单，以致想用心理骗术取代靠有实质内容的纲领开展的政治活动。

全球主义鬼话这个术语是首先由鲍勃·费兹提出来的。它最准确地抓住了全球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空洞的、倾向性的、同义反复的论据。

全球主义者首先认为，世界普遍地朝着全球化前进，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被拖入共同的一套市场关系。考虑到占据绝对多数的人群有意识地拒绝旨在推进全球主义项目的政策，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该论断。我指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马斯特里赫特，以及北美、欧洲和亚洲建议的自由贸易理论。我们感到，它们没有得到普遍支持的状况，像个催化剂那样，促使它们发表更加夸张的论断：最好的政策变成了惟一的政策，经济上的进步变成人类历史的顶峰。在面对脆弱的社会支持时，提出来的这些没有根据的论断，特别是关于不可避免性的概念，都是全球主义鬼话的概念分析的主要因素。

像由全球主义者炮制的关于不可避免性概念，包含一种救世主般的启示，这如同专利药品制造商关于他们产品的宣传，或者巡回传教士对不信教的人们的劝说：如果它不在这里，它正在到来；如果看不见它，它就在地平线后面；如果它还在造成痛苦，繁荣和健康立刻就即将到来。这一切包含着一些骗术，因为设计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欺骗无知的人们，或者吸引对其他不可避免性论断丧失信心，从而需要加入新信仰的人们。

在全球主义鬼话之背后，有这样的严肃事实，即大部分国家，以及其内部的人类的绝大部分，都反对全球主义的行径。这是为什么在参加竞选时，全球主义政治家们都要掩饰他们的信仰，而把自己装扮成批评全球主义的人——在上台掌权后，他们却将更加变本加厉地搞全球主义。克林顿、梅内姆、卡多索、腾

森、希拉克、普罗迪、卡尔德拉，¹⁾ 在参加竞选时，最初都是批评自由市场的，而自由市场正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因素。今天，在欧洲、亚洲以及拉美，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全球主义政策的群众性反对。《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说，“赞颂自己经济的美国，在峰会上没有支持者。”如果在峰会上没有羊，那是因为在这条马路上没有驴（意即会上会外都没有盲从的傻瓜——译注）。韩国总统的主要顾问之一就克林顿向其余世界鼓吹的全球主义鬼话精辟地说，“韩国人不会支持那种经济上的不稳定。”

全球主义鬼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说自己是未来的浪潮。在这里，思想家们描绘一个未来主义的世界，其中，在全球市场上发挥作用的有强大动力的技术，生产着高质量的货物，并提供先进的服务，供人数日益扩大的人群消费。全球的现实离全球主义鬼话这些论断很远：在 21 世纪前夕，社会条件正在倒退到 19 世纪（佩特拉斯和莫尔里，1995）。保健正在变得更加脆弱，并且更加依赖于收入水平。在美国，6 千多万人完全没有或只有不充分的保健，1 千多万儿童没有保健。就业越来越没有保障，因为，经理们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可以像查尔斯·狄根斯时代的主导做法那样，随意雇佣和解雇雇员，并且随意承包非全日制工作和临时工作。贫困的家庭被迫在维持最低生存的工资水平之下工作，否则就会挨饿。今天，比起 30 年前，更多的工人延长了工作时间。退休年龄接近 70 岁。雇主们再也不提供退休金计划。监牢的劳工被私人雇主雇佣，以获取私人利益。孤儿院里的儿童数量在增加，生活贫困的儿童数量也在增加。不平等在接近或者超过 19 世纪的水平。把全球主义比作一个“暗流”，是更恰当的以海洋给它做的比喻（这比起把它比作“未来的浪潮”更恰当）。这个“暗流”把劳动人民重新拖到充满屈辱的过去。无论在美国

1) 美国、阿根廷、巴西、秘鲁、法国、意大利和委内瑞拉的国家元首。

还是在欧洲，对多数年轻一代的人来说，未来看上去没有保障和可怕。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走下坡路的人。争辩说全球主义是未来的浪潮，等于向未来的几代人许诺延长他们的一生的工作时间，同时减少他们的工资和不向他们提供任何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全球主义鬼话的本质在于否定这种现实和鼓吹美好的前途。

未来意识形态的浪潮，与特定的一批资本家有关，他们在全球主义的核心工作——他们是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他们已经进入美国最富裕的公司的前列里去了。哥尔德曼萨赫斯（GOLDMAN SACHS）集团，即华尔街最大的私人伙伴组织，在1997年可能挣到了将近30亿美元。在1975年，经济和投资银行挣到了48亿美元。到了1994年，它们一年的利润增长到了695亿美元。相比之下，最大和最成功的公司，即微软公司，其税后利润为22亿美元。显然，对于投机商和金融家来说，全球主义是未来的浪潮，但把他们与其余人类混同起来，是最不恰当的事情。散播全球主义鬼话的人在论战风格方面的一个内容是，在谈到促进某些人的利润和多数人生活条件的下降时，他们有意地模糊特定的阶级差别。

在这些混蛋的论点都被揭露和驳斥了之后，他们最后逃难的办法是举手并叫喊“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一种为他们自身服务的办法，目的是为全球化的失败炮制合理的理由来。这种论断的基础是对失败的承认，对反抗的否认，以及削弱反对者精神的企图。这种战略一般基于简单的两分法，它的两个方面是失败的共产主义和继续前进的全球主义，从而把复杂的经历压缩起来了，而排除了像镶嵌图案那样丰富的过去和现在的替代方案。该论断的依据主要是庆祝胜利的态势。其依据是对今日世界的肤浅观察，它突出了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在以前敌对地区的渗人。问题在于这个预言性态度观察的是附带现象和相对短的时间。这种分析

缺乏深度，它回避了所滋生的国内冲突、不受调控的投机造成的不稳定和动荡，以及缺乏一个经济动力中心的问题。在利润增长的同时，它主张减少劳动费用，而不提高生活水平；在股市上升的同时，生产力停滞不前；在新技术成倍增长的同时，它们对真正的经济的影响被投机者的受益掩盖。

从本质上看，全球主义者面对来自三条路线的批评。

①全球性的扩张根源于历史，是由特定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决定因素塑造的。全球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把全球化归因于一套力量的综合相互关系，还认为这种关系能够逆转。

②无论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它们在全球网络里的帮手，植根在全球化项目中的社会—经济利益，都是少数人的利益。将这个少数人集团确定和追求其利益的做法，与人类的需要、利益和前途相混淆起来，是社会分析开的玩笑。此外，忽视全球主义对各个不同阶级、种族、一代一代的人以及不同性别的人的分化作用，是极其愚蠢的。

③把行为特征和政治命令归因于比如说市场那样的抽象实体，是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本来是要确定哪些机构和决策者是市场的制造者，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上的获取者。此外，试图把各种市场简化为一个由特定的阶级力量组合拥有和操作、由特定的国家组织照顾的市场，是抽象简单化的极端做法。争辩说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指挥着当代的市场交换形式，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和现在，都还有其他的真正的和潜在的市场，在其中其他的力量愿意并能够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交换，使它们带来与今天的市场完全不同的结果。

以分析的方法看待市场，与全球主义者的抽象简单化是相对立的，它首先意味着要研究市场交换在分配上对各个阶级的不同效果。在全球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辩论的部分内容是关

于方法的辩论：一方追求对交换进行系统的分析，另一方给抽象的与人无关的力量（他们提到了市场的命令）赋予人的特征，并从它们那儿推理出结果来。

与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把它贬低为全球主义鬼话，只是辩论的一个部分，关于全球化的动力的辩论同样紧迫。

八、全球化的动力：政治、经济、技术

走向全球化的大推动来自政治和经济。在政治上，大推动是政治权力的深刻变化，即政治权力从左翼的、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政权转移到了全球主义的政府。在社会上，大推动是工会的失败和退却以及工人阶级、中间阶级的下层和农民的影响的削弱的结果。从事资本、货物和技术国际网络活动的社会阶层的上升，但特别是金融部门的上升，为全球主义的反革命建造了舞台。这是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智利、墨西哥）和帝国主义中心（美国和英国）开始的，后来以不平衡的方式扩散到全世界。

全球主义者不仅仅对左翼政权的失败或危机作出反应，他们还强烈地介入了事态发展，以实现他们预言的结局（佩特拉斯和莫尔利，1980）。这种积极的作用的规模很巨大，而且涉及了直接的军事干预、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军备竞赛和与梵蒂冈和慈善基金会的政治联盟。例如，在拉美，从推倒了——受害者数以十万计——反对派的凶暴军事政权中，出现了全球主义阶级。在非洲，战争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这些战争消灭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地方的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里根政权赞助了一场军备竞赛，并有意识地谋求使苏联破产，而苏联却积极配合。在东欧，特别是在波兰，梵蒂冈在宣传和物质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把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中央情报局基金投入了团结工会的组织里。在东欧，亿万富翁投机商人乔治·索罗斯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以培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从而使他们后来成为了执着的亲资本主义的和亲北约的政客。

这些地区的内部危机，通过中和人民的潜在反抗，配合了积极的全球主义运动。新的全球主义阶级的上升，起初没有受到争议，它的净效果是，公众对资本主义对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剥削的控制和限制削弱了，矿业、金融和制造领域里的重要积累杠杆被交给了私人投资者。民族国家在压低工资和取消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强大作用，使巨额的资金被释放出来了，供全球主义阶级中饱私囊。远远没有随着全球化而削弱的民族国家，变成了传播全球主义信条的重要政治工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有影响的帝国主义政权提出，提供贷款和借款的条件是要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从而强行建立统一的全球主义政策。很不受人们欢迎的结构调整政策深化了全球主义阶级的权力，并且通过私有化和取消调控扩大了那些阶级对国家领导权的控制。民族国家和它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对全球化的大推动的重要因素。

最后，民族国家进行了政治干涉，以解救遇到了麻烦的对外投资者（日本和美国的银行）、投机商人（墨西哥，1984）以及跨国公司（洛克希德公司、菲亚特公司）。这暗示，为了维护充满危机的全球主义事业，政治继续在发挥作用。

来自政治一方的大推动，是组成全球化动力的经济事态发展的综合影响的平衡力量。从本质上看，有4个因素在大推动前存在并促进了它：一个过度积累危机、作为劳资关系后果的利润的压缩、国际上的资本主义竞争的加剧和取消调控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猛烈增长。

这些经济过程当然不能与阶级关系和它们构成其不可分割部分的政治组织分割开来。

过度积累危机指的是利润有了巨大增长，但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缩小。换句话说，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资本增长了，但由于

越来越多的资本追求越来越小的市场份额，利润率越来越小。彻底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改变阶级结构，以便扩大需求，但这样做会使利润率减少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反对的解决办法正是被采纳了的办法。这个办法是打破对走向外面的运动——即走向海外市场的运动——的内在阻力，并在长远上在此过程中压低国内的费用。全球主义阶级部分地把当地生产者群众视为费用，而不是视为一个市场。全球主义首先是对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办法，但它是投资者阶级能够接受其条件的解决办法。

对全球化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二个经济因素是劳资关系造成的压力。利润的压缩根源于资本的缺乏流动性：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面对面的关系中，以福利国家作为中介，劳方争取到了经济上的让步，使积累起来的费用成为资方无法承受的负担。通过在海外在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进行投资，并且在那儿复制工资、资本的关系，资本家阶级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使利润扩大了，还使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减轻。这样，全球化破坏了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平衡，使之朝着有利于全球化的方向倾斜。

资本在海外的流动，受国际竞争的增长的刺激。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出口的强有力冲击，迫使美国在海外投资，以开辟更接近市场的生产场所，超越保护主义壁垒，以及研究各地的市场。欧洲人和日本人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他们开辟了有助于进入美国市场的生产场所。这种竞争的不可分割成分是，民族国家代表其跨国公司进行着不断的干预：关于平等待遇的要求、征税措施、统一的劳动法（贝利，1994）。在多极化区域性经济集团成长的同时，集团内部的国家 and 跨国公司建立了各种联盟，使表面看问题的观察员以为，民族国家正在变成过时、软弱或者处于边缘的力量。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贸易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会议、七国首脑集团的会议等会议，可以看出，制定全球扩张和竞争的游戏规则的正是民族国家。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全球化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金融市场的巨大增长。我说最重要是因为，正是在这个部门里，资本流动的增长规模最大，但同时它在对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方面的刺激效果最差。大规模全球化和主要全球性参与者软弱无力的增长之间的悖论，从巨大的金融流动和真正的经济之间的脱钩得到了解释。

金融市场的非调控化、大量的高技术通讯和信息系统的引入以及使金融规则屈从于它们，可能是全球化的最显著因素。在被理解为全球化的事业中，有相当大部分具有金融性质，但它们并不拒绝货物和在矿物及制造业产品中的投资的大规模运动。它们却的确表达了这样的情况，即范围很广泛的金融赌博大大超过了在世界各个股市上买卖的公司股份的真正资产。如果我们把通过金融渠道买卖的其他投机工具（衍生物、货币、期货、假证券）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真正感觉到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化没有什么活力，它不大可能给群众带来好处，它不大可能带来对社会有用的增产，因此，全球主义者把国家（人民和经济）说成是正在兴起的市场，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通过金融投资和经纪业公司的狭窄视野看着它们的，所看到的是短期的意外收获（利息差别）、廉价出清（私有化）以及可以进行低成本生产的场所。在这一切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调控组织社会组成的变化和管理金融流动的一套新规则。新调控机制的核心正是全球主义决策者们的没有人反对的统治。这些决策者们与劳方是互相分隔开来的，而与金融界的全球主义领导力量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在反映全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决定因素的第一性的图案里，自吹自擂的技术革命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与全球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相反，技术革命扮演一个重要但从属的角色。各项革新本身是基于国家赞助或资助而研究出来的，后来被转让给私营部门的。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原先存在的经济决定的。

甚至其资源最丰富的新高技术企业家，也必须把产品卖给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即那些已经扎根于全球化网络的公司。传讯速度的加快和数量更大的信息的获取，并不能使全球经济的轮廓有明显的变化。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管理信息交换，当然还有资本、货物和技术的运动的基本机构的概念。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资本积累、高回报率、更大的市场份额、更低的劳动费用。高技术是全球主义金融过程的帮手：对流动进行操纵，使其适应基于紧急金融报告的短期决定。对数据数量和处理过程速度的强调，反映需要根据货币经济或真正经济中的短期变化迅速作出关于投资的决定。这样，高技术加强着经济活动中最动荡和对生产没有什么促进的活动，即金融领域里的货币交换。

否认高技术在重新调整劳动、消费模式、个人通讯等方面的多种用途，是一种夸张。但是，多种用途的要害正是在于：在制度的层次上，它们更有利于适应现存的全球阶级，而不利于在打破统治、剥削和停滞不前方面进行创新。从权力在制度里所在的地位运用的高技术，使全球主义生成的社会矛盾加剧。高技术却没有任何内部纠正措施，来保证任何另外的结局。

全球化的动力，不仅可以从其根源和扩张来分析，而且也可以从其分配上的后果来分析。全球主义带来的结果能够对其前途带来严重的后果。

九、全球化在分配上的后果

全球化在分配上的后果，与所有制形式和对机构、阶级结构和国家的控制形式，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观看或粗略修补分配机制或结果，我们不可能谈论公平或市场社会主义。当资产拥有者和生产者调整地方或者威胁他们不喜欢的环保和税收政策时，这一切变得比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在所有制、生产及公平的

一方和公平及可持续性的另一方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联系。

全球主义阶级在世界的兴起，激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它在全世界范围影响了工资劳动者、农民、雇员和自有职业者的生活（佩特拉斯和莫尔利，1995）。正是全球主义的成长和渗透，导致了在处身于全球主义循环内部的少数人与受他们剥削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明显扩大。全球主义的一个后果是，社会阶级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另外还有若干跨越国家和文化界线的的不平等。税收日益变成了递减式的：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靠工资生活的集团，而来源于跨国公司资本的百分比在下降。其部分原因在于法律有大量的空子可以钻，另外还由税收律师的能力，即他们善于设计逃税的办法，并把公司收入的焦点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里（这被称为让与定价）。在执行递减的征税制度的同时，也执行日益递减的国家资助和支出计划。公司享受低息贷款、出口补贴、建厂补助、土地赠与、基础设施开发、研究与开发等，但转移给挣工资和薪金的人们的社会资金大大减少了。国家向跨国公司资本提供的补助在增长，而挣工资的工人、退休人员、低工资家庭、生病和受伤的人们、单亲家庭和儿童的份额在减少。

这种社会不平等是两个结构性因素的结果：通过合并、并购、合资所造成的对企业的占有的不断集中；国家与全球主义公司经营的紧密一体化。政治决策的集中是国家资源的集中的重要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集中起来的资本的效益和增长。今天，在发达帝国主义中心的资产所有制的形式，与被一些人贬低称为香蕉共和国的拉美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很相似：不到5%的居民拥有私有资产的将近90%。此外，一小撮的中介商和银行投资者，从买公司和卖公司中，以及从私人和非私人投资基金会的股票交易中，捞取数以亿万美元计的报酬。

最大的社会危机大概正是发生在那些在全球化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里。首先是在美国，其次在英国，没有医疗保险的工人、

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没有或只有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的临时或非全日制劳动力的数量最多。美国自吹自擂的相对于欧洲的低失业率，是由低工资、容易受到伤害的最高比例相平衡的——欧洲的工人运动是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的。

在第三世界正在发生同样的过程。阿根廷和巴西的失业率为18%和15%。随着它们的经济的全球化，这些失业率成倍地提高了。在东欧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在那儿，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生活水平下降了30~80%。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墨西哥，与15年前相比较，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到了原来的水平的30%（维尔特梅耶尔和佩特拉斯，1997）。

全球主义阶级通过特定机制进行了这种收入和财产的反革命，这个机制包括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以及整套的法律，即所谓的结构调整政策，它包括有利可图的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新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的开发，让它解决整个过程的资金并指挥该过程。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概念上的若干手法，给不平等的不断扩大的过程涂上了知识的光彩，这些手法是：为了模糊集中的经济活动和有害的社会后果，它强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还强调个人责任的概念。通过模糊制度化权力的集中和它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它使权力问题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非政治化了，而同时把处理全球主义引起的问题的负担转移到了家庭、个人或当地社群。这又解放了雇员和基金，以致能够促进全球性扩张和积累。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自由市场辩解，而事实上全球性公司多数的交换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模糊了帝国主义国家与在海外投资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对全球性公司日益增强的依赖性以及确定议事日程的全球性公司相互之间的关系。

全球主义阶级的结构性权力是非正式和正式地执行了的所谓结构调整政策的原因和后果。结构调整政策事实上是通过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给公司减税以及增加补助而重新集中收入的过程。在牺牲工人利益情况下，权力集中在雇主手中（这被称为劳动的灵活化），导致公司组织内等级结构的僵化。雇主们单方面地确定条件，来进行雇佣、解雇、派遣、承包，以及为更多的全球性活动，采用其他形式的提高剥削率、减少劳动成本和增加利润。

结构调整政策的推行，直接地与劳方的反抗相关。而劳方的反抗与工会内部结构、工会领导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是否平易近人以及容易更换有联系。在工会内部有民主结构，其领导人面对有组织的反抗，其领导人接受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把工会视为运动而不是生意，其领导人受到合法的基层替代性领导人的挑战的那些地方，工会就能够更成功地阻止结构调整政策和全部的全球主义议事日程的执行。法国、意大利、德国就是这种情况。与此相反，在美国，工会领导人经营着寡头组织，在其中，百万富翁的工会官员通过官僚主义机构把工会作为商业公司来经营，让这些官僚机构把会员挤到边缘去，还管理着退休金基金和有利可图的房地产股票，使工会完全没有能力反对全球主义的议事日程。难怪克林顿总统能够为自己执行递减式经济改革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他不必与民主的、激进的工会会员进行竞争。

美国经济是靠全球主义上升的典范。克林顿政府甚至说它是一个样板。但是，它是全球主义阶级的样板，任何其他地方的劳方都坚决拒绝它。连欧洲的领导人对其运用皱眉头，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死板地效仿它，这将激发重大的社会动荡。

理论上的问题在于，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全球主义项目正在达到其政治上的极限：帝国与共和国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办法，涉及打破支撑着数以百万计的挣工资的工人、家庭和退休人员的社

会组织。我们正在进入充满持续危机和可能很动荡的时期。全球主义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只有在国内阶级之间（劳资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改造，才能被出口。逐渐地或者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的变革过程正在进行中；在德国是砍社会福利预算和搬迁工厂；在意大利是私有化和取消工资的指数化；在西班牙是高失业率和分割开来的劳动条件。

欧洲劳方的防守性斗争反映一种信念，即相信要在以前的福利国家的残余和全球主义资本之间作出选择。已经很清楚的是，伴随着全球主义的兴起的现像，不是福利国家的保留，更不是它的扩大。显而易见，利益和条件在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以及基本上互相对抗的结构地位，都要求我们对生产制度进行重新考虑，对所有制本质进行更加根本性的重新考虑。否认私人利润集中在最有组织和最扩展的形式（跨国公司的企业）中，等于看不到可能的解决办法。在日常政治中集中研究政策和其直接结果，而不集中研究国家结构和国家的内部组成（在全球主义阶级和执行机构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等于忽视用于对指导着全球主义项目的所有制和财产形式进行改造的根本工具。

私有化努力的不合理性，正在瓦解复制全球主义扩张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新的阶级、新的地区、新的供游乐和空气好的地区，都正在被贪婪地开发：南极洲、亚马逊河流域、乔治岸（GEORGE BANKS）、主要的大都市、臭氧层。私有化政策不仅使大量的改革财富转移到全球主义的亿万富翁和超级富豪们，而且还是一个使这些人毫无节制地进行剥削的许可证。正当帝国主义国家、世界银行和与其相伴的全球主义投资者和政治家们在促进私有化和进行掠夺时，谈论可持续增长是下流的事情：私有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保护环境相伴随，它过去和狭窄始终与对人民和土地的加剧的掠夺、消耗和放弃相联系。

私有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但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导致

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如果我们不考虑人口的增长，美国的人均增长是1%之下，在欧洲和日本将近等于零。私有化是私人对现有财富和资产进行的掠夺。它取代了新公司和产品的创造和新市场的发现。股市的猛烈增长是与真正的经济的增长的减速同时发生的。投机性的增长带来停滞不前。最大的增长来自合并、解雇和减少工资较高的职位。除了在其寡头主义工会过度膨胀的美国之外，反对全球主义的社会政治革命正在启动。

十、国家政策和全球化

散播范围最广泛的误解，或许是全球主义思想家们散播的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全球化公司和新国际力量面前，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或者很软弱）。事实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在塑造本地、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的经济交换和投资方面，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发挥更决定性的作用，进行更强有力的干涉，导致更多的后果（韦斯，1997；罗德里克，1997；佩特拉斯和莫尔利，1995）。在没有民族国家预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干预情况下，跨国公司和银行不可能进行扩张和日益深入的参与。在不肯定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键政治作用——特别是美国在为宣传活动提供资金、为军备竞赛提供动力、为文化和宗教宣传提供资助方面的作用——情况下，也同样不能理解市场在前苏联、中国和东欧以及原来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和贸易集团（欧洲共同体、北美贸易协定、南美洲共同市场），都是由民族国家提出、确定其条例和实现的。主要的政策鼓励广泛提供税收优惠，提供大量资助，降低国内劳务成本，它们都是由民族国家制定的。民族国家的活动规模和范围已经大大扩大了，以致我们不能把它称为自由市场，而是新的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全球主

义首先是新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的产物，直接的国家干预继续伴随和支撑它。

狡猾的评论员、商务记者和出版商经常争辩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的国家，已经被新的一种国际秩序超越，在那个秩序里，跨国公司独立于国家。其他的思想家们争辩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国家的职能，使国家的作用减少到了法律和秩序允许的最低程度。难怪许多前左派人士和自称的新思想家争辩说，现在正在形成一个第三经济，其基础是非政府组织和本地社群组织，这些组织都植根于他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东西里。最后，一批略知皮毛的思想家相信，某种贴上了世界体系的东西超越了民族国家，它正是建立超国家实体的过程，而也许因为缺乏数据，目前对它还没有完全揭示。

关于民族国家已经解体的意识形态很顽固，同时其鼓吹者们忽视塑造和继续推动资本、货物和技术国际流动的重大事件和力量。

全球化的核心是笼罩它的政治框架：该建筑物的基石是在消灭福利国家制度，减少关于海外流动的规定，以及消除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经济阻力中，国家发挥的作用。这些建筑基石是由民族国家安置的，跟随其后安置的是直立的柱子，其形式是民族国家任命的国际金融机构官员，他们通过所谓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全世界设计、执行和推广政策。全球主义的圆形屋顶是对全球经济的短期和每天的微观管理，这项工作是由监督个人投资、行业部门之间的交换和每月商业收支平衡的中层官员进行的。

国家的政治经济作用，由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受其主导的国家的警察、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深入渗透相伴随。像联邦调查局和毒品管制局（DRUG ENFORCEMENT AGENCY）那样的以前负责国内事务的机构，今天在海外国家机构的最高层次上自由地转游着。美国的毒品许可证计划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权力，使

它能够影响在各个国家的部、军队和警察里的任命。华盛顿推行的治外法权法律原则确认，美国法律高于被认为是主权国家的法律——霍尔姆斯-伯顿法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切非常强烈地暗示着，在发挥跨国公司作用的能力方面，和更重要的在扩大国际流动中统治阶级的世界市场份额的能力方面，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正在使它扩大到最大限度。

如果全球主义者关于被认为是软弱或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陈词滥调是不反映现实的话，那么它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服务呢？首先，它的用途在于使批评者解除武装——打击社会上的反对派力量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去抓首要和最根本的因素，来创造出能够取代全球主义主宰的资本的方案来。其次，它具有政治心理上的目的，这就是让斗争丧失方向，因为，既然国家不存在了，斗争应该围绕什么来进行呢？第三，鼓励政治和社会团体在小型经济活动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制度的间隙中集中开展工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与全球主义阶级主导的宏观经济体系的依赖性联系。事实上，多数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来源方面或在其在本地开展的互助活动中，都不是非政府性的。

最后，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开放的范畴，比如公民社会，让残酷剥削工人的全球性血汗工厂老板们处身在其中，然后把它描绘为政治民主和本地私人经济创造性的所在地。这样的谈论忽视公民社会主要活动分子(统治阶级)和国家机构顶点之间多种联系。

通过确定民族国家在当今的全球化阶段中的强有力的和中心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作为经济组织替代形式的一个核心的巨大潜力。它可以采取的形式包括公共企业，自己经营的合作社，以及在收入、贷款、土地和技术帮助方面的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方面的分散计划。重新配置国家投资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对在法律、政治、经济含义上国家权力发挥强有力作用的所有制进行根本变革。民族国家的权力是把生产和消费从以全球市场为中

心转移到以本地市场为中心并使全球性交流变成补充性活动的基础。只有在民族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植根于不断加深的社会团结和社群联系的、把生产率与更多自由时间联系起来的革新和技术组织。

在教育和深化自治形式的改革的领导人方面，民族国家权力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些领导人的任务是经营企业和把生产率和竞争受益归还给生产者集体。

民族国家权力是实现新国际主义的根本环节。为此，它必须成为全球主义的替代方案的成功例子，还必须通过提供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活动，来深化全球上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从而作为在其他解决办法出现之前的前奏，自下而上地创造更大的一体化。

民族国家权力重新规定了市场的开放，把它放入新的社会政治背景，在那儿社会关系把优先地位提供给生产者阶级。受人们欢迎的民族国家的市场，是建立在由社会利润的政治标准指导的交换的基础上——这些受益使社会的工资总额扩大，而不归属于个人或者公司利润的获取者。当地和国家的市场是按照塑造全球性交换的人民权力的新组合塑造的——正好与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相反。

寻找全球化替代方案的努力，涉及从历史角度对私有化和社会化的比较优势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显而易见，在社会化下，主要的倾向是，要让越来越多的劳动的人们（工薪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大的就业保障、更广泛的保健服务以及更多的进入公共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私有化的不可阻挡力量相比较，主要倾向是要更多地关心妇女。反映着当前进行私有化的国家里的生活水平的比较数据表明，生活质量在急剧下降，这特别对年轻的一代人有效。随着退休年龄的推迟，人们在生命周期里受的剥削，被推延到人们的晚年。随着经理们的特权的增

加，与职业相关的压力和风险在增加，而工作的好处（保健、假期等）在减少。客观的观察员能够争辩说，对公司执行官员（CEO）的需要和利润（由竞争力这个术语掩饰）的热情满足，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下降了。因为在欧洲工人一般保持4个到5个礼拜的假期，《纽约时报》描绘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因为在欧洲，其工资比工人工资大40倍的公司执行官员（CEO），竟然被《福布斯杂志》描绘是工资过低的人员，因为，其工资大大低于为工人工资的240倍的美公司执行官员（CEO）的工资。

私有化的光彩是一个掩饰得不好的努力，其目的在于创造植根于控制国家的资本的绝对权力的西方式专制统治、强行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恐吓劳动大军。首当其冲的样板是美国。

社会化提供着一个民主的替代方案，在其中，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因为它正式从属了国家权力的新组织和权力被下放到了分管生产、消费和环境保护的委员会。生产率提高使每个人的保健基金计划增加了；公共教育向在学术上达到标准的人员开放；55岁或50岁的人员可以退休和开辟另一个职业生涯；工作时间减少到了25个或30个小时。社会化的好处不仅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也在于对生产和媒体的方向的重新确定，使它们为以民主方式决定的社会价值服务。这是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得到说明的社会价值，在质量上的深化和扩充。这是建造在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后全球主义的社会主义。

十一、在全球范围的反抗

关于对全球主义政策的反抗的回顾，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即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进行了领导，其强度是不尽相同的，其战略是包罗万像的。尽管如此，在国家和地区特点之外，可以看到某些普遍的倾向。

首先，虽然选举是进行反对活动的一个渠道，但在阻止或限制全球主义政策的运用方面，议会外的行动是使用得最广泛和最有效的办法。多数在议会里反对全球主义的人们，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在议会里是少数，因此，通过执行部门的法令和（或）全球主义势力对议会的影响，全球主义的政策继续得以执行。在选举萨里纳斯为总统的过程中，发生了作弊；在巴西，在卡多索的领导下，政府露骨收买了众议院选票，这一切都使作为进行反抗据点的选举机构的作用被削弱了。第二，在议会里，中左的反对派，一旦当选了，几乎全部都接受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便适应领导阶级、国际金融机构和原来存在国家机构的要求。最近的例子是当选圣萨尔瓦多市长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的黑克托·西尔瓦，他认为，极力鼓吹搞全球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发展过程中的盟友。以前在70年代和80年代曾经是革命的组织，在转到选举政治和获取政治职位后，几乎总是抛弃了他们对全球主义的反对，而接受了其假设。作为其结果，几乎所有的受到全球主义损害的组织，都转到了议会外的活动和组织：在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韩国等都进行了总罢工。在巴西、巴拉圭、萨尔瓦多、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扎伊尔等占领了土地。在议会政党的无能和妥协面前，议会外的运动变成了反对派为表达自己要求而选择的形式（佩特拉斯，1997；维尔特梅耶尔和佩特拉斯，1997）。

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们都是在现存权利和利益受到全球主义统治阶级威胁时，作为维护这些权益的运动开始活动的。无论是抗议失业，国营企业私有化，还是抗议社会福利计划、生活水平、退休计划、公共教育设施等的被消减；对抗的起点是富有侵略性的击退措施。在全球主义夺取新利润源泉和消减税务费用的措施的挑衅之下，那些运动作出了反应。在这种对过去获得

的利益进行共同保卫的斗争之中，某些运动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争取发展到结构性的改革：墨西哥的恰帕斯农民运动、巴西的 MST、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农民运动、玻利维亚的恰帕瑞（CHAPARE）的可可农，都创立了合作社，建立了以社群为基础的经济，它们都反对全球主义，而面向发展国内市场。虽然它们仍然是少数，但在目前从事防卫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反对全球主义和甚至初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觉悟正在成长。

对全球主义的反抗的第三个特点是这样一个总的趋势，即所有的组织都倾向于争取环保、妇女平等以及种族平等的小组和斗争建立联盟或把它们吸收进来。全球主义项目具有很多的消极影响。因为，它进行剥削和污染，使人们贫困化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使生活条件和标准恶化，还使阶级之间和阶级之内的不平等加深。对于各种不同的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当地政权都争取分化它们，并使它们非政治化，以致变成一批为自己服务的、孤立的、脱离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的文化单位。在这些努力面前，集团的汇合是一种挑战。

除了对全球化的反抗的共同特征之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几个共同点。首先，在国家之间和在各国内部，反抗的过程是不平衡的。在欧洲的反抗，特别是在法国的反抗，显然比在美国的反抗更发达。巴西和墨西哥的反抗比智利和秘鲁的反抗更发达。决定斗争水平方面的差别的是政治组织的水平、斗争的传统、群众组织的内在结构以及反对派在暴动或官僚机构里的根源。

在各国内部，某些部门、地区、种族集团表现的反抗比其他部门、地区、种族集团的更强烈。在阿根廷，各省处于斗争前列，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很落后。在巴西，没有土地的农民比城市贫民窟的流浪者或工会更富有战斗精神。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城市贫民比正式的工会更积极。一般来说，公共部门的工人比私营部门的工人更积极（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一般

来说，除了个别特例之外，较激进的斗争的中心在农业地区和省里，而城市工业部门基本上从事防御性阶段的斗争。但是，这些并不是固定的和广泛的区别。在欧洲和亚洲，是最发达的行业部门（法国的运输部门和韩国的冶金部门）的工人，充当了斗争的急先锋。反对活动在选举领域之外的扩展和不断深化，为有计划的替代方案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反，除了在选举政治之外，全球主义政治家和经济经营的社会基础，已经变得更加脆弱。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机构中心是美国：就是在这里，它不受挑战，其原因在于工会长期以来的寡头主义本质（这使它们脱离了多数工人）以及主要种族、妇女和保守主义组织选出的领导人。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全球主义政党面前，这些领导人仅仅作为一个压力的集团发挥作用。我们只要离开了美国，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欧洲、拉美和亚洲，就是这样的。在考察各国的内部政治动力时，我们会看到相同的情况：如果只进行表面的观察，即仅仅看选举过程，我们得到的印像是，全球主义的前景很巩固。如果从选举活动转移到日常的群众斗争和组织与个人的优先选择，我们将遇到对全球主义政治各种因素或所有因素的广泛反抗。

没有得到解决或者不断提出来的问题是：如果存在着那么普遍的反抗，为什么全球主义没有被推翻呢？回答有两点内容：第一，更多的组织被击退到有限的资源，结果主要从事防御性的斗争；第二，虽然执行了各种替代方案，但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或者它们继续植根在部门或当地的环境里。

十二、替代全球主义的方案

多年来，批评全球主义的人们多次回避了创造替代方案的必要性。某些知识分子继续这样做，许多其他知识分子继续对全球

主义的强大攻势作出消极或无力的反应。同时，少数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研究由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和活动家创造的正在形成的替代方案的真实世界。

新的替代方案不仅应该从它们创造什么的角度，而且也应该从它们拒绝什么的角度来理解。这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既不要自由市场，又不要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在这些坐标的范围内，正在形成的替代方案需要被进一步分析，以把它们同全球主义国际金融机构资助的小型项目区分开来。国际金融机构的目的在于消化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所引起的不满。

今天存在的替代方案，可以在进行起义的集团在本地执行的项目或在进行斗争的运动的纲领里找到。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各种替代性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从 MTS 组织的巴西农村合作社网络（它包括 15 万以上的家庭），到恰帕斯的萨帕塔主义（ZAPATISTA）领导人领导下的自治印地安人社区，在中国组织的乡镇企业，在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正在兴起的社会党人领导的地区性农村生产者，到智利和阿根廷人们提出的关于使大学民主化的建议，到法国、韩国和意大利工会激进的一翼提出的自治建议。这些部门的或小型的活动和国际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当地替代发展项目的区别在于，它们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变革政治项目的一个部分。它们是与全球主义国家和阶级进行对抗的起义集团启动的，它们一般在内部是民主的。领导人是由本地社群选举的，必须向社群负责（这不同于非政府组织，因为非政府组织依赖于它们的外国赞助者，并向它们负责）。因此，小型替代方案是大规模变革的建筑的基石；替代方案产生于提高阶级和民主觉悟的斗争之中，这些斗争指出，一个以民主的集体主义替代方案为基础的反全球主义霸权集团正在被创建。使这些替代方案团结起来的是它们争取把可持续的成长、办企业的精神以及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的斗争。这些替代方案之间的差别很多：劳动关

系、私有制的范围、对市场的依靠等。然而，已经清楚的是，社会利益决定着市场交换：市场本质上是当地的或国家的，对外的交换从属于内部市场的深化。纲领里的主要问题是，要系统地使微观的制度上的关系适应宏观的层次，要把纲领里关于变革的主张运用于特定的制度背景。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反对信奉技术治国的知识分子和僵化的集体主义者的斗争。这些知识分子相信致力于把人民的社会纲领和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全球主义概念。那些集体主义者不明白人民生产的各种形式（合作社、公共企业、家庭）。有一些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印象，即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替代方案。这当然反映他们忽视了现存正在被创造中的替代方案，或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关于没有替代方案的全球主义论点。与其重复关于需要替代方案的破烂套话，倒不如考虑正在斗争的运动现在正在制定的替代方案。

那些已经存在的替代方案，需要被赋予更大的内容、一贯性以及更大的民族国家和更大的范围的影响力。即使在今天，在反对全球主义阶级的民族斗争中，各种运动之间在建立国际联系。这些运动都有自己的本地经济和纲领规定的变革。它们向对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增添了另一个肯定的因素：在争取推翻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主义阶级的斗争中，有一个替代方案。

作者简介

萨米尔·阿明编写了许多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包括《在世界范围的积累和不平等发展：对关于欠发达状况的理论的批判》（1974）和《全球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1996）。他领导在塞内加尔的第三世界论坛。

迈克尔·巴拉特·布朗在谢菲尔德大学教授了关于工业的研究，而且在许多国家里就工业的发展讲了课。他是贝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会长之一，是创建北方学院的院长。他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之后》（1963）、《帝国主义经济学》（1972）、《政治经济学模式》（1984，修改于1992）、《公平贸易》（1993）、《非洲的选择：世界银行的30年之后》（1995）。

J.M. 布姿特是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的地理和人类学教授。他曾经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西印度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他的著作包括《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扩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历史》（1993，纽约基尔福特出版社）和3本关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和政治地理的书。1997年他获得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表彰。

安东尼·布鲁维尔是布里斯托尔大学经济学史教授。他写了一些书，包括《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的考察》，目前他正在研究18和19世纪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纳德·H. 奇尔科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院的经济学和

政治学教授。他写了大量的书和学术刊物的文章，包括《关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重新讨论对坐标体系的探寻》（1994，西景出版社）、《巴西北部的权力和统治阶级》（1990，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发表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理论》（西景出版社）。他主编了关于过去发表过的著作的文集《帝国主义：理论方向》（人类出版社）。他是双月刊《拉美透视》的创办者和管理编辑。他研究的焦点是在葡语非洲、巴西和葡萄牙。

M.C. 霍华德 1945 年出生于格罗塞斯特郡。他在英国的兰开斯特和莱斯特大学受过教育。他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担任过学术职务。他广泛地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理论和经济体系的文章。他目前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J.E. 金 1947 年在伦敦出生。他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在兰开斯特大学任过教，目前在澳大利亚拉特罗贝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广泛地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劳动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文章。

罗纳尔多·蒙克是一个阿根廷社会学家，目前在利物浦大学工作。他广泛地写了关于政治社会学特别是劳动和发展问题的文章。他写了 10 本书，其中包括《第三世界的政治和依附性：拉美的情况》（1984，ZED BOOKS 出版社）和《马克思在 2000 年：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将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他也参加主编一些书，目前正在研究拉美的全球化、劳动的灵活性和工人组织。

格里高里·P. 诺维尔是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在那儿教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他是《重商主义国家和世界石油卡特尔》（1944，康乃尔出版社）的作者，还在学术刊物和大众报刊上发表过关于国际石油事业的文章。他也积极从事关于空气质量和替代性运输燃料的政治咨询工作。

普拉帕特·帕特奈克是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的经济研究

和计划教授。他写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问题的文章。他的书包括《经济和平均主义》(1991)、《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其他文章》(1995)、《资本主义下的积累和稳定》(1997)。

詹姆斯·佩特拉斯是秉汉顿的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是30多本书和200篇文章的作者。他在《英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外交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最近的著作是《拉美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冲突》(1997, 麦克米兰出版社)。

约翰·威洛拜是华盛顿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阿联酋沙尔查的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于197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利分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广泛地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竞争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帝国主义历史等的文章。他最近开始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度和组织。

译名对照表

A

- Abraham, D. 亚布拉罕
- Accumulation, primitive 原始积累
- Luxemburg on 卢森堡谈原始积累
- Marx on 马克思谈原始积累
- socialist 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 Acquisitivenes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致力于获取财富的特点
- Africa 非洲
- agriculture in 非洲的农业
- colonial domination on 对非洲的殖民主义统治
- European contacts with 欧洲人与非洲的接触
- famines in 非洲的饥荒
- scramble for 围绕非洲的争夺
- Agriculture 农业
- Agriexports, vs. food crops 农产品出口，与粮食作物的比较
-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替代方案
- Alvarez, Sonia 阿尔瓦雷斯
- Amin, Ash 阿明, A.
- Amin, Samir 阿明, S.

- Antipatriotic cosmopolitanism 反爱国主义的普世主义
Arrighi, Giovanni 阿里齐
Asia, European penetration into 欧洲人对亚洲的渗透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东亚国家联盟 (东
盟)

B

- Bagú, Sergio 巴古
Banking, British 英国银行业
Banking concentration, in Britain 英国银行业的集中
Baran, Paul 巴兰
Becker 贝克尔
Bernal, Martin 贝纳尔
Big push 大推动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Bourgeois internationalism 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African famines and 非洲饥荒
agriexports *vs.* food crops in 农产品出口，与粮食作物的比较
components of 组成部分
definition of 定义
food security in 粮食安全
fundamentalism and 原教旨主义
interimperialist rivalry in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internecine conflicts in 自相残杀式的冲突
labor reserves for 后备劳动力
Marx, Lenin, and Luxemburg and 马克思、列宁和卢森堡
outlying regions in 外部地区
resource conflicts from 围绕资源的冲突

- subjugation in 征服
 subnational conflicts and 国内冲突
 summary critique of 总结性的批判
 terms of trade in 进出口交换比率
- Braudel, Fernand 布劳代尔
- Brenner, Robert 布雷讷尔
-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布雷顿森林机构
- Brewer, Anthony 布鲁维
- British colonialism 英国殖民主义
- British Empire 英帝国
- Barratt Brown on 巴拉特·布朗
-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商业和工业
- “gentlemanly capitalism” in “绅士般资本主义”
-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工业资本主义
- nature of 本质
- new imperialism in 新帝国主义
- North – South divide in, existence of 南北分野的存在
- North – South divide in, geography of 南北分野的地理
-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
-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英国工业革命
- Bukharin, Nicolai 布哈林
- on NEP 新经济政策
- vs. Preobrazhensky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

C

Cain 凯恩

“gentlemanly capitalism” of “绅士般资本主义”

Calderón, Fernando 卡尔德隆

Capital 资本

export of 资本输出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国际化

monopoly 垄断

movement of 运动

Capital, goods, and technology, flow of 资本、货物和技术的流动

Capital export 资本输出

Hobson on 霍布逊

underconsumption in 消费不足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conquest in, external 外部征服

consequences of 后果

definitions of 定义

development of 发展

European, on Third World 欧洲，关于第三世界

future of 前途

“gentlemanly” “绅士般”

Marx on 马克思

merchant 商人

modern 现代

monopoly 垄断

precapitalist and semicapitalist-labor reserves for 前资本主义和
半资本主义后备劳动力

repercussions of 反响

rise of 兴起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transition to, Brenner on 布雷讷尔论过渡

transition to, Marxists on 马克思论过渡

- universal prevalence of 普遍存在
 as world system 作为世界体系
 Capitalism, industrial 工业资本主义
 empire and 帝国
 imperialism as expansion of 作为资本主义扩散的帝国主义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式的发展
 classic and Marxian antecedents to 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先
 驱
 damaging effects of 破坏效果
 early theories of 早期理论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arxist 资本主义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
 accumulation in, primitive socialist 积累, 初级社会主义
 antecedents to 先驱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War Communism in 布尔什维克革命
 和战时共产主义
 early theories on 早期理论
 Lenin on 列宁
 Luxemburg on 卢森堡
 Marx on 马克思
 process of, 过程
 rural - urban articulations in 农村—城市的连接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卡多索
 Cartelization 卡特尔化
 Cartels 卡特尔
 vs. trusts 托拉斯
 Casanova, Pablo González 卡萨诺瓦
 Castells, Manuel 卡斯特而斯
 Causes,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的原因

Center 中心

Center – periphery model 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模式

Eurocentric Marxist theories of 欧洲中心主义理论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of Lenin 列宁

polarization in 两极分化

Class differentiation 阶级分化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Classic theories 传统理论

Coercion, political 政治压力

Coffee farmers 咖啡农

Collapse of empire 帝国的崩溃

Collectivization, of Stalin 斯大林的集体化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主义管理

Colonial dependency 殖民地的依赖性

Colonial trading relationship 殖民主义的贸易关系

perpetuation of 延续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British 英国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

Euro – Marxists on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

Colonies 殖民地

British 英国的

Colonies, former 前殖民地

exploitation of 剥削

export commodities of 出口商品

foreign debt of 外债

- Commerce, industry and 工业与商业
 Communication 交通
 Concentration, industrial 工业的集中
 Conflicts 冲突
 internecine and ethnic 自相残杀式和种族的冲突
 over resources 围绕资源的冲突
 subnational 国内冲突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合作组织
 Core -- periphery interaction 核心与边缘的相互作用
 Cosmopolitanism, antipatriotic 反爱国主义的普世主义
 Costs,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的费用
 Counterfactual 与事实相反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

D

- Davidson, Basil 达维德逊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
 Definitions 定义
 of bourgeois internationalism 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Delinking 脱钩
 Democracy, low intensity 民主、低强度
 Dependency 依附论
 colonial 殖民主义的
 deconstruction of 解析依附论

economism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经济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in Latin America (*See also under*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limitations of 局限性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方法学的态度

in noncapitalist world 非资本主义世界

radical approach to 激进的态度

reformist approach to 孤立主义的态度

socialism *vs.* 社会主义

as stagnationist 停滞不前

statistics on 统计数据

totalizing perspective of 总体性视角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

Despotism, Oriental 东方暴政

Development 发展

capitalist (*Se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式

core and periphery in 核心和边缘

Euro-Marxism and 欧洲马克思主义

gap in 差距

historical stages in 历史阶段

inward-directed 向内的

market and relations of exchange in 市场和交换关系

metropole and satellite in 大都市和卫星

in Mexico 墨西哥

old *vs.* new imperialism and 旧帝国主义对新帝国主义

revolution as prerequisite for 被视为先决条件的革命

value of 价值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theory 发展理论

Arrighi on 阿里齐

Baran on 巴兰

Brewer on 布鲁维尔

Cardoso on 卡多索

Marini on 马里尼

Parnaik on 帕特奈克

Warren on 沃伦

Diamond, Jared 戴蒙特

Diffusionism, Eurocentric 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doctrine of 学说

Marxism and (*See also*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马克思主义

Diffusion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Stalin's 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扩散主义理论

Disease, Old World, on New World population 疾病, 旧世界, 关于新世界的人口

Distribution 分配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分配联盟

Divergence, economic 经济差距

dos Santos, Theotonio 多斯桑托斯

E

Eatwell, J. 伊特维尔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ist 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equalities,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经济平等, 政治独立

Economic gains 经济收获

Economics 经济

development 发展

i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politics and 政治

Economy, imperialist capitalist world 经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

Edelstein analysis 爱德尔斯坦分析

Effects,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的影响

gainers in 受益者

losers in 败家

Emmanuel, Arrighi 阿里齐

Empire.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帝国，请参看英帝国

economic basis of 经济基础

fall of 崩溃

unequal class benefits of 各个阶级的不平等的好处

Employment, full, market-driven 由市场驱动的充分就业

Enfoque totalizador 总体性视角

Escobar, Arturo 埃斯科巴尔

Ethnic conflicts 种族冲突

EU-ACP association 欧盟—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协定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Marxism and 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ancient society and 古代社会

background on 背景

colonialism and 殖民主义

doctrine in 学说

Euro-Marxism in 欧洲马克思主义

imperialism and 帝国主义

- national question and 民族问题
 rise of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的兴起
 Euro - Marxism 欧洲马克思主义
 Europe, dominant position of 欧洲的主导地位
 European capitalism, on Third World 欧洲资本主义, 关于第三世界
 European imperial territories 欧洲帝国领土
 European Union 欧盟
 Exploitation, of noncapitalist world 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

F

- Fall,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的崩溃
 Famines, African 非洲饥荒
 Feminism 女权主义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封建生产方式
 Fieldhouse, D. K. 费尔德豪斯
 Finance capital, in world capitalism 世界资本主义中的金融资本
 Financial markets 金融市场
 Financialization 金融化
 Fordham, B. 福特汉
 Foreign investment 外来投资
 from mal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不好的分配
 profits from 利润
 as toxic/imperialistic 有毒/帝国主义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富科
 Fourth World 第四世界
 Frank, André Gunder 弗朗克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phenomenon, imperialism as 作为自由贸易现象的帝国主义

Fronzizi, Silvio 弗隆迪齐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Future 未来学

G

Gains, economic 经济收获

Galbraith, John Kenneth 加尔布雷思

Galeano 卡勒亚诺

Gallagher 卡拉格尔

García Canclini, Nestor 坎克里尼

“Gentlemanly capitalism” 绅士般资本主义

Geographic extension, capitalistic acquisitiveness in 地理扩张，资本主义致力于获取财富

Geography 地理

i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in North – South divide 南北分野

Gibson – Graham, J. K. 吉布森 – 格雷厄姆

Globalism, *See also* Globalization 全球主义，也请看全球化

past and present 过去和现在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adversaries of 反对者

advocates of 支持者

alternatives to 替代方案

ambivalents on 矛盾

in ancient times 古代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 capitalist expansion cycles in 资本主义扩张周期
class differentiation from 阶级分化
as class phenomenon 阶级现象
class struggle in 阶级斗争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概念上的和历史的分析
contingency in 偶然性
criticism of 批判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文化后果
cyclical nature of 周期性本质
debate in 辩论
defensive movements against 维护权益的运动
definitions of 定义
delinking and 脱钩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s of 分配上的后果
dynamics of 动力
economic growth in, stagnant 经济增长停滞
economics in 经济
ethnic conflicts from 种族冲突
export classes in 出口商阶级
financial markets in 金融市场
financialization in 金融化
flaws in 偏差
on food security 粮食安全
fundamentalism from 原教旨主义
future ideology on 未来意识形态
future picture of 未来前景
history of 历史
as imperialism 作为帝国主义

- vs.* imperialism 反对帝国主义
impoverishment in 贫困化
inevitability of 不可避免性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情报行动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国际劳动分工
vs. internationalism 反对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in 资本国际化
in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literature on 文献
of markets 市场
Marxist theories of 马克思主义理论
military in 军事
monopolies in 垄断
national policies and 国家政策
as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opposition to, uneven 不平衡的反抗
past and present globalism in 过去和现在的全球化
polarizing nature of 其本质是促进两极分化
police in 警察
political framework of 政治框架
political limits of 政治极限
politics in 政治
post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post-imperialism and 后帝国主义
a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作为进步的资本主义
resistance to 反抗
resource conflicts from 围绕资源的冲突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陈词滥调和现实

social groups in 社会集团
 stagnation in 停滞不前
 subnational conflicts and 国内冲突
 technology in 技术
 unequal distribution in 不平等的分配
 unequal relations in 不平等的关系
 wealth in, ge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财富, 地理上的重组
 world systems and 世界体系
 Globaloney 关于全球化的胡说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人均国内总产值
 rate of growth of 增长率

H

Habermas, J. 哈贝马斯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Hirst, Paul 赫尔斯特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背景
 Historical stages 历史阶段
 History, tunnel 历史隧洞
 Hobson, J. A. 霍布逊
 o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关于自由国际主义
 Hobson's imperialism 霍布逊的帝国主义理论
 critics of 批判
 Edelstein analysis of 爱德尔斯坦的分析
 Fieldhouse critique of 费尔德豪斯的批判
 free trade critique of 自由贸易批判
 Hobson's economics in 霍布逊经济学
 Hobson's political model in 霍布逊的政治模式

in.perfectionism in 非至善主义

military – industrial complex in 军事—工业综合体系

money, interest rates, and capital deepening in 金钱、利率以及资本的深化

overseas investment in 海外投资

post – Hobson Hobson on 霍布逊谈后霍布逊

Protectionism in 保护主义 Say's Law and 萨伊定律

trade unionism in 工会

underconsumption in 消费不足

war cycle in 战争循环

Hopkins 霍普金斯

“gentlemanly capitalism” of “绅士般的资本主义”

I

Imperfectionism 非至善主义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classic theories of 传统理论

as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作为资本主义的扩张

history of 历史

Marx on 马克思

Marxist theory of 马克思主义理论

meanings of 含义

new 新帝国主义

new, in Latin America 在拉丁美洲的新帝国主义

old vs. new 旧帝国主义对新帝国主义

Imperialist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India, independence of 印度的独立

- Industrial capitalism, empire and 帝国和工业资本主义
-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工业的集中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 Britain 英国
- Industry, commerce and 工商业
- Inevitability,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
- Information accumulation 信息的积累
- Intelligence agencies 情报机构
-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情报活动
- Interimperialist rivalry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bourgeois (*See also* Bourgeois internationalism) 资产阶级
(也见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 liberal 自由派
- Interneccine conflicts 两败俱伤的冲突
- Investment, foreign 外国投资
from maldistribution of wealth 由于财富的不良分配
profits from 利润
as toxic/imperialistic 有毒/帝国主义

J

James, C.L.R. 詹姆斯

K

Kalmanovitz, Salomón 卡尔马诺维齐

Kautsky, Karl 考茨基
ultraimperialism of 超帝国主义

Kay, Geoff 凯

Keynesian theory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vs. Say's Law 反对萨伊定律

$Y = C + I + G$ in $Y = C + I + G$

Kolko, G. 科尔科

L

Labor, wage 劳动, 工资

Labor reserves, for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后备劳动力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dependency and imperialism in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和帝国主义

beyond 超越

entrance of 进入

exit from 走出来

globalization vs. new imperialism in 全球化对新帝国主义

postdependency 后依附论

social movements in 社会运动

Lenin, V.I. 列宁

o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式的发展

on colonialism i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下的殖民主义

on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o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on Kautsky 考茨基

on monopoly-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

nondiffusion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of 关于民族主义的非扩散主义理论

- Lewis, W. Arthur 刘易斯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自由国际主义
 Logocentrism, development theory and 词句中心主义, 发展理论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o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式发展
 on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o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Lyotard, J. F. 赖奥塔尔德

M

- Magdoff, Harry 马格多夫
 Malaya rubber industry 马来亚橡胶工业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
 Mandel, Ernest 曼德尔
 Marini, Rui Mauro 马里尼
 Market forces/coercion dichotomy 市场力量/强制制度的两分法
 Marx, Karl 马克思
 o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on capitalism as closed system 作为封闭体系的资本主义
 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资本主义式的发展
 o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Marxian critics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Euro- 欧洲马克思主义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and (*See also*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
 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主义

- Eurocentrism in 欧洲中心主义
on nation and nation-state formation 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stages of history in 历史阶段
- Marxis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ee als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arxist 关于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 Marxist theorists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Materialism, historical 历史唯物主义
- Mercantilism, imperialism under 重商主义下的帝国主义
- Merchant capitalism 商人资本主义
- Metropole 大都市
- Mexico, development *vs.* imperialism in 墨西哥，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对立
- Milgate, M. 米尔盖特
- Military 军事
- Military policy 军事政策
-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Hobson on 霍布逊论军事—工业综合体系
- Modernization theory 现代化理论
- Mohanty, Chandra 莫汉迪
- Monopolization 垄断化
- Monopoly (ies) 垄断公司
five 五家垄断公司
- Monopoly capital 垄断资本
- Monopoly capitalism, Lenin on 列宁论垄断资本主义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的公司
- Multinationals 跨国公司

N

- National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struggle among 民族企业, 相互之间的竞争
- National-state power 民族国家的权力
- Nations (nation-states) 民族 (民族国家)
- as diffusion of capitalism 作为资本主义的扩散
- as European idea 作为欧洲的思想
-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 Lenin on 列宁
- Marxists on 马克思主义者
- Stalin on 斯大林
- Nemmers, E. E. 奈默尔斯
- Neo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 dominant class 占主导地位的阶级
- Neo-Marxism 新马克思主义
- criticisms of 批判
-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新经济政策
- Bukharin on 布哈林
- Preobrazhensky on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
- Trotsky on 托洛茨基
- New 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 New Leviathan 新利维坦主义
- Nondiffusionist theory 非扩散主义理论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North – South divide 南北分野

age of 历史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s of 地理解释

Nye 奈

O

Olson, Mancur 奥尔逊

Oriental Despotism 东方暴政

Overaccumulation crisis 过度积累危机

Oversavings, Edelstein on 过度储蓄, 爱德尔斯坦

Overseas investment 海外投资

P

Pakistan, independence of 巴基斯坦的独立

Palloix, Christian 帕洛瓦

Path dependency 对道路的依附性

Patnaik, Prabhat 帕特奈克

Pax Americana 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

Pax Britannica 英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

Peasant movements 农民运动

Periphery, *vs.* center, *see also* Center-periphery model 边缘对中心。也请参看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模式

Polanyi, K. 波拉尼

Polarization, from globalization 两极分化, 全球化

Police 警察

Political coercion 政治压制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ocentrism in 政治经济学, 以资本为中心

Political imperialism 政治帝国主义

- Hobson on 霍布逊
- Political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从政治上对权力进行再分配
- Politics 政治
- of delinking 脱钩
- economics and 经济学
- Polycentric world, authentic 真正的多中心的世界
- Population, New World, Old World disease on 居民, 新世界, 旧世界, 疾病
- Postdependency 后依附性
- Post-development 后发展
- Post-imperialism 后帝国主义
- Postmodernism, in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的后现代主义
- Power 权力
- political redistribution of 从政治上的再分配
- struggle for 争取权力的斗争
- Prebisch, Raúl 普雷比施
- Precapitalist breakdown 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被打破
- Precapitalist systems 前资本主义制度
- Preobrazhensky, Evgeni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
- vs. Bukharin 与布哈林的对立
- Pritchett, L. 普里切特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 Production 生产
- feudal mode of 封建生产方式
- Profit seeking, unproductive 不利于生产的谋取利润活动
-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 in Hobson's imperialism 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Q

Quijano, Anibal 基哈诺

R

Rahnema, Majid 拉纳马

Realism 现实主义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对全球化的反抗

Resource conflicts 围绕资源的冲突

Revolution 革命

modernizing 旨在实现现代化的革命

as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 发展的先决条件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革命变革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Rivalry, interimperialist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Robinson, R. 鲁宾逊

Rubber industry, Malaya 马来亚的橡胶工业

Rural-urban articulations 农村—城市连接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S

Satellite 卫星

Say's Law 萨伊定律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德

Silk routes 丝绸之路

Slavery 奴隶制

Small-scale alternatives 小型替代方案

Smith, Adam 斯密

- Social development, as European 欧洲的社会发展
 Social inequalities 社会不平等
 Social profits 社会利润
 Social transformation 社会变革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会经济发展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Soft cooperative power 软合作权力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de 苏萨·桑托斯
 Spanish Empire 西班牙帝国
 Stalin 斯大林
 collectivization project of 集体化项目
 diffusion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of 民族主义的扩散主义理论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结构调整政策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计划
 Subimperialism 亚帝国主义
 Sweezy, Paul 斯威齐

T

- Technical advance, in productivity 技术优势, 生产率
 Technical change, in Europe 欧洲的技术革新
 Technology, i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下的技术
 Theory, *See also* specific subjects, e. g., Development theory 理论, 也请参看特定的题目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的发展理论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European capitalism on 欧洲资本主义
 merchant capitalism in 商人资本主义
 Third Worldist ideology 第三世界主义意识形态

Thompson, Graham 汤普森

Totalizing perspective 总体性视角

Trade 贸易

international 国际

terms of 条件

unequal 不平等

Trade policy 贸易政策

Trade unionism 工会活动

Trading relationship, colonial 殖民主义的贸易关系

Transfer pricing 让与价格

Tributary systems 纳贡制度

Trotsky 托洛茨基

on NEP 新经济政策

Trusts 托拉斯

Tunnel history 历史隧洞

U

Underconsumption 消费不足

Lenin on 列宁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在革命前的俄国

Underdevelopment 欠发达状况

of noncapitalist world 非资本主义世界

Unionism, trade 工会活动

V

Vernacular societies 地方的社会

W

Wage labor 劳动工资

Wallerstein, Immanuel 华勒斯坦

War 战争

War Communism, failure of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Warren, Bill 沃伦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Wealth, maldistribution of 财富的不好的分配

Williaras, Eric 威廉斯

Williaras, Raymond 威廉斯

Workers, on globalization 工人, 全球化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

capitalism as 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

Y

$Y = C + I + G$ $Y = C + I + G$

参 考 文 献

Abraham, D. (1986)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Achebe, C. et al. (1990) *Beyond Hunger in Africa*. Portsmouth, NH: James Currey, London, and Heinemann.

Aghion, P., and Howitt, P.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lavi, H. (1964) "Imperialism: Old and New,"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Alavi, H. (1972) "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New Left Review*, 74: 59-70.

Altwater, E., and Mahkopf, B. (1997) "The World Market Unboun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3: 448-471.

Alvarez, S., and Escobar, A. (1992) "Conclusion: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Horizons of Change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dentity, Strategy and Democracy*. Boulder: Westview.

Alvarez, S., Dagnino, E., and Escobar, A. (1998)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and the Political in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Cultures of Politics: Politics of Cultures.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oulder: Westview.

Amin, A. (1997) "Placing Globaliza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4 (2): 123-137.

Amin, S.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2 vol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 (1977)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 (1980) *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 Susan Kaplow, tran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 (1985) "Modes of Production: History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Science & Society*, 49: 194–207.
- Amin, S. (1989a) *Eurocentr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Amin, S. (1989b) *La faillite du développement en Afrique et dans le Tiers Monde*. Paris: L'Harmattan. In English: *1990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 Amin, S. (1992) "On Jim Blaut's Fourteen Ninety-Two," *Political Geography*, 11: 394–396.
- Amin, S. (1993a) *Itineraire intellectuel, Regards sur le demi siècle 1945– 1990*. Paris: L'Harmattan. In English: *1994, Re-reading the Post War Period, An intellectual Itinera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min, S. (et al.) (1993b) *Mondialisation et accumulation*. Paris: L'Harmattan.
- Amin, S. (1995) *La gestion capitaliste de la crise*. Paris: L'Harmattan.
- Amin, S. (1996a) *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Harmattan.
- Amin, S. (1996b)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London: ZED.
- Amin, S. (Forthcoming) "Regionalis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response to the polarisa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Bjorn Hettne (ed.), *The New Regionalism*. Wider-Helsinki: Macmillan.
- Amin, S. (ed.) (1982) *Dynamics of the Global Crisis*. Macmillan.
- Amoore, L., Dodgson, R., Gills, B., Langley, P., Marshall, D., and Watson, I. (1997) "Overturning Globalisation: Resisting the Teleological, Reclaiming the Political," *New Political Economy*, 2 (1): 179–195.
-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 (1974a)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and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 (1974b)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 (1987) "The Figures of Descent", *New Left Review*, 161.

Anderson, P., and Nairn, T. (1964)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Jan.–Feb.

Arendt, 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Arrighi, G. (1978)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Patrick Camiller, tran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rrighi, G. (1983)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London: Verso.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rthur, W.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y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ston, T., and Philpin, C. (ed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Avineri, S. (ed.) (1969)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Bachaus, J. (1992) "Fredrich Li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ve Tariffs," in T. Lowry (ed.),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ume VII*, 142–56, Aldershot: Edward Elgar.

Backhouse, R. E. (1994) "Mummery and Hobson's *The Physiology of Industry*," pp. 78–99 in John Pheby (ed.), *J. A. Hobson after Fifty Years: Freethinke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New York: St. Martin's.

Bailey, A., and Llobera, J. (eds.) (1981)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ailey, D., Harte, G., and Sugden, R. (1994) *Transnationals and Governments: Recent Politics in Japan, France,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 and Britain*. New York: Routledge.

Bairoch, P. (1993)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iroch, P. (1994) *Mythes et paradoxes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Banaji, J. (1983) "Gunder Frank in Retreat?" In Peter Limquenco and Bruce McFarlane (ed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Croom Helm.
- Baran, P. A.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 Bardhan, P. (1997)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1320–46.
- Barratt Brown, M. (1963) *After Imperialism*. London: Heinemann.
- Barratt Brown, M. (1970) *After Imperialism*. London: Merlin.
- Barratt Brown, M. (1972a) "A Critique of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Roger Owen and Bob Sutcliffe,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 Barratt Brown, M. (1972b) *Essays on Imper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 Barratt Brown, M. (1974)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London and Baltimore: Penguin
- Barratt Brown, M. (1984) *Model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 Barratt Brown, M. (1988) "Away with all the Great Arches: Anderson's History of British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67.
- Barratt Brown, M. (1989)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 in England: A Reply to Geoffrey Ingham," *New Left Review*, 178.
- Barratt Brown, M. (1993) *Fair Trade: Reform and Rea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London: Zed Books.
- Barratt Brown, M. (1995) *Africa's Choices: After 30 Years of the World Bank*. London: Penguin.
- Barratt Brown, M. (1997) "An Africa Road to Development: Are we all Romantics?" *African Studies Lecture*, Leeds.
- Barratt Brown, M., and Tiffen, P. (1992) *Short Changed: Africa and World Trade*. London: Pluto Press.
- Basu, K. (1997) *Analy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Bauer, Otto. (1907)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Ignaz Brand.

Bawtree, V. See Rahnama, M. and Bawtree (1997).

Beach, W. E. (1935) *British International Gold Movements and Banking Policy, 1881-191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ard, C., and Smith, G. H. E. (1934)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Beaud, M. (1989) *L'économie monde dans les années 80*. Paris: La découverte.

Becker, D. G. et al. (1987)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Bernal, M. (1987) *Black Athena, Vol. 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Bernstein, R., and Munro, R.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Bertram, C. (199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183: 116-28.

Bhagwati, J. (1982)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988-1002.

Blackstock, P., and Hoselitz, F. (eds.) (1953) *The Russian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Blaut, J. (1976) "Where Was Capitalism Born?" *Antipode*, 8, 2: 1-11.

Blaut, J. (1987) *The National Question: Decoloniz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Blaut, J. (1989)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Science & Society*, 53, 3: 250-296.

Blaut, J.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Guilford.

Blaut, J. (1994) "Robert Brenner in the Tunnel of Time," *Antipode*, 26, 4: 351-374.

Blaut, J. (1997) "Evaluating Imperialism," *Science & Society*, 61: 382-393.

Blaut, J., Amin, S., Dodgson, R., Frank, A. G., Palan, R., and Taylor, P. (1992) *Fourteen Ninety-Two: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ocentrism, and History*,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Bleaney, M. (1976) *Underconsumption Theory: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Block, F. L. (1977)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one, C. (1992) *Merchant Capital and the Roots of State Power in Senegal, 1930–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th, D. (1985)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Sociology: Interpreting the Impasse." *World Development*, 13 (7): 761–787.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Braudel, F. (1979)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 – XVII siècles*, 3 vols. Paris: Armand Colin.

Brenner, R.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 25–93.

Brewer, A.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Brewer, A. (199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rezekinski, Z. et al. (1996)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Leadership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B. H. (1943) *The Tariff Reform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881–189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undtland, G. H.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kharin, N. (1915)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Merlin, 1972, an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29.

Bukharin, N. (1917)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Merlin, 1972.

- Cain, P. J. (1978) "J.A. Hobson, Cobdenism, and the Radical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 4: 463–490.
- Cain, P. J. (1985) "Hobson, Wilshire, and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7, 3: 455–560.
- Cain, P. J. (1990) "Variations on a Famous Theme: Hob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erialism," pp. 31–53 in Michael Freeden (ed.), *Reappraising J. A. Hobson: Humanism and Welfare*. London: Unwin Hyman, pp. 31–53.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8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vember.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87)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I New Imperialism, 185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February.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93a)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1993b)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Cairncross, A. K. (1953)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 Studies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ón, F., Piscitelli, A., and Reyna, J. L. (1992) "Social Movements: Actors, Theories, Expectations," in Antonio Escobar and Sonia Alvarez (eds.),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 Calderón, F. (1986) "Los movimientos sociales ante la crisis," in Fernando Calderón (ed.), *Los movimientos sociales ante la crisis*. Buenos Aires: CLACSO.
- Caldwell, M. (1977) *The Wealth of Some Nations*. London: Zed Press.
- Cammack, P. (1997) "Cardoso's Political Project in Brazil: The Limit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Leo Panitch (ed.),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aputo, O., and Pizzaro, R. (1974) *Dependencia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osta Rica: Ediciones Educa.
- Cardoso, F. H. (1972)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 (July–August): 83–95.
- Cardoso, F. H. (1977) "The Consumption of Dependency Theory in the U.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2 (3): 7–24.

- Cardoso, F. H. (1993) "North-South Relations in the Present Context: A New Dependency?" in Martin Carnoy, Manuel Castells, Stephen Cohen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eds.),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ardoso, F. H.,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anova, P. G. et al. (ed.) (1994) *Etat et politique dans le tiers monde*. Paris: L'Harmattan.
- Castañeda, J., and Hett, E. (1981) *El economismo dependientista*. Mexico: Siglo XXI.
- Castells, M. (1993) "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Martin Carnoy et al.,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Reflections on Our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 (1998)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3: End of Millenium*. Oxford: Blackwell.
- Castley, R. J. (1996) "The Role of Japanese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uth Korea's Manufacturing Sector," *Policy Development Review*, 14, 1.
- Cerny, P. (1999)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Market Structure and Policy Response," *Policy Sciences*, 27, 4: 24.
- Chesnais, F. (1994)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Syros.
- Chick, V. (1996) "Equilibrium and Determination in Open Systems: the Case of the General Theory,"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25, (Winter-Summer) 184-189.
- Chilcote, R. H. (1984)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 Chilcote, R. H. (1994)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Reconsidered*,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hilcote, R. H. (ed.) (1981) *Dependency and Marxism.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homsky, N. (1991)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Verso.
- Chomsky, N. (1993)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 Chomsky, N. (1996)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P. (1990) "Hobson and Keynes as Economic Heretics," pp. 100–115 in Michael Freedman (ed.), *Reappraising J. A. Hobson: Humanism and Welfare*. London: Unwin Hyman.
- Cohen, B. J. (1973)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hen, S. F. (1973)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olc, G. D. H., and Postgate, R. (1946) *The Common People, 1746–1946*. Methuen.
- Cole, W. A. See Phyllis Deane.
- Collins, R. M. (1981)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 1929–196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mfort, A. (1976) *Man and Society*. London: Mitchell Beasley, Joy of Knowledge Library.
- Corrigan, P., and Sayer, D. (1985) *The Great Arch*, Oxford.
- Cottrell, P. L. (1991) "Great Britain," pp. 25–47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1870–1914*, Rondo Cameron and V. I. Bovykin (eds.).
- Court, W. H. B. (1938) *The Rise of the Midland Industries, 1600–1838*. Cambridge.
- Cox, R. W. (1994) *Power and Profits: U.S. Policy in Central America*.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Cox, R. W. (ed.) (1996)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rafts, N. J. R. (1997) "Some Dimension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0, 4.
- 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cific Rim" in R. A. Palat, *Pacific 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Macmillan.
- Daniels, P., and Lever, W. F. (ed.) (1996) *The Glob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Longman.
- Darity, W. Jr. (1992) "A Model of 'Original Sin': Rise of the West and Lag of the Re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104th Annual Meeting, 82, 2: 163-167.
- Darity, W. Jr., and Horn, B. L. (1988) *The Loan Pushers: The Role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International Debt Crisi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Dasgupta, B. (1998) *Structural Adjustment, Global Trade,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 Daunton, M. J. (1989)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Industry, 1820-1914,"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February.
- Davidson, B. (1978)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 Davidson, B. (1984) *The Story of Africa*. London: Mitchell Beasley.
- Davidson, B. (1992) *The Black Man's Burden and the Curse of the Nation State*. Times Books and James Currey.
- Davidson, B. (1995) *The Search for Africa*. New York: Times Books.
- Davidson, P. (1991) *Post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eory: A Foundation for Successful Economic Polic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Edward Elgar.
- Davis, H. (1978)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Davis, L. E., and Huttenback, R. A. (1986)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60-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la Peña, S. (1994) "Las transfiguraciones del capita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1 (Jan-March): 183-193.
- De Ste Croix, G. (1981)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Deane, P., and Cole, W. A. (1964)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Ehrenreich, J. (1983) "Socialism, Nationalism,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 1–40.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Emmanuel, A. (1972a)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Left Books and Monthly Review Press.

Emmanuel, A. (1972b) "Whit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Myth of Investment Imp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73.

Engels, F.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Stuttgart: Dietz.

Engels, F. (1974) "What Have the Working Classes To Do with Poland?" in D. Fernbach (ed.), *Karl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New York: Vintage.

Erich, A. (1960)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scobar, A. (1984)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to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0, 3: 377–400.

Esteva, G. (1992) "Development" in Wolfgang Sach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London: Zed Books.

Etherington, N. (1982) "Reconsidering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21: 1–36.

Etherington, N. (1983)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1: 38–62.

Etherington, N. (1984)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War, Conquest, and Capital*. London: Croom Helm.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 Rueschemeyer, D., and Skocpol, T.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nstein, C. (1972) *National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 1855–1965*. Cambridge.

Feis, H. (1930)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Feldstein, M., and Horioka, C. (1980)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Economic Journal*, 90: 314–29.
- Ferguson, T. (1995) *The 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eldhouse, D. K. (1961)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14, 2: 187–209.
- Fieldhouse, D. K. (1973)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Weidenfeld.
- Filtzer, D. (1979) "Introduction," *The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Selected Essays* by E. A. Preobrashensky.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 Finley, M. (1981)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ischer, F. (1974) *World Power or Decline — The Controversy ov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Norton.
- Floud, R. C. See D. McCloskey.
- Fordham, B. (1998) *Building the Cold War Consensu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Foster, J. B. (1986)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 Frank, A. G.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7–31.
- Frank, A. 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 Frank, A. G. (1969a)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dern Reader Paperbacks.
- Frank, A. G. (1969b)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 A. G. (1971)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London: Penguin.

- Frank, A. G. (1977) "Dependence Is Dead, Long Live Dependence and the Class Struggle: An Answer to Critics," *World Development*, 5 (4).
- Frank, A. G. (1978a)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 Frank, A. G. (1978b)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 A. G. (1984) *Critique and Anti-Critique: Essays on Dependence and Reformism*. London: Macmillan.
- Frank, A. G. (1991)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10, 3.
- Frank, A. G. (1992) "Fourteen Ninety-Two Once Again," *Political Geography*, 11: 386–393.
- Frank, A. G. (1998) *Re-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anklin, J. (1989) *A Gentleman's Country House and Its Plan, 1835–1914*, quoted in Saville (1988).
- Freedman, M. (1994) "J.A. Hobson as a Political Theorist," pp. 19–33 in *J. A. Hobson after Fifty Years*, ed. John Pheby,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 Freyer, T. (1992) *Regulating Big Business: Antitrust i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 188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G., and Friedman, M. (1996) *The Future of War*. New York: Crown.
- Friedman, G., and Lebard, M. (1991)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Furedi, F. (1994) *The New Ideology of Imperialism. Renewing the Moral Imperative*. London: Pluto Press.
- Galeano, E. (1972) *The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allagher, J., and Robinson, R.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6, 1: 1–15.

- García Canclini, N. (1995) *Culturas híbridas. Estrategias para entrar y salir de la modernidad*.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 Garten, J. (1992) *A Cold Peace: America, Japan, Germany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 S. (1988) *A Fate Worse Than Deb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eorge, S. (ed.) (1992) *The Debt Boomerang*. London: Pluto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bbs, D. N.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 Mines, Money, and U.S. Policy in the Congo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1987)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pin, R.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delier, M. (1969) *El modo de producción asiático*. Barcelona: Martínez Roca.
- Godelier, M. (1981)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Bailey, A., and Llobera, J. (eds.),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ompert, D., and Larabec, F. (eds.) (1997)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nzález Casanova, P. (1969)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et al. (eds.), *Latin American Radic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ramsci, A. (1988)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edited by D. Forgacs. New York: Schocken.

导 言

罗纳德·H. 奇尔科特

这本书根源于几种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第一，其出发点是这样的基本前提，即演进之中和已经巩固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构成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问题和理论的基础。第二，这本书认为，制定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应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大卫·李嘉图、亚丹·斯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例如，马克思大量地使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他从资本积累、商品化、流通、生产、利润的最大化等方面，集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第三，这本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和生产力及生产工具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了爱尔兰和印度受到的这些影响：他们估计，在印度，资本主义将扫除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的遗产并促进社会进步，而在爱尔兰，保护措施可能将允许爱尔兰在其主导它的邻国英国面前实现自主的发展（莫赫里，1989）。

在 20 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论，都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对帝皇制欧洲和其殖民地的影响。多数理论谴责帝国主义，然而，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散发出来的关于发展的流行思想，在传统上倾向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积极的趋势能够扩散到世界上不那么发达和更贫穷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帝国和帝国主义阴谋崩溃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都开始对扩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质疑。它们在寻求对自己的贫困、受剥削和缺乏发展的解释时，在关于资本主义的文献中，找到了进行批判的材料。然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欠发达状态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因此，在1945年后，知识分子们的确为推出新的替代性思想和理论而努力工作。

致力于描写帝国主义的传统作者们，写的是非资本主义世界所受到的剥削。致力于描写欠发达状态和依附性的当代作者们，也涉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社会形式。就这些传统的和当代的作者而言，他们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或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前者倾向于强调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外部特点，而后者试图将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方面。有时他们提供的文章的论战性特点多于实质性和理论性的特点，但他们的讨论所使用的话语，不管它是围绕帝国主义还是围绕发展问题展开的，都要么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结果，要么与其消极后果，相一致起来了。在围绕帝国主义的讨论变成论战的地方，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转向了发展和关于欠发达及依附性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转移到别的问题。

在70或80年代后期，随着专制政权的崩溃——首先是在曾经受独裁政权统治的南欧和南美南部的圆锥形地区，其次是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了的东欧和苏联——这种讨论发生了变化。即使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对世界许多地方的为解决内部经济困难而斗争的国家进行可观的控制。伴随着政治开放的情况是：多数国家在选择解决本国发展问题的办法时，不再争取从内部推动独立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向了世界经济，其手段是解散国家的

公共企业和向外部世界开放贸易。在 90 年代，关于发展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开始吸收全球化这个术语，用它表达到处渗透和扩展的世界经济，但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及其影响。不管我们研究的是跨国公司还是多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还是金融资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认识到，世界经济和全球的体系，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至少从马克思的年代起，一直是这样的。^①

这本书从上述这样的观点出发，而本导言试图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刊登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归纳分类为三类。第一，它们当中的多数文章回顾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并对它们在理解 19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面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重新解释。第二，若干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既成为帝国主义又成为发展理论的基础的。第三，一些文章探讨了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并研究和批判性地分析像全球化那样的替代性理论提法。

帝国主义：遗产及当代意义

帝国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IMPERATOR 一词，它表达的

① 这篇导言是对我过去的一些著作的补充。本书的许多课题都在那些著作里加以讨论。从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内容很广泛的著作里援引一些观点的目的在丁，要向读者介绍围绕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的不同线条，还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重新研究这些早期传统认识，读者就能够适当地对付当代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另外还将开始注意到，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是如何经常地反映当代关于发展课题和问题的辩论的。在将由博德—西景 (BOULDER - WESTVIEW) 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里的由罗纳德·H. 奇尔科特写的题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第 5 章里，有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扩展的文章。在人类出版社 (HUMANITY PRESS) 将出版的罗纳德·H. 奇尔科特主编的《帝国主义》一书里，将刊登以前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著作的选编。

含义是专制的权力和集中的政府。按照其广义上的含义，帝国主义一词涉及“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群对其他国家或人群的统治，而其统治方式使前者得到好处，而后者往往受到损害”（格里芬和古尔里，1985，第1091页）。在罗马帝国时代，帝国主义加强了传统地方统治的等级制度，而现代帝国主义在从属于它的居民中造就了新的权力基础。例如在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这个词是与那些希望恢复拿破仑帝国的人们相联系的，而在1848年后，它被贬义地用来描述拿破仑·波拿巴的主张。在19世纪70年代，它被用来说明正在扩张的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径的特征，在19世纪末，它常常被用于说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科亨，1973，第10~11页）。

帝国主义一词的传统的或旧的含义与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在一起。从大约1500~1800年，在重商主义初期，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西班牙的统治，在更小的程度上，其基础也是葡萄牙的统治。当时西班牙控制着南美的贵重金属，葡萄牙在非洲、亚洲和拉美有商业联络点，经营着香料、奴隶和象牙的生意。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个王朝被统一在西班牙的控制下时，葡萄牙的霸权大部分向西班牙让步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对海上运输的控制后，随着奴隶从非洲被运往美洲，糖从美洲被运往欧洲，制成品从欧洲被运往亚洲，先是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最后是法国人，都扩展了自己的影响。

这种旧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被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取代了。新的帝国主义概念一般指的是发达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激烈竞争，其象征是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对非洲的瓜分，但在19和20世纪之交期间，这种瓜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在这种转变中凸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8世纪晚期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初级产品的欠发达国家和工业化

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在 19 世纪末美国和欧洲扩张的事业；作为一个资本积累者的大公司和其对帝国主义的影响；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苏联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巴拉特·布朗，1974）。

这种历史背景和各种各样的解释，为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背景，这些概念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概念。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以下这些人：

J. A. 霍布逊，英国自由主义者，强调必须用消费不足理论解释问题。

鲁道夫·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是金融资本。

尼古拉·布哈林，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把积累与世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主张一种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并预言了通过渐进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和平的过渡。

弗·伊·列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强调的是垄断资本。

罗莎·卢森堡，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是宗主国里的积累。

约瑟夫·熊彼德，经济学家，预言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将消失。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方面有分歧。列宁受到霍布逊的影响，与希法亭和布哈林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它们后来成为对帝国主义的一种传统的理解，它们强调的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在一起后形成的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的扩张以及军事生产和军国主义的增长。虽然霍布逊、考茨基和熊彼德在其很多方面有不同观点，但是，他们都预言，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要么改革或者要么自然演变，帝

国主义将受到遏制和甚至可能消失。其他的学者却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主张把建立社会主义这种结果作为完全消灭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

在这本论文集里，有4篇文章用回顾历史的方法，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特别是它在19和20世纪中的本质和影响。通过对它们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归纳，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围绕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格里高里·诺维尔的文章对霍布逊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和温和的辩护。霍布逊是一个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诺维尔在其他地方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霍布逊的文章。他探讨了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逻辑，提出这个概念对于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有用的。他重点注意的问题是关于消费不足的思想。霍布逊曾经使用它作为他的一个论点的依据，这个论点是，英国应该停止在海外的帝国主义剥削，而转到集中建设国内市场，以消费生产的任何多余商品。诺维尔既研究霍布逊提出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中的观点，又研究其中的问题。他对在奈梅尔斯、卡拉格尔、鲁宾逊、爱德尔斯坦以及费尔德豪斯所发表的批判文章中反对霍布逊的意见进行了评价。此时他建立了为霍布逊进行辩护的框架，还争辩说，现在需要提出一种后霍布逊主义的观点，它的内容应该涉及“能够促进军事综合体的需求得以扩大的效应”和“在所夺取的地区和夺取它们的经济动机之间缺少相关性的问题”。此外，他提出，与自由贸易及银行业在英国的集中相结合的卡特尔化，可能破坏了在国内的投资。他还提出，像乔万尼·阿里齐和伊曼努尔·华勒斯坦那样的作者，成功地超越了霍布逊的帝国主义模式。还说，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都能够超越霍布逊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

迈克尔·巴拉特·布朗过去写了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这次他提供了对自己以前的思想的回顾。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对帝国

主义的看法，即认为，它是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并把它视为工业资本的竞争性的积累过程在全世界的扩张。这种帝国主义采取了两种形式，即在欧洲之内和之外的欧洲人集团，分别建立了自身的资本积累体系，由依赖于欧洲的殖民地 toward 欧洲提供原料。一些欧洲人最初是作为在美国和在英国的自治领地的移民安扎下来了，但后来他们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进行了独立的资本积累。与此不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大部分采取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其中还混杂着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形态。

巴拉特·布朗在对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大量著作和对一般发展学的兴衰进行批判性评估时，再次确认他的早期判断大部分是成立的。第一，帝国和帝国主义首先是对经济问题的反应。但是，他也承认，他应该像贝西尔·达维德逊那样的作者所做的那样，更恰如其分地对待帝国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那些作者研究了比如说殖民主义对非洲文化的影响。第二，从地理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的解释，可以以资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为依据，并且说明欧洲为什么兴起和非洲为什么衰落。对于农业上的差异为什么在欧洲特别地重要，而在亚洲并非如此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亚洲有灌溉的河流农业导致产生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以及要保护自己对付游牧民族的入侵，以致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了干扰；而在欧洲，由雨水提供所需要的水的农业，导致产生了权力分散的经济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第三，民族企业互相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它与国家的支持一起组成了 19 世纪晚期的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在这里，巴拉特·布朗试图否定这样的论点，即在 1860 年之后的英帝国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的权力和压力的结果。他也反对这样的看法，即 19 世纪形成的“绅士般帝国主义”，是权力已经顺利地从一个更早的阶段中掌权的经营商业和拥有土地的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金融资本的精英们

手中的结果。最后，他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原来的殖民地的人民也继续受到剥削，这种情况的基础在于殖民地时期的商业关系和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了，它们得到了在原来的殖民地里兴起的商业和地主家族的支持，从而保证了向原来的殖民主义列强的原材料供应。在这一点上，他对贪污、直接的剥削形式以及外债进行了揭露。他提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有关国家带来的破坏比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要大。历史并没有结束，如果要维持地球上的生命，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此外，虽然帝国主义的进程阻碍了南方国家人民的进步，但是，北方国家的人民未必因此就得到了什么好处。北方国家经济的进步主要根源于北方国家人民自己劳动的生产效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的扩大，不是根源于殖民地的被拖延的发展。他认为，尽管帝国主义带来了不平等，但在一切地方都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状况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新的强有力的势力在成长，这不仅有益于促进人们对不公正的觉醒，而且也有益于寻找可持续性的发展，并找到建立在平等交换基础之上的替代性贸易形式。

由迈克尔·霍华德和J.E.金提供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性归纳，在其开端讨论的是马克思和他最初围绕关于资本主义积累是与强制性措施相辅相成的思想而提出的粗糙提法；然后该归纳转到传统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垄断化和对稳定的霸权的追求；该归纳的结尾则关注了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和保尔·巴兰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们通过集中研究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与更早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相比较是“新的角度”，取得了“重要的进步”。霍华德和金暗示，这些进步揭露了马克思的观点中某些错误的看法，但他们也继而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批评了后者没有分析苏联的生产方式或者后者对沿着苏联路线的独立发展过于偏好。尽管霍华德和金做了如

上的分析，但是，他们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谈的是分歧、紧张的关系，甚至暴力冲突，而没有谈今天看上去正在发生的一体化和统一。他们提出，“传统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和新帝国主义的继续存在，都不能作为一种关于极糟社会的幻想而加以否定。”

安东尼·布鲁维尔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归纳和评估里，讨论了3个问题：欧洲为什么能够取得统治地位，欧洲为什么对于在种族和文化上不同于欧洲的地区实行了殖民主义；所建立的帝国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不同部分在财产上的差别负责；鉴于殖民帝国已经崩溃，今天帝国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他具体地集中考虑英国的经验。他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经验中的得与失，提出，虽然殖民主义阻碍了殖民地获得技术进步的好处，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是无国主义者而发财的。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影响的分析有点模棱两可，因为，他对支持帝国主义有进步性的材料提出了疑问，而且看上去靠近了这样的观点，即他认为，殖民地受到折磨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现代化的好处没有涉及它们，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发展的好处很明显。他相信，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帝国的存在很脆弱，而且，因为有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对建立民族国家和民主的追求，维持帝国主义的费用很巨大。在争取独立的斗争获胜之后的时期里，世界上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他强烈提出，认为世界经济对穷国有偏见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在第三世界里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很不清楚的问题。他说：“所有的证明材料表明，从长远看，帝国对帝国主义中心的发展的影响是很小的。”今天的新特点是，世界经济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这非常像20世纪初的欧洲那样。尽管帝国主义很粗野，在发展上不平等，有挫折和危机，但同时也很清楚的是，落后地区能够追上欧洲的进步。

帝国主义和发展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和欠发达状况受到了关注，在这过程中，过去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and 思想，其中有一些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又被人们重新提出来了，从而重新出现了。然而，在历史文献中，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很少，因此，在当代的作者中，很少有人明确寻找早期的思想和把理论建立在过去的辩论的基础之上。

安东尼·布鲁维尔（1990）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外，他的归纳的基础是经典思想家的早期理论贡献，他把帝国主义和关于发展的文献相联系起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和欠发达状况的理论的演变进行了追索。布鲁维尔通过观察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和贡献，有效地说明了这些论题。在这些思想家中，有马克思、卢森堡、霍布逊、希法亭、布哈林、列宁等经典思想家，有巴兰、弗朗克、阿明、华勒斯坦、埃曼努尔、雷伊等当代思想家。

乔万尼·阿里齐也对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and 关于发展的理论之间的联系的理解作出了贡献。他考察了J.A. 霍布逊的思想中的帝国主义概念的极限和模棱两可的性质，试图通过对列宁的研究来重新制定该概念（阿里齐，1978、1983）。最近，他探究了在过去的700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兴衰，他的依据是这样的前提，即金融资本未必是像列宁、希法亭等提出的那样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事实上它是一直存在的和不断重现的一个现象，从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出现时到当代，它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特点，阿里齐没有把自己的分析局限于仅仅根据20世纪情况来确立概念的较传统做法，而使自己对历史的归纳包括了关于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战略、成功和衰落的历史分析。他的

综合归纳和历史归纳提醒了读者，要重新思考在历史较长的时期里的历史发展，要重新思考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的兴衰的案例研究（阿里齐，1994）。

其他一些著作也支持我们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的前提，其中，普拉帕特·帕特奈克（1995b）在自己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帝国主义究竟变成了什么？比尔·沃伦（1980）从略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写文章，他强调指出，帝国主义需要扩张，并主张让一种进步的资本主义渗入落后地区，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植入前资本主义的或早期的资本主义地区。

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制定了一些与现存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偏离的前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反映着很多关于帝国主义和西方的统治的观点。在过去的理论中，有很多有创新的贡献，其中首先是早期的著作。例如保尔·巴兰（1957）的著作，它们倾向于把讨论的焦点放在落后、不平等、剥削和欠发达状况上，并且通过强调帝国主义的作用，而不是通过依靠对封建主义和具有两重性的社会的解释，来向传统的保守和激进的解释进行挑战（斯特恩，1988）。人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和关于发展和不发达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理论带来了很多好处。两位思想家偏离了帝国主义论，他们是鲁伊·莫罗·马里尼（1978）和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1972），前者制定了关于亚帝国主义的理论，其依据是巴西军人在1964年到1985年之间的独裁时期里的扩张主义计划和行动；后者提出了关于联合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其依据部分地来源于他阅读的列宁著作（帕尔马在1978年研究列宁的思想，以寻找关于欠发达状况在理论上的根源）。

其他一些历史上的考虑，可以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和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首先，确认历史阶段可以有帮助。从传统上看，

帝国主义的旧含义与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有联系。哈里·马格多夫（1969、1978）把它分成3个时期：从15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中期：在这个时期里，欧洲致力于开发新发现的地区的资源；从1650~1770年：这是剥削奴隶劳动和代表领先的欧洲列强寻找商品的时期；从1770年到大约1870年：这时英国在失去其在美洲的殖民地后，转向了亚洲和非洲。然而，旧的含义被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理解所超越，该新的理解是在19世纪末形成的，当时，发达的欧洲国家互相激烈地争夺非洲。新帝国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对贸易的主导转向了对工业变革的控制，后者与工业革命和欧洲走向制造业的冲击相联系，这种发展迫使欧洲在边缘地带夺取原材料和开展世界市场。新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涉及的主导势力，主要是英国，后来则是美国。更晚期的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尾，是以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崛起为特点的，这些公司的影响扩展到了超越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国界之外。

在关于发展问题的文献中，有时也出现类似的时期划分。例如，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利用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提纲研究问题，该提纲的依据是历史上的各种依附性形式：在对殖民地社会里的土地、矿山和劳动力建立了贸易垄断时形成的依附性；随着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期形成的、并且导致了大资本在霸权中心地区的统治和在国外的扩张的工业对金融界的依附性；在跨国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方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向了欠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时形成的一种新形式的依附性。他把这种新的依附性描述成为取决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与依附于它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致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扩张能够对依附于它们的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多斯桑托斯，1970）。

第二，在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理论的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

二元对立：政治上的（大都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对立）、地理上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对立）、经济上的（发展与欠发达状况之间的对立）。在早期的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经常看到大都市和卫星城市这两个术语，但一般用殖民地替代卫星城市。霍布逊、列宁和多数研究帝国主义的作者都使用过这些术语，而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在把世界的许多部分的落后状况解释为是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时，也使用了这些术语（1966）。弗朗克争辩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剩余被剥夺了，而这导致了大都市中心地区得到发展，而边缘上的卫星城市却陷入了欠发达的状况。这种论断与罗莎·卢森堡所做的关于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对原始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明显地沿用了保尔·巴兰的经典研究成果，该项研究影响了拉美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使他们去研究他称之为落后状况的形态学的问题，并且去写作大量关于依附性和欠发达状况的文章。巴兰作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和依附的国家没有办法得到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得到的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源”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发展面临的障碍，与200或300年前遇到的障碍相比较，只有很少的共同点”（1957，第16页）。这种思想成为一系列很重要的关于地区问题的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些项目包括：弗朗克（1967）做的关于拉美的研究、沃尔特·罗德尼（1974）做的关于非洲的研究、马尔科姆·卡尔德威尔（1977）做的关于亚洲的研究以及曼宁·马拉布勒（1983）做的关于美国黑人的研究。

关于大都市和卫星城市的术语成为了墨西哥政治社会学家帕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1969）制定的折衷主义理论的基础。国内的殖民主义涉及了单一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 and 处于边缘地位的集团。他的理论忽视了外在的帝国主义，因为，墨西哥通过1938年的对外国的石油利益的国有化，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实

现了自己的独立。但是，该理论承认在国家内部可以见到资本的统治，其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墨西哥城大都市里的垄断势力，对被排挤在边缘地带的印地安人社团的统治。被排挤在边缘地带的卫星城市的欠发达状况，是它们被正在发展的大都市的剥削和它们对该大都市的依附的结果。在60和70年代里，该思想也被美国学者运用于对北美的贫民窟和讲西班牙语人居住的地方的落后条件进行的分析。

较陈旧的关于大都市和卫星城市或殖民地的术语，逐渐地演变成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这些术语，后者成为了当代通用的、把发达工业国家与在第三世界里进行斗争的欠发达和穷国互相区分开来的术语。这些结构性的区分被纳入了把所强调的重点从外在因素转移到内在因素的一个过程之中，特别是拉美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这种转移，其中很多人接受了新的术语，从传统上关心帝国主义转到了关心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破坏。例如，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施是第一个停止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他后来把世界划分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他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常常被称为向内的的发展，暗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把外资挡住，通过建立关税壁垒实现独立的或国内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实行进口替代以刺激生产。殖民地历史学家塞尔乔·巴古通过从1944~1946年在美国的讲学把自己的思想提出来。他强调指出，欧洲统治了国际市场，靠依附性的关系塑造了殖民地的经济的结构。在1947年，法律教授西尔维约·弗隆迪齐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依附性和欠发达状况，研究的课题是两个帝国主义势力——即英国的商业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工业帝国主义——对阿根廷的影响。

第三种历史考虑，来源于大量的有关不平等或不平衡发展的国际后只的文献。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时，观察到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在列宁对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的分析中，列宁

(1899)发现了说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同时存在的证据，他后来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1916)里，讨论了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垄断。萨米尔·阿明在他的关于世界范围的积累的雄心勃勃的著作(1974)里，援引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他把世界视为由发达和欠发达社会组成的，其中一些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些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它们都在全球范围的商业和金融的资本主义网络中一体化。后来阿明(1976)从经济的不同部门的互相脱节、来自外部的统治以及大型的国外工业公司造成的依附性这几个方面，分析了不平等的发展。其他的一些作者也采用了类似的术语，其中包括阿里齐·埃曼努尔(1972a)，他的关于不平等交换和帝国主义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刻画成正在渗入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的各个单位则是由国际劳动分工中专业化的差异和不平等的工资水平所区分的。埃尔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1975)，其论据是：一体化的国际体系的建立的后果是剩余资本必须从欠发达国家转移到工业化国家去。他的思想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相结合的和不平等的发展的理论，他争辩说，在不同的国家里，可以找得到最落后的和最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剥削的形式，而且是变化多端的形式，但是，在它们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它们有可能是互相联系的或互相结合的。在从前资本主义经济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里，可以看到有不同成分相结合的和不平衡的社会形态，以致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可能共存。

最后，**核心地区或大都市**和**边缘地区或卫星城市**在这些理论提法中的应用，一般是与对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强调相联系的，不是与对生产的强调相联系的，而多数人认为，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在边缘地带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或者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些理论一般可以靠它们的

主张来识别，它们要么主张选择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平道路（例如，这是普雷比施的主张），要么主张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革命的道路（这是弗朗克的主张）。另一种分歧出现在另外一些人的著作里。这些著作争辩说，一些国家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于消费主义不够发达，这种思想早就由霍布逊提出来，后来在许多重点研究市场和商业考虑的著作里被发挥起来了。例如，在解释边缘地带国家的欠发达状况时强调了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作用的弗朗克，还有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分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因此被指责把缺乏消费纳入了自己论据的保尔·斯威齐，都这样做了（布雷讷尔，1977）。主张走革命道路的那些人们，也倾向于重复过去的辩论，其基础是一些理想主义的想法，认为，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完全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例如，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民粹派就是这样的）。

本书的某些作者在研究帝国主义和发展时援引这些共同点。例如，约翰·威洛拜评论了对关于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的理论的早期贡献，他从亚丹·斯密、李嘉图和其他的经典思想家开始，然后转到马克思、列宁和卢森堡，他找出了他们的分歧点，还提出了他们是如何影响了早期的关于依附性的理论的。该文的许多内容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对在促进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强制手段的作用的关注，还集中探讨了列宁在其关于俄罗斯对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中对剥削的关切。威洛拜在研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讨论时，致力于发现旧传统，以使用它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虽然今天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早期的革命家们的思想继续塑造针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批判和辩论。

詹姆斯·布娄特批判性地研究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课题，系统地探索了现存对于理解任何地方的发展问题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系列问题的思想。他确认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来源于扩展主义的

欧洲解释，另一个来源于非扩展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前者优先研究处于历史过程中的欧洲和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后者反对这样的倾向。布娄特说明了扩展主义的潮流是如何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现代化理论而维持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和扩展主义的理论，在研究特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时，揭示了欧洲人强烈的偏见。在关于殖民主义的一个部分里，他援引了对立的观点，说明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要么倾向于支持殖民主义这个在现代世界上是最灾难性的扩展过程，要么对它抱有复杂的感情的。”在接着展开的讨论中，他把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相对照起来。他批评支持全球化的观点的人们把第三世界视为前资本主义的、从工业化和现代化得到了好处的、同时相应地改进了人民的生活条件的社会。他说，事实上，在那儿物质上的进步很小，即：“只有在很少的地区里出现了真正的工业化。”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提供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即把资本主义视为具有破坏性。研究帝国主义的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很久以前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同时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困化。他的分析说明，我们必须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以便让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影响时，能够变得更有意义。

罗纳尔多·蒙克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各个浪潮的评论中批判性地讨论了依附性理论的局限性。他的文章研究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依附性理论的插曲，以及关于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说成是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把依附论说成能够造成严重的停滞。他着手通过集中研究依附论的改良主义的、激进的和后发展的倾向来进行剖析。他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有益于对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的探索。他说明了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在整个后殖民主义

时代里，在西方的坐标系之内，来自第三世界的讨论中的最突出干预的代表之一”的。他确认了依附论的观点有几个类型：经济学家泽尔索·弗尔塔多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的路线是改良主义的，特约托尼约·多斯桑托斯和鲁伊·莫罗·马里尼的思想是激进的，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的历史结构分析是强调方法论的。

蒙克关于全球化的评论认为，这是“概念的膨胀”，与过去的依附论是相同的。他考虑它是个“不好的向导，不能很好地引导人们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批判性分析”，但有可能有益于理解“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他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有益于对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的探索，认为对全球化进行抵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将使反对派势力得到一定的加强。他主张更密切地观察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和提出后依附性的模式，其中要注意到社会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替代性的发展战略。他甚至预言依附论被存在被更新的可能性，使其精神以潜在的创造性的方式被继承下去。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还是 关于全球化的理论？

近几年来人们为超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一些努力，引起了辩论，这有时完全模糊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注意。作为争取清除一些模糊认识的努力，我现在想简短地讨论和批判性地分析4种理论，它们都把焦点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后果：各种世界体系、资本的国际化、后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这些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即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受到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和他的著名著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的影响的。该著作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发展。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以布劳代尔为自己楷模开展活动，用

核心地区（西北欧洲，那儿在农业生产中有水平很高的熟练个人）、边缘地区（东欧和早期的西半球，在后者那儿有奴隶制度、强迫性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劳动和粮食、棉花、糖等的出口）以及半边缘地区（地中海欧洲，在那儿的农业中有交谷租种田制度）这3个概念确定世界体系。因此，这3个范畴（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代表着3条走向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道路。

华勒斯坦在他的共计4卷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和此后）中，将历史发展与一个交换关系的网络联系起来，在该网络中，剩余资本倾向于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但是，它的概念是根据世界体系的术语确定的，不是根据其特定部分和内部结构确定的。华勒斯坦致力于探讨资本主义早期的根源，它从封建主义的过渡以及它的演变。在他的个人通信中，他解释说，他的理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受到依附论的影响。他提出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或者列宁都没有关系，帝国主义并非他最关心的问题。看来，关于体系的理论是致力于用新的概念超越更早期的思想的一种努力。因为关于世界体系的思想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顺利和直线式的，它在许多层次上都受到了批判，其中特别是布雷讷尔（1977）的批判很突出，但是，总的来说，它也对历史和社会分析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成为一个学派，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关于世界体系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书，另一部分是发表在华勒斯坦主编的刊物《评论》上。

第二种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资本的国际化的理论，它是克里斯蒂安·帕洛瓦在其著作《资本的国际ization》（1975）里研究的。帕洛瓦扩大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的范畴，以便能够对在国际层次上的资本运动和阶级斗争进行分析。像通过国际措施维持商品价格、资本的国际积累方式、生产和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等

那样概念，变成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研究方法的重点对像中，很多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方面，这些也是比尔·沃伦关心的问题，他（1980）争辩说，列宁歪曲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能够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里前进的看法。他相信，关于欠发达状况的理论仅仅是列宁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提出的思想的战后变种。沃伦相信，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里，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都存在良好的前景。沃伦对帝国主义的关心，与在马克思后研究帝国主义的思想家 and 他们的思想没有密切的关系，而与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迟早将扩展并到处改变生产关系。

然而，第三种建立理论的尝试体现在这样的努力之中，该努力的目的在于超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依附论关于资本主义影响下的欠发达状况的解释，并且实现朝后帝国主义方向的发展。贝克尔等（1987）争辩说，全球性的机构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资源和技术，来促进各种民族利益在新的国际基础上实现一体化；这迫使了公司把外国劳动力和管理放在依附的国家里，而且还要让当地人参与掌握公司的所有权。在那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两个部分：有特权的国民或由企业管理者组成的资产阶级，以及管理商业和跨国组织的外国公民。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成分跨越国界的聚合暗示着一个国际寡头集团正在形成。贝克尔认为，关于后帝国主义的理论，可以用来替代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列宁主义认识和关于依附性的正统理论。然而，国际资本主导了第三世界的局势，而且，可以用来证明管理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将取得霸权，或者其他阶级将被削弱，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将喜欢民主或者权威主义的事实很少。

最后，围绕全球化思想的辩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帝国主义转移过去了，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

义的世界，正在统一和协调地兴起。该辩论是在大众化的进步刊物里展开的，这些刊物中有比如说《Z 杂志》（请参阅赫尔曼，1997）和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每月评论》（请参阅匹文和克洛瓦德，1998；塔布，1997），另外也在威廉·鲁宾逊（1996）关于全球化和霸权的书里被加以研究。对全球化的注意，正如其他的进行革新和朝新的方向运动的尝试，倾向于模糊对帝国主义的注意。在本书里，萨米尔·阿明和詹姆斯·佩特拉斯对付了这个矛盾。

阿明确认全球化在古代就存在，而其形式的变化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该术语无论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还是与帝国主义的逻辑都没有联系。在古代，全球化为落后地区创造了机遇，使它们能够追上发达地区。与此相反，在当代，全球化的含义是，造成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他争辩说，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讨论，它被用于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的战略成为合法”。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与原先的殖民主义形式脱钩，美国作为某种超帝国主义列强兴起，帝国主义的冲突似乎消失了。他继续说，目前的制度，在其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力图在一切地方执行同样的政策，以便减少社会支出，减少国家的许多活动，并给富人带来好处。阿明表现得非常讨厌资本主义势力目前干的这些活动，但他感到遗憾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幻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能够有出路。

他相信，他所描述的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本身，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永久性的特征。他的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最终将瓦解地区性的组织和地区内的团结，并造成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反抗。他继续说，有 5 种垄断势力在“塑造导致两极分化的、当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它们是：新技术、资金的流动、自然资源、通讯和媒体以及大规模杀伤武

器。

阿明认为，这种全球化模式很脆弱，以致到处都在影响人们的生活的不人道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将推动人民反对垄断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运动将通过进步的民族主义演变发展，从而促进地区性的反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合作。这一切将构成他称之为“真正的多中心的世界”的状况，这种世界将迫使资本进行所需要的调整，使世界在其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到全球性的社会主义的漫长的过渡中，达到人道主义的要求。

普拉帕特·帕特奈克也表达这样的感情，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和其在国外的占领的著作，都是单独写的，没有与马克思在其一生中始终进行的对被理解为封闭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相联系。他把“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前景当做一个例外，认为该理论把进步的大都市经济的两面性经济理解为不同于落后的内在前资本主义结构。与此相反，他理解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和佩特拉斯及其他人一样，他反对这样的思想，即认为全球化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且或多或少将解决当代世界很多部分里存在的不平等并带来和谐的思想。他探讨全球化的后果，即其引起分裂和破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统一倾向。他呼吁，要通过进步力量开展的争取在第三世界实现民族的民主议事日程的斗争，来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反抗。

詹姆斯·佩特拉斯探讨的是这样的流行思想，即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取代了在历史上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资本流动、贸易及投资以及机构和权力的思想。在探讨全球化理论时，詹姆斯·佩特拉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是个传统手段，其用途在于给资本的流动提供一个框架，并在其力量不平等的国家、阶级和市场之间发生的冲突的背景下，确定资本主义的动力位置。他批判性地确认了全球化理论家们的基本前提，否认了这样的许诺，即关于它是有重新作用的事态发展和有能力

解释问题的一种理论的许诺。他证明了全球化理论是为旨在使阶级不平等在意识形态上的被合理化和掩盖当今世界许多现实情况而服务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他对权力、代表力量、阶级方面的不平等、收入和投资流等那样的术语的用法进行比较和对照时，他突出地指出了全球化概念在分析上的弱点和帝国主义的强大。

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帝国的和阶级的现象。它的支持者是农业贸易界和金融阶级、进口商、矿藏出口商、大的制造商以及残酷压榨工人血汗的工场主人。这些人得到了从属于他们的高级国家官员、学者、出版界的支持。商人阶级也主张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其对手包括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全球化政策的定义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处于中心地位的特点。

詹姆斯·佩特拉斯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球化进行了比较。他觉得，在过去，在出口商阶级占上风的时期，比如说在16和17世纪里，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和新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全球化的意义更大。在过去与今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一切地方，它作为惟一的经济制度存在着。此外，今天的全球化的一个新特点是资本流的容量、财富的跨国界的转移、大的组织网络、信息的传递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扩展都更大了。他抨击关于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和连续性的思想。他相信，该思想的支持者倒退到了技术决定论，没有看到过去的矛盾，特别是“过去的全球化扩张的让位”。

他的广泛的抨击给我们援引了大量的关于全球化论题的前提，然后他在结束抨击时关注了对全球化的反抗，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进行反抗，他们从维护受到全球化的统治阶级威胁的权利和利益入手。因此，他们抗议失业，抗议公共企业的私有化，抗议社会福利项目、退休金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被削减，抗议生活水平的下降，抗议教育项目的被削减，等等。这些力量

也和其他的环保的、争取妇女解放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结合成为一个联盟。他认为，这样的一些反抗是新的一些替代方案，它们的形式是反抗的集团和在进行斗争的运动在本国奋斗的项目。作为这样的替代运动，他认为，它们不同于非政府组织，因为，在它们与全球化的国家和阶级的对抗中，它们是“争取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它们的争取将可持续增长和经济民主相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的斗争中，它们在内部是民主和团结的。

总 结

霍华德和金对世界秩序的统一和和谐的一体化作用提出疑问，预言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和在将来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阿明预言，在美国主导下的那样的世界秩序，将爆发同样的反应，并争辩说，除非到处都实现有利于人民的调整 and 适应，加上不人道的条件得到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斗争将会兴起。詹姆斯·佩特拉斯跟着他们揭露这些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与布鲁维尔和巴拉特·布朗的观点有分歧，后两人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有进步的趋势。

霍华德和金批判性地把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与在发展经济学中形成的许多思想相联系起来，而在讨论过程中对它们提出疑问。但是，其他一些作者，其中特别是蒙克和威洛拜，接受某些发展理论的思想。同时把它们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相联系起来。布鲁维尔和巴拉特·布朗把英国的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从而在关于帝国主义的重大问题上，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在对霍布逊进行的分析中，既赞扬他，但又批判他的诺维尔，也从根本上离开欧洲的视角。阿明、帕特奈克、佩特拉斯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蒙克，都反映第三世界学者对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全球化

的意识形态看法相联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的批判。虽然从在本书里收集的多数文章中，或许都暗示了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结局，但只有阿明提出了关于实现从全球资本主义到全球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过渡的可能性。

